《中国体育通史》
总主编　崔乐泉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体育通史

ZHONG GUO TI YU TONG SHI

第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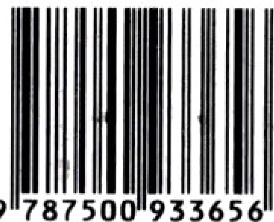
主编　罗时铭

人民体育出版社

中国体育通史

第三卷

ISBN 978-7-5009-3365-6



责任编辑 丛明礼
封面设计 刘 泉

定价:35.00 元

《中国体育通史》
总主编 崔乐泉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体育通史

ZHONG GUO TI YU TONG SHI

第三卷（1840-1926年）

主　　编　罗时铭
编写人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李　翔
李国玲
罗时铭
聂啸虎
崔　莉
潘　华

人民体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体育通史. 第三卷，1840—1926年 / 罗时铭主编.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ISBN 978-7-5009-3365-6

Ⅰ. 中… Ⅱ. 罗… Ⅲ. 体育运动史-中国-1840—1926
Ⅳ. G8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017703号

*

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

880×1230 32开本 12.75印张 342千字 插页6
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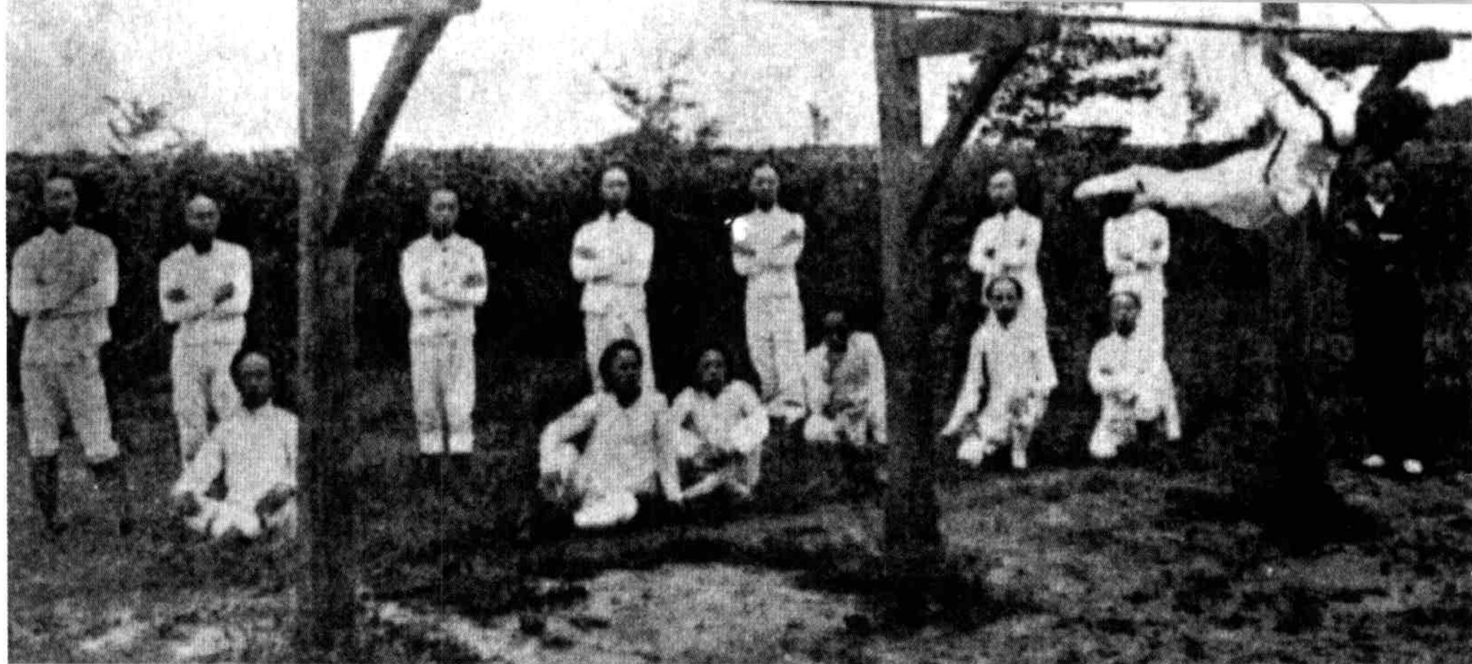
ISBN 978-7-5009-3365-6
本册定价：35.00元 全套定价：280.00元

社址：北京市崇文区体育馆路8号（天坛公园东门）
电话：67151482（发行部） 邮编：100061
传真：67151483 邮购：67143708

版画中描绘的清末放风筝活动

清末画报中描绘的华界龙门师范学校学生上体操课的情景

建于1860年的上海跑马场



清末的上海浦东中学学生正在练习器械体操——单杠



1902年圣约翰大学足球队



手持网球拍、身穿19世纪末期体操服的圣玛丽亚女校学生

20世纪初期，传统武术于西方近代体育传入中国的同时，也在社会各个层面得到了播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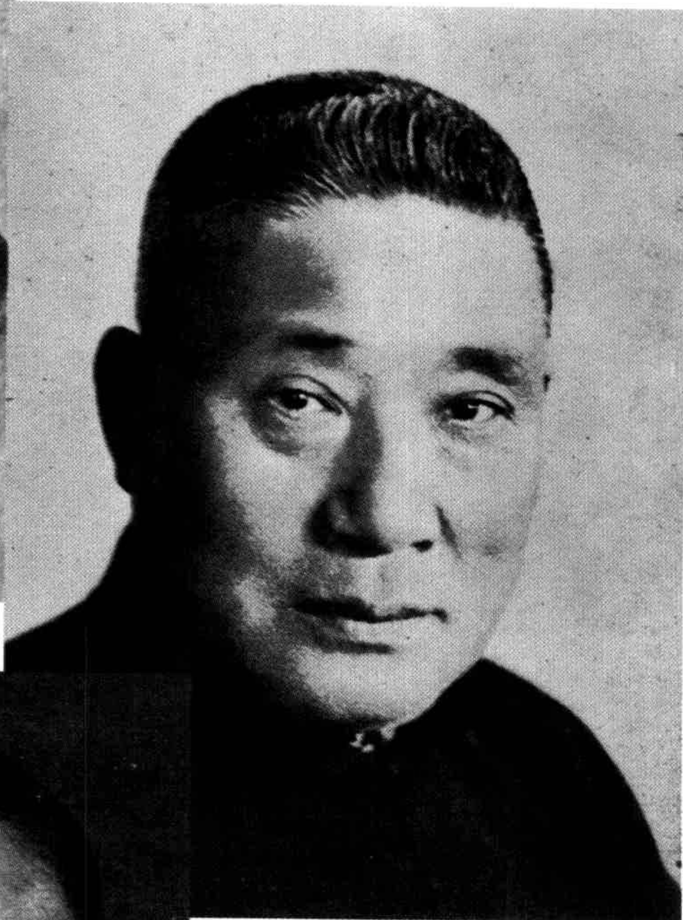
1914年中国体操学校创始人合影（前左一徐一冰、左二袁公诚，右一徐筑岩、右二瞿仲戌；后左王石士、后右王季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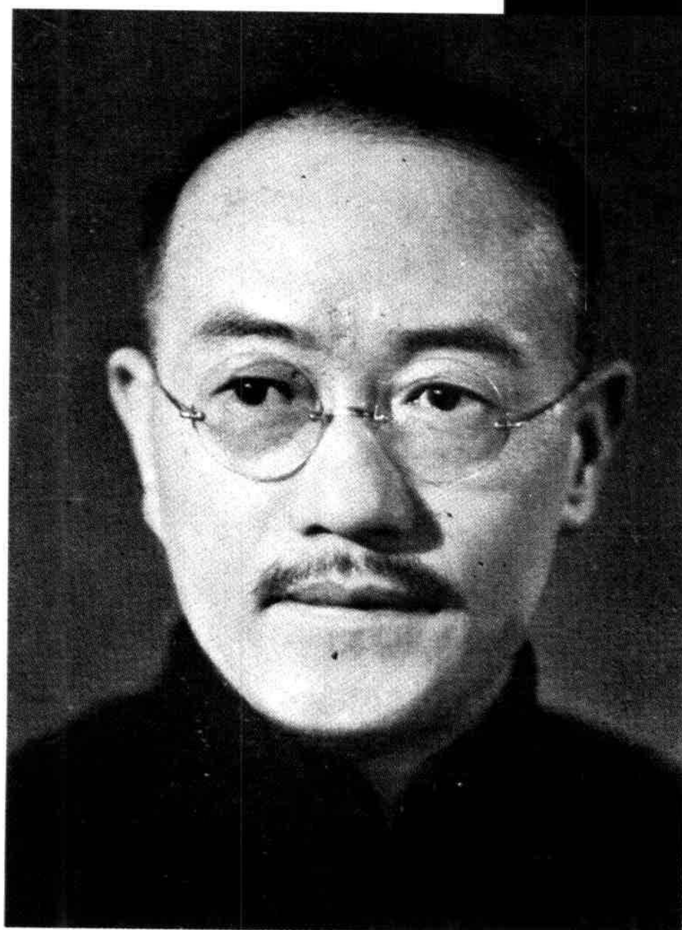
《体育杂志》1914年创刊于上海，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同类杂志之一。图为该社编辑徐一冰（左）、王均卿（右）



近代武术家霍元甲（1857－1910年）



近代教育家、体育倡导者张伯苓（1876－1951年）



体育活动家、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1882－1961年）



1916年，上海精武体操会改名为“精武体育会”，图为改名后的新会徽



1919 年第 4 届远东运动会上获得五项、十项全能冠军的著名运动员朱恩德

1919 年 3 月，上海东亚体专的学生在进行篮球比赛



20 世纪 20 年代参加跨栏比赛的东亚体专女学生



1924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部分董事合影（前排左起：冯少山、卢炜昌、沈嗣良。后排左起：陈时、张伯苓、王正廷）

上海中国女子体操学校的学生在1925年第7届远东运动会上参加 50 米预赛



前　言

体育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体育思想与实践的真实记录。体育史和体育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发现并揭示体育发展的规律，探索体育发展过程中各种问题的解决途径和方法，从而促进体育更加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其为人类的发展服务的目的。

中国体育史是世界体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体育史的研究，是随着西方体育的传入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步的。在此之前，尽管中国已有数千年注重修史的优良传统，但由于体育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因而也未能成为传统史学研究的对象。20世纪初期，清政府实行“新政”以后，各级各类普通学堂按照新的学堂章程相继设置了“体操”科目，一些专门培养体育人才的学堂设置了“体育史”课程。19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我国第一部体育史专著——《中国体育史》，就是郭希汾（绍虞）先生为爱国女学体育科和东亚体育学校开课准备的。此后，相关的研究成果亦有不少问世，体育史的论著和译著也逐渐增多，如1931年章辑五的《世界体育史略》、1945年程登科的《世界体育史纲要》等等。不过，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包括体育在内，都处于落后的状态，因而对中国体育史的研究也处于较低的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体育史研究有了较大发展。通过体育史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先后出版了许多有关中国体育历史的研究成果。尤其是随着近年来大批文献资料的积累、研究成果的不断问世以及相关考古资料的不断披露，使得中国体育历史的研

究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国运盛，体育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中国当代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悠久的中国体育历史文化开始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而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应用通史的形式，整理和传播具体的体育历史文化知识，则理所当然地成为一项时代的重要工程，也是体育史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基于上述考虑，2002 年我们提出了编撰《中国体育通史》的计划，通过论证准备，这一计划先后被批准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国家体育总局重点课题。

《中国体育通史》各卷分别对不同时代中国体育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研究和梳理。总体上，整个中国体育发展的历史，大致划分为中国古代体育、中国近代体育、中国当代体育 3 个大的历史阶段。

1. 中国古代体育（史前—1840 年）

中国古代体育，历经史前社会（— 前 2070 年）、夏（前 2070 — 前 1600 年）、商（前 1600 — 前 1046 年）、西周（前 1046 — 前 771 年）、东周（前 770 — 前 256 年）、秦（前 221 — 前 207 年）、汉（前 206 — 220 年）、三国（220 — 280 年）、两晋南北朝（256 — 589 年）、隋（581 — 618 年）、唐（618 — 907 年）、五代（907 — 960 年）、宋（960 — 1279 年）、辽（907 — 1125 年）、金（1115 — 1234 年）、元（1206 — 1368 年）、明（1368 — 1644 年）和清前期（1616 — 1840 年），为中国体育产生、发展和演变的重要历史时期。

历史的发展表明，人类的祖先大约在距今 300 万年前就已经生活在地球上了。在这漫长的历史中，仅史前社会所跨越的时间就占去了 99%。就其组织形式而言，这一社会形态先后经历了血缘家族社会、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 3 个社会发展时期；从经济发展与生产力水平来看，则先后经历了以采集、狩猎经济

为主的旧石器时代和以农业、畜牧业经济为主的新石器时代。在史前社会，原始形态的体育是随着劳动等社会生活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主要的表现就是在生产劳动、部落战争、日常生活中，逐渐产生了走、跑、射箭、攀登、搏斗、跳跃、舞蹈、导引等运动形式。这些原始形态的运动形式，为文明时代体育形态的出现揭开了序幕。

从公元前2070年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的建立，直到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历史上先后延续了夏、商、西周和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4个历史时期。这是我国文明社会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经济上，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进步为我国文明时代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政治上，华夏大地各部落相互融合，形成了华夏族，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壮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作为华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古代体育，随着频繁的战争、学校的兴起和各种宗教祭礼仪式的出现，也日益发展和丰富起来。尤其是战国时期思想文化上出现的“百家争鸣”局面，促使各家学说中的体育思想崭露头角。这些变化，对古代体育的初步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射箭、技击、赛车、游泳、奔跑、摔跤、技巧、导引、球戏、棋类活动以及各种体育思想在这个时期已初步形成。所有这些都标志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进步，为华夏民族体育的初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中国古代体育的雏形开始形成了。

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后，经过长期的发展，中国历史上先后经历了秦、西汉、东汉、三国和两晋南北朝几个时期。在这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带来了城市的初步繁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而体育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同样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形成了后世体育发展的基本格局。特别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各民族融合过程中，物质、文化的相互交流，推动了各民族体育的发展和交流，也为

体育活动增添了新的内容和色彩。

经过两晋南北朝将近四百年的长期封建割据战争之后，历史进入封建社会繁荣的隋唐五代时期。较为完备的封建体制、经济的高度发展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为体育的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对军事训练的重视和武举制的实施，在推动武艺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马球、蹴鞠等体育活动的风行；城市的繁荣和宫廷娱乐的发展，推动了各种传统体育活动的进一步开展，并吸引了妇女阶层的积极参与；而与周边国家频繁的经济、文化往来，既促进和丰富了中国传统的体育文化的发展，也使体育文化的交流更为广泛，成为我国古代体育史上的黄金时代。

唐朝以后，中国境内先是出现了北宋、辽、西夏并存，后为南宋、金和西夏鼎立的局面，但随着元王朝的建立，中华大地又归于统一。这一时期，体育发展是多方面的。在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中，军事武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各民族体育活动的开展也各具特点。而市民阶层的壮大，为城镇健身娱乐体育活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蹴鞠、马球、角抵、游泳、龙舟竞渡、蒙古象棋、围棋和象棋等成了市民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在养生体育方面，注重对前人导引养生资料的汇辑与整理，出现了大量的著名的养生家和导引养生著述，文人儒士、佛道教徒对导引养生术的研习等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中外体育文化的交流日趋频繁和广泛。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鼎盛的时期，相对稳定的社会形势，为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作为中国古代体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体育活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趋势。民间社会的宗教组织与秘密结社的盛行，促进了民间武术的广泛传播和发展，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和体系。在养生体育方面，编辑整理了古人的精华之作，进行了分类和评述，导引养生体育逐步完善和系统化。随着传统的蹴鞠、击球、捶丸这些体育活动因竞技性减弱而走向衰弱，角抵、龙舟竞渡、棋类、秋千、风筝、举重、踢毽子、跳百索等体育活动在民间得到了普及。少数民族开展的体育活动各有

特点，百花齐放。在中外体育交流中，西方近代体育开始引起国人的注意。

从整个中国古代体育的发展历程来看，它是经过不同时期的流传融汇而逐步发展起来的。除了华夏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外，中国古代体育还包括了在历史长河中由许多其他民族传入并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展的体育活动。中国古代体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原始的朴素和谐的理想、中和融通的宽和精神，决定了其竞技性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那种带有强烈对抗性的形式，更加注重礼仪和实用性。与此同时，体育与文娱活动融为一体又使中国古代体育的娱乐性、游戏性和趣味性殊为明显。而华夏民族长期形成的清静淡泊、顺乎自然的性格，天人合一、和谐共处、融合化一、贯通一体的理想及注重个人修身养性的务实精神，还导致了养生保健术的产生，使其成为中国古代体育活动的重要形式，形成了东方体育文化的典型代表。

2. 中国近代体育（1840—1949年）

中国近代体育，是指1840年到1949年这段时期在中国流行和实践的体育。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本身固有的由古代延续下来的传统体育；二是由西方传入的近代体育。其中涉及到了晚清时期的体育、民国初年和北京政府时期的体育、抗战前南京政府时期的体育、抗战后南京政府时期的体育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带有新民主主义色彩的革命根据地的体育。古代中国体育经历了高度繁荣和发达的阶段，但到了清代，它和它所处的社会，都已远远落后于欧洲。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接触到西方近代体育，从而开始了其缓慢的体育近代化的过程。

1840年的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从此，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入侵所导致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加剧，促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努力向西方寻求救国的真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学说和

文化教育。而西方近代体育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传入中国，并逐步居于近代中国体育的主导地位的。可以说，它是在古老的封建帝国逐渐解体的背景下，作为中国人寻求救国图强的世界先进科学文化的组成部分而被引进、吸引并传入中国的。从主观上看，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教会等向中国传输文化、体育，是其文化侵略中国的手段之一，但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国体育的发展，加快了中国与世界先进文化、体育接轨和融合的步伐。洋务派“新军”和“新学”中的“体操”，开近代体育之先河；清末民主主义者则利用体育与军事相联系的特点，以体育作为培训革命军事力量的重要途径；而清末日益增多的西方教会的文化教育活动，亦成为西方体育传入中国的重要渠道。在近代西方体育大量被引进的同时，中国传统的、丰富多彩的体育仍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并继续得到流传与发展。这也是中国近代体育初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色。

1911 年的辛亥革命，埋葬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思想，促进了人民的觉醒。特别是 1915 年后在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给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在它们的推动下，中国近代体育也经历了重大的演变：在学校体育中，以体操为主要内容的体育课，发展为以球类、田径等多种生动活泼的体育项目为内容；培训体育师资的工作已在较大范围内开始；在社会体育和竞技体育方面，由于远东运动会的影响，全国、大区、省市等不同级别的体育竞赛已初步形成制度；体育竞赛的组织和裁判方面，逐渐从外国人手中收回了主权。

1927 年后，国民党逐步在全国建立起统治。到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为止，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近代中国体育也处于一个发展较快的时期，中央政府在教育部下设立了“体育组”等专门管理体育的组织，诞生了中国第一部体育法和其他许多体育方面的法律法规；体育运动竞赛在这个时期空前地发展了起来，不仅举办了 3 次“全国运动会”，举办了一些地区、省市的运

动会，还开始参加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体育理论界，随着西方一些体育思想的传入和影响，不同的体育思想学说在中国得以展现；学校体育在发展过程中，并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形成了制度；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如武术等取得了新的发展。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以苏区体育和工农红军中的体育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体育已初步形成并发展起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和人民军队，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使近代体育普及到了穷乡僻壤，取得了显著成效，显示出了新民主主义体育的特性。

1937 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使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由于出现了社会性质不同的 3 大区域，即日本统治下的沦陷区、国民党统治下的国统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使发展中的近代体育也呈现出 3 种类型，即沦陷区的殖民地体育、国统区的战时体育和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体育。在战时状态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体育，由于它突出为革命战争服务，注重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性，因而成为一种全新的体育运动。尤其是在 3 年解放战争中，随着军事训练的开展，在军队和人民群众中，体育活动更广泛地开展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解放区体育运动的开展，创造和积累了发展人民体育事业的经验，为新中国社会主义体育运动的建设与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近代体育只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尽管这个时期社会动乱，人民饱经沧桑，但却是中国体育内涵和面貌发生较大变化的一个阶段。在这一时期，西方体育开始传入中国，并逐渐地得到普及与发展。同时，中国传统体育也在不安定的环境中艰难地奋进。正是在这两大不同体育体系的相互排斥与相互吸收中，中国体育走完了它的近代化历程。

3. 中国当代体育（1949—2005 年）

《中国体育通史》所记录的中国当代体育，是 1949 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至2005年这56年间中国体育的发展历程。而这一时期中国体育的发展，也是一部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的历史。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成立，更意味着一幅撼人心魄的历史巨变画卷在当代中国展开。而批判改造旧体育，建立新体育，成为当时体育界的主要任务。

新中国成立前，新民主主义文化、体育思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体育中得到体现。新中国的成立，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在全国的贯彻实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体育成为建设新民主主义及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要“提倡国民体育”。同年10月，朱德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全国体总筹备会上的讲话中，将体育确定为“文化教育工作的一部分，也是卫生保健的一部分”。他指出：“过去的体育，是和广大人民群众脱离的。现在我们的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国防和国民健康的利益服务。”[1] 冯文彬则进一步提出新民主主义体育的方针应当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要把体育活动和一般新民主主义的建设结合起来，反对为体育而体育，脱离人民的思想办法。……为人民的健康、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和人民的国防而发展体育。”[2] 1952年，毛泽东“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明确地界定了新中国体育的性质、目的和任务。

从1953年起，随着陆续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毛泽东“要学习苏联”的号召下，全国体育界掀起了一个相当长时间学习苏联的热潮。其时，通过大量翻译介绍苏联体育模式，并聘请苏联专家来华讲学，尤其是聘请他们指导了新中国的一批体育理论研

[1] 朱德副主席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会议上的讲话，新体育，1950（1）.

[2] 冯文彬. 新民主主义的国民体育. 新体育，1950（1）.

究生，使苏联体育模式在我国得到广泛传播和推广。但与此同时，体育界也出现了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和急功近利思潮。如1958年提出的体育运动10年发展纲要，要求在10年内全国有4000万人通过劳卫制，800万人达到等级运动员标准，出现5000个运动健将等等。在这一阶段，整个体育事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变化，既出现了发展高峰期，也因为“左”倾思想的影响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出现了短暂的冒进和收缩所形成的回落期，呈现出马鞍形曲折发展的境况。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体育事业遭受了一场浩劫。文化专制，形而上学猖獗，体育思想也被极度扭曲，出现极左的体育观，把体育为政治服务绝对化、庸俗化。竞技体育、学校体育急剧衰落。但在“文革”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由于夹杂着极左思潮支配的形式主义，因而在一定层面和时间段里，群众体育还显现出了畸形的兴盛状况。当然，这种恢复和畸形兴盛在没有平稳的政治局势和良好的经济状况背景下，是不可能长久的。“文革”后期，体育又整个滑向了低谷。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在中国当代体育发展的过程中，它以改革开放为背景，在反思中不断冲破旧的思想束缚，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体育发展最快的时期。体育工作者和全国人民一道，为发展体育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从思想上解除了精神枷锁，恢复和健全了体育组织管理机构，恢复了正确的规章制度，提出了攀登体育高峰的目标，为当代中国体育事业的大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中国当代体育发展史上，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年代。第一，从这一时期开始，在党的改革开放路线指引下，中国体育走进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第二，中国体育在这一时期全面走向世界，在国际赛场上创下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成就，奠定了中国体育在国际体坛的地位和影响；第三，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中国体育还在适合中国国情的体育发展道路方面进行了初

步探索与实践。此外，在制订新时期我国体育发展战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举国体制”、推动体育体制的改革、促进体育文化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

1992年以后，随着邓小平一系列重要谈话的发表，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新思路开始形成，同时也为我国体育的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从此我国体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主要标志是体育的发展呈现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趋势。1995年《体育产业发展纲要》《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奥运争光计划纲要》的制定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体育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在中国当代体育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随着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成功，实现中国人近百年的奥运梦想成为中国当代体育发展的又一个目标。虽然1993年北京市在申办2000年奥运会中以两票之差失利，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的长足进步、国际政治地位的进一步提高、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以及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大，北京市又以崭新的面貌开始了新一轮奥运会主办城市的申办工作，并最终成功地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

进入新的世纪，国家体育总局制定了《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为中国当代体育在新世纪的发展描绘了新的蓝图。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为新时期中国体育的发展确定了路线和方针政策。

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体育的发展是中国体育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由于特定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历史原因，港澳台地区的古代体育发展颇具特色，近代体育受西方近代体育的影响较为突出，当代体育全面发展，成效显著，是《中国体育通史》中独具特点的历史画卷。

随着2008年奥运会在中国北京市的筹办，新的中国体育发展高潮正在到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各界和全国人民的支

持下，当代中国体育必将得到全面进步与发展，取得更大的成就，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体育通史》由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同一课题负责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研究员崔乐泉博士担任总主编，共分为8卷：第一卷（即古代体育史第一卷），史前—960年，由崔乐泉主编；第二卷（即古代体育史第二卷），960—1840年，由南开大学体育部教授杨向东主编；第三卷（即近代体育史第一卷），1840—1926年，由苏州大学体育学院教授罗时铭主编；第四卷（即近代体育史第二卷），1927—1949年，由罗时铭与厦门东南职业学院教授赵讴华主编；第五卷（即当代体育史第一卷），1949—1979年，由鲁东大学体育学院教授傅砚农主编；第六卷（即当代体育史第二卷），1980—1992年，由成都体育学院教授郝勤主编；第七卷（即当代体育史第三卷），1993—2005年，由杭州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教授曹守和主编；第八卷，即香港、澳门、台湾体育史，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副编审马宣建主编。各卷分之可独立成书，合之为一有机整体。参加撰写的学者近50位，其中大多为国内各院校的体育史科研人员，同时我们还邀请了国内有关科研机构的专家，参与了本书的部分编写工作。作为一个集体性的项目，本书涉及了中国体育上下数千年发展的历史，以及体育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交融与影响，因此我们力求在现有的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在撰写中要突出历史性、科学性、全面性和客观性，同时更要有创新性。鉴于《中国体育通史》，尤其是其中当代中国体育史编写的复杂性和难度，我们自2000年起，先后邀请体育界的张彩珍、谢琼桓、王鼎华、毕世明、陈荫生、熊斗寅、张天白、谷世权、徐永昌等领导和专家进行座谈，从提纲的拟定到编写的具体原则广泛地征求意见和建议，并先后召开了数次由各卷主编人员和具体编写人员参与的研讨会，以求保证本书的编写质量。尽管如此，对于这样一部由几十人参与，又涉及时代如此之长久、地域如此之

广阔、内容如此之广泛、问题如此之复杂的庞大著作，其中的不足和缺陷在所难免，我们诚挚地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与指正。

《中国体育通史》在编写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国家体育总局的有关领导、专家的关心、鼓励和悉心的指导；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体育文化发展中心、成都体育学院以及全国各地的相关院校、体育科研机构均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和大力的支持。

作为国内最高档次的体育专业出版机构，人民体育出版社承担了《中国体育通史》编写与编辑出版的主要组织工作。在史勇总编辑的领导下，丛明礼、孙静敏编审和吴永芳、谢建平等各位编辑人员，以认真负责的精神和热情投入的态度，审读书稿、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做了大量的编辑工作和相关的事务。正是他们的辛勤努力使得作品能够顺利出版。就在即将完成全部编辑工作之时，经人民体育出版社申报，《中国体育通史》被列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实现了体育类读物列入国家级重点出版规划的“零”的突破。

在《中国体育通史》付梓之际，我们向所有关心、指导、支持和帮助过我们的同志们，向全国各相关单位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7 年 12 月

目　录

下编　民国初年与北京政府时期的体育
（1912—1926 年）

绪 论

本卷是《中国体育通史》第三卷，时间从 1840 — 1926 年。主要为中国近代体育的早期传入和初步发展时期，分上下两编。上编为晚清时期的体育（1840 — 1911），下编为民国初年和北京政府时期的体育（1912 — 1926）。

1840 年的鸦片战争，是英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关于这场战争的性质，马克思曾经非常明确地指出：鸦片战争是英国资产阶级“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和进行的对华战争。”[1] 所以就战争的双方关系而言，在英国方面，这当然是一场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而从中国方面来说，则是一场保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完整的反侵略战争。但如果从当时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来说，则又可以被理解为：这是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西方文明，对落后的封建主义东方文明的冲击，是两种文明不可避免的冲突。在这样的两个世界的对峙中，除非旧世界能面向新世界，主动接受西方的文明，并以此来对付伴随先进文明而带来的邪恶。否则，先进的近代文明战胜落后的古代文明，这是不可改变的社会规律。尽管这种古代文明的代表，有着正义的目的，以及种种的痛苦和血泪。所以正是在这一条件下，迫使中国的志士仁人开始正视社会现实，“睁眼看世界”，并在比较中鉴别和认知西方文化的长处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短处，从中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和途径。于是，“救亡图存”之声成了当时中国的时代最强音。要救亡图存，就必然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因此，反帝反封建斗争，争取独立、民主、富强，便始终成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主题。中国近代体育发生和发展的现代化过程，也始终是围绕着这一历史主题而展开的。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8.

从1840年到1911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晚清时期，也是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早期传入和传播时期。这种传入和传播，是伴随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基本理念而发生和发展的。魏源的"师夷长技"，不仅仅是指武器装备，还包括了军事训练等多种内容。他曾明确地指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议战》）正是从养兵和练兵的方法里，人们看到了近代军事训练活动中最早引进的近代西方体育内容——"兵式体操"。所以，在中国近代体育史上，尽管一般认为是洋务运动最早在编练新军中引进了西方近代体育（兵式体操），但最早提出这一要求的则可以追溯到魏源。

如果说魏源是从理想的角度，提出了要注意学习西方的科技文化，包括体育，那么，后来发生的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则是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上，开始了对西方近代体育的吸收和引进。大概从19世纪60年代起，洋务派就开始编练新式军队，以洋操、洋枪、洋炮为主要训练内容。洋务派新式军队中的兵操训练，一方面是从英、法、美等国的军队中，聘请军官充任兵操教习；另一方面也派人出国学习，以培养自己的兵操教官。如李鸿章在整顿直隶的防务中，曾于1876年选拔年轻力壮的中下级军官卞长胜等7人赴德国学习，1879年学成回国后，他们即以德国兵操训练淮军。洋务派还先后创办了不少军事工业学堂和军事学堂，如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等，这些学堂大多依照外国同类学校设置课程，并聘用外籍教员。其中也已设置有较多的体操课程，如在北洋水师学堂，"体育课的内容有击剑、刺棍、木棒、拳击、哑铃、足球、跳栏比赛、算术比赛、三足竞走、羹匙托物竞走、跳远、跳高、爬桅等项。此外，还有游泳、滑冰、平台、木马、单双杠及爬山运动等。只是还没有篮球、网球等活动"。在北洋水师学堂，"所学的体操最初为德国操，主要演习方城操及军事操。后来到了戊戌年间就改为英国操了"[1]。

---

[1] 王恩溥. 谈谈六十三年前的体育活动//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3辑.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58：121.

戊戌维新运动是发生在中国近代早期的又一场政治改良运动。它是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继承和发展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改良主义思想，团结部分爱国知识分子而发动的一场变法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不过百日便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势力所镇压，其实际的改革非常有限，时间也极短，但却有着巨大的思想解放的历史影响，对促进“西学”，包括西方近代体育，特别是西方近代体育思想和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例如严复在当时已经能提出德智体三育并重的观点。他在《原强修订稿》中说：“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他甚至认为：“民之手足体力”关系到“一国富强之效”。所以他从强国强种的立场出发，提出要高度重视妇女儿童的健康，因而提倡妇女体育[1]。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康有为，也已经开始注意到从学校的教育内容上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的多方面培养。他在《大同书》中说：“本院凡弄儿之物，无不俱备，务令养儿体、乐儿魂、开儿知识为主。”在他所办的学校“万木草堂”的教育活动中，“体育亦特重焉”。又有梁启超，则提出了“新民说”，即培养一种具有特色的国民。这种国民应该体现出“民德、民智、民力”的德智体全面发展要求。他们不仅提出了要对学生进行德智体多方面的培养，而且从强国强种的立场出发，提出了要高度重视妇女儿童的健康。由此，将近代中国体育进一步引向了全社会。模仿西方（特别是日本），亦步亦趋，并最终建立起中国近代最早的体育制度，是这一时期中国体育发展的基本特征。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这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次重大飞跃。它标志着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和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诞生，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912 年 1 月 1 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发布《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宣言》指出：“临时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它的任务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

[1] 严复集：第一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7：17.

达革命之宗旨”。此后，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政策法令，并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夺得了政权的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现出与封建专制主义决裂、建立一个资本主义新中国的高昂精神，为民国初年的体育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然而无所不包的普遍王权的一元结构突然解体，在造成权威丧失、价值迷津的同时，也诱发了保守顽固势力的拼死反抗，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和对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反动，掀起了一股短暂的复辟逆流；但是逆流毕竟不是主流，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股逆流引发了国人对数千年历史积淀而成的文化传统的总体性的理性批判，引发了中西方文化的激烈争论，促进了观念形态的深刻变革，于是有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狂飙大潮，出现了“近代百年第二次民族反思”[1]，从而使中国近代体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在价值观念上，出现了由体育强兵、强种、强国的观念，向体育竞技、健身、休闲娱乐的观念转变。最为显著的是学校体育中以体操为主要内容的体育课，变换为以球类、田径等多种生动活泼的近代体育项目为内容的课内外体育活动。在传播路线上，随着近代学校体育制度的确立，体育又开始由学校向社会渗透，现代体育文化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认同。不仅培养体育师资和体育专门人才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而且在远东运动会的影响下，全国的、大区的、省市的等不同级别的体育竞赛也逐步形成制度，在“收回体育主权”的口号下建立起中国近代的国家奥委会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社会影响上，不仅有更多的社会精英关注中国体育的发展，而且有更多的民众开始关注大大小小的体育运动会。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在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潮、民主与科学思潮、国粹文化思潮等的影响下，不断艰难地前行。

总之，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体育发展，已经开始在理性思考和实践活动的两个层面上，同时向前推进。

---

[1] 陈旭麓.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337.

上编

晚清时期的体育

（1840—1911年）

《中国体育通史》第三卷上编，为晚清时期的体育。其时间跨度是从1840年至1911年。这是近代西方体育在中国的早期传入和传播时期。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伴随着西方文明的血腥的崛起和东方文明的悲壮的沉沦，中国古代传统体育文化开始逐渐消亡，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则是西学东渐条件下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早期传入和传播。这一中国体育的历史转换，首先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后来又有了维新运动。正是在洋务思潮和维新思潮的影响下，首先是西方兵式体操被引进中国，然后又有田径、球类等近代运动项目的陆续传入。在西方近代体育的早期传入和传播中，在华的外国侨民和传教士，也从客观上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公布以后，近代西方体育又从军队而走进了中国学校教育的殿堂，从此以后，才真正确立了它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主流地位。

第一章　影响近代西方体育传入中国的主要社会思潮

所谓思潮，是指一定历史时期内反映某一社会阶级、阶层利益和愿望以及要求的思想倾向，是带有趋势性的思想潮流，是一种群体意识。即如梁启超所说："凡文化发达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互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寖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至于衰息。"又说："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1] 由此可见，思潮起码包括了以下几层含义：第一，不是所有的思想主张都能成为潮流，成为潮流者必然确有价值，且能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时代要求。第二，由思想变成思潮，其发展的动力源当有两个方面：一是客观的环境之变迁；二是主观的心理之感召。第三，所谓思潮必然有相当大的规模与气势，而不是某一思想主张的孤立存在。第四，每一思潮都会经历从兴起到发展、到高涨、到低落的演变过程。正是从这样的认识角度我们理解到：近代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入过程，乃是由于不同社会思潮的影响而表现出其高低起伏的不同。因此，讨论晚清社会思潮的变迁及其对近代西方体育传入中国的影响，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社会思潮是怎样如实地反映了当时体育的客观存在，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近代中国早期体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一般趋势。

---

[1]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31.

晚清时期的中国，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西学东渐，由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社会转型，使中华民族面临着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历史大变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和文化挑战。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已经敏锐地觉察到清廷在国际关系中的不利处境，他们深怀忧国之情，想方设法了解世界形势，以图从中寻找出防范和摆脱民族危机的对策。因此，救亡图存、求富自强便成为这一时期的历史主题，成为整个社会的时代强音。正是在救亡图存、求富自强的旗帜下，涌现出了各式各样的社会思潮，推动着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也推动着近代西方体育在中国的早期传入和传播。

从 1840 — 1911 年的七十多年间，是近代西方体育在我国早期传入和传播的时间。它所带来的主要变化是：原有的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在总体上逐渐走向衰落，并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而近代西方体育，则逐渐占据了中国体育历史的主体地位，并成为近代中国体育发展的主流。可以认为：在这一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和近代西方体育有关历史地位的转换过程中，社会思潮的不同影响，无疑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第一节　洋务思潮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加紧侵略中国，并接连制造了严重的边疆危机，中华民族同资本主义列强的矛盾日益上升并逐步尖锐起来，迫使人们去理智地寻求一种比较现实而有效的抵制办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侵略，特别是大规模的商品输出，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瓦解过程，从而使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成为一种客观的历史趋势。与此同时，西学东渐的过程也日渐加快，它经过欧美传教士带进了中国，也通过越来越多的出国、出使人员带回了中国，这就为追

求进步、追求救国真理的人们提供了日益丰富的思想元素。同时，俄国和日本努力学习西方、发愤为雄的举动，亦激励着先进的中国人。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力主兴办洋务的开明官僚奕䜣、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倡言于上；进步的务实知识分子冯桂芬、容闳、薛福成、王韬、郑观应等人纵论于下。中央当权者和地方实力派的相互配合、上层官僚阶级和下层知识分子的遥相呼应，遂使“洋务”成了“一时之世风，一时舆论之趋向。”❶ 于是，一场为时 30 年的“洋务运动”，从此在华夏这块土地上被搞得如火如荼。

一、洋务思潮的兴起

洋务一词，是由夷务演绎而来的。在汉字中，夷和洋的字义本不相干。夷指东夷，指未开化地区。所以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之说，其用意乃是相对于华、夏部落而言的。但是由于经济文化的巨大差异和历代的相互征战，华、夏被逐渐视为文明礼仪之邦和天下的中心，而蛮、狄、夷、戎则被视作化外之区。因而，“夷”字带有一定的贬义。洋，则是指比海更大的水域。到了近代以后，夷的字义有所延伸，亦指国外或外国的。洋亦有国外或外国之意。所以，二字开始相通。但最早对西方各国的称谓，还是借用了古代的“夷”义。所以，在鸦片战争前后公私文牍中，常出现英夷、法夷、米夷，以及夷商、夷语、夷船等一类的字眼，并把与西方国家有关的一些事务，称为“夷务”。所以，清朝的对外关系档案资料被编辑成《筹办夷务始末》。此时的夷字，也许仍保持着一定的贬义成分，并为外国学者所了解。所以，从 1858 年 6 月的《中英天津条约》开始，外

❶ 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王忍之，等.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1卷.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741.

国人已明确要求中国，“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1] 在1860年的《北京条约》中，这一要求再一次被重申。从此以后，在我国的各种文献中，“夷”和“夷务”，渐被“洋”或“洋务”的字词所替代。

这种改变，既表现为一方面是屈于外国列强的压力，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它也是由于中国人对国际事务认识的提高所致。例如太平天国运动的著名领袖洪仁玕，在他的《资政新编》中已经明确地指出：在对外国际关系中，“凡于生来言语文书，可称照会交好、通和、亲爱等意。其余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且招祸也。”[2] 一个农民领袖对国际事务都能具有这样的认识和胸怀，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国民族觉醒的程度。所以，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仅“洋务论”渐成社会文化的主流，且洋务的内涵也日渐扩大。例如1861年，清政府已成立有专办洋务的中央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除外交事务外，人们还把采用外国先进设备、翻译和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及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等活动，也都称之为“洋务”。所以，20世纪初人们这样描述了当时社会的洋务思潮：“讲制造也，则曰必精算学；言交涉也，则曰必通语言；办教案也，则曰必谙外交；言通商也，则曰必达商情。合交涉、制造、教案、通商诸务，而一概之以一名词焉，曰洋务。”[3]

发生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洋务思潮，在时间段上虽然大都认为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90年代结束，亦即第二次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之间的这段历史时期，但事实上这种思潮的发端最早可追溯到林则徐、魏源等人身上。例如林则徐提出要“睁眼

---

[1] 北大法律系. 中外旧约章汇编（一）.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102.

[2] 太平天国（二）. 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528.

[3] 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741.

看世界”，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后来又有地主阶级的封建士大夫郭嵩焘和冯桂芬，有农民起义的革命领袖洪仁玕，还有呼吁留学教育的活动家容闳。他们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有着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成长环境，也代表着各自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但他们却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中国必须学习西方，实行改革，以救亡图存。例如郭嵩焘在1859年曾上书咸丰皇帝，建议在天津设局，如法仿造西洋战舰，同时推求通悉外国语言之人才入京传习外国语言。同样在1859年，总理太平天国朝政的干王洪仁玕，更是提出了一个以仿效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农民施政纲领——《资政新编》，主张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兴办新式工业、矿业和交通运输业；要开设银行、创办邮政、鼓励私人投资、实行保险和专利，以及澄清吏治、革除陋习等；还主张与各国平等交往、和平竞争，从而把中国建成一个“兵强国富、俗厚风淳”的“新天、新地、新世界”。稍晚一点的冯桂芬，则在1861年发表了他倡导变革的重要著作——《校邠庐抗议》，其中明确指出：中国一定要采西学，制洋器，改革弊政，以求富强。

当时形成洋务共识简单列表[1]

代表者	主要言论	资料源
李鸿章	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	《李文忠公全书、明僚函稿》卷16
郭嵩焘	今时关系天下利病，无过于洋务	《郭嵩焘奏稿》359页
张之洞	洋务最为当务之急	《张文襄公全集》卷89
王　韬	今日所谓时务急务者，就有过于洋务者哉	《弢园文录外编》卷2
王先谦	今切要之图，莫如洋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一册184页

❶ 李喜所. 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21.

这中间还有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就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并获得学位的知识分子——容闳。容闳(1828—1912)，名光照，字纯甫，广东珠海人。容闳7岁时即在澳门英国传教士郭士立创办的西塾中接受西方的启蒙教育，13岁时，又进入著名的以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汉学家马礼逊名字命名的马礼逊学校学习。19岁时，得到香港商人资助，随马礼逊学校校长、美国人布朗到美国留学。他先在马萨诸塞州的孟松（MSA）学校修业3年，然后考入耶鲁大学，靠美国一家妇女会的资助和自己的勤工俭学完成了学业。1854年获得美国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接受西方教育并获得美国名校学位的中国人。不平凡的求学经历，使容闳非常崇尚西方文化，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着深切的体会，所以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就开始酝酿着一个庞大的计划，即回国之后组织更多的中国青少年像他那样留学美国，接受西方教育，然后回国效力，以改变中国。他说："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造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1] 为此，容闳在获得耶鲁大学的文凭之后，拒绝了当地一些部门的高薪聘请，毅然扬帆归国，以寻找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的首选便是于1860年访问太平天国，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举动。他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向总理朝政的干王洪仁玕提出了7项改革建议。主要包括加强战备，组织良好军队的问题；创立学校，培养各种人才的问题；聘请行政顾问，建设善良政府的问题；设置银行，厘定度量衡标准的问题等等。容闳明确表示，如果太平天国政府同意实行他的这些建议，他"愿为马前走卒"，贡献自己的力量。后来他放弃了太平天国，而转向投靠曾国藩等洋务派，并最终借助他们的力量，初步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教育计划，于1872年由清政府向美国派出了

[1] 容闳. 西学东渐记.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88.

第一批留学生。

由上引发出的另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是，导致洋务思潮兴起的历史原因到底是什么？在中国史学界，许多学者认为，洋务思潮的兴起，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封建势力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相互勾结的产物。不可否认，这样的推论是有一定的史实依据的，如在奕䜣1861 年的奏折中曾这样说："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从而提出要以"灭发捻为先"（注："发捻交乘"，指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错发生的时候，清朝统治者一方面要靖内患，这是主要的，但另一方面也同样是要御外侮的。例如奕䜣曾表示过，与英法等国议和签约，其目的仅仅是为了"保全大局"，因为英法虽然"渐见信服，有昵而就我之意"，但我们必须为国家"谋久安之策"，由此"防患正不可不深"[1]。因而奕䜣明确主张："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即兵法所云，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者此也。"[2] 可见，即使像恭亲王奕䜣这样的统治者，他们在办洋务时也没有忘记"御外侮"的历史任务。更不要说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开明洋务领袖。因此，我们决不能将洋务思潮的兴起简单归结为，是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以镇压农民革命运动的产物。事实上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这些不同政治立场、维护不同阶级利益的人们，之所以能够在学习西方、主张洋务的问题上走在一起，并最终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思潮，是不是与以下一些因素有关？

第一，无论是太平天国农民政权，还是清朝政府，他们都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处在深刻危机之中的那些有识之士，深深地感

❶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 79 卷. 北京：中华书局，1987：291.

❷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 25 卷. 北京：中华书局，1987：2.

受到，只有揭露时弊，倡导改革，中国才能有出路。这既表现在清朝政府方面，也表现在太平天国方面。就前者而言，如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缔结割地赔款的《南京条约》，并没有使清朝政府惊醒过来，他们以为签订了所谓的“万年和约”，就可以从此天下无事，因而依然不思振作，文恬武嬉。虽然早就有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呐喊，但并没有在统治阶层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也没有在士大夫中引起普遍的共鸣。而具有讽刺性的则是日本人十分看重《海国图志》，如获至宝，并最终在励精图治的道路上走到了中国的前头。然而太平天国运动的迅猛发展，已经将清朝政府的腐朽统治暴露无遗，再加之 1860 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咸丰皇帝的仓皇出逃，使众多的爱国之士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他们反复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因而不得不重新高举起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大旗，以寻求救亡图存的发展道路。

同样的问题在太平天国方面也有表现。1858 年的天京事变和石达开出走以后，这一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革命运动，在继续给予帝国主义和满清王朝以沉重打击的同时，也开始出现逆转，暴露出农民政权伤痕累累、江河日下的处境和趋势。而作为太平天国运动后期重要领袖的农民政治家洪仁玕，正是在这一年来到了天京，他充分地看到了太平天国政权“到处尽成荆棘，无处不是陷坑”的危机四伏，因而于 1859 年向洪秀全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要改革内政外交，以“因时制宜，度势行法”，挽救太平天国运动于危难之中的宏大计划。

第二，西学的早期传播，为主张洋务的士人们寻求救国真理不仅开拓了思路，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也准备了可资借鉴的现成模式。士人们在对中西文明的比较中，逐渐形成了普遍共识：中国有很多方面确实是“不如人家”。例如从国家的总体方面看，表现为“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而在具体的内容上，则表现为如算学、光学、化学等自然学

科的发展上，西方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以及义务教育活动等“多中人所不及”[1]。正是在这样的比较中，先进的中国人从西人、西学和西方文明那里找到了自己的差距，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从而提出了效法西方、推进洋务的主张。

第三，国际社会的改革大潮和成果，给中国人以重要的启示和影响。资产阶级在西欧国家取得统治地位并成功完成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世界各地扩张，它要将全世界纳入资本主义的文明体系之中。在这个世界重新整合的过程中，落后的国家或民族要么继续保守走向灭亡，要么主动接受新的生产方式，使自己也变成资产者。所以美国发生了废奴运动，俄国出现了奴隶制改革，日本则酝酿着明治维新。所有这些发生在国际社会的改革潮流，特别是作为近邻的俄国、日本所发生的一切，无不为先进的中国人所注意，影响着中国的社会思潮。如《资政新编》中自云“熟谙各国风教”，在大肆赞扬英美国家“邦法宏深”的同时，特别对俄、日学习西方事迹推崇备至。俄罗斯邦，曾“遣其长子伪装凡民，到佛兰西邦学习邦法、火船技艺”及“归邦之日，大兴政教，百余年来声威日著，今亦为北方冠冕之邦也”。又有日本邦，“近与花旗邦通商，得有各项技艺为法则，交来亦必出于巧焉”[2]。又有冯桂芬说：“前年西夷突入日本国都，求通市，许之。未几，日本亦驾火轮船十数遍历西洋，报聘务各国，多所要约，诸国知其意，亦许之。”[3] 王韬也曾指出：“日本海东之一小国耳，一旦勃然有志振兴，顿革平昔因循之弊。其国中一切制度，概法乎泰西，仿效取则，唯恐其人之不深。数年之间，竟能自造船舶，自制枪炮。”[4] 李鸿章在看到日本国的改革使其呈现出蒸蒸日上之势时，亦于1864年春致

[1] 龚书铎.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5：176.

[2] 龚书铎.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85：181.

[3] 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74.

[4] 王韬. 变法自强下//弢园外录外编.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58.

函奕訢："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必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❶ 从而认为，中国也应在国际社会的改革潮流中，在邻近国家所取得的改革成果中，注意汲取成败的经验和教训，以从中找出自己的发展方向。

二、洋务思潮影响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理论

洋务思潮影响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理论包括：中国社会发展的机遇理论、中国社会发展的自强理论、中国社会发展的求富理论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人才理论等几个方面。这些理论为近代西方体育的引进，同样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一）中国社会发展的机遇理论

所谓机遇理论，就是在思想认识上提出：中国人在新的历史时期要能够认识时代变局，把握住历史的机遇。首先提出时代变局一说的是黄钧宰。1844 年他在《金壶七墨》一书中说："初不知洋人何状，英法国何方也。乃自中华西北，环海而至东南，梯琛航赆，中外一家，亦古今之变局哉。"❷ 后来冯桂芬在其《校邠庐抗议》一书中也明确指出："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郑观应更是将此种西方各国来中华"叩关互市、入居内地"的形式，明确称之为"此乃中国一大变局，三千余年未之有也。"❸ 薛福成亦于 1864 年在其《上曾侯相书》的文章中说"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并将这种变局概括为"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❹ 面对这样的时代变局，中国应该怎么办？是王

❶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 25 卷. 北京：中华书局，1987：10.
❷ 鸦片战争（二）. 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623.
❸ 郑观应集（上）.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25.
❹ 薛福成选集.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22，556.

韬首先回答了这一问题，他最先提出了要把握住历史机遇的问题。他在1864年的《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中说："当今光气大开，远方毕至，海船估艘，羽集鳞萃。欧洲诸邦，几于国有其人，商居其利，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与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朝亦尽牢笼羁縻之，概与之能和立约。"认为"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所谓不世出之机也。"[1] 王韬的这一观点得到了李鸿章的高度认同，他在《复朱久香学使》的信中说："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岂甘视其沉胥耶？鄙人一发狂言，为世诟病，所不敢避！"[2] 因此，他在《筹议海防折》中向皇帝明确进言道："历代备兵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所以李鸿章提出：只要我们自己能同心协力，以图自强，"则敌国外患未必非中国振兴之资，是在一转移间而已"[3]。由此看出，洋务思潮不仅引导人们能够正确地认识时局问题，而且还从社会现实中指出了中国应走的发展道路。

（二）中国社会发展的自强理论

所谓自强理论，就是明确地提出了中国要学习西方和"师夷长技"的问题。在这里，当然首先碰到的是观念上的解放，即是否承认中国的落后，从而解决向西方学习的问题。因为华夏中心论即使在鸦片战争后，在一些守旧的官僚阶层和落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

[1] 丛刊本. 洋务运动(一).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47.

[2] 李文忠公全集·明僚函稿：第6卷. 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2519.

[3]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24，35卷. 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828，1133.

中，仍不乏一定的市场。那些夜郎自大的顽固守旧势力，仍然对发展着的世界大势茫然无知。他们陶醉于过去辉煌历史的回顾之中，甚至还在为大清皇朝高唱赞歌，以为“我朝定鼎二百余年，圣圣相承，文德武功，震耀区夏，深仁厚泽，普被垓埏。渊乎铄哉！法度纪纲，烂然大备，岂特远过宋、元与明，直将驾汉、唐而上之已！”从而认为“中国何弱之有？”既然不弱，那么，只要能坚持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则外患胥平，内忧悉泯，亿万年有道之长，基诸此矣”[1]。所以他们反对学习西方，反对“师夷长技”。认为中国三千年来帝王代嬗，治乱循环，唯以德服人者能混一区宇，奠定黎庶。认为鼓吹洋务者乃是“几几乎欲用夷变夏”[2]。这些论调理所当然遭到了主张洋务者的批判。例如冯桂芬就认为：在西方的科学技术中，凡有利于国计民生者，均属奇技而非淫巧。因此都是可供中国师法的。他说，中国多秀民，聪明智巧并不亚于外国人，甚至在他们之上，只要努力学习他们，完全可以达到“出于夷而转胜于夷”的目的[3]。李鸿章也说：“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4] 左宗棠亦有同样的观点，他曾在一份奏稿中说：“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借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5] 因此他主张：“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6] 薛福成也曾在《上曾侯相书》中向曾国藩建议说：“彼之所长，我皆夺而用之。”提出“为今之计，宜筹专款，广设巨厂，多购西洋制造之器。聘西

---

[1] 方浚颐议覆赫威两使臣论说//洋务运动（一）.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455.

[2] 丛刊本洋务运动（一）.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455.

[3] 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84.

[4] 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19卷. 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677.

[5] 左宗棠全集·奏稿（三）. 长沙：岳麓书社，1987：63.

[6]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7卷. 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2901.

人为教习，遴募巧匠，精习制造枪炮之法。”认为以中国人之才力，必能驾而上之[1]。王韬不仅认为中国应当“仿行西法”，借法自强，更是提出了一个“洋务在用其所长”的问题。他说：“苟能师各国之所长，兼受并蓄，悉心致志，务在探其困奥，而勿徒袭其皮毛，安见其遽出西人下哉。”[2] 由魏源首先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光辉思想，在这里得到了洋务派人士的广泛认同。

（三）中国社会发展的求富理论

所谓求富理论，就是认为当时的中国必须走以工商立国，发展经济的发展道路，以提高与西方列强抗衡的能力。鸦片战争后，特别是 19 世纪 70 年代后，中国开始了经济的近代化进程。由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转化，在生产力的因素之外，最根本的特征是自然经济变为市场经济。这种转变在中国和在大多数后发展国家一样，不是自发的在传统市场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而是在外来因素的作用下被迫产生和进行的。大约在 19 世纪 60 年代初，首先是具有洋务思想的冯桂芬，及时地看到了五口通商后中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商机，因而提出了要开发矿产、发挥地利的富国之道。他在《筹国用议》中说：“夷书有云，中国地多遗利，设我不开而彼开之，坐视其捆载而去，将若之何?”因此，他主张中国也要像其他各国一样，做到“以开矿为常政”，发展经济[3]。王韬则从西方各国都是以“恃商为国本”“以兵力佐其行”的具体行为中，看到了“商富即国富”的道理。因此他提出，我们也要“广贸易以重货财”[4]。薛福成在发展经济方面的理论则是：求富应“以工商为先”。他以英国为例说：“英人经营国事，上下一心，殚精竭虑。工商之务，

---

❶ 丁凤麟，王欣之. 薛福成选集.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23.

❷ 王韬. 洋务在用其所长//弢园文录外编.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120.

❸ 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49.

❹ 王韬. 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弢园文录外编.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390.

蒸蒸日上。其富强甲于地球诸国。”[1] 也许正是这一系列的理论准备，让李鸿章深刻地认识到了“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的道理。从而使他能够提出“设法仿造，自为运销”的经济活动主张[2]，并设计了全面发展中国工商业的具体行动方案。如在机器制造和交通运输上，他要求“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在矿产的开发利用上，他提出要“择其利厚者次第开挖，一切仿西法行之。或由官筹借资本，或劝远近富商凑股合立公司”。然后从中酌提一二分利税归官，以期“渐开风气以利民用”[3]。洋务派提出的以工商立国的经济发展思想，如果从社会发展论的角度看，它正好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取代封建主义经济，已经成为当时社会条件下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

（四）中国社会发展的人才理论

所谓人才理论，就是提出了增强国力的人才培养和人才选拔问题。在人才的培养、选拔上，首先遭到洋务派人士猛烈抨击的便是在中国流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取士制度。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曾专门就《改科举议》《改会试议》《广取士议》《停武试议》和《制洋器议》等内容进行了广泛的议论。指出：八股取士，非一朝夕，谬种流传，败坏天下人才。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因而他主张废除八股，改革科举。他在选用人才的考试政策上提出，应注意奖励工艺技术人员，体现出“重其事、尊其选”的精神，国家可“特设一科，以待能者”。甚至认为，对那些能工巧匠以及聪明才智之人的仿制洋器活动，要做到“工成与夷制无辨者，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出夷制之上者，赏给进士，一体殿试”[4]。在科举考试的内容上，他提出的改革主张是：以解经、古学、策问

---

[1] 筹洋刍议·商政//薛福成选集.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540.

[2] 试办织布局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43卷. 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1349.

[3] 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24卷. 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832.

[4] 制洋器议//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76.

三者为要。

紧接着冯桂芬之后提出全面改革科举取士制度的是以崇尚实学而著称的丁日昌。他的主要做法是改八股制度为八科考试，这八科是："一曰忠信笃敬以觇其品。二曰直言明事以觇其识。三曰考证经史百家以觇其学。四曰试帖诗赋以觇其才。五曰询刑名钱谷，以觇其长于吏治。六曰询山川形势、军法进退，以觇其能兵。七曰考历算格致，以觇其通；问机器制作，以尽其能。八曰试以外国情形利弊、言语文字，以觇其能否不致辱命。"丁日昌在人才的定位上提出：凡习图学、算学、化学、电器、兵器、机器、工务、船务、政务者，均为有用之人。所以他对容闳提出的选拔幼童送泰西留学的建议，表现了完全的认同和全力的支持。认为广派留学生，可以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徐图自强[1]。

在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考试》中，亦在人才的培养、选拔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首先在人才录用的理念上，他认为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做到"论其艺而不论其文，量其才而不拘资格，精其选而不必定额数"。要鼓励人们努力"习一有用之学，或天文、或地理、或算法、或富强之事"。其次在具体的考试做法上，他的主张是：于文、武正科外，国家可特设专科以考西学。一试格致、化学、电学、重学、矿学新法；二试畅发天文精蕴、五洲地水舆陆形势；三试内外医科、配药及农家植物新法。他认为，只要能坚持下去，"他日奇才硕彦应运而生，天地无弃材，国家即永无外患。"[2]在有关人才的问题上，李鸿章同样认为：一个国家，"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而"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而出？"因此他认为要改革国家考试，并提出了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人才的主张。他说：凡有海防省份，均宜设立洋学局，分别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等。此皆有切于民生

❶ 张磊. 丁日昌研究//百兰山馆政书：卷4.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327.

❷ 郑观应集（上）.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291.

日用军器制作之原。他认为，外国正是通过这样的做法培养人才，故心思日出而不穷。而华人聪明才力，本无不逮西人之处，只是未得其法，未入其门，无以鼓励作新罢了。所以李鸿章建议：对西学如有志且略通一二者，选收入局，延西人之博学而精者为之师友，按所学深浅，酌给薪水，俾及研究精明，再试以事，如有成效，分别文武，照军务保举章程，奏奖升降，授以实缺，与正途出身无异[1]。

三、洋务思潮促进了近代西方体育的传入

首先是新式军队中引进了西洋兵操。这里的所谓新式军队，是指湘军、淮军、新建陆军、自强新军等，他们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陆续替代了原有八旗、绿营的清军功能，而成为维护晚清统治的主力。在曾国藩制定的湘军营规中，规定士兵每天早晚各需做一次体操，并且指出，学习枪法，可以操练人的手脚；跑坡、跳坑，可以操练人的步履；每日演阵，可以操练人的行伍[2]。在淮军中，其阵容和现代化的装备也使他们很早就引进了兵操训练。1866 年时，“淮军各劈山炮队，皆用开花炮。其抬枪、小枪队，皆改用洋枪。故所部陆军五万余人，约有洋枪三四万杆。铜帽，月需千余万颗；粗细洋火药，月需十余万斤。又有开花炮队四营”。这样的装备在当时的国内确实是独一无二的[3]。而当时的湘军，“每营仅用抬枪、小枪一百二十余杆，淮军则每营用洋枪四百余杆，少亦三百余杆。每开一仗用洋药、铜帽须数万。其军又有开花炮队四营，专以开花炮弹及洋枪为攻剿之具”（《续修庐州府志》卷九十八）。在淮军的后期，主要是练习德国兵操，这在《清史稿》中有明确

[1] 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 24 卷. 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834.

[2] 晓谕新募乡勇//曾国藩全集·诗文. 长沙：岳麓书社，1989：453.

[3] 朱来常. 淮军始末. 合肥：黄山书社，1984：21.

的记载："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聂士成于直隶驻防淮军内，选练马、步队三十营，仿德国营制操法。"德国兵操的内容主要包括单兵教练和队列训练，也要练习单杠、双杠、木马、平台等器械体操。

新建陆军主要仿照德国和日本的陆军建制，推行新的军事教育。在著名的天津小站练兵中，曾聘用了不少外国人担任教官，其中德国教官最多。在自强新军中，则规定洋人军官负责带兵操练，华人军官负责部队管理，从而使西方的步阵操、水操、枪炮以及射击、打靶、夺旗赛步等活动得以推广和普及，演习项目也由个人兵操、射击，发展到营间对抗，曾多次获得朝廷大臣和外国军事家的赞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1904 年，湖北第一、二镇在武昌阅兵场联合举办了有 2 万官兵参加的营兵运动会。比赛项目有骗马之术（马术），有夺旗赛步（跑步），有牵绳（拔河）、缘绳（爬绳），有越墙、跳木马，有自行车，有竞走等。据说运动会上，有某一营兵在摔跤比赛中因连胜二十多人而为张之洞所赏识，他当即"取自佩之金时表赏之"[1]。所以，有学者总结说：洋务运动的"练兵，是指使用西洋新式武器及与之相适应的一套洋式操练方法，它与八旗、绿营旧式训练有着明显的时代区别"。"清政府倡导练兵，不仅是军事上的一项革新，而且也应该说是洋务运动一个显著的标记"[2]。

同一时期在太平军中，也有西洋兵操训练的记载，并主要是依靠外国人来实现的。由于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比较开放，对外国人来说，也一般比较友好，通常都是称外国人为"洋兄弟"，所以曾吸引了不少的外国人投入到太平天国革命中。仅在呤唎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中，就写到了有埃尔、腓力普、玛丽等人。据不完全统计，到太平天国失败时，有二百六十多名来自英、美、法、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菲律宾、印度、爱尔兰、土耳其和一

❶ 邓先海. 清末湖北新军的营兵运动会. 体育文史，1995（3）.

❷ 夏东元. 洋务运动史.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40.

些不知国籍的外国人，加入到了太平军[1]。慕王谭绍光曾选拔两千名太平军组织了洋枪队，请美国人马惇进行训练。后马惇叛变革命，逃到“常胜军”头目英人戈登处供认：“分配给我的叛军（太平军），操练得非常好。”[2]

其次是军事学堂中引进了体育课。在《光绪政要》中，对天津水师的课程开设，具有以下的原则要求：“日间中学西学，文事武备，量晷分时，兼程并课。”并强调说：“以升降娴其技艺，即以练其筋力。”这显然是要求水师学生在接受专业知识教育的同时，还要接受体育训练。

再次是产生了中国最初的体育观念。中国人最初的近代体育观念，来源于洋务派对西洋体操的粗浅认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奕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成为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派别。他们在“中体西用”的思想指导下，开始编练新式军队，创办最早的军事学堂，兴办最早的军事国防工业和民族工业，并向外选派留学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最早引进了西洋体操。如1866年天津设立船政学堂，1881年天津水师学堂开办，1883年天津武备学堂开课，1895年又创办陆师学堂。这些学堂多聘请外国教官教习，传授枪炮阵势及造筑炮台之法和军事武备技艺。正如《左文襄公奏稿》中所云：“每日晨起夜眠，听教习洋员训课。”所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载：“近年江苏用兵，雇觅英法洋弁，教练兵勇。”苏松太道吴煦亦“因各营兵勇放洋枪未能娴熟，遴选壮丁，设局松江，练放洋枪洋炮。即派华尔前往教练，并演西洋各式阵势。”1897年张之洞又要求通过轮训骨干的方式，进行推广。“练军重在操演，令分防务营以十之一更番来省，教以新操。俟练成后，转

[1] 太平天国：第六册.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854.

[2] 太平天国史料译丛. 王崇武，黎世清，译. 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73.

授各营。”[1] 在张之洞的《札学务处发学堂歌、军歌》中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体操学，关衰旺，人人胜兵其国昌。”[2]

由此可见，洋务派一开始就是以强兵为目的而接受西方体育的，并且主要是接受西方的兵式体操。军事学堂中开设体操课，并非仅为了锻炼身体；军队中推广西洋体操，不过是为了练兵的目的。所有一切都没有从体育的本身去定义。因此在当时，社会上也并无体育一词。称体育者，均以体操[3] 冠之。也许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学校教育中均无体育的位置，在体育教育上存在的空白；也许是因为当时的国难当头，且又恰逢西方社会那样强悍。因此，在洋务思潮影响下的中国人，也就不免会不问青红皂白，将西方的所有一并拿来学习，而并未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过滤过程。“兵式体操”冠上了体育的名号，这就使得中国人在初始建立的朦胧的体育观念上，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浓厚的军事烙印。体育强兵，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人们的共鸣，并影响着后来体育的发展。

第二节 维新思潮

1894 年 7 月 25 日，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丰岛海面，用突然袭击的手段击沉中国去朝鲜的运兵船“高升”号，并击伤中国北洋舰队为之护航的“济远舰”和“广乙舰”，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发动的这场蓄谋已久的对华侵略战争，其目的是企图割断朝鲜与中国的“藩属”关系，以完全控制朝鲜，进而侵占中国的东北和蒙

---

❶ 谷世权. 中国体育史：下册. 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9：39.

❷ 张文襄（之洞）全集：第 106 卷：13//沈云龙.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台北：文海出版社，1996，1982.

❸ 所谓体操，在近代中国一度曾是体育的代名词。它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体操，在内容上要宽泛些，主要包含了柔软体操、器械体操以及队列队形等内容。

古，实现它的所谓“大陆政策”。甲午战争历时 8 个多月，经历了 3 个阶段，最后以中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要求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赔款 2 万万两白银。后来辽东半岛在俄国、法国、德国的联合干涉下，清政府再用 3000 万两白银赎回，而台湾和澎湖则从此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达半个世纪之久。

甲午战争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耻辱，而且也导致了西方列强后来迅速在中国强占领土和划分势力范围，妄图瓜分中国的狂潮。如 1897 年 11 月，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山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接着俄国强租旅顺和大连，以长城以北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法国强租广州湾，以两广和云南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英国强租九龙半岛和威海卫，以长江流域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中国面临着更大的民族危机，也彻底暴露出清朝政府的腐朽无能和中国国力的孱弱。严酷的现实迫使先进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一步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途径，认识和承认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方面的优越性，并以经过明治维新得以打败清朝的日本为榜样，发出“改弦易辙”“变法成天下之治”的呼声，从而出现了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

是的，如果说甲午战争前的中国人还陶醉于“求富”“求强”的洋务运动的话，那么，甲午惨败的严酷事实，则彻底打破了许多中国人良好的自我感觉。一个从不被看得起的小日本，竟然打败了一向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王朝，这实在是让人感到震惊、愤慨和忧伤。所以，它给中国人敲起了最后的警钟，也促使了中华民族的真正觉醒。正如梁启超所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1] 从此，长期受农业宗法社会观念束缚的忠孝思想，才真正受到了冲击；以纲常名教为立国之本的

[1]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 1//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一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249.

理念，才真正遭到了彻底怀疑。西方的进化论学说，开始为广大的先进知识分子和维新派人士所接受。特别是严复发表的《天演论》，不仅宣传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真理，指出了“弱肉强食”乃是发生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而且强烈地告诉人们：如果中国再不努力奋起，亡国灭种的悲剧也就为期不远了。

然而，中国的积弱不仅有政治、经济的问题，还有人的问题。从鸦片战争到戊戌维新的近半个世纪里，中国人对自身的认识，一直是限于“器物”不如人和“制度”不如人方面。例如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无不反映了中国人只是从物质的表层上，找到了自己同西方先进国家的差距。但甲午战争以及后来戊戌变法的失败，不得不让人们反复思考这样的问题：小小的日本为什么能打败中国？小小的日本为什么能变法成功走上自强之路？中国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由此，人们开始从文化背景的角度反省以往的失败，开始探讨文化、意识形态等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进而把目光集中到了中国“人”的问题上。尽管研究中国“人”的问题，其道路充满了苦涩与艰辛，但一些有识之士终于还是坚定地拿起了“自我解剖”的手术刀。指出：中国固然有“器物”“制度”不如人的一面，但是，中国的“人”更落后。而“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其政息焉”。所以他们提出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以造就一代新民。因为“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这便是1902年梁启超明确提出的《新民说》。1903年，又有壮游提出了《国民新灵魂》[1]。

从此，一个关于中国“人”的现代化问题被明确提出，中国人在思想文化认识上实现了一次重大的历史飞跃。而这一飞跃又恰好为近代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不断传入与传播，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

[1] 壮游. 国民新灵魂，江苏，1903（5）.

一、维新思潮的兴起与发展

与洋务运动相比较，维新运动所表现出的主要是从注重“器用”的改革，而上升到注重“制度”的改革；从关心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现代化，而上升到关心“人”的现代化，关心人的思想、文化的现代化。因此，维新运动与洋务运动确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就社会思潮发展的脉络来看，维新思潮与洋务思潮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维新思潮就是脱胎于洋务思潮。所以，当我们在讨论和考察维新思潮兴起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时，首先还是从一些洋务思潮的代表人物身上，去寻觅维新思潮的早期表现。

从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到 1895 年甲午战争结束，通常被认为是维新思潮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维新思潮所作出的理论贡献是：第一，明确地提出了要实行变法的问题。如王韬在《易言·跋》中说：“当今之世，非行西法，则无以强兵富国。”[1] 陈虬也在《世经博议》中说：“欲图自强，首在变法。”[2] 汤震则认为：中国已处于“开辟以来不知几千万年未有之奇局”，因而必须抓紧变法。否则“及宜变之时而不变，时有不得变者矣。储能变之力而不变，力将有不能变者矣”[3]。强调了时代在改变，环境在改变，因而必须因时制宜，抓住机遇，变法自强。第二，提出要发展民族工商业。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农抑商”和“崇本抑末”的思想观念不同，早期的维新思潮中已明确提出了要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问题。他们从“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欧洲立国，

❶ 郑观应集（上）.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67.
❷ 戊戌变法（一）.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218.
❸ 戊戌变法（一）.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178.

以商务为本。富国强兵全借于商”的现象中[1]，得出了为救亡图存，必须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的结论。他们认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2] 甚至将商务的兴衰与否，提到了与国家兴亡相关联的认识高度上。“商务盛衰之枢，即邦国兴亡之卷也。”[3]“商务不兴，则不能与敌国并立。”[4] 第三，提出君民共主的议院制度。在蒋智由的《风俗篇》中有这样一段话：“工商之世，而政治不与之相宜，则工商不可兴，故不得不变政。”这应是早期维新思潮中又一个闪光的理论亮点。郑观应说得清楚：“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人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5] 他们甚至对具体的议院制度都进行了设计。例如汤震就曾建议由四品以上官吏组成上议院，由四品以下官吏组成下议院。国家大政方针，上下议院论其得失[6]。当然，由于他们对西方君主立宪制度还缺乏深入的了解，由于他们受数千年忠君爱国思想传统的影响，他们的君民共主的理论和议院制度的设计，还存在着相当大的缺陷，但他们的这种主张无疑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

从 1894 年甲午战争到 1898 年的戊戌变法失败，大致可理解为维新思潮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也是维新思潮发展的顶峰时期。这一阶段维新思潮的理论贡献主要有：第一，充分肯定了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康有为曾在《日本变政考》中说：“泰西之强，在其政体之善也。其言政权有三：其一立法官，其一行法官，其一司法官。立法官，论议之官。主造作制度、撰定章程者也。行法

---

❶ 薛福成. 出使四国日记.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47.

❷ 郑观应集（上）.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614.

❸ 陈炽.《庸书》外编：上卷. 光绪二十二年（1896）刻本（湘潭大学图书馆藏）：38.

❹ 戊戌变法（一）.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208.

❺ 郑观应集（上）.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315.

❻ 戊戌变法（一）.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177.

官，主承宣布政、率作兴事者也。司法官，主执宪掌律、绳愆纠谬者也。三官立而政体立，三官不相侵而政事举。”[1] 第二，提出了维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新经济政策。例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中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应该得到国家的承认和维护，与洋务派压制民族工商业不同，康有为提出，国家对任何企业的态度都是“宜纵民为之”。严复甚至补充说：“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皆得自由始。”[2] 这分明就是在鼓吹经济自由主义，分明就是在要求国家能放任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三，接受西方的进化论学说，抨击传统王朝更替的历史循环论。以严复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注意对西方进化论学说的广泛介绍，并在其改造和扬弃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认识，用以抨击传统王朝更替的历史循环论。他们还对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和封建等级观念进行批判，戳穿了“君权神授”的弥天大谎，显露出早期的民权思想。所以，他们在改革社会习俗方面坚决主张废缠足、禁食鸦片、设立女学，提倡男女平等，极力宣扬要“鼓民力”，要“开民智”。

从戊戌变法失败到20世纪初，可理解为维新思潮发展的第三阶段，这是维新思潮发展的深入期。理由是：第一，这一时期的维新思潮始终以救亡图存，争取国家的独立、自主和富强为己任，大声疾呼发扬民族主义，建立民族国家，以对抗列强侵略，自立于民族之林。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说：“凡百年来种种之壮剧，岂有他哉？亦由民族主义磅礴冲激于人人之胸中。宁粉身碎骨，以血染地，而必不肯生息于异种人压制之下。”因而指出：“今日欧洲之世界，一草一石，何莫非食民族主义之赐。”[3] 第二，主张变封建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革除封建弊端和落后的文化习

[1] 吴熙钊. 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116.

[2] 严复集：第1册.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27.

[3]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北京：中华书局1936年版，1989年影印本：20.

俗，力图开民智、兴民权、新民德，大力引进西学以救亡启蒙，从而第一次提出了关于人的现代化问题。如梁启超在《自由书》中说："故民智、民力、民德不进者，虽有英仁之君相，行一时之善政，移时而扫地以尽矣。"认为"善治国者，必先进化其民"[1]。所以他所撰《新民说》《新民义》等论著，都是针对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积淀所造成的国民劣根性，而畅说新民要遵守社会公德，确立国家意识，勇于进取和敢于冒险，做到自由、自尊、自爱，讲究协作和合群等。他是近代史上力主以资产阶级面貌造就一代新的国民，从而通过首先是人的现代化，进而促进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的第一人。

二、维新思潮影响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理论

与洋务思潮相比，维新思潮显然表现出一种更为进步的理论，因此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进步的影响，也更加深远和广泛。其中关于社会制度建设问题的提出、关于中国人的现代化问题的提出等，无不具有一定的理论超前性。

（一）提出了社会制度建设问题

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涉及到中国社会制度层面的改革和建设，因此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中国人第一次提出了关于进行国家政治和政体改革的问题，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有关政治和政体改革的呼声，早在王韬那里我们就隐隐约约有所耳闻。"中西同有舟，而彼则以轮船；中西同有车，而彼则以火车；中西同有驿递，而彼则以电音；中西同有火器，而彼之枪炮独精；中西同有备御，而彼之炮台、水雷独擅其胜；中西同有陆兵水师，而彼之兵法独长。其他则彼之所考察，为我之所未知；彼之所讲求，为我之所不

[1]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 北京：中华书局 1936 年版，1989 年影印本：9.

及。如是者，直不可以偻指数。设我中国至此时而不一变，安能埒于欧洲诸大国，而与之比权量力也哉!”[1] 接着在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二书》中，已经明确地请求光绪皇帝能开武英殿，分州县，约十万户公举一名议郎。他对议郎的要求应该是“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的“方正直言之士”。他们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轮班入值，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下部施行。”[2] 后来在《为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呈》中，康有为又提出了效法日本明治维新的三条政治和政体改革措施：一是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是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 20 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审定，并交由十二局施行。这十二局就是国家成立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商局、工局、铁路局、邮政局、矿务局、游会局、陆军局、海军局。形成一套完整的权力机构。三是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3] 这些政治和政体改革的主张，虽然在维新运动中并没有能得到全部的体现（这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但维新思潮促进了晚清的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也推动着维新思潮的进一步高涨，这恐怕是在讨论维新思潮影响中国社会发展进步时所不能不给予充分注意的地方。特别是戊戌年间，维新思潮在中国的影响达到了至高点，他们大胆地在政治行动上进行了一次变法革新的尝试。虽然 103 天的时间是短暂的，但其政治改革所带来的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力却是巨大的，它彻底动摇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时间的封建专制制度，为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拉开了序幕。

---

[1] 戊戌变法（一）.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133.

[2] 康有为政论集（上）. 北京：中华书局，1981：135.

[3] 杰士上书汇录：卷一//载郭汉民. 晚清社会思潮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61.

(二) 提出了中国人的现代化问题

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与人的现代化是紧密相连的，因此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中国人第一次提出了关于“人”的现代化问题，要求进行文化和教育改革，以培养一代新民。在文化教育改革方面，维新思潮的主要理念是大量输入西方文明，在检讨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抨击封建主义的学术思想、政治意识和伦理标准，尝试构建一种适宜中国国情并能服务于“救亡图存”要求的新文化。所以，他们在教育措施上首先提出了要改革科举的废除八股要求。认为这种封建统治者长期实施的最为有效的愚民政策和措施应予否定。即如康有为在《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所说：国家改革的当务之急莫胜于人才的需求，而得到人才的道路有多种，其中最要紧的“莫先于改科举”；而科举的改革又“莫先于废弃八股”。[1] 后来光绪皇帝采纳了这一意见，并下诏废除了在中国实行了几百年的八股取士制度，从而使全国上下“顿有豁然开朗之一日也”。[2]

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人们还注意到，教育不应局限在精英层次，而且还应扩展到大众层次。“然富而不教，非为善经；愚而不学，无以广才。是在教民。”“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3] 所以康有为在 1895 年的《上清帝第二书》中说：“欲富强自立，教学之见效，不当仅及于士，而当下逮于民；不当仅立于国，而当遍及于乡。”认为，“必使四万万之民，皆出于学”，实行全民普及教育。否则，“小民不学，则农工商贾无才。产物成器，利用厚生，既不能精；化民成俗，迁善改过，亦难为治”。[4] 而实行教育普及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国家要广设各类

---

[1] 康有为政论集（上）. 北京：中华书局，1981：268.

[2] 戊戌变法（三）.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322.

[3] 康有为. 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全集：第二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94.

[4] 康有为全集：第二集.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94.

新式学堂，所以，“百日维新”中不仅创办了中国的第一所高等学府——京师大学堂，而且命令各督抚将各省、府、厅、州、县之大小书院，也一律改为兼习中学和西学的学校。在学校的级别上则规定为：省会城市的大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府厅郡城一级的书院，改为中等学堂；州、县的小书院，为小学堂。此外还要求，凡地方上自行捐办的义学、社学等，也一律改为学堂，实行中、西学并举的教育。甚至要求当时民间的一些宗庙祠堂，也一律由地方官员晓谕百姓，改为学堂。

这种全民普及教育，除通过兴办学堂来实现以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创办报刊。报刊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由于传播速度快、信息容量大、知识结构层次多等特点，因而容易做到“同时传播统一及标准的政治信息给众多的人民”，而它的这种“标准足以产生举国一致的行为模式”。[1] 在1895到1898年间，我们看到了由维新派人士创办的报刊已达到40种之多。具有代表性的就有1895年梁启超等创办的《中外纪闻》，严复创办的《直报》；1896年徐勤等创办的《强学报》，胡璋创办的《苏报》，黄遵宪等创办的《时务报》；1897年陈虬创办的《利济学堂报》，康广仁等创办的《知新报》，章太炎等创办的《经世报》，叶耀元创办的《新学报》，陈季同等创办的《求是报》，严复等创办的《国闻报》；1898年韩文举创办的《东亚报》，康同薇等创办的《女学报》，裘廷樑创办的《无锡白话报》，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时务报》和《国闻报》。

在社会文化方面，维新派认为，社会习俗是支配人们思想、左右人们行为的无形的社会力量。因此提出要对传统的社会陋习恶习进行改造，以营造一个适宜社会变革和进步的良好环境。中国最严重的陋习恶习是什么呢？“沿习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二事”。所以严复说：“种以之弱，国以之贫，兵以之

[1] 杨孝荣. 传播社会学.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439.

窳，胥于此焉阶之厉耶。”[1] 废除女子缠足，禁止吸食鸦片，成为当时进行社会习俗改造的主要课题。总之，他们主张通过民德、民智、民力的新民培养，而首先实现中国人的现代化，进而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所以，维新运动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主张启迪民智，伸张民权，大力输入西方文明，赋予中国人一个崭新的世界观，即进化论，用西方文明理性之光，冲破中国中世纪的蒙昧落后。它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学说，抨击中国封建专制统治和纲常名教。它运用科学对抗迷信，通过普及教育、集会办报、改良社会习俗等措施，以改变中国人原有落后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伦理精神、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它使中国社会迈出了走向现代化的最为关键的一步。

三、维新思潮对体育发展的影响

维新思潮对中国近代体育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表现在它使中国人在体育观念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在洋务思潮的影响下，中国人对体育的认识主要是侧重于强兵的作用，而导致了对西方近代体育的最初引进，那么，维新思潮影响下的变化则是近代中国人开始从更深的层面上认识到：近代体育不仅有军事上的强兵作用，更有在国家与民族长远利益上的强种、强国作用。而能否实现强种强国又直接与以下因素相关：一是教育；二是女子。所以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近代中国体育的发展，出现了向教育领域的延伸和向女子体育发展的趋势。

（一）学校体育的产生

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继续肯定西洋体操具有提

[1] 严复集：第1册.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28.

高军队战斗力作用的同时，开始把西洋体操引进学校教育。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讲学时，已经作过关于德、智、体三育并重的尝试。这在梁启超《康有为传》中有具体的描述："其为教也，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体育亦特重焉。"康有为的体育要求是重视军事体操，注意学生的课外活动。所以规定"每间一日"，课以体操[1]。

值得注意的是维新派人士严复，已经从全面教育的角度论述了体育是强兵之本、是富国之基的道理。他在《原强》中说，大凡国民素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存亡强弱，莫不以此为基础。如果具备了这三者，民族就优秀，国家就强大。他说，在西方国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但国民素质的提高在于教育的正确实施。因此他提出：我们的教育应和西方国家的学校一样，"教人也，以睿智慧、练体力、励德行三者为纲"。

在康有为的《大同书》中，对这种体育观念也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晰。他曾说：要成为新时代的人才，就必须接受新时代的教育。而新时代教育的特点就是通过"德教、智教、体教"，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所以他说：体育是教育中不可缺少之物。他的具体设计就是：不管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院，除德育智育外，都要"注意卫生体育的设备及环境布置"，使小学生"以动荡其气血，发扬其身体"；使中学和大学生"重视体操，以行气血而强筋骨"。

康有为的这种体育观念不仅得到他的学生梁启超的认同，而且被梁启超所继承和发展。例如，梁启超晚年在清华学校执教时曾非常明确地指出："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为教育上缺一不可之物。"他在《中国之武士道》的文章中公开承认，他推崇古希腊斯巴达人"惟其以尚武为精神也，故专务操练躯体，使之强壮"的措

[1] 戊戌变法（四）.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12.

施；他欣赏西方学校教育中“注重于德育体育，锻炼强民之体魄”的做法。所以他主张中国的学校教育也应该是多彩的，少年儿童在学习之余，“或游苑圃以观生物，或习体操以强筋骨，或演音乐以调神魂”。他提出中国教育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培养具有“民德、民智、民力”的新民。在当时中国社会羸弱的条件下，他特别强调“学生必习体操，强其筋骨，而使人人可为兵也”。

资产阶级维新派之所以将西洋体操引进学校教育，那是因为他们已经发现：“外国教育必有体操，所以强其体魄，壮其胆气。养成不畏强敌，不慑雷霆之志。然后内之以靖国难，外之以拒强敌，驰骋于炮光爆毁、肉震血气之际而不惧。”即体操者，强体魄、实精神也。所以他们第一次提出了要“研究体育之学”，并扩大了西洋体操在近代中国的实施范围。由于维新派的做法符合当时社会变革的要求，所以被当时的社会先进分子所普遍接受，使当时的中国社会曾一度出现“有志之士，乃汇集同志，聘请豪勇军师，以研究体育之学”的新景象[1]。

进入20世纪后，晚清政府在学校体育方面的措施则是农历1903年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章程明确规定：各学堂一律练习兵式体操，以肄武事。1906年，清廷学部又通令全国各省，于省城师范学堂附设五个月毕业之体操专修科。所以。它带来的社会变化就是：在辛亥革命前，全国已经出现了即使许多寺庙办的学校，也不能不开设体操课的倾向。

（二）女子体育的出现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女子体育的最早出现和妇女教育的出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近代妇女教育的最早出现是传教士所开办的一些女学。据有关史料记载：由英东方女子教育协进会会员、传教士阿尔德赛1844年在浙江宁波开办的女塾，当是我国近代史上

[1] 戊戌变法（三）.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157.

最早出现的女子学校。此后，在沿海和内地的一些大中城市，相继出现了一些同类的教会女子学校。在这些教会办的女塾中，主要以西方学校教育为模式，课程设置不仅有发展智力的近代科学知识，而且有促进女子身心健康的舞蹈和游戏教育。例如 1844 年美以会在江苏镇江开办的女塾中，其课程设置除《圣经》《三字经》外，还有体操和游戏。

到了戊戌变法时期，随着欧风美雨的不断东渐和妇女解放呼声的日渐高涨，在上海出现了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近代女子学校——经正女塾，亦称“中国女子学堂”。它是 1898 年 5 月，由上海电报局局长经元善创办的。学校分算学、医学、法学、师范等科，专门招收 8—15 岁的女子入校学习。作为维新派人士开办的经正女塾，得到了梁启超等人的高度关心和全力支持。据说梁启超曾专为该女塾起草了章程。这所以西学为主的女子学校，在一开始筹办时，就确立了“以发展女子身心健康”为主旨的办学思想，曾特邀中西女客一百二十余人举行座谈会，议论办学之方法。其中特别指出：学堂功课繁密，听文诵读之外，必设小花园一所，借习灌溉培种之法，以资游息而舒畅其志气。再设体操之课，以杜单弱。认为东西学校，无不有体操者，此培体却病之要义，未可忽也。

由于经正女塾的示范，1902 年上海邑绅吴馨又在上海创办了“务本女塾”，这同样是一所风气开通并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女子学校，它亦将体操列为正课教学。著名体育教育家徐一冰先生就曾在该校任过体育教员。同年，蔡元培先生也在上海创办了爱国女学。这所学校同样“以增进女子智、德、体力，使之以副其爱国心为宗旨”。它们的体操课和唱歌课教学，曾被时人视为“最精美之处”。除上海以外，当时的南京、常州、广东等地也都陆续开办了一批女子学校。特别是 1908 年，在上海，汤剑娥等人还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培养女子体育专门人才的学校——中国女子体操学校。

第二章　近代西方体育在军队的传入与传播

翻开中国近代的历史，早在清嘉道时期，西方殖民势力就已汹涌东来，中国和西方列强之间在科技发展水平、军事力量、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差距就已经完全拉开。与之适应的是，西方侵略的威胁也日渐加剧，特别是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后，英国扩大对华侵略与中国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在此背景下，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已经敏锐地觉察到清廷在国际关系中的不利处境，他们深怀忧国之情，想方设法了解世界形势，以图从中找出防范和摆脱民族危机的对策。其中有进步思想家、提倡“通经致用”的学者龚自珍，他早就提出了“更法”的见解，主张要留意于“天地东西南北之学”[1]。又有坚决反抗侵略，并注意了解外情、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他主张“向西方学习”。尤其是爱国进步思想家魏源，他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编成了《海国图志》一书，更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而他所说的“长技”，并不仅仅是指武器装备，还包括了军事训练等多种内容。他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议战》）正是从练兵之法里面，我们不仅看到了军事训练的内容，而且还看到了早期的体育训练内容。当时的体育训练内容主要就是采用西方的“兵式体操”。所以在我国近代体育史上，尽管一般认为是洋务运动最早在编练新军中引进了西方近代体育，但最早提出这一要求的则可以追溯到魏源。

[1] 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龚自珍全集.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312.

第一节 太平军中的西洋兵操

在以往的近代中国体育史研究中，对于魏源等人的这种思想的影响，从主流社会方面进行考察和研究的较多，认为实践“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是晚清的“洋务派”，并得出了“洋务运动最早引进了西方近代体育”的结论，这的确是不争的事实。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尽管是一场农民革命运动，但他们同样有着学习西方文明以推进中国近代化的意识，因为“太平天国发生在中国已经和资本主义建立‘联系’的年代，它就和传统的农民革命不同，经历着一个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认识过程。”❶ 所以在引进西洋兵操方面，同样有着他们的重要贡献。

在英国人呤唎写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中，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开放意识：“太平军自起义以来，就想占领一个海口，以便可以和外国通商，并得到武器和军用品的供应。”❷ 在东王杨秀清答复英人的三十一条中，也有这样的一段表述：“平定时，不唯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由于西洋兵操的引进与西洋武器的使用是直接相关的，所以研究太平军的西洋兵操情况，完全可以从考察太平军使用西洋武器的时间入手。资料表明，有关太平军中西洋武器的记载大概最早可以追溯到金田起义时期。在邓元忠《美国人与太平天国》一书中，有一段重要的记录：“关于太平军使用西方武器的最早记载，见于1851年。当时葡萄牙在澳门都督命令扣押士兵的武器，为了阻止他们其中五六个人到广西去。”又有“1852年8月，一位耶稣会教士的信中叙述说：‘叛乱者的武器不

❶ 李喜所. 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25.

❷ 呤唎.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十章.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13.

是中国制造的'"[1]。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有关购买洋枪洋炮的事，则累见于记载。如夏燮《粤氛纪事》卷四：1853 年 4 月，"贼踞城（南京）之逾月，有洋舰二，自海道泊下关，贼始疑是大兵之借援者。继侦知其为上海之领事，舟中所带皆洋枪火药，以通贸易为词。该逆延之入城，联教能款"。又如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简辑》(三)：天京（南京）城外，"买卖街极多做洋枪铺户，佛兰西（法国）人城内甚多，俱穿长毛服饰，携带洋枪及各种枪械，在彼消（销）售"。《北华捷报》第 518 期载：1860 年 6 月，赫威尔等传教士访问苏州，太平军曾要求他们能"带钱到上海，为他们购买武器"[2]。

在太平天国使用洋枪洋炮的记载中，我们还发现 1859 年时，在辅王杨辅清的军中已建有专门的特种兵部队"洋枪队"[3]。此外，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九章中，曾介绍到太平军"使用的火器，则是轻便的火绳枪，有时也有欧式的滑膛枪或手枪。枪兵携火绳枪，天气潮湿时则不能使用。也有欧制双铳枪、滑膛枪、手枪。一般说来，这些武器都是十分粗劣的"。这一类记载在法人梅邦·弗雷代《1860 — 1864 年的太平军》文章中，也得到了反证："如果说在这次作战中联军所受的损失比以往和叛军作战的任何一次都更大的话，那是因为对方有欧洲的卡宾枪和手枪，是那些假仁假义的走私犯提供的。"[4] 可见太平军在洋枪洋炮的武器装备方面，此时已丝毫不比外国军队逊色。所以，英国人威里塔斯发表在香港《每日新闻》上的《访问漳州》文章说："看来叛军武器甚为精良，有来福枪、左轮枪和滑膛枪，清军在这方面不能和他们相比。

---

❶ 邓元忠. 美国人与太平天国. 台北：华欣文化事业中心印行，1983：167.

❷ 1861 年夏，英国人呤唎也曾专程到上海，找欧洲人为太平天国采购军火。见呤唎.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十三章.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❸ 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 香港：简氏猛进书屋出版，1958：1149.

❹ 太平天国史料译丛（二）. 王崇武，黎世清，译. 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163.

因为清军只有土造火绳枪、抬枪和长矛。甚至十人之中还没有一支火绳枪，并且又是一群褴褛肮脏的暴徒。反之，叛国服装整齐、清洁，并且又经过了欧洲兵法的教练。”[1]

这种武器装备上所反映出的差异性，正好说明在关于认识世界和学习西方的问题上，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事实上要比当时清朝政府的官僚地主阶级更清醒，也更开明。“居官者视洋人以夷，待之如狗”（《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大学士倭仁视西方科技产品为“奇技淫巧”。而在太平天国那里看到的则是另一番景象：侍王经常披览世界舆图，通晓中外关系，熟悉欧洲政治。干王在香港生活多年，能用英语交谈，还学习微积分。他对世界各邦大势、盛衰成败之缘作过调查研究。慕王谭绍光经常谈论欧洲的政治和发明[2]。由此可见，正是他们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思想认识，造成了在西洋兵操的引进方面，恰恰走在了洋务派的前面。这是在讨论这一章内容时所特别应予注意的问题。

太平军在不断购买西洋武器的同时，还开始了仿制西洋武器的活动。在《李秀成自述》一书中，曾介绍了太平军的做法：我们在战场上，每当“取到其炮，取到车炮架”，即“寻好匠人，照其式样，一一制造”。例如“我在太仓抢得炮样，业经制与其一样无差，今南京城内尚有此样”。这种真实的情况在钞本《曾国藩书牍》卷二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忠、侍两逆，众约二十余万，攻扑官军营盘，纯用洋枪洋炮、西瓜硼炮。”文中的忠逆，是指忠王李秀成；侍逆，是指侍王李世贤。在《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中，亦有关于太平军制造洋枪洋炮的记录。1863 年 6 月 1 日，戈登、程学启、郭松林攻昆山、新阳二城，发观“昆山需内有太平军之枪弹制造厂，由二英人主持”[3]。特别是在呤唎写的《太平天国

[1] 呤唎.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656.

[2] 沈喜荣. 太平天国史略. 南京：南京出版社，1992：232.

[3] 郭廷以. 太平天国史事日志.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994.

革命亲历记》中，我们在多处读到了有关太平军制造枪炮的记载。如第二十四章："我（呤唎）在湖州留下了从苏州来的一个工程师和另外一个人，让他们制造枪炮弹药。"

有了洋枪洋炮，就必然要有使用洋枪洋炮的方法，因而，有关洋枪洋炮的训练活动也就开始了。正是在这样的训练过程中，西洋兵操被引进了太平天国。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九章中，呤唎曾有这样一段描述：我们出发二十天后，进抵清军阵地附近的鄱阳湖。"全军成若干密集的四人纵深的纵队继续前进，各平行纵队间留有相当距离，以便可以左右旋转移动。太平军的这种阵势，颇类似英军的'四列纵队'。"这是呤唎刚到太平军参加作战时所看到的情况，说明太平天国早有类似西洋兵操的训练。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了忠王李秀成的儿子茂林在战场上使用洋枪的画面：在一次战斗的危急关头，呤唎说："我转身一看，原来是茂林救了我的性命。这个勇敢的孩子及时地挡住在我头上猛力砍下来的大刀，接着用左轮枪把敌人击倒。"[1]

从有关记载来看，太平天国的西洋兵操训练也主要是依靠外国人来实现的。由于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比较开放，对外国人来说，也比较友好，通常都是称外国人为"洋兄弟"，所以曾吸引了不少的外国人投入到太平天国革命中。仅在呤唎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中，就写到了有埃尔、腓力普、玛丽等人。据不完全统计，到太平天国失败时，约有二百六十多名来自英、美、法、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菲律宾、印度、爱尔兰、土耳其和一些不知国籍的外国人，加入到了太平军[2]。慕王谭绍光曾选拔两千名太平军组织了洋枪队，请美国人马惇进行训练。后马惇叛变革命，逃到"常胜军"头目英人戈登处供认："分配给我的叛军（太平军），操

[1] 呤唎.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02.

[2] 太平天国：第六册.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854.

练得非常好。”[1] 1863 年 2 月，慕王的洋枪队在追击英国侵略者奥伦的“常胜军”时，惊恐万状的奥伦败逃到松江大本营后，也不得不供认：“叛军（太平军）全都以欧洲制毛瑟枪为武器，打得真妙，令人佩服。”也许正是这一缘故，使得容闳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位获得外国学位的留学生，也曾把太平天国作为自己实现伟大人生抱负的首选地。并向当时总理朝政的干王洪仁玕提出了七条建议，其中就有组织一个合乎科学原则的军队；设立一所军事学校和海军学校的问题。容闳在《我在美国和中国的生活追忆》中曾说：“干王的见闻较之其他诸王和领导人广阔些，甚至超过了洪秀全。他很了解英国及欧洲列强所以强盛的奥秘，所以他很赞赏以上七项建议的重要意义。”

呤唎作为一名同情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外国人，他曾随忠王作战，但更多的时间是为太平天国训练军队，担当西洋兵操的训练教员。这在他的书中是有所记录的。例如关于在南京生活的一段描写，他说：“我们每天分出一部分时间去教练太平军兵士炮术，或教练太平军兵士操演的一种中西参半的阵法。中国人本来就以善于摹仿闻名，而这些自由的中国人则更易于教练。他们可以迅速学会英文及其他各种技能，这种本领是实在令人感到惊讶的。”在 1861 年，呤唎又介绍说，当我去上海采购军火前，“一切筹备就绪，我费了不少力量劝我朋友同行。留下腓力普继续教练兵士操演，并代我处理其他事务”[2]。正是在接受西洋兵操训练的基础上，使太平天国的战斗力也获得了较大的提升。例如 1862 年 7 月，李秀成率领十多万太平军进攻淞沪。在太仓、嘉定、青浦的三次战役中，太平军把淮军以及外国的洋枪队打得落花流水。法兵提督卜罗德在战场毙命，英兵提督何伯受伤，美国兵华尔则仓皇逃走。

[1] 王崇武，等. 太平天国史料译丛. 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73.
[2] 呤唎.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90，297.

第二节　湘军、淮军中的西洋兵操

从清朝的军队建设情况看，在咸丰以前有两种部队：一是八旗，一是绿营。八旗由旗人编成，约有25万人；绿营由汉人编成，约有64万人。八旗兵大半卫戍北京，小半驻防要地。八旗部队早在入关以后就已经开始腐化，所以自康熙以后，实际上是依靠绿营维持它的统治。在对抗太平天国战役中，清朝政府也曾调动过八旗参战，如河南怀庆府战役就有八旗参加，但旗兵的状况是见太平军“即走”，比较绿营“更易误事”[1]。所以，在太平天国革命初起时，清政府主要依靠绿营的武力对抗。但绿营在乾隆末年以后，也已开始走向腐朽，如嘉庆初期为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清政府已不得不召募川、陕、楚三省的“乡勇”，以帮助绿营作战。而在道光年间的鸦片战争中，人们看到的在广州参战绿营是：“奉调之初，沿路劫夺”；“抵粤以后，喧呶纷扰”。真正到战场上打仗时，则是“望见夷船，急发空炮数声，卷包而遁”（王钧宰《金壶浪墨》卷二附“羊城日报七则疲兵”）。给英国侵略者以致命打击的反而是三元里的人民群众。

一、湘军中的西洋兵操

晚清政府继续依靠八旗、绿营那样的武装力量，以阻止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维持风雨飘摇的统治，显然是没有指望了，由此，在咸丰二年（1852年）冬，统治者首先命令湖南在籍礼部右侍郎兼兵部侍郎曾国藩，在湖南办理团练事宜，以建立新的军队，这就是后来的湘军。湘军，顾名思义，它最初是由湖南湘乡的人员

---

[1] 奕䜣，等. 剿平粤匪方略：卷49. 同治十一年（1872年）.

所组成。曾国藩是湘乡人，他所选的将领也主要是湘乡人，士兵也主要招募湘乡一带的农民。湘军的创立（包括后来的淮军），使清朝从此在兵制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有的绿营采用“兵皆世业、将皆调补”的运行机制，军饷也由户部调拨，使全国的兵权握于兵部，归于中央。然湘军实行的是“兵必自招，将必亲选，饷由帅筹”的做法，以营为建制单位，规定士兵由什长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将领在营一天，军营就存在一天；将领一旦战死，军营当即解散。使士兵只知服从将领，因而形成了“兵为将所有”的局面。营官以上也是这样的做法。营官由统领挑选任命，统领由统帅挑选任命。正是这种浓重的封建隶属关系的串联，使湘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所有的人都服从于曾国藩一人。

湘军分水师和陆军两种。最初起家时只有 3 营 1000 人，但在曾国藩的多年经营下，不断成长壮大，1854 年时发展到一万七千多人，1864 年攻取天京时已达五万多人。湘军的首领曾国藩，以及主要高级将领，均为文人出身。例如三大统帅的江忠源为举人出身，胡林翼为进士出身，左宗棠为举人出身。其他还有官至出使英国大臣的郭嵩焘，为进士出身；官至贵州布政使的李元度，为举人出身；官至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为进士出身；官至三品顶戴的郭崐焘，为举人出身；官至两广总督的李瀚章，为拔贡出身；官至两江总督的李兴锐，为诸生出身；官至两江总督的沈葆祯，为进士出身；官至两江总督的李宗羲，为进士出身，等等。这一特点，使得湘军与原八旗、绿营的又一个很大的不同点是，他们普遍具有审时度势的开放意识，因而在湘军的武器装备和士兵训练上，同样可以较早地发现其所受之西方文化影响和引进的西洋兵操。

在曾国藩制定的湘军营规中，有定名、演操、站墙子、巡更、放哨等。其中有一条《日夜常课之规》，是要求士兵每天早晚各须做一次体操。其具体规定是：“黎明演早操一次，营官看亲兵之操，或帮办代看。哨官看本哨之操。”“日斜时演晚操一次，与黎明早操同”。曾国藩认为，军队只有每天不懈地操练，才能锻炼其

体魄，娴熟其技艺。他曾在《晓谕新募乡勇》中对士兵们说："要你们学习拳棍，是操练你们的筋力；要你们学习枪法，是操练你们的手脚；要你们跑坡、跳坑，是操练你们的步履；要你们学习刀矛钯叉，是操练你们的技艺；要你们看旗帜、听号令，是操练你们的耳目；要你们每日演阵，住则同住、行则同行，要快大家快、要慢大家慢，要上前，大家上前，要后退，大家后退，是操练你们的行伍。"因而他经常要亲自到操场上去查看士兵们的体操训练情况。如他曾规定："每逢三、六、九日午前，本部堂下教场，看试技艺，演阵法"❶。

不仅如此，他还要求他的统帅们也能这样做。例如他曾要求各部队"每逢一、四、七日午前，着本管官下教场演阵，并看抬枪、马枪打靶"；"每逢二、八日午前，着本管官带领，赴城外近处跑坡、抢旗、跳坑"；"每逢五、逢十午前，即在营中演连环枪法。""每日午后，即在本营演习拳棒刀矛钯叉，一日不可间断"❷。即使像李鸿章那样在1862年已成为淮军统帅的人，曾国藩也再三叮嘱他要亲自对士兵进行点名、看操、站墙子。上文中所说的连环枪法，是一种典型的仿照英法军队使用的兵操训练法。其法是将步兵分成每六人为一个组合，一个组合分三排，即六人中两人取卧姿、两人取跪姿、两人取立姿，然后六人同时放枪，构成立体式。放完后，左人左后转，右人右后转，至队末。第二组合六人前进一步，再放枪。以此类推。

这种兵操训练在湘军中受重视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曾国藩1856年作于南昌的一首诗中得到印证。诗名《陆军得胜歌》，其中写道："第六兵勇要做操，清清静静莫号嘈。早习大刀并锚子，晚习扒墙并跳壕。壕沟要跳八尺宽，墙子要扒七尺高。树个靶子十丈远，火毬石子手中抛。闲时寻个宽地方，又演炮队又演枪。鸟枪

❶ 晓谕新募乡勇//曾国藩全集·诗文. 长沙：岳麓书社，1989：453.

❷ 晓谕新募乡勇//曾国藩全集·诗文. 长沙：岳麓收社，1989：453.

手劲习个稳，抬枪眼力习个准。灌起铅子习打靶，翻山过水习跑马。事事操习事事精，百战百胜有名声”[1]。

二、淮军中的西洋兵操

与湘军相比，淮军在西洋兵操的引进方面则更大胆、更普遍。在《清史稿·李鸿章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1862 年 4 月，当李鸿章率领淮军抵沪时，“外国人见其衣装朴陋，辄笑之”。但当时的李鸿章对这种嘲笑并不在意，认为“军贵能战，非徒饰观美，迨吾一战，笑未晚也”。然而后来，当李鸿章在上海亲眼看到洋枪队与太平军作战的情景时，使他真正领略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从此购买洋枪洋炮，乃至制造洋枪洋炮便成为李鸿章淮军建设的头等大事，直至 1895 年甲午战争失败和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

淮军，是指这支军队开始时主要从淮河流域招募而来，故名。淮军在建制上和湘军基本相同，也是以营为一个独立单位。一个营由前后左右四哨，以及六个亲兵队组成，加上行政及其他人员共计 685 人。淮军的营官一般是先由李鸿章确定，然后由营官去招募乡勇，并任命哨官、队官等职。所以淮军的营官具有相当大的实权。可以说，一个营官当他树起“营”的大旗后，他便有了相当大的作战的独立性、机动性和灵活性。1862 年淮军初创到上海时，只有 6 个营，即程学启的“开字营”、刘铭传的“铭字营”、周盛波的“盛字营”、潘鼎新的“鼎字营”、张树珊的“珊字营”、吴长庆的“庆字营”。等到 1864 年秋时，已发展到 104 个营，全盛时达到 200 个营以上，十万余人。

淮军初创时的武器装备也是十分落后的，主要使用刀矛、抬枪、鸟枪、火绳枪和少量的前膛枪，以及非常原始的笨重的土炮。但到上海不久，李鸿章就开始在淮军的武器装备上下工夫，在军队

[1] 晓谕新募乡勇//曾国藩全集·诗文. 长沙：岳麓书社，1989：429.

训练上下工夫，开始了他的最早的“洋务”事业。他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向英法国家大量购买新式武器；一方面向社会广泛招募外国工匠，开办军火工厂，自己制造枪炮武器，以尽快使淮军的装备现代化。1862年，李鸿章在英人马格里的建议下，首先在上海淞江地区的一座庙宇里创建了“淞江洋炮局”，以自己制造武器。这在马格里的手书札记中有详细的记载：我在被批准脱离英国军役之后，便投效了李鸿章。第一件事我就向他指出，当时他购买外国军火所付的代价过高。我告诉他，欧洲各国都开办大工厂制造军火，中国若要为本身利益着想，也应该建立这样的制造厂。李鸿章很赞成我的建议，立即授权给我雇用50名工人，在邻近的一座庙宇里开始进行制造[1]。后来李鸿章又购买了一座在上海虹口的洋人机器铁厂，与淞江洋炮局合并后改称“江南制造总局”，主要仿造洋枪、洋炮、轮船，并兼有购买洋枪洋炮的任务。所以，到1866年时，“淮军各劈山炮队，皆用开花炮。其抬枪、小枪队，皆改用洋枪。故所部陆军五万余人，约有洋枪三四万杆。铜帽，月需千余万颗；粗细洋火药，月需十余万斤。又有开花炮队四营。”其阵容和现代化的装备，当时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2]。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1865年时湘军与淮军的武器装备对比中，看到当时淮军的现代化程度。湘军“每营仅用抬枪、小枪一百二十余杆，淮军则每营用洋枪四百余杆，少亦三百余杆。每开一仗用洋药、铜帽须数万。其军又有开花炮队四营，专以开花炮弹及洋枪为攻剿之具。”（《续修庐州府志》卷九十八）江南制造局还翻译出版了大量的近代西方科技图书，仅兵器兵法、造船与海战、地质探矿冶炼这三个门类的图书就出版有76种415卷。其中1874年出版的《水师操练》，有许多关于兵式体操的训练内容。

1863年12月，李鸿章从太平军手中夺回苏州后，又在苏州成

---

[1] 高空雁. 淞江洋炮局//南京：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 江苏近代兵工史略.

[2] 朱来常. 淮军始末. 合肥：黄山书社，1984：21.

立"苏州洋炮局"，并于次年买下了英国阿思本舰队"水上兵工厂"的部分机械设备，用来装备苏州洋炮局。1865年，李鸿章升任两江总督，当他到南京就任时，将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并以此为基础创建了"金陵机器制造局"，也是专门从事军火生产。1870年，李鸿章又接办了"天津机器局"。他在原有基础上大力增建厂房，并将机器局扩大为东、西两局。其东局专门制造火药、铜帽、枪炮、水雷及各种子弹；西局则主要制造开花子弹和军用器具。李鸿章对自己创办军火工业的作用，曾有过很高评价。他说："抚臣李鸿章不惜重赀，购求洋匠，设局派人学制，源源济用。各营得此利器，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是也。"❶

在大力发展军火工业的同时，李鸿章的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雇佣大批外国军官，到淮军的各营中担任军事教习，以帮助淮军训练洋操，更好地使用洋枪、洋炮。我们从英国人戈登书写的一封家信中，看到了当时淮军进行兵操训练的效果：我"很感兴趣地教练着中国兵使用大炮。他们进步很快，已经学会执枪、射击和分队。我希望他们很快学会步兵战术。这次训练比我预期的成绩还要大"❷。1863年12月，淮军占领苏州后，李鸿章立即聘请英人马格里主持苏州炮局，使苏州炮局成为当时国内重要的一个兵工厂。马格里是英国侵华部队第九十九联队的一个军医，后在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被李鸿章看中，被任命为洋枪队教练，并授予中国陆军的上校职务。1875年，大沽炮台试验爆炸事故发生后，马格里拒绝承认错误而与李鸿章发生裂痕。从此，以李鸿章为首的淮军和淮系势力，同英国的关系逐渐疏远，代之而起的是德国顾问德璀琳对淮军的渗透和影响。所以，在1876年，李鸿章开始改聘德国军人为淮军的兵操教练，并于同年在淮军中选拔了年轻力壮的中下级军官

---

❶ 李文忠公全集：卷二. 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46.

❷ 太平天国史料译丛. 王崇武，黎世清，译. 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251.

卞长胜等7人，赴德国专门学习陆军知识。1879年他们学成回国后，即普遍以德国兵操教练淮军。

关于淮军后期主要是练习德国兵操的情况，在《清史稿》中也有记录："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聂士成于直隶驻防淮军内，选练马、步队三十营，仿德国营制操法。"德国兵操的内容主要包括单兵教练和队列训练，也要练习单杠、双杠、木马、平台等器械体操。

第三节　新建陆军与自强新军中的西洋兵操

依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而起家和发展的湘军与淮军，尽管与晚清的八旗和绿营相比较，无论在兵制建设上，还是在武器装备和训练的方法手段上，均有其进步的一面，但是，当他们与取法西洋近代军队编制建设的日本军队作战时，其落后的一面便完全地暴露出来。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宣告了几十年洋务运动在中国的彻底破产，而且也引发了清朝军队建设制度的又一次变革。正如督办军务处五大臣所奏称的那样："现欲讲求自强之术，固必首重练兵。而欲迅期兵力之强，尤必更革旧制"（《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一）。驻俄、德公使许景澄的奏章说得更是明白："自辽海军兴，战守不利，中外论者，审溯兵事得失，无不以仿用西方法，创练新兵为今日当务之急。"[1] 从此，完全仿照西方近代军队编制，重新组建中国的新式陆军，成为军队建设的主旋律。在此背景下，它在近代体育方面所引发的结果是：中国军队在更大的范围上引进西洋兵操。

一、新建陆军中的西洋兵操

1895年，清朝政府在甲午战争的震惊下，决定改革旧的军事

[1] 清朝续文献通考. 二：卷203·兵二.

制度，组建新式陆军。这时的袁世凯弄到一个浙江温处道的官职留在北京，他邀集一伙人译著兵书，同时接受慈禧太后宠臣荣禄的指示，拟订新建陆军的各种规章制度。后来在清皇族大臣的保奏下，袁世凯奉命在天津小站成立一支“新建陆军”。小站，距天津约三十多公里，东临渤海，处于大沽海防要塞与天津之间，是天津的南大门，也是首都北京的天然屏障。这里地域辽阔，交通便利。过去人烟稀少，宜于屯兵。这样，袁世凯以一个道员身份，取得了督练新军的职权，成了日后飞黄腾达的起点。

事实上在袁世凯督练新军的前一年，在天津小站，已有淮军官僚、长芦盐运使胡燏棻在此组建了一支新式军队，“一切操练章程，均按照西法办理”（《光绪朝东华录》第3556页），取名“定武军”。定武军在小站共设10个营，分步、炮、工、骑4个兵种，计4750人。全部装备洋枪洋炮，并聘请德国教官汉纳根主持训练。不久，因胡燏棻被任命为津芦铁路督办，清政府遂决定将定武军交由袁世凯接统。袁世凯在定武军的基础上，再招募2500人，从而组建了由7250人组成的“新建陆军”。

新建陆军主要仿照德国和日本的陆军建制，使用新式武器，拥有步、骑、工程、辎重等兵种。设有步兵学堂、炮兵学堂、工程兵学堂，推行新的军事教育。在新建陆军中，袁世凯派冯国璋为步兵学堂总办兼督练营务处总办；段祺瑞为炮兵学堂总办兼炮兵统带；王士珍为工程兵学堂总办兼工程兵统带。王、段、冯三人均为小站练兵时的主要骨干，曾被称为“北洋三杰”，并分别得到“龙”“虎”“狗”的绰号。天津小站练兵聘用了不少外国人担任教官，其中德国教官最多，所以在《梦蕉亭杂记》中是这样描述当时新建陆军的训练情景的：“该军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束精壮。专练德国军操。马队五营，各按方辨色，较之淮军各营，壁垒一新。”[1] 在1898年10月11日袁世凯的《谢赏新建陆

[1] 谷世权. 中国体育史.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7：84.

军银两天恩折》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光绪皇帝还曾打算专门到天津检阅小站练兵的情况，特别是检查部队的兵操训练："前经降旨，择于九月初五日，朕恭奉慈禧端右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慈舆启銮，先赴南苑，再往天津，以次阅操。"后因天气转冷，而使"所有巡幸天津之处，著即停止"。但考虑到皇帝视察对军队训练的意义，"唯念国家讲求武备，本期亲临校阅，鼓舞戎行，近畿各军业已次第预备，该官兵等平日操演不惮勤苦，朕心良深轸念"，因而决定对"提督聂士成所部武毅军，著赏银六千两；侍郎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著赏银四千两；提督董福祥所部甘军，著赏银三千两。以示体恤"。同时期希望各部队能继续"督率将士，随时认真训练，总期纪律严明，缓急足恃，毋负朝廷整军经武之至意"[1]。

1898年戊戌变法后，新建陆军发展到1.7万人，同时改名为"武卫右军"，属直隶总督荣禄统领下的武卫军的一部分。1899年，袁世凯奉命率领武卫右军由小站开往山东德州，以会操为名镇压刚刚兴起的义和团运动。由于镇压得力，袁世凯被提升为山东巡抚。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袁世凯因按兵不动而使武卫右军获得了完整的保存，并在收编山东旧军的基础上扩编为20个营，发展到1.96万人，同时命名为"武卫右军先锋队"。由于袁世凯再次为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所以被提升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及兼任练兵大臣。1904年，袁世凯改武卫右军为"北洋新军"，成立3个镇（相当于师），扩军到2.5万人。次年改名"北洋常备军"，再新建3个镇，达到8万人。北洋常备军除第一镇由满人铁良统领外，其余5镇均为袁的嫡系，主要将领均出身自小站练兵。所以，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成立新建陆军起，在晚清的历史上，又逐步形成了一个继李鸿章淮军而后的庞大的封建军事、政治集团，史称"北洋军阀"。

---

❶ 袁世凯奏议（上）.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8.

二、自强新军中的西洋兵操

与新建陆军几乎同时进行建设的还有张之洞的“自强新军”。1894年，张之洞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当他于11月来到南京上任的时候，正是甲午战争激烈进行之时，看到的是清军的节节败退。他深知“各营积习锢弊深入膏肓，若不捐弃旧法，别开局面，虽事前日加申儆，终无大益。事后加以诛戮，已难捕救”❶。而同时他看到的是“日本用兵，皆效本西法，简练有素，饷厚械精。攻取皆有成算，弁兵皆有地图，以及登山涉水之具。糇粮御寒之物，无不周备”❷。因此，他决心采用西法，编练新军。当时陆军以德国最强大，所以德国陆军的编制和操练之法便成了他学习和模仿的目标。

1895年3月7日，他首先致电中国驻俄国和德国公使许景澄说：“南洋拟用洋将练兵一万，兵轮十余艘，即请托克（虏伯）厂，或他厂荐二三十人来南洋。水陆均需。用才高为将，才小为弁。得其时望分晰示知。须有堪胜统领者，水陆各一，月薪约若干，祈先示。”❸ 三天后，张之洞又向许景澄提出了更具体的所要聘任的德国教官要求：“需统将一，营宫二十，哨官一百，皆用洋弁，以华官为帮办。请觅一真能统万人者。”❹ 张之洞一边求助许景澄帮助物色合适的德国人选，一边抓紧在中国就近招募。据说威体锡和乐巴二人就是他首先招募到的洋教官。二人帮助张之洞首先对步队200名、马队100名骨干，进行了集训。内容包括“地营、散队、枪炮取准之法”。集训后的骨干被派送到各营，作为营的训练教官。到1895年底，张之洞所聘任的德国教官已陆续来华。由

❶ 张之洞. 选募新军训练洋操折//张之洞全集：第一册. 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723.

❷ 张之洞. 吁请修备储才折//张之洞全集：第一册. 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680.

❸ 张之洞. 致俄京许钦差//张之洞全集：第三册. 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534.

❹ 张之洞. 致俄京许钦差//张之洞全集：第三册. 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536.

此，他于12月27日正式向朝廷上了一道《选募新军训练洋操折》，1896年1月17日获朝廷准奏，标志着“自强新军”的正式组建。所以，在《清朝续文献通考》中有这样的记述：“北洋有新建陆军，南洋有自强军，是为练新军之始”（《清朝续文献通考》二，卷203“兵二”）。

自强新军原拟编练1万人，后因经费问题而缩减成第一批组建2800人。按德国军制分成13个营。其中步队8个营；马队2个营；炮队2个营；工程队1个营。张之洞曾聘来春石泰等35名德国军官为其训练新军。其中委任德国人来春石泰为全军统带，其营官、哨官亦由德人担任，华官则充任副职。关于自强新军的兵操训练情况，《清史稿》中曾有记载：1896年，“张之洞练洋操队二营于湖北”。1897年，“张之洞以练军重在操演，令分防各营以十之一更番来省，教以新操，俟练成后，转授各营”。特别是1898年5月，自强新军曾在上海搞了一次会操表演，当时有各国驻上海的领事、武官、舰长等175人前往观摩。在来春石泰的指挥下，他们先后表演了走阵、放枪手势、攻战之法、合操枪法、进退冲突法等内容，得到了当时社会和媒体的很高评价。如有些社会人士说：“观步伐枪法，整齐灵捷，实为近年新法，足抵泰西强国练过二年之兵。”[1] 也有媒体评论说：“各兵手足之灵活，所演手势、步伐，皆极敏捷。一切皆按德法，望而知非中国昔日之兵。”[2]

自强新军的新式训练，还曾被编成《自强军西法类编》一书，共18卷，分6类：兵法学8卷，军器学5卷，军乐学1卷，工程学2卷，测绘学1卷，数学1卷。其中兵法学中有步队、马队、炮队的操法口令与图解；有验枪、架枪和瞄靶程式；有步队、马队、炮队的

❶ 陈明自强军训练粗成接教精艺情形禀//《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 中国兵书集成：卷49.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1995：445.

❷ 译西报论自强军操法//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 中国兵书集成：卷49.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1995：445.

演阵图式等。它为西洋兵操在军队的普及和推广，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1902 年，自强新军被调往山东，后编入袁世凯的北洋军。

正是在新建陆军和自强新军的示范下，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在清朝政府的官员中，几乎都对军队中的西洋兵操训练持肯定的态度。如 1898 年，在户部所上的一道奏折中，曾这样说道："维今日事势，练兵为第一大政，练洋操尤为练兵第一要著。"甚至向皇帝建议说，应给练习洋操的军队增加饷银，以资鼓励（《清朝续文献通考》二，卷 203·兵二）。又如 1898 年兵部和户部在给江南道监御史曾宗颜的一封公函中认为：精练陆军，需一律改为洋操。因而命令他们说："带随员数名，洋将一名，洋教习十余名。到沿江各省，严选丁兵。待募新兵，全练洋操。规模初具，再赴他省。"[1]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使军队中的西洋兵操训练很快获得了普及。如 1904 年《东方杂志》第十期中，曾有关于清军中训练西洋兵操的连续报道："浙提吕军门，前曾分饬绿营中标兵，由各参戎每营挑选精壮兵丁二十名，共计百二十名合成一方后，训练德操。现已挑选足数，在右营教场。会集训练操演。"又有"江苏镇江城守营兵丁，向系沿守旧制。现署参将周锦堂，参戎延聘教习二人，一律改习德操"。军队中的这些训练活动，使西洋兵操有可能较为系统地传入中国，从而为中国近代体育的初步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四节　军事学堂中的兵操教育

西洋兵操除因具有实用方面的意义而首先在中国军队中得到了传播和推广以外，另一个重要的传播媒介就是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学堂。洋务派创办军事学堂，是在中国当时内忧外患处于十分严重的

---

[1] 何启君，胡晓风. 中国近代体育史. 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9：54.

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其目的性非常鲜明：一是要镇压人民革命；一是要反对外国侵略。即如《同治三年十二月初四日巡视南城掌四川道监御史陈廷经奏》中所说："靖内患，御外侮，非讲求兵制不可。"认为只要"整顿陆营，则内患不作；整顿水师，则外寇不兴"[1]。虽然后来的结果表明，洋务派军事力量是"靖内"有功，而"御外"无力，但从创办军事学堂的客观效果来看，它推进了中国军队的近代化建设，促进了西洋兵操在中国的传播。

一、天津水师学堂中的兵操教育

天津水师学堂，又称北洋水师学堂，由李鸿章创办于 1881 年，是中国最早的海军学校。内分驾驶与管轮两科，入学年龄为 13—17 岁，学习年限 5 年。学堂开始由吴赞成为总办，后由吴仲翔接任，严复为总教习。《清续文献通考》中，有关于天津水师课程开设情况的介绍："学生入堂，授以英国语言，翻译文法。"同时传授"推步、测量、驾驶诸学"。考虑到不能使学生走向文弱，学堂还要对学生"授之枪，俾习步伐；树之桅，俾习升降"。所以，我们在原天津水师学堂学生王恩溥老人 1957 年的回忆文章中，更具体地了解到了当时"天津水师学堂的体育课内容，有击剑、刺棍、木棒、拳击、哑铃、足球、跳栏比赛、算术比赛、三足竞走、羹匙托物竞走、跳远、跳高、爬桅等项。此外，还有游泳、滑冰、平台、木马、单双杠及爬山运动等。只是还没有篮球、网球等活动"。老人还介绍了水师有关兵操训练内容方面的变化。他回忆说：我们"所学的体操，最初为德国操，主要演习方城操及军事操。后来到了戊戌年间，就改为英国操了"[2]。

---

[1] 洋务运动（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11.

[2] 王恩溥. 谈谈六十三年前的体育活动//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三辑.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58：121.

二、天津武备学堂中的兵操教育

天津武备学堂，是继天津水师后李鸿章于1885年创办的又一所军事学堂。它是中国的第一所陆军学校。在李鸿章上书清廷的奏章中曾指出：西方各国“陆营将弁，必由武备书院造就而出”。因此，“我非尽敌之长，不能致敌之命”。故创办武备学堂，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否则“与强敌从事，终恐难操胜算”❶。可见，洋务派创办军事学堂，确有着抵御外侮的一面。天津武备学堂主要聘德国军官为教习。学生来源于两部分：一是从良家年幼子弟中招募，主要是培养军事指挥人才。后来北洋军阀的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吴佩孚等人，都是从武备学堂走出的学生。二是从各营挑选优秀的中下级军官，学习一年后，改从军事教官。他们的课程内容分学科和术科两种。学科有天文、地理、测绘和数理化等知识；术科有步队、马队、炮队，以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之法。李鸿章曾在1887年向清廷夸奖武备学堂的学生说：他们“两年以来勤课不懈，于西洋武备各学，俱通门径”。尤其是“各项操法，一律娴熟”。因而他建议政府择优褒奖，以示鼓励。关于武备学堂的体育教育情况，我们目前还未能有更多的具体了解，但从王恩溥《谈谈六十三年前的体育活动》一文中，还是看到了一些蛛丝马迹。文中说：“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电报学堂等举行校际运动会，作为水师训练的特有体育活动，则是有趣的‘爬桅’竞赛。”这就是说，在天津武备学堂，同样应该有着较为正常的体育教学课。

三、江南水师学堂中的兵操教育

江南水师学堂，是由南洋大臣曾国荃于1890年在南京创办的，

❶ 朱有瓛.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533.

所以也称南京水师学堂。江南水师的办学亦仿照英国的做法，专业分驾驶、管轮两科。招收学生的年龄要求是 13 — 20 岁。首期招生 120 名，按英文程度分一、二、三班。在课程设置方面，总体上看和天津水师大同小异，例如在专业课的安排上，也有"升桅帆缆、划船游水、枪炮步伐"等。在体育教育上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在入学资格的审查中，有明确的身体条件要求，即"气体结壮，身无隐疾"。第二是每日傍晚放学后，要求所有学生都必须到操场进行体育锻炼。关于江南水师学堂的办学成效，在 1892 年的《格致汇编》一书中，曾有以下一段记载："水师学堂创仅二年，全借英文习练，已得臻至此进境，实觉奇异，大堪嘉美。"并特别指出：学生们"或打靶、或爬桅、或跑阵、或练勇，各显技能，莫不便捷"[1]。

军事学堂开展兵操教育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使西洋兵操的引进又多了一条通道，更重要的是它为后来的西洋兵操走进中国的学校教育，开了思想认识上的先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 朱有瓛.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529.

第三章 近代西方体育在学校的传入与传播

中国社会历来具有良好的教育传统，例如早在奴隶社会时期就有了专门从事教育的机构——学校。所谓“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孟子·滕文公·上》）。西周甚至出现了“礼、乐、射、御、书、数”的全面教育模式。其中乐、射、御都含有较大的体育教育成分。春秋战国时期，私人办学曾掀起高潮。以孔子为例，一生从事教育40多年，有弟子3000人。孔子的教育，仍坚持文武兼顾。大致从汉代以后，教育理念逐渐出现了“重文轻武”的趋势，学校教育中的体育成分越来越少，甚至到后来出现了“羞与武夫齿”的社会文化现象。随着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后，传统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育形式等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代之而起的是近代教育制度的逐步确立。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标志着以西学为主要内容的新式学堂正式在中国诞生。甲午战争后，在维新派“广开民智”的奔走呼号下，全国更是出现了一个兴办新式学堂的高潮，著名的京师大学堂就创办于这一时期。1901年，清政府又开始实行“新政”，主张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并于1904年（旧历1903年）公布和正式实施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学制——《奏定学堂章程》。从此，体育作为学校教育内容的地位，得到了确认，体育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一个重要方面，形成了共识。西方近代体育由军队而走进学校，这是发生在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重大转折。

第一节　清末“新政”与学校体育课的出现

就晚清学校体育的发展来看，一般认为，中国近代学校体育的产生是在清末“新政”以后，并通常以1904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公布为标志。这样的判断是基本准确的。但是，如果再能深入地考察一下中国近代学校体育发展的具体过程，便不难发现，事实上在清末“新政”发生之前，中国近代学校体育已经有所萌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书院体育”。后来才逐渐形成了近代学校教育中的体育制度。

一、晚清学校体育的早期尝试——书院体育

书院体育是书院教育的一部分。书院一词始于唐代，最初是指官方修书、校书和藏书的场所。后来也指私人读书、讲学的地方。到宋时，书院开始兴盛，成为一种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晚清的书院教育，最初仍然是一种旧式教育，例如张之洞在湖北、四川学政任内建立的经心书院和尊经书院，其教学内容仍是“通经”“读史”“读诸子”和写八股文。认为一个从书院毕业的学生，应该学习经书的全部，以及正史、通鉴、通考、诸子与古人文集。说明这时的书院教育，保留的仍是中国传统之学。但19世纪90年代后，一些晚清的旧式书院教育开始逐渐脱离传统教育框架，超越传统书院的教学体系，而初步具备了近代教育的意义，如1890年创办于湖北的“两湖书院”、1891年创办于广州的“万木草堂”等，均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由旧式书院向新式学堂过渡的学校形式。在这些书院中，又尤以“两湖书院”的发展变化最具有代表性。

两湖书院的创办人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洋务运动领袖张之

洞。张之洞一生，对教育事业特别青睐。从 1869 年算起，经他亲手创办的书院和学堂就有几十所之多。其中著名的书院有广雅书院、两湖书院；著名的军事学堂有广东水师学堂、湖北武备学堂；著名的实业学堂有武昌农务学堂、工艺学堂、广州电报学堂、湖北路矿学堂；著名的师范堂有三江师范学堂等。张之洞所进行的书院教育，早期也是以培养入仕科考的人才为目标。大致从中法战争以后，在时势剧变的背景下，张之洞在对人才的理解上也发生了变化。他开始认识到学习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和掌握西方技能的重要性，因而提出了对传统书院教育进行改造的问题。他在 1898 年的奏章中说：书院应该“按照学堂办法，严立学规，改定课程，一洗帖括词章之习，唯以造真才济时用为要归”[1]。因而主张将两湖书院的课程设置，分为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六门。后又废理学和文学，增设了天文和地理两门。1899 年，张之洞再次上书朝廷，提出对书院课程设置的改革意见：“书院之设原以讲求实学非尚训诂词章。凡天文、舆地、兵法、算学等经世之务，皆儒生分内之事。”所以他建议加强实用科目，删减经史内容。可以将经史合为一门，每月讲习一次。兵法、舆地等自然科学门类则应大量增加学时，以期“文武兼习，学行交修”[2]。在传统书院的教学内容中，不断增加西学的分量，这一变化无疑使中国的旧式书院教育，终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迈出了具有关键性的近代化一步。

两湖书院的学生主要来自两湖地区。在其固定的 240 人名额中，有 100 人来自湖南、100 人来自湖北，另有 40 人来自汉口商业界。两湖书院的办学经费由湖南、湖北两省分担。学生全部实行

[1] 张之洞．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76.

[2] 札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改定课程//张之洞全集：第五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3747.

住宿制。甲午战争后，两湖书院监督梁鼎芬曾号召书院学生要一洗文弱之风，养成体格健全之人才。所以两湖书院从 1896 年 8 月，开始设置有体育课程。当时的任课老师据说是一名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学生，以柔软体操见长。在体育老师的带动下，两湖书院的学生每天下午都会自觉地去操场进行身体锻炼。他们从徒手柔软体操开始，逐渐练习到器械体操。为了便于学生能随时进行体操练习，在学生宿舍前，均装置有单杠、双杠等体操设备[1]。和其他新式学堂一样，兵操训练也是当时两湖书院的主要体育内容。书院曾发给学生每人一套兵操训练的短衣短裤；每人一支毛瑟枪和子弹十余发。兵操训练的内容主要有步操、炮操、马操 3 种。兵操教官由军营里的军官充任。工程营的军官教步操，马队的军官教马操，炮队的军官教炮操。在两湖书院的学生中，后来成为辛亥革命领袖之一的黄兴，曾是兵操训练的积极参与者和骨干[2]。

在上海，1878 年由张焕纶创办了正蒙书院。正蒙书院开始也主要以国文、地理、经史、时务、格致、数学等为教学内容。但 1882 年后，“张氏为适应环境计，加课英、法文字，并注意体育，令诸生分日轮习军事、拳术等项。定和厚、肃静、勤奋、精熟、敏捷、整洁六项为校训。于是校誉日隆，学生益众”[3]。正蒙书院于 1902 年又正式改名为梅溪学堂，并越发体现出它的新式教育思想。在教学活动中，“举德、智、体三育而兼之，与东西洋教授之法意多暗合者”。特别是“自甲申年，始添课英、法文，旁及应对、进退、洒扫，与夫练身习武之术，有击球、投沙囊、投壶、习射、蹴鞠、超距、八段锦诸课，分日轮流演习”[4]。

---

❶ 陈英才. 回忆两湖书院//湖北文史资料：第八辑. 1984：28.

❷ 陈英才. 回忆两湖书院//湖北文史资料：第八辑. 1984：28.

❸ 正蒙书院沿革//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239.

❹ 张在新. 先君兴办梅溪学堂事略//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241.

二、《奏定学堂章程》的体育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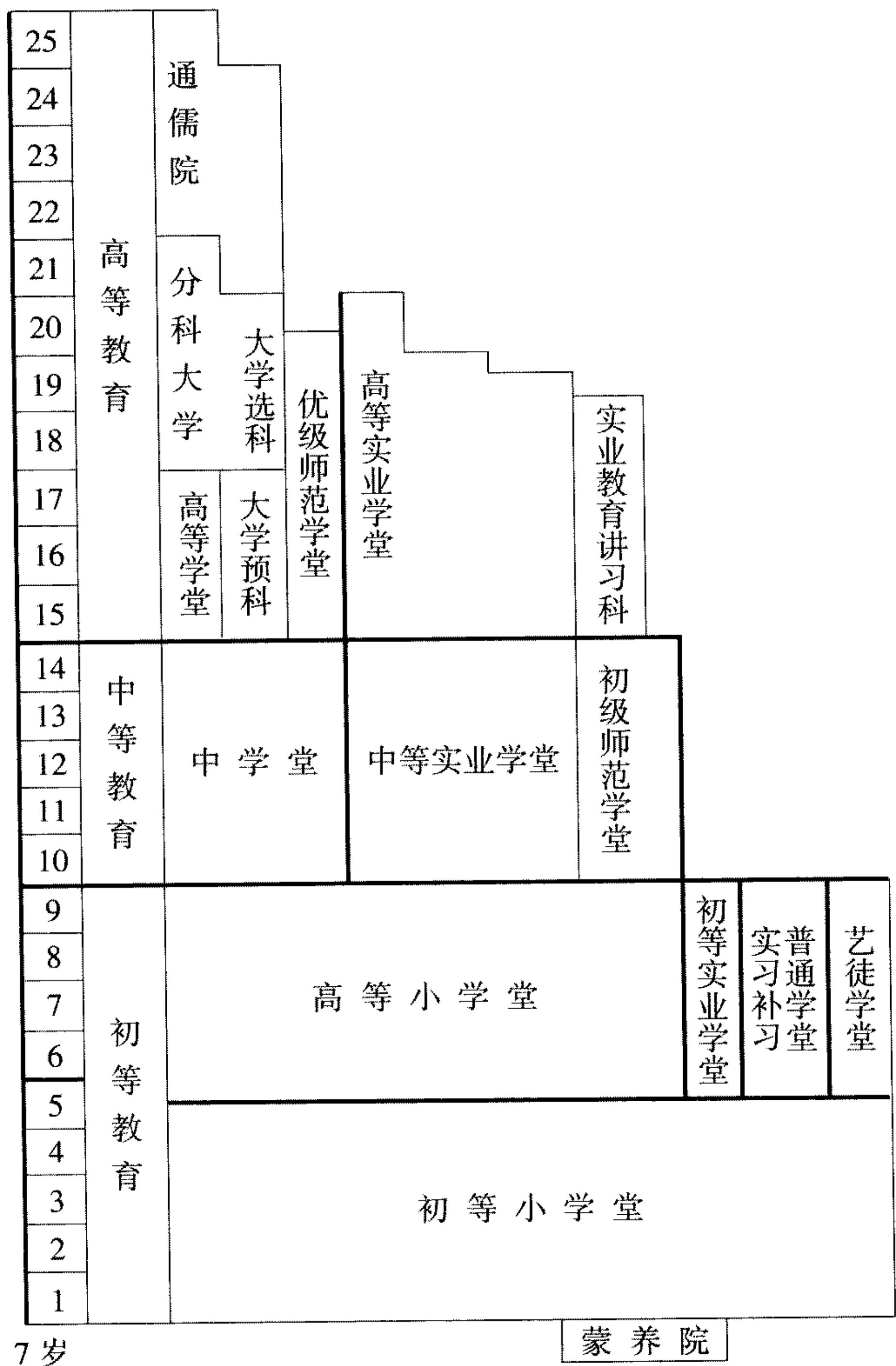
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使清皇室再一次被帝国主义列强逐出皇城。在严酷的历史现实面前，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势力不得不有所醒悟。于是在 1901 年 1 月 29 日，亡命西安的清廷发布上谕，要求各地官员积极讨论有关国家改革问题。并于同年 4 月 21 日设立国家有关改革问题的督办政务处，专门负责审查各地官吏奏章，办理全国官制、学校、科举、吏治等事务，制订各项新的国家改革措施等。这些，便是清末"新政"的开始。清末新政在教育上带来的重大变化主要是 1904 年公布了《奏定学堂章程》。

虽然在《奏定学堂章程》之前的 1902 年，清政府曾公布了一个《钦定学堂章程》，而且从形式上看，确实已经具有较为完备的学校体系，可以称得上是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第一次法定学校系统，但是由于该章程没有施行，所以它也就不具有历史影响力。对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真正产生重大影响的是 1904 年公布并实施的《奏定学堂章程》。此章程对学校系统、课程设置、学校管理等都作了具体规定，是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并经法令正式公布在全国实行的学校体系，它一直延用到 1911 年清朝灭亡为止。

《奏定学堂章程》也称"癸卯学制"，它规定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学制体系。在纵向上，学制分 3 级 6 段。即第一段为初等教育，设初等小学堂 5 年，高等小学堂 4 年。另有不在学制内的学前教育形式——蒙养院。第二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 5 年。第三段为高等教育，设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 3 年，分科大学堂 3～4 年，通儒院 5 年。按照这个学制规定，儿童从 7 岁入学到最后通儒院毕业的整个过程，大约是 25 年。如果不计算通儒院，为 21 年，是我国最长的一个学制。在横向上，与高等小学堂平行的，有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和艺徒学堂。与中等学堂平行的，有初级师范学堂、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与

高等学堂平行的，有优级师范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

附："癸卯学制"系统图



《奏定学堂章程》基本上是完全仿照日本学制制定的，它在学校体育上的意义是，明确规定各级各类学校均需要开设体育课程，课程称为“体操科”，并对课程的教学时数、教学目标、教授内容、场地设施等，都作了相应的规定。例如教学时数的规定是：小学堂每周 3 学时；中学堂每周 2 学时；大学堂每周 3 学时。在教学目标上，小学堂提出的要求是：“其要义在使儿童身体活动，发育均齐，矫正其恶习，流动其气血，鼓舞其精神。兼养成其群居不乱、行立有礼之习。并当导以有益之游戏及运动，以舒展其心思。”中等学堂的要求是：“凡教体操者，务使规律肃静，体势整齐，意气充实，运动灵活。”强调“中学堂体操宜讲适用”。在教授内容上，小学一年级主要安排“有益之运动及游戏”。从二年级开始，兼习“普通体操”。到了中学阶段，主要有“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其普通体操先教以准备法、矫正法、徒手哑铃等体操，再进则教以球竿、棍棒等体操。其兵式体操先教单人教练、柔软体操、小队教练及器械体操，再进则更教中队教练枪剑术、野外演习及兵学大意”。中学的体操科内容安排，还“可视地方之情形，若系水乡，应使练习水泳”。但总体原则上，“在中学堂，宜以兵式体操为主”。章程对大学堂的体操科教授内容，也是规定为“普通体操、兵式体操”两种。在体育课程的场地设施方面，章程规定：“初等小学堂之体操场，应分室内、室外两式，以备风雨。除室外一式必备外，室内即借学生聚集处用之。”此外，还要备有体操“所用之器具”。中等学堂的体操场，“必宜分屋内、屋外二处”。教授体操的所用器具，则“均宜全备，且须合教授中学堂程度者”。高等学堂体操场，也是“宜分屋内、屋外二式”，凡教授“体操用器具，均宜全备”。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时的清政府为保证学校体操科教学的顺利进行，甚至还专门颁布了一个《操场规则》。对此，我们可理解为是落实《奏定学堂章程》中有关学校体育工作要求的重要补充。《操场规则》的内容共有 7 项：“一、操场当一律整齐，不得嬉笑

私语、大声咳唾、蹲坐自由；二、操场器械各有定所，不得任意移动毁坏；三、服用物如眼镜、荷包等件，不得带入操场；四、操帽衣裤，下场后即须一律更换，收置整齐；五、学生值操期，不得借故请假不到，排班定后不得擅自妄动出班；六、学生不值操期旁视者，应一律整立，均着学堂制服，不得异色羼杂；七、操场一切均听教习号令，仍随时受监学纠正”[1]。

《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确立了中国近代教育制度，使近代体育在中国学校的普遍实施，获得了法律支撑。但是，由于当时的体育课教学更多地偏重于兵式体操的训练，“立正、稍息、齐步走”之类的军事操练，虽说对学生的身体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体育课形式上的呆板、枯燥和千篇一律，事实上更多地是影响了体育教育的实际效果，因此，当西方近代体育最初走进学校的同时，便也给中国的学校体育发展留下了一定的隐患。

三、晚清学校体育的基本特点

从晚清学校体育的基本特点来看，可作如下归纳：第一，在指导思想上，封建式的“忠君、爱国”仍是其发展教育的主旨。正如1902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所说：“京师大学堂之设，所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谨遵此次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全学之纲领。”在1906年《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将教育的宗旨正式规定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所以，晚清学校的体操科教学，具有明显的“军国民主义”倾向。这是因为“环球各国，合上下之精神财力，尤注重练兵。兵之所以精，则以通国皆兵，又无一不出于学”（1902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一章全学纲领）。在这样的理念下，晚清政府要求所有学校的教育，“必寓军国民主义”（1906年《学部奏请宣示教育

[1] 1905年高等学堂规则、操场规则//四川学报：第四册. 1905.

宗旨折》)。所以，1911 年 4 月，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曾作出了一个以下决定：奏请特颁谕旨，宣布军国民主义；通饬高等小学及与之同等以上之学堂，一律注重兵式体操；各学堂均应励行关于军国民教育主义之训练，并设运动部，以教员之长于体育者为部长，监督学生之运动[1]。

第二，在教学内容上，以兵式体操为主体。例如 1903 年张百熙等人在重定学堂章程的时候，曾在其《学务纲要》中写道："中国素习，士不知兵，积弱之由，良非无故。"因而要求"各学堂一体练习兵式体操，以肄武事。并于各高等学堂中讲授军训、战史、战术等要义"。还特别要求体操一科，"以兵式体操严整其纪律，而尤时时勖以守秩序、养威重，以造成完全之人格"（1906 年《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不仅体育课上学习的内容是兵式体操，而且课的组织形式也都是兵操训练的一套，强调的是机械盲从、单调统一。所以，导致的结果是，深受青少年欢迎的近代西方体育娱乐项目，诸如田径、球类等，始终被排斥在晚清学堂[2]的大门之外。

第三，体育师资严重缺乏，使许多旧式军人有机会走进学堂，充任体育老师，成为当时社会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但是不管怎么说，随着清末"新政"各种"学堂章程"的颁布，体育的位置终于在学校教育中得到确认。这是破天荒的重大事件。甚至对当时的女子学堂，政府也有明确的开设体育课程的要求："其要旨在使身体各部发育均齐，四肢动作机敏，咸知守规律、尚协同之公义。"这是课程的目标。在教学进度上，则要求："女子初等小学堂，初则授以适宜之游戏，时或与音乐结合授之，渐进授普通体操；在女子高等小学堂，则授普通体操和游戏。"其教学的基本原则则是："凡教授游戏，虽当使之活泼愉快，但须注

---

[1]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史. 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28：118.

[2] 晚清时的教会学校，当是另外一个系统，不包含在此列。

意使之不蹈放纵之行为；又依体操所习成之姿势，务常使之保持勿失。”（《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1907年）这一切说明，清朝末期的近代体育教育制度终于在摇摇晃晃中破土而出，它所带来的必将是今后中国学校体育的新生。

第二节　体育专门学校与学校体育师资培养

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以后，要求全国各地的新式学堂都必须开设体育课程，由此引起了社会对体育教师的大量需求。有资料表明：截至1912年的统计，全国已有各级各类学堂87272所。其中有小学堂86318所，中学堂832所，大学堂122所。在校学生人数达到2933387人[1]。如此众多的学校，又都必须开设体育课程，它所带来的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便是各地体育师资的奇缺。

一、人才匮乏的矛盾

在体育师资大量缺乏的情况下，为了解决当时的急需，不得不聘用大量的旧式军人到学校担任体育教师。人们误以为，学校体育课教学就是兵操训练，而对于兵操训练，大凡军人都具有这方面的基本素质。结果是：使得“一般无知识无道德之营弁之兵士，竟一跃而为教师。品类不齐，非驴非马。既不识教授为何物，又不知学校为何地。酗酒狂赌，好勇斗狠，无所不为。不一年，学校之名誉扫地，社会之信仰尽失，学生父兄多仇视体操一科”[2]。

由于多数旧式军人并不具备担任体育教师的基本能力和素质，

[1] 南京政府教育部.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 教育统计. 上海：开明书店，1934.

[2] 徐一冰. 二十年来之体操谈. 体育周报：特刊，1920.

因而引起了社会的极大不满。在此背景下，培养合格的体育师资，便成为当时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于是，出现了最早的培养体育师资的学校。当时走得最快的是苏州的“江苏优级师范学堂体操科”，它创办于1903年，科主任为日本人高田仪太郎。该科修业年限为1年，前后毕业了两届学生，共60人。专业课程设置主要有连续体操（即旧式德国体操，包括哑铃、球竿、木环、棍棒、豆囊等）、各个体操（即旧式瑞典体操）、兵式体操、器械操、田径、游戏、舞蹈等。后来又有“湖南体操研究所”，它曾于1904年开办了培训体育师资的短期训练班，所招学生按军人管理。所设术科有柔软体操、器械体操、兵式体操及各科游戏。有江苏两级师范体操专修科，它成立于1905年。这期间最著名的是绍兴“大通师范学堂”，也称大通学堂。该学堂仅设体操专修科，由徐锡麟等人创办于1905年。

徐锡麟（1873—1907年），字伯荪，浙江绍兴人，近代民主革命烈士。1903年游历日本，1904年在上海参加光复会。积极组织联络民众革命团体，筹备革命武装，从事革命活动。原打算创办大通武备学堂，但清政府规定，民间不得开办武备学堂，遂与革命党人陶成章等商量，决定创办大通师范学堂，取得合法地位，并于1905年8月25日正式开学。大通师范学堂之所以只设体操专修科，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是想通过有组织的军事体育训练，而建成一支能够进行武装斗争的革命军事力量。因此，他们在给政府的报告中，是以“凡有志体操专修科学习者，六月毕业后，即行各归本乡，倡办团练，以为征兵预备”为理由，而取得办学资格的。

大通师范学堂是革命党人以开设体操专修科为名，培养训练革命党人军事骨干的学校，这在陶成章《浙案纪略》中非常明确地指出：“凡本学堂卒业者，即受本学校办事人之节制。本学校学生，咸为光复会会友。”因此，“凡党人来者，仅习兵式体操专修科，均以六月毕业。文凭由绍兴给发，面上盖有绍府及山荫两县印，又盖大通学校图章于末。背面则记有秘密暗号”。又有范文澜

先生也在一篇《女革命家秋瑾》的文章中回忆说：大通学堂实际是一个军事学校，操场就在我家对面，中间仅隔丈把宽的小河。我和一群小孩很喜欢看他们背着洋枪上操，听到洋号声，就不约而同地跑到河岸上去看。有几次看到一位矮小的人在操场里看操，有些人指点说，这就是徐锡麟。

大通师范学堂的生源主要来自社会的一些进步青年，也有会党成员。在1907年2月25日《绍兴白话报》上登载过一篇有关大通师范学堂第三期学员的招生广告：本校已于二月初十开学，“如有十八岁以上，三十岁以下，果欲来校肄业者，务于二月三十日前到本校报名，随交墨银两元。各持照片到校投考，逾期截止”。大通师范学堂的课程设置主要为兵式体操和器械体操。除星期天以外，每天上午第一课起，有三节课兵式体操，逢星期一、三、五，有一节课器械体操，内容包括天桥、溜木、平台、木马、秋千、铁环、跳远等。此外，学习的课程还有国文、英文、日文、地理、历史、教育、伦理、理化、算术、博物、琴歌、图画等[1]。

二、政府的救急措施——师范学校增设体育专修科

但是，仅靠这些少量学校的自发培养，是远远满足不了社会对体育师资的需求的。所以，1906年，晚清政府学部向全国发出了《通行各省推广师范生名额电》，其中要求各省城师范，“并须设五个月卒业之体操专修科，授以体操、游戏、教育、生理、教授等法，名额百人，以养成小学体操教习”。并通知说：“五个月内，本部当派视学官分省巡视。”

1907年，当时的学部又转发了一份邓莹诗在四川设立体育专门学堂情况的函件，表示了政府对培养体育师资的高度关注和支持。函件说：“为劄行事：普通司案呈据四川新津县廪生邓莹诗呈

[1] 朱赞卿. 大通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回忆录（四）.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请设立体育学堂等情，附呈章程到部，当经批示：体操一科，关系重要，其功用非直强健身体，而证实足以训成道德，完固精神。故自初等小学以上，因学生年龄之有异，而教法各有所宜。为教员者，尤非深谙学理，不能胜任。所称‘各省学堂所授体操，无初等、高等之别，无小学、中学之分。’洵为深中时弊之言，亟应设法讲求，以图进步。本部曾于去年3月电行各省设立体操专修科，以期养成体操教员，即是此意。该生游学日本，考察有得，洞见本源。所设体育学堂，科目完备，务即认办理。仰候本部札行该省提学使司立案，并将所呈规程、课目札行各省提学使司，借备采择。”❶

正是在政府的要求下，一些官办学堂，特别是省城师范学堂，都纷纷办起了体操专修科。如1906年创办的成都高等师范学堂附属体育学堂，云南体操专修科；1907年创办的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浙江两级师范体操专修科，河南体育专科学堂，奉天师范学堂体操专修科；1908年创办的杭州全浙师范体操专修科，浙江处府州府中学堂体操专修科，等等。在这些官办学堂的体育专修科中，影响较大的是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后改名四川体育专门学堂），主持人为邓莹诗。1907年第一期《四川学报》上，曾登载有四川体育专门学堂的招生告示，从中可以了解到该校的一些基本办学情况：“考东西各国均有体育学校，养成体操教员，以振尚武精神。本司因此特立体育专科学校，以造就完美教员，而期比偶于德、日诸国之练习养成所。”这是他们的办学目的。在学科安排上“则有修身、教育、国文、算学、心理、音乐、生理、卫生、体育学、兵学、社会学、管理法及瑞典体操、普通体操、兵式体操、兵式教练、游戏体操、射击、随意科等”。关于学生的毕业资格，则是这样介绍的：“其学期则分为四。第一期卒业可任初等小学教员；二期限高等小学教员；三期中学堂教员；四期高等学堂教员。”

❶ 学部为邓莹诗呈请设立体操学堂札//四川学报：第5册，1907.

三、革命团体和个人创办体育专门学校

为了加快体育人才的培养，当时政府在要求官办省级师范学堂增设体操专修科的同时，也鼓励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可能的条件下创办体育专门学校。由此，从 1906 到 1908 年间，全国各地的体育师资培养曾掀起一个小小的高潮。下表所列的是一些革命团体和个人创办的体育专门学校。

学校名称	创办时间	创办人	学校性质	校　址
浙江台州耀梓体育学堂	1907	杨镇毅	光复会办	浙江临海
四川王氏树人学堂体操专修科	1907	王树人	私立	四川富顺
广东松口体育会	1907	谢逸桥	同盟会办	广东梅县
中国体操学校	1908	徐一冰	私立	上海华兴坊
中国女子体操学校	1908	汤剑娥	私立	上海
重庆体育学堂	1908	杨沧白	同盟会办	重庆武库

(根据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室. 中国近代体育史简编；何启君，等. 中国近代体育史；谷世权. 中国体育史等相关资料制作)

有关这些体育专门学校的办学情况，《重庆体育学堂简章》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该简章刊登在 1908 年第 161 号《广益丛报》上：

第一条，本学堂为本省陆军小学堂之预科，并造就中学堂及各等普通学堂之师范。以强实学者之体质、研究体育之理法为宗旨。

第二条，本学堂于教授管理，并谨遵部章及近奉严饬各学堂之谕旨，厉禁一切邪僻不经之说。

第三条，本学堂先收学生两班，修业年限共三学期。计一年半卒业。

第四条，凡本学堂所收入之学生，须有如下之资格：一、年龄25岁以下，16岁以上；二、文理清通；三、体格壮实，无疾病、无嗜好者；四、身家清白，本身及先世无猥贱职业者。

第五条，凡来本学堂之学生，须有为法律所认许之社会之介绍书（法律认许之社会为各衙门、局、所、学堂、学会、商会等皆是）。书中须有印记图书为据，私人介绍无效。但有高等小学堂以上卒业文凭，或曾充小学堂体操教员者，不在此限。

第六条，学生赍介绍书或卒业凭照至堂注册者，听候定期考验。考验合格者，再具愿书、保证书，始行缴费入堂。

第七条，必在重庆有确实之职业为本堂执事所信赖者，方得为保证人。

第八条，本学堂所授课程，分为学科、术科、随意科三种如下：学科有修身、国文、生理、卫生（附救急疗法）、算学（附测绘）、体育原理、教育学、普通体操学科、兵式体操学科、音乐学；术科有美容术、徒手体操、哑铃、球竿、木棒、木环、游戏、行进游戏、舞蹈游戏、竞争游戏、瑞典体操、兵式体操、兵式器械、音乐、唱歌；随意科有游泳术、英文、拳勇刺刀术。

第九条，每星期授课三十至三十二点钟。学科占十分之四，术科占十分之六，随意科钟点无定。

第十条，学生于学科、术科中先有陈明不能学全者，于学科、术科中随习二种以上亦可。但其入学之次第与学费，则与全学者一律。

第十一条，本学堂每学期收学费十二元，皆于一学期入学之先全数完纳，掣取收据，始入堂受课。

第十二条，本学堂一概不寄宿食，但学生寄宿之所，本堂管理员均于学堂以外施其管理之权责。如有非理犯法、滋生事端者，虽事出学堂以外，亦立行斥退。

第十三条，凡外籍隶重庆附属之学生，于入学之先，另缴开办费四元。

第十四条，每年学堂为学生备操衣操裤，冬夏各一套，遮阳帽一顶，革履一双。其余需用各物，概属自备。

第十五条，凡体操器械在授课时损失者，由学堂添补。如系憩息时借用练习而损失者，必须赔偿。学堂贵重品不得借用。

第十六条，学生非有不得已事故，不得半途退学。无论自行辞退与学堂斥革，皆不退还学费。衣履不退。惟徽章须缴[1]。

这是一份比较完整的体育专业学校办学章程，使我们对晚清时期体育专业学校办学的基本要求、管理方法、生源资格以及开设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时数等，都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在以上这些革命团体和个人创办的体育专门学校中，社会影响最大也是办学时间最长的首推“中国体操学校”。中国体操学校由留日归国学生徐一冰、徐傅霖和上海买办资本家虞洽卿等 8 人于 1908 年在上海创办。其校址最初是在上海北浙江路华兴坊，1920 年后迁至浙江嘉兴南浔镇。该校从 1908 年起，到 1927 年止，共毕业学生 36 届，计 1531 人。

以下是徐傅霖先生生前留下的一篇介绍中国体操学校创办经历的遗著，写于 1938 年。

“1905 年，余毕业日本体操学校。尔时我国学校，尚无体育一科，故余即在上海办体操游戏传习所两届，以养成速成体育教员，供各校所需；然仍以为未足。光绪戊申三十四年，余始与友人王君季鲁、徐君一冰，创办一体育专门学校于上海，曰中国体操学校。是实为我国最早之体专，规模较为完备，学生亦相当发达，唯经费奇窘，支持颇非易事。余等皆埋头苦干，数年间从未支薪水半文。余专司学科，王季鲁君办理校务，徐一冰君担任训育。三人努力前进，不厌不倦，幸其后略有官费补助，并拨得旧枪百支，足以鼓励我等困苦艰难时之勇气不少。更有可喜者，每期学生毕业，各处皆

[1] 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295.

争先聘去，故数年以后，全国各地体育教师，无一非本校毕业生矣。嗣后余因事离沪，王君亦无暇兼顾，校务由徐一冰君独立支持，不幸徐君因病逝世，而此在我国体育界上有光荣历史之最古体专，责因无人维持而停办矣。惜哉！

“初，内子汤剑娥，毕业于日本体操学校女部而归国时，王季鲁君更以其余力，办一女子体专，曰中国女子体操学校。斯二校，实兄妹校也。唯兄虽夭逝，而弱妹则健全无恙，即今日上海之中国女子体育师范学校也。”[1]

中国体操学校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定位在注重体操和各种体育科学的传授上。如1907年12月24日上海《时报》上曾载有中国体操学校招生告示一栏，其中介绍有学校的“编制：注重体操，兼授各种体育中重要科学。分本科、选科。本科年半，选科一年毕业。科目：兵式、器械、普通、游戏、柔术、击剑、教育、伦理、体育、生理、医学、兵学、测算、绘图、音乐。学额：本科二百名，选科一百名。学格：品端身健，国文清通，年在十六岁以上、三十岁以下为合格。考期：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正月十四日至二十日。”后来，中国体操学校又明确把“提倡正当体育，发挥全国尚武精神，养成完全体操教师，以备教育界专门人才”作为自己的办学宗旨。在目标上，“以教育的体操为主，凡关于教育上各种科学，并皆注重”。所以它的课程设置分学科和术科两类。其学科类包括“伦理学、教育学、体育学、兵学、国文、生理、救急法、音乐。”术科类包括“兵式教练、器械教练、瑞典式各个、普通连续徒手、哑铃、球竿、棍棒、木环、豆囊、应用操、游技、教授法、射击术、拳术、武器”。学制上的要求是“本科生定期一年半毕业，选科生无毕业年限，唯于出校时给予所选取之科及修业若干时之证书。”对学生的考核是：“以品行、体格、学科、术科并重。”[2]

---

[1] 徐傅霖．中国最早之体专．体育文史，1987（6）．

[2] 中国体操学校章程//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297．

中国体操学校为近代中国培养了大量杰出的早期体育专门人才，特别是为学校体育造就了数以千计的教学骨干。其中较有社会影响的毕业生就有上海东亚体专创办人傅球、庞醒跃，中国女子体育师范创办人华豪吾，上海中华武术会创办人吴清，上海两江女校创办人陆礼华，浙江杭州体育师范创办人蔡屈哉，广东体专创办人杨振峰，苏州中山体专创办人朱重明，（苏州）成烈体专创办人柳成烈，奉天体育学校创办人尚士元，上海童子军创始人顾拯来，学校体育三段教学法创始人王怀琪等。他们都是从中国体操学校走出的佼佼者，真可谓“桃李满天下”。

徐一冰（1881 — 1922 年），中国体操学校的创办人之一，浙江嘉兴人，原名益彬，又名逸宾，在原始发起人告示栏中，也写成徐一丁。1905 年去日本大森体操学校留学[1]，1907 年回国[2]，先后在上海爱国女校、中国公学等校担任体育课教师。1907 年 11 月 19 日，与徐傅霖、虞洽卿等人在上海发起，于 1908 年 3 月 3 日创办了中国体操学校。1909 年任校长，直到 1922 年病逝。徐一冰虽然因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但他还是留下了不少的学术成果。如他写有《徐氏体育学》《体育原理》《希腊体育史》等专著，主编过《体育界》[3]《体育杂志》等有影响的刊物。从中，也使我们看到了他对体育的基本态度及基本观念。

第三节　教会学校的体育教学与训练

所谓教会学校，是指 1840 年鸦片战争后，英、美、法等国各

[1] 据日本体育史学者的考证，日本并无大森体操学校，但日本体育会体操学校曾于 1904 年迁移至邻大森村，故中国留学生是否将大森误以为其校名，暂存疑。

[2] 亦有说他于 1902 年留学日本，1906 年回国的，见费石师. 中国体操学校简史. 国民体育季刊：创刊号，1941.

[3]《体育界》于 1909 年创刊，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份体育刊物，中国图书公司发行，不定期出版，第 10 期时停刊。1918 年 3 月又复刊，并改为月刊。

派教会以培养为教会服务的牧师、教师和为外国在中国经营企事业服务的人员为目的所创设的各级学校。教会学校的基本性质是对中国文化教育的侵略。关于这一点，侵略者自己也不否认。1836 年 9 月 28 日，在马礼逊教育会成立会上，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曾说：教育肯定可以在道德、社会、国民性方面，比在同一时期任何海陆军力量、最繁荣的商业刺激以及任何其他一些手段的联合行动，产生更为巨大的变化[1]。事实也正像侵略者自己所估计的，“学校在所有的教区内都做了很多开辟传播福音道路的工作”，“很多的学生受了感化，变为我们最得力和最有智慧的基督教传教士”[2]。在中华基督教教育会 1902 年上海年会上，会议得出的重要认识是：教育是传教最有力的助手。并得意洋洋地指出：“现在中国的新教育制度实际上是在代表各教会团体的基督教徒控制之下。这事实上就使人类大家庭中的四分之一的青年都受到基督教会的控制。”其侵略者的嘴脸可谓一目了然。所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帝国主义“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

当然，另一方面，教会学校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曾起到了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和发展文化事业的客观作用，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这是因为，体育具有培养人的自信、勇敢、规则和忍耐等作用，而这些作用和教会学校人才培养的终极目标，诸如爱、诚实、自主、勇敢等品质具有许多的契合之处，正是在这个平衡点上，所以体育教育一直为教会学校所重视。当然，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教会学校

---

❶ 邵雍．传教与教案//冯林．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北京：北京改革出版社，1998：485.

❷ 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二届全体大会记录（1890）//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四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417.

的体育比起今天我们所说的体育，可能在概念上要宽泛一些，除了运动、游戏以外，事实上还包括手工、劳工一类的教育。

中国近代第一所教会学校，是由美国传教士布朗夫妇1839年在澳门兴办的马礼逊学堂（1842年后迁香港），第一批学生是6个穷人家的孩子。近代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和著名西医黄宽，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随着传教士的纷纷来华，使教会学校数量不断增多，也使更多的中国青少年有机会接受西方科技文化教育。有资料显示：到1860年时，江南一带就有天主教小学90余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教会学校开始由沿海伸向内地，在1860到1875年期间，全国教会学校总数已达800余所，学生数超过2万人[1]。1877年，全国仅基督教会开办的学校就有350所，学生5975人[2]。20世纪初年以后，在西方列强对华政策总体调整的背景下，为适应"以华治华"的战略，教会办学的重点开始转向高等教育，其中美国基督教会兴办的大学最多。

早期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主要是圣经、英语，也有一些四书、五经和自然常识。后来随着外国在中国政治势力的伸展，除英语外，也讲授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增加了音乐、体育等内容。

一、教会学校的体育教育理念与形式

与晚清时期的官办学堂不同，教会学校在体育教育的理念和形式上，可归纳为以下要点：

第一，接受体育教育，是每个学生应尽的义务。在教会学校，一般不开设正规的体育课，但要求每个学生都必须有接受体育教育

[1] 龚书铎．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24.

[2] 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一届全体大会记录（1877）//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四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415.

的机会，因此，他们广泛推行“强迫体育”运动，并主要安排在课外活动时间进行。例如在苏州东吴大学，每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一到，除学校的大门关闭以外，所有的教室、图书馆、寝室和食堂的门也都全部关闭，学生一律被赶到操场。操场上则设有若干个体育活动点，诸如田径的、足球的、网球的、排球的等。每个活动点上都配有体育指导教员。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志愿和爱好，任意选择体育活动点，并随时可以得到指导教员的帮助[1]。这种做法，当时同样可在其他一些教会学校中看到，如1884年基督教会设在镇江的女校就有这样的《校规》：“本校上课每日从八时开始，十一时半午食。午后的上课从一时起，到四时结束。在休息时间中，使用已备好的器具，各自进行游戏。”[2] 让学生在休息时间内进行各自喜好的体育游戏，也许更符合女生体育教育的特点。

山东烟台汇文学院，在1895年时也有这样的校规：每日上下午课间加两次运动，上午叫“放小学”，常做“抢球”游戏。游戏方法为学生分成两组，教员掷出皮球，由学生争抢后还给教员。五分钟内以抢得多者为胜。下午的运动内容主要是进行“夺旗”游戏[3]。这是一种有组织的课间体育活动。也许正因为是有组织，所以汇文书院的体育做法曾被当时的守旧分子视为是“误人子弟”，而导致了少数学生的退学。在1899年的武汉文华书院，可以看到另一幅图景：每天“下午三点四十分，学生们带着哑铃进入操场，谭立德先生（美国人，体育教师）带领他们进行20分钟紧张的锻炼与步伐操练。这不仅是为了增进他们的健康，而且也教导这些学生们需要一致行动的思想与习惯”。文华书院对体育活动的倡导还表现在每天“晚饭后，学生们有一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操场里呈现着生气蓬勃的景象。这儿一组学生在玩中国毽子，他们用脚板

[1] 东吴大学. 雁来红. 1903.

[2] 何启君，胡晓风. 中国近代体育史. 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9：63.

[3] 秦晋. 三十年来烟台体育的演变. 体育周报，1932（12）.

把毽子踢到空中，或者用手甚至用脸来接毽子，这不是由运动者之间互相传递；另一组学生玩足球；那边的学生正在为参加春季或秋季的运动会而锻炼。这已成为这所学校的特征”[1]。

第二，通过体育教育可以养成学生良好的休闲娱乐方式。在教会学校一般认为，体育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健康文化，因此，对学生进行体育教育，可以帮助他们逐渐养成良好的休闲娱乐方式。例如1903年圣约翰学堂出版的第二期《约翰声》中就是这样阐述他们的这一理论的：“中国幼童，本少家庭教育，五六岁时送至村馆读书，自晨至暮，不求讲解，第能背诵，如开留声之机器然。但知响应而已，句读或差，夏楚雨下。活泼精神渐至消灭。此中国积弱之原因也。至如赌博之风，全球同病，而中国尤甚。彼以为今日穷措，大可明日富家翁也。一旦失败，则丧身亡家，攘道败德以至苟贱之举，无所不为；狗偷鼠窃之事，无所不有。”在批判的基础上，文章认为：“细究其故，方知我中国向无消闲之良方、游戏之善法，故以赌博作消遣之具。”因此文章提出：“为今日计，唯有各处广设公园，行公共踢球运动诸会。”认为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振我尚武之精神，使我军国民之资格”，更重要的是为逐渐养成一种积极健康的休闲生活方式。所以，武汉文华书院在19世纪90年代曾规定年终评选优秀学生时，要把对体育的参与态度和行为作为一个重要的条件。在浙江杭州的求是书院，从1897年成立起，就一直坚持有体育课程的教育。在1903年第七期《浙江潮》上，曾刊载了一张求是书院学生在体育课下课后的合影。由上可见，“教会大学给中国带来的一大革新是引进了体育课。……随着西方人的到来，同时也带来了对体育和活动的爱好。圣约翰大学建立没有几年就引进了田径运动。由于相信体育运动有益于身心健康，因此其他教会学校也纷纷看样。学生最初不太愿意参加这种不高雅的活动，

[1] “文华书院一周”通讯. 美国纽约SM杂志，1901（4）. 转引自王其慧. 武汉才会学校的体育活动. 中国体育史文集（二），1986.

可是后来他们也慢慢地开始爱上了体育运动和体育竞赛。”❶

第三，通过体育教育可以改变中国人重文轻武的传统价值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概自汉代的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崇文抑武的价值判断就逐渐开始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到了宋明以后，社会上竟然出现了“羞与武夫齿”的文化现象，使文弱之风盛行，体弱多病的林黛玉竟然成了美女的代言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教会学校当时同样要响应政府的号召，以适应整个社会发展的大潮流。因而也提出了要通过体育教育来改变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形成尚武、习武的社会风气。例如圣约翰大学，早就认为：“中国无尚武精神，几成习惯。究其原因，由来已久。中国自古至今，重文轻武。古人有言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故世人以冒险为大戒，懦弱为循良。至有好铁不打钉，好民不当兵之谚。即如甲午一役，中国战死之兵，伤皆在背。此无他，向来既无尚武精神，又无提示警觉，故至于此也。”因此，他们认同政府现在有关体育教育的做法。“近年以来，政府于各处广设水陆师学堂，且于各处大小学堂，添设体操课程，以求体育之发达，并开运动大会，以振尚武之精神”❷。所以在上海圣约翰大学，1894 年就已开设有兵式体操课，规定每周上操两次。

显然，教会学校的体育必须和本土教育措施相吻合，才会有更好的发展道路和生存空间。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一些教会学校在广泛开展近代西方体育活动的同时，也纷纷加入了兵操训练的行列。例如苏州东吴大学，从 1903 年起，就聘请隔壁邻居博习医院的美国人罗格思，担任学校的兼职兵操教习。这是一位牧师兼药剂师，他推广了他在美国著名的西点军校所受训的内容，使“东吴大学的学生，制服整洁，身姿笔挺，与那些组成普通中国军队的没有纪律

❶ 中国教会大学史 1850—1950. 曾钜生，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173.

❷ 约翰声，1903（2）.

的乌合之众毫无相似之处”[1]。

二、教会学校的运动训练与比赛

教会学校体育的又一个重要特点，是课余运动队训练比较活跃，运动比赛活动频繁，从而大大激发了青年学生对西方体育的兴趣和爱好，也推动了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上海圣约翰大学，在1867年就成立了学校足球俱乐部。当时的中国男子，均有蓄长辫留于脑后的习俗。青年人一般在脑后留四股胖辫，前蓄刘海儿。圣约翰队的学生为踢足球方便起见，遂将发辫绕成一硕大云辫疙瘩盘于头顶。但在1902年的圣约翰校队中，有一个名叫黄明道的学生，他不爱将辫子盘起或扎紧，而是踢球时任其垂飘于后，由于他奔跑速度极快，所以凡见黄在足球场上追奔抢球、运球时，其辫子总是被拉成一平行的直线拖于脑后，蔚为异观。由此人们便将圣约翰足球队又称为“辫子军足球队”。

在苏州东吴大学，1903年已建有诸如“健身会”“踢球班（足球队）”“篮球班（队）”“网球会”等多种运动队组织。1898年由英国长老会创办的厦门英华书院，由于其院长英国人洪显理喜欢踢足球，所以该院一成立就建立了学校足球队，并制定了一系列的开展足球运动的具体措施。后来在1915年的福建第1届全省运动会上，他们获得了足球冠军。

有训练就会有比赛。所以在中国近代体育史上，教会学校又是较早进行西方近代体育比赛的地方。例如1890年5月20日圣约翰大学召开的学校田径运动会，就通常被体育史学界公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体育运动会。1898年，山东烟台的汇文书院，也召开了以游戏赛跑为主要形式的准田径运动会。

进入20世纪后，在教会学校中又出现了校际运动会形式。较

[1] 文乃史. 东吴大学. 王国平，等. 译. 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37.

早的有1901年5月11日在武汉文华书院召开的，由文华书院、博文书院、博学书院三所教会学校参加的田径运动会。项目有85码、220码跑，跳高，跳远，拔河，掷铁饼等。还有1904年在苏州东吴大学召开的华东地区“四大学体育联合会”运动会，主要是田径项目的比赛。

除了田径以外，足球的校际比赛也是开展得比较多的一个项目。例如上海圣约翰大学从1903年起，就开始了每年一度的与南洋公学的足球对抗赛活动，一直坚持到1910年（见下表）。

圣约翰大学与南洋公学1903—1910年足球对抗赛情况表

比赛时间	比赛地点	胜方	败方	成绩
1903	南洋公学	圣约翰	南洋	不详
1904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1905	不详	圣约翰	南洋	2∶1
1906	不详			踢平
1907	不详			踢平
1908	南洋公学	南洋	圣约翰	6∶0
1909	圣约翰大学	圣约翰	南洋	3∶2
1910	南洋公学	南洋	圣约翰	6∶0

〔依据南洋周刊，1923，3（11）的资料制作〕

当然，更多的校际比赛可能是不定期的。在1906年7月的第2期《东吴月报》上，记载了东吴大学和萃英书院的一场足球比赛：“三月二十二日星期一，本城萃英书院来约诸生为蹴鞠之戏。本校遂选定十余人以应命。是日天朗气清，赛者之气固雄，观者之心亦爽。少焉，钟鸣二下，群集于本校体操场。赛者每方面11人，皆旋转灵捷，努力相搏。或以足踢，或以首撞。忽焉，鼓掌之声大振，则球入标架，而雌雄决也。至三旬钟乃罢。本校得胜者八次。”

第四章　近代西方体育在社会的传入与传播

虽然一般来说，近代西方体育在中国的早期传入和传播，是首先从军队和军事学堂开始的，然后开始向官办学校渗透，再由学校而影响了整个社会，这更多地是从中国人主体接受西方体育的传播过程考虑的，然而就中国社会体育的一般发展而言，在华的外国人和传教士、近代的中国留学生和中国出使人员，亦为近代西方体育在中国社会的早期传入和传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一节　早期在华外侨的体育活动

就近代西方体育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而言，虽然总体上所表现出的基本特征可以理解为在纵向的阶段发展上，是由洋务运动时期到维新运动时期；在横向的线路传播上，是由军队到学校、到社会的发展过程，但这并不等于说传播过程中就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事实上早期在华外侨的体育活动，也同样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近代西方体育向社会传入与传播的过程中，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所谓在华外侨，应包括在华的外国传教士、商人、军人、外交官和海员等等。这里着重介绍的是在华外国商人和军人的体育活动。至于传教士的体育作用，则将在基督教青年会部分进行重点介绍。

一、外国商人的体育活动

外国商人来华贸易，应该是很早就有的事。但在清朝政府长期

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影响下，这种贸易是很有限的。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大概 1715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东设的“行”，是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第一个重要企业。后来有美国人于 1818 年在广州设立旗昌洋行，这是 19 世纪美国在中国最大的商业机构。1834 年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独占权被废止前后，陆续有其他英商来中国投资，如 1832 年设立的怡和洋行、1835 年设立的仁记洋行等。但从总体上看，1840 年以前，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商号是非常有限的。据统计，1836 年在广州的外商机构大约为 55 家，其中英商约 41 家，美商 9 家，其他 5 家。他们的财产主要是鸦片和购买中国货物的现金。外商在华的活动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和管束，例如不许外国人在广州过冬，不许外国人购买中国书籍和学习中国语言，外人每月只允许有三天 10 人以下结伴，到指定的场所游览等[1]。

鸦片战争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外商得到了在华进行自由贸易所需要的一切权利。外国商人开始大量涌入中国，仅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几年内，各通商口岸就有 40 家左右的洋行设立[2]。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加和列强对华经济扩张的发展，各国在华设立的洋行急剧增加，1872 年时达 343 家，到 1892 年时更增至 579 家[3]。尤其在上海、汉口、广州、天津四大通商中心，更是洋行林立。新辟的通商口岸上海，甚至成了外国冒险家的乐园。外国商人在进行投机和淘金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文化，其中包括近代西方体育。

例如在上海，开埠后不到 10 年就出现了室内保龄球和室内墙手球活动，以后陆续开展了划船、赛马、板球、健身体操、网球、足球、田径、游泳、棒球、高尔夫球、帆船等运动项目。1848 年，

---

❶ 许纪霖. 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5：45.

❷ 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346.

❸ 姚贤镐.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 2 册. 北京：中华书局，1962：1000.

已有英国商人在上海开辟了第一个跑马场。从1850到1861年的11年中，在华外商侨民曾在上海的大马场（南京东路）和静安寺路（南京西路）边兴建过3个跑马场。这些跑马场既是外商侨民赛马赌博的娱乐场所，也是他们向中国社会传播近代西方体育的重要阵地。如1850年，以麟瑞洋行大班（经理）英国人霍狄为首的上海跑马总会，选定界路（河南中路）、花园弄（南京东路东段）、天主教堂街（江西中路）一带80多亩土地辟作花园，围绕花园筑成一条专供跑马的跑道，而成跑马场。因其东南部有个抛“五柱球”的球房，故又叫“抛球场”。又因这个跑马场的四周围以木栅，中间种有花草，所以上海人又称它为“老公园”。1851年，在“老公园”举行了上海的第一次赛马大会。

在天津，1863年5月，由英租界的“天津赛马会”组织，在海光寺一带空地上举办了天津的第一次赛马大会。在武汉，1901年建立了“汉口西商赛马体育会”，通称西商跑马场或马道子，占地800多亩，是英商在汉口主办的外商侨民娱乐场所。汉口的赛马为每年3季，即上元赛、春季赛、秋季赛。每赛7天，每天赛12～13场。马场除跑马外，还有各种球赛，如高尔夫球、足球、网球、马球、篮球、青果球等，应有尽有。一球一场，任凭会员随意选择。在最盛时期，经常每天有五六百个会员在场内玩游戏。但中国人不得参加[1]。

外商侨民早期组织的赛马活动，在开埠城市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例如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在1872年4月30日《申报》创刊号上，其第一则体育新闻报道就是“驰马角胜”，介绍的是有关寓沪外国商人的赛马活动及赌马规则。在美国人霍塞所写的《出卖上海滩》一书中，也对当时的上海赛马活动进行了详细描述。赛马分春秋两季，春季赛马是在5月里的第一个星期中，秋季赛马是在11月里的第一个星期中。每次举行3天，去观看的人天天都很

[1] 李绍依. 汉口英租界见闻//列强在中国的租界编委会. 列强在中国的租界.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218.

拥挤，后来竟成了时髦男女的出风头地方。在跑马的这几天，洋行照例放假，女人都特地制备3套新的衣服，每天换一套。男人也都是高帽礼服，衣冠齐整，说不尽的繁华气象。大班们差不多个个养着几匹马，其中自然又以怡和洋行大班的马房为最大。但这是一种绝对的业余运动比赛，所以比赛的时节都是由马主人自骑，而不准出钱雇用骑师。赛马时，每一个节目必举行一次独赢彩票，由跑马厅从中抽取四分之一作为跑马厅的经费。最后的一天，还举行一次大香槟赛，发卖大香槟彩票❶。

早期在华外商侨民的近代体育活动除了赛马以外，较早开展的运动项目还有赛艇。有记载表明，还在1852年，上海黄浦江上就出现了外商船员组织的划船比赛。当时的上海，外商侨民在苏州河上所举行的划船比赛是一年一度的重要盛会。1872年9月20日的《申报》曾有这样的场景描述："一点半，赛八人打桨之舟，共有两艘，激浪如飞，排桨连击"；"三点钟，赛四人打桨之船，三点三刻赛一人打桨之船。胜者踊跃奔腾，西妇顾而乐之，趣多赏赉"。赛艇的样式为"二至三丈长，首尾锐而腰微阔"。比赛地点经常是在苏州河的石桥之西。后由于苏州河交通日趋频繁拥挤，1906年9月以后，上海划船总会曾在闵行东黄家码头和昆山青阳港建设分部，建造了船库和比赛场地。在《舢舨事务》一书上，记载了从1859到1938年上海举行赛艇比赛的成绩与名单。

在早期外商侨民的近代体育活动中，足球也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运动项目。例如：在香港，早在1897年就开始举办特别银牌足球赛；在上海，外商侨民于1902年组织成立了"上海足球联合会"，他们按欧洲的习惯组织足球比赛，规定每年10月至次年4月为足球赛季，当时参赛的外商侨民代表队主要有西商队（英国商人组成）、腊克斯队（英国商行职员组成）、法商队、葡商队、商团队（租界商团武装组成）等。1902年，西联会举办了第1届"史考托

❶ 霍塞. 出卖上海滩——外人眼中的近代中国. 上海：上海书店，2000：70.

杯”足球赛，该杯赛一直坚持到1934年。1908年起，又开始举办“国际杯”足球赛，该杯赛延续到1941年。由西联会主办的其他足球杯赛还有高级杯赛（1927—1931）、字林杯赛（1927—1943）、初级杯赛（1927—1943）、预备杯赛（1939—1941）。除杯赛外，西联会还建有足球联赛制度，如1907年开始的甲组联赛、1911年开始的乙组联赛等。在1926年之前，上海西联会所组织的所有足球比赛均不许华人队参加。

早期在华外商侨民的近代体育活动是丰富多彩的，例如：在上海，1858年，外商侨民在浙江路跑马场举行了第一次西人板球比赛。同年外商侨民还在上海的张家花园举行了首次自行车比赛。在1874年之前，上海已建有网球（也称拍球）总会，并于1879年起，开始采用英国温布尔顿锦标赛的规则进行比赛。1904年，上海的外商侨民又开始举办“万国竞走赛”和“万国越野赛跑”，并形成每年举行的传统。所以，在1882年出版的《字林星期周刊》上，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爱好体育的西侨青年，在上海可选择的户外活动要比在伦敦或英国其他城市多得多，可在保养得完美的草坪打网球，在超等板球场打板球，在离办公室5分钟路程的划船总会划船，他们也可有自己的马。”

在天津，1890年冬天，在租界内出现了冰上快艇运动。1896年开始有了热烈的篮球比赛。1901年，俄国商人组建了“天津高尔夫球会”，并于1905年春首次举行了高尔夫球公开赛。1905年，英国商人成立冰球会，并于同年在宝士徒道（营口道）举行了津门的第一次冰球赛。1908年，又有了天津外商侨民最早的棒球赛和网球赛。在俄国人德来特里扬契维茨基写的《八国联军目击记》中，可以知道网球在当时天津的外商侨民中可能是最早普及和受欢迎的运动项目之一。例如根据1900年5月的记载，那些生活在天津的外商侨民，“通常四点钟办公室结束工作，欧洲人骑自行车或马，到郊外的休息场打网球”。他们“相互间的交往，只限于正式的拜访和打网球”。特别是“草地网球吸引所有的人，儿童、青年

人、成年人，乃至老头子和老太婆。他们一清早就手执球拍来回奔跑，一直打到天黑。他们打得很认真、郑重。边打边用英语郑重其事、神气十足地叫道：打呀！您的球！会打网球被认为是好风度的标志，不会的人在此地社会上被视为怪人，或可疑分子。因为每天必须打网球，正如每天必须吃饭一样。一个人必须打网球，就像一个人必须遵守礼节和装束入时一样”[1]。

在云南，1907年9月，滇越铁路法国公司正式成立，由越南海防到昆明的铁路动工修筑，发明网球的法国人把网球带到云南。到1910年，在云南境内的铁路沿线各站，已修建了20多片网球场，作为法国人自己打球的场所。1910年4月1日，滇越铁路修到昆明后全线通车，在昆明的外国人成立了“万国网球会”，并建有三块网球场[2]。

由此可见，在华外商侨民开展的各种体育活动，虽然其直接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娱乐和消遣，但客观上却起到了向中国社会传播西方近代体育的作用。

二、外国军人的体育活动

早期在华外侨的体育活动除商人以外，军人也是一个重要的群体。这里所介绍的外国军队的体育，并不包括兵式体操，而是除兵操以外的一些近代娱乐体育项目。例如1895年，驻天津的英国军人马球队，曾多次在英租界游戏场与“世界”队（其他各国军队的组合）进行马球比赛。又如1900年，天津的外国军人通常要去的地方是天津俱乐部，他们在那里进行体育休闲和娱乐。天津俱乐部是由英国人发起成立的。在《八国联军目击记》中曾有这样一段

---

[1] 八国联军目击记.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36.

[2] 浙江体育学会体育史专业委员会. 中国近代体育史文集.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216.

介绍：人们“总是十二时下班，坐人力车或骑脚踏车去天津俱乐部。在那里互相见面，读电讯和报纸，交换消息。根据英国人明智的倡议，在中国、朝鲜、日本的各主要港口城市，都办起这样的万国俱乐部。它们成为操各种不同语言的侨民相互接近和联络的中心。当地土著——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以及混血儿不得进入俱乐部。只有白色人种才能成为它的高贵的会员。俱乐部事务由各国代表选举产生的委员会管理。俱乐部里设有餐厅、台球场、九柱戏（用棍依次撞击按特殊次序排列的九至十根木柱）、图书室和拥有很多报刊的阅览室。俱乐部的仆役是中国人。俱乐部的所有会员都是经过挑选的。只有各国军人可以被认为是俱乐部的常客”。因为他们“唯一的公共娱乐就是运动、赛马和纵酒”。1902 年，在驻天津的美军中，时有篮球比赛活动。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军著名将领马歇尔，当时是驻天津的美军步兵团长，他也经常参加军队中的篮球活动[1]。

在外国军人的体育活动中，可以看到有关和中国学生进行足球比赛的记载。1906 年，驻北京的英国军人足球队，曾与河北通州协和书院的学生足球队进行过一场足球比赛，并由此引发了中国近代体育史上一段关于“白瓷九龙杯”的历史佳话。说的是正当协和书院与英国驻军进行足球比赛时，有一位清廷大官刚好坐八抬大轿路过赛场，他见中国学生敢于和洋人比赛深为不安，并以奴才的心理推测中国人必然失败。因而，为讨好洋人，第二天他专门派人送了一个“白瓷九龙杯”到英国公使馆，并对公使馆说：“昨天英国和中国足球队比赛，不知哪个队赢了，这个杯是送给胜利队的。”弄得英人一时啼笑皆非。因为这场足球赛是协和队以 2∶0 胜了英军队。所以公使馆的英人只得将“白瓷九龙杯”再送到协和书院。协和书院为了庆祝战胜英军队和获得白瓷九龙杯，特为队员们作歌，以示祝贺。

---

❶ 汤铭新．我国参加奥运沧桑史．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1999：36.

1907年，驻扎北京的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军人足球队，以及通州协和书院、北京汇文书院足球队，也举行过相互间的足球联赛。最后是英军队获得第一，协和和汇文分获二、三名，美军队为最后一名[1]。1907年，上海公共租界警察局还在北四川路建造了一个公共游泳池，以专供外国军警人员活动，华人则不许入内。

第二节　留学生、出使人员与近代西方体育

考察和研究发现，近代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入与传播与留学生也有很大的关系。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是洋务运动中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适应外国侵略者的需要，虽然在中央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办与列强有关的事宜，并开设同文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讲解各国社会情形，以迅速培养一批外交人才，但远远不能适应日益增多的外交事务之需。同时，同文馆的学生学习长达8年才能毕业，他们只是从书本上和课堂上对外国有所了解，一旦真正接触外交事务，往往笑话百出。此外，随着洋务派兴起的办工矿、办企业的热潮，也需要一批能及时掌握外国科学技术的科技人员。正是办外交和办企业这两个重要的条件，再加之容闳的不懈努力，终于在1870年冬天，清王朝批准了由曾国藩、李鸿章所上的《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从此掀开了中国近代史上留学教育的一页。广大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社会传播和示范西方近代体育的又一股重要的力量。

---

[1] 董守义. 华北体育联合会的沿革//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 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441.

一、首批留美学生对近代西方体育的传播

近代中国的留学生运动是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1872 年，首批留美学童 30 人于 8 月 11 日从上海起航。到 1875 年时，清政府共向美国派遣了 4 期计 120 名留学生。留学生到达美国后，受到美国友好人士的热情接待。开始时留学生一时找不到住处，就分别住在美国友人家中，到 1874 年他们才住到美国哈特福德城的中国留学生事务所。首批留美学生虽然都是幼童，但他们学习非常刻苦认真，要求上进。几年之后，不少人升入到美国的中等科技学校，也有的考入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取得了优异成绩。例如成为近代著名铁路工程师的詹天佑，到美国后先入西海文小学读书，后以优异成绩考入纽海文中学，接着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土木铁路工程，几次荣获奖学金，毕业时取得学士学位。

留美学生在努力完成学业的同时，也积极参加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诸如游泳、滑冰、长跑、打球、钓鱼、下棋等，都是他们经常参加的运动项目。所以一位美国教授曾这样评价他们的体育表现："吾人所玩各种游戏，他们均感新鲜。且都是排、足、水上、曲棍球游戏的能手。"[1] 在 1939 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菲尔浦斯《书信体的自传》中，曾有《中国同学》的章节，其中写道：这些男孩子穿着打扮和我们一样，只是头上留着长长的辫子。他们玩橄榄球的时候，会把辫子藏在衬衣里，或盘在头上。我们玩的所有的游戏，对他们来说都是陌生的。但他们很快就成了棒球、橄榄球、冰球的好手。在花样滑冰场上更是超群。菲尔浦斯在《自传》中说：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当我们玩橄榄球选人分队时，聪（邓士聪）一定是首选，因为他又矮又壮，身材天生接近地球，跑动起来像只小猎犬，躲闪的功夫又像只猫。如果说聪在速度和风度

[1] 留学生历史及成就//张睿壮，等. 今日世界. 上海：学林出版社，1982：203.

上占优势，那么康（康赓龄）则是力量型选手。他身材健壮，脸上永远挂着善意的微笑，他可以穿越四五个美国同学的封锁，闯过目标线。在棒球场上，曾（吴仰曾）是最佳投手。他投的球几乎没有能被击中的可能。菲尔浦斯《自传》中还特别提到了富有传奇色彩的钟文耀。钟为第一批留美学童，广东香山人。他 12 岁到美国，1879 年进耶鲁大学，是耶鲁大学划船队的舵手。菲尔浦斯说：在一张划船队的集体照上，其他队员膀大腰圆，只有钟文耀矮小孱弱，然而，钟在耶鲁划船史上却颇有名气，其原因是他担任耶鲁划船队舵手的两年，在和哈佛大学举行的一年一度的两次比赛中，均为耶鲁取得了胜利。

在耶鲁大学，由詹天佑、梁敦彦、蔡绍基、黄天甲、陈钜庸、钟俊成、李桂攀、吴仲贤、邝咏钟等人组建的“中华棒球队”，更是有着不平凡的经历。他们不仅经常和美国友人进行友谊赛，以增进相互的接触和了解，而且“曾多次为耶鲁大学争得荣誉”。也许正是因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使得留美幼童几乎人人都喜欢棒球运动。一位曾抚养幼童的美国友人说：“幼童们喜欢各种运动，尤其喜欢棒球。我当时住在森孟纳街，孩子们到住的地方总要经过我住的房子，他们总是将球和球棒放在我家前厅。”[1] 1887 年，当清政府决定将留美学生全部撤回时，据说在回国的途中，“中华棒球队”还在旧金山与美国的奥克兰橡地棒球队进行过一场友谊比赛。一开始，奥克兰队十分高傲，对“中华棒球队”根本就不屑一顾，认为击败这支留学生队应是不费吹灰之力。然而几次交锋后，中华棒球队连连击中，势不可当。于是“球场大哗 —— 中国人打美国的国球，且使老美溃不成军，不可思议”。比赛结果中华棒球队“净胜 10 分”，“中国大胜，华侨们激动得留下了热泪”[2]。

---

[1] 于建勇. 中国首批留学生与他们的体育活动. 体育文史. 1990 (1).

[2] 高宗鲁. 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六）//传记文学：卷37，三，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

对此，留美学童温秉忠也曾在回忆文章中说：“开赛以前，主队认为他们将轻取客队。40年前谁又看过东方人玩棒球呢？中国投手之高招，使奥克兰队已感情势不妙，球场观众大哗——中国人打美国的国球，且使老美溃不成军，不可思议！全场终局，中国队大胜，幼童及华侨兴高采烈。这是幼童们合打的最后一场球，因为他们回华后，天南地北各自一方，再也没有打球的机会了。”❶

在首批中国留美学生中，梁诚也是一位棒球好手。梁诚在20世纪初曾被清政府委任为驻美、驻日公使。后人评价他“对于促进中美邦交，成绩卓著。任期内修改华工条约，索还庚子赔款，赎回粤汉铁路等，功不可没”❷。梁诚就读于麻省安度华学校，求学期间曾多次代表学校参加棒球比赛。如1881年间，参与对额士达（EXETER）争夺锦标一级，他凭其个人技术优势，得获大捷，数十年后直至今日，仍为当地人士所乐道。所以当梁诚上任驻美公使不久，恰逢他的母校举行建校125周年纪念活动，他被邀请为贵宾，“其肖像至今仍挂在该校之图书馆壁上”。当时的美国总统有一次曾问梁诚说，在中国首批留美学生中，有一位“获得好评、蜚声校际的棒球好手究为何人”，梁诚回答“就是我”。从此以后，梁诚在美国“对于交涉事项，一帆风顺，而白宫政员无不刮目相看”❸。这大概是中国近代史上体育为外交服务的最早案例。

二、清末留欧学生对近代西方体育的传播

如果说1872年清政府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主要是为了培养外交和企业人才的话，那么，清政府向欧洲派遣留学生的目的则主要是

❶ 温秉忠. 一个留美幼童的回忆//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143.

❷ 吴文忠. 中国体育发展史. 台北：三民书局印行，中华民国七十年（1981年）：71.

❸ 吴文忠. 中国体育发展史. 台北：三民书局印行，中华民国七十年（1981年）：71.

培养军事人才，而且主要是培养海军的技术骨干力量。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在内惧太平天国革命、外恐西方列强入侵的情况下，急切希望加强军备，并从1861年起开始筹建海军。为了培养将来海军的技术骨干，清政府于1876年开始向欧洲派遣留学生。为什么要派往欧洲？这在李鸿章等人的《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中有一定的说明："请于闽厂前后学堂选派学生分赴英法两国学习制造驾驶之方及推陈出新练兵制胜之理。"[1] 因为他们认为，法国制造技术最好，英国水师操练最精，所以主张派留学生去法国学制造，去英国学驾驶。

第一批留欧学生是1876年由李鸿章派出的，当时乘在淮军工作的德国洋教员李励协回国之便，李鸿章派淮军军官卞长胜、朱跃彩、王得胜、杨德明、查连标、袁雨春、刘芳圃7人去德国学习海军技术。但7人的留学情况均不理想，因此李鸿章决定改派青年学生赴欧留学。1877年，由福建船政学堂挑选了35名学生，在监督李凤苞和法国人日意格的率领下，前往英国和法国留学。1881年，又从北洋水师学堂和福建船政学局选派了10人去欧洲留学。1886年，再次从北洋水师学堂和福建船政学局选派了33名学生赴欧留学。这些赴欧洲留学生，年龄一般在20岁左右。他们精力旺盛，学习用功，大都取得了优秀的成绩。所以在薛福成的日记中说："近年出洋学生试于书院，常列高等，彼（指英法等国人）亦知华人之才力不后西人也。"[2]

留欧学生对近代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播，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例如留英学生严复（严宗光）在其《原强》中曾告诫国人说：西欧强国，常"以人种日下为忧"，所以他们"操练形骸，不遗余力。饮食养生之事，医学所详，日以精审"。严复认为：中国的救亡图存，也需要有"血气体力之强"。因为"君子小人劳心

---

[1]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167.

[2] 薛福成. 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卷三. 长沙：岳麓书社，1986：5.

劳力之事，均非体力强健者不为功”。所以他回国后在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期间，表现了对体育的足够的重视。学校开展有田径、足球、游泳、拳击等多项近代西方体育活动。学校不仅开展有校内的各种形式体育比赛，而且还组织参加校际体育比赛，如1898年水师学堂就参加了由天津北洋大学发起，有武备学堂、电报学堂等参加的校际运动会。这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举办的校际运动会，著名的天津市各校联合运动会就是在这一运动会的基础上，于1902年开始形成传统的。

三、清末留日学生对近代西方体育的传播

晚清政府正式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是从1896年开始的。此后随着民族危亡的加深和国内废科举、兴学堂的展开，出现了去“日本游学者相望于道”的繁荣景象[1]。如1896年只有13人去日本留学，1903年增加到1300人，1906年增加到12000人，使留日学生成几倍乃至几十倍地增长。留日学生区别于赴欧美留学生的一个很大的不同点是，自费生占有很大的比例。例如在梁启超的《行人失辞》一文中说：“东京现时留学生数百人中，官费者仅强半耳，余则皆自备资斧，茹根尝胆而来者。”这是1902年的情况。在1903年第五号《大陆》杂志上，也曾有这样一段文字：“近来东渡之留学生，合官费私费计之，都九百名。”官费私费各占一半，和梁启超说的情况基本吻合。

大量的自费生东渡日本后，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他们可以广泛地根据自己的爱好选读专业，而不必受清朝政府的限制。因此与留学欧美不同的是，留日学生中已有专门选修体育专业的学生。根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的资料，可看到1904年的中国留日学生专业分布情况，其中在日本体育学校就读的中国留学生

[1] 冯自由.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编. 上海：上海良友印刷公司，1928：2.

有12名，分别为浙江、四川生源各1人，湖北、江苏生源各2人，湖南生源6人[1]。又据1907年第一册《四川学报》"留学日本各省学生人数表"资料，仅1906年6月19日至9月17日的这段时间内，国内各省送入日本大森体育会的学生就达到104人[2]。

留日学生在早期传播西方近代体育方面的主要贡献是：

第一，直接从日本引进了体操和体育两个重要的专业词汇。体操一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时期，是指"身体训练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柏拉图《对话篇》）。文艺复兴后的近代西方社会，亦广泛使用这一术语，用来表达广义的体育概念。日本是较早从西方学术中引进这一概念的国家，大致在1775—1780年间，日本最先引进的叫TAIKU，是教育领域培育的内容。后来又引进了Gym'nastiecs，译成"练体法"，或"体术""体学"和"体操"等[3]。明治维新后的1873年，在日本《学制》"改正小学教则"中，"体操"一词被日本政府正式使用，从此长期作为学校体育课的名称，并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由于日本汉字与中国汉语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容易相通，所以19世纪90年代起，日本的"体操"一词很快为中国学者所接受，并被直接引入中国。在现在可以看到的资料中，1890年由上海广学会出版的第一本体育书籍中，还未出现体操一词，所以书名取为《幼学操身》。但在1890年5月7日上海《申报》的一篇《振兴学校论》文章中，在介绍日本教育经验时提到了"体操"一词，并解释说："所谓体操，即泰西学校中，午后纵令学生至空隙地嬉娱蹴鞠、秋千，随心所欲。"这是目前看到的国内对体操一词的最早使用。后来又有郑观应在1893年出版的《盛世危言》"学校篇"中，使用了体操一词。书中介绍的是当时日本学校体操课情况：学生们"就空地习兵式体

[1] 李喜所. 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652.

[2] 肖冲. 清末留日学生对欧化的日本体育传入中国所起的作用. 体育文史，1987（3）.

[3] 韩丹. 论我国早期的三个体育定义. 体育文史，1993（1）.

操，一律更换戎衣，操演枪、炮、戈矛等等。跃距曲踊、击剑相扑，务使劳其筋力，不得有片刻分闲。若女子，则以柔顺为宜。故虽有体操，不沿兵式”。1896年，在黄遵宪等人创办的《时务报》上，已开始频繁使用“体操”一词。由于《时务报》有不同凡响的影响力，所以使体操一词渐为国人所接受。在1897年8月出版的第29册《知新报》上，人们已经能读到像《体操说》那样专门讨论体育问题的研究论文。等到1902年时，作为官方文件的《钦定学堂章程》，也正式使用起“体操”一词。

在中国汉语中，“体育”一词原本也是没有的，它也是近代中国人从日本直接引进的。体育一词最早出现在1760年的法国报刊上，用法语Education Physique拼写。1762年经过卢梭的名著《爱弥尔》，使这一词汇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传播，并拼写成英文字母Physical Education。明治维新后，日本又从西方学术中引进了这一英语词汇，并翻译成“体育教育”、“身体教育”和“关于身体的教育”等术语。1876年，近代日本著名教育家近藤慎三将以上术语简化成“体育”二字，并在同年的第6号《文部省杂志》上首先使用。1878年后，体育一词开始在日本普及，并主要是在一些杂志的栏目标题和团体组织名称中使用。

中国人直接使用这一词汇的最早记录是在1897年，主要有两处资料说明。一是在当时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已提出有“重体育锻炼”的要求。二是1897年秋，为解决师院附小学生启蒙教育的课本问题，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大）师范学院学生陈懋志、杜嗣程、沈叔逵3人曾编写了《蒙学读本》一书，在书的第三编编辑大意中，已有“泰西之学，其旨万端，而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纲”的说法，并解释了何谓德育、智育和体育：“德育者，修身之事也；智育者，致知格物之事也；体育者，卫生之事也。”[1] 1901年，在上海的《教育世界》杂志上，又出现了“学

[1] 张天白.“体育”一词引入考.体育文史，1988（6）.

校体育”的用语。“体育”一词在中国作为官方文件的最早使用，见于 1902 年公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在该章程的“全学纲领”第二节中，有以下一段文字表述：“中国圣经垂训，以伦常道德为先，外国学堂于智育、体育之外，尤重道德。中外立教本有相同之理。”[1] 1903 年，又有岚僧翻译了日本学者西川政宪的《国民体育学》，并在当时的《杭州白话报》上连续发表，致使“体育”一词获得了更大范围的传播和运用。在江苏无锡甚至出现了以“体育”冠以组织名称的做法，如 1903 年成立的“无锡体育会”。1904 年，又有上海广学会出版了《体育图说》一书。同年 12 月 28 日的《大公报》上，还发表了专门的《论体育》的研究文章。从此，“体育”与“体操”，两个均代表着广义体育概念的词汇，在中国学术界并行不悖。直到 1923 年北京政府宣布将学校体操科一律改名为体育科，这两个术语词汇才从根本的概念上开始分道扬镳，并从此表述着各自不同的理论含义。

第二，有目的地翻译和介绍日本的体育文献和规章，逐渐建成了中国近代最初的体育体系。众所周知，旧历 1903 年的“癸卯学制”，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颁布并真正实施的学制，它标志着中国长期封建式的官学、私学、书院等学校形式发生了根本改变，为现代形式的学校制度奠定了基础，这无疑是重大的历史进步。但是，就这个学制本身来讲，它又几乎是完全抄袭于日本的，说明当时日本的做法对中国有着很大的借鉴作用。体育也是一样，中国人不仅从日本直接引进了“体操”“体育”这样的专门词汇，而且在一些体育规章制度的建设和具体做法上，也都不乏以日本为蓝本的记录。

例如在学校体育制度建设方面，有人明确提出：日本现行小学校制度，可以备中国之参考。在体操的设置上，可分甲、乙两种。甲为“普通体操，种类甚繁，男女不同”；乙为“兵式体操，柔软

---

[1] 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 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174.

体操。”[1] 在体育教材建设方面，则有留日学生陆世芬等人于 1902 年创建的教科书译辑社，专门翻译日本中小学课本，其中包括体操。所以在 1901 至 1904 年的 6 本中译文本《体操》书中，除一本为翻译的德文本以外，其余均为日文本翻译书。1906 年左右，留日学生陈采南等人又翻译出版了《新撰普通体操法教科书》，这是一本由日本体育学会编撰的权威教科书，共分“学校体操”和“家庭体操”两编。学校体操编由三章内容构成，包括：“一、准备法；二、徒手运动；三、器械运动，含哑铃、球杆、棍棒、木环、豆囊。”家庭体操编中有两章内容：“一、徒手运动；二、器械运动。”[2] 在早期的一些地方官办运动会方面，同样有留日学生所做出的引进和尝试工作。例如 1905 年在成都北校场举行的四川第一次全省运动会上，除大会会长、会场主办等由地方官员担任以外，运动会的裁判人员和具体的组织者，均为清一色的留日学生，有周道刚、徐孝刚、张天培等人。所以，运动会的组织程序和项目安排，都体现出当时日本举办运动会的味道[3]。又如同年 6 月在湖南召开的武备学堂和兵目学堂联合运动会上，同样可以看到运动会的组织者、裁判员，甚至是场地设备工作人员，也大都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学生，其中包括蔡锷、詹宗瀚等名人。在创办体育专业学校方面，也是留日学生走在了最前面。无论是带有革命性质的绍兴大通师范学堂，还是以培养体育师资为己任的中国体操学校，其主要创办者均为留日学生。

由此可见，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中国主流社会（或曰官方）体育的发展，主要是在留日学生的影响下进行的，包括当时已显端倪并影响后来中国体育发展道路的军国民体育思潮。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日本维新之后的迅速崛起，甲午战争又大败清帝

---

[1]《教育之目的》讲义. 四川学报，1905-06.

[2] 肖冲. 清末留日学生对欧化的日本体育传入中国所起的作用. 体育文史，1987（3）.

[3] 孙仲达. 四川近代的运动竞赛. 体育史料：第 6 辑.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

国，使中国人不得不对日本另眼相看。加之欧美各国毕竟离中国太远，文化差异也大。而日本和中国社会文化相近，且在学欧美中大获成功。所以以日为师，努力使中国尽快走向近代化，便成为当时国人的普遍共识。

四、出使人员对近代西方体育的传播

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后中国洋务运动的又一个重要改革成果是，1861年成立了一个专门管理与各国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接着在1867年，由丁日昌上书朝廷，主张在国外正式设立公使馆，以便更直接地了解西方和与西方社会打交道。丁日昌的这一主张10年后得到实现，由郭嵩焘率领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驻外公使馆，于1877年正式在伦敦设立，从此拉开了中国驻外使节工作的序幕。它的意义在于：思想上，中国人从此走出了传统的以华夏为中心的地理观念误区，而真正开始走向世界；行动上，则是通过大量出使人员这一特殊的群体中介，使中国人能够更直接地接受、了解和认识西方文化，包括近代西方体育。

（一）郭嵩焘所记述的近代西方体育

郭嵩焘对近代西方体育的介绍，主要集中在他的《伦敦巴黎日记》中。其具体的项目有地滚球："用木钟楦九，置长木板端，板长约丈许，用铁球从板端前抛之，斜冲前钟楦左右，则木杵相连倾倒，谓之获彩"[1]。据说地滚球游戏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当时在教堂里安放有象征异教徒和邪恶的木柱，用石头滚地击倒，以示赎罪和消灾。地滚球在中国近代早期也被称为"抛球"，它很可能是现代保龄球的滥觞。有马球比赛："乘马者十余人，各着异色短衣小帽，手执木锤，柄长三四尺，分左右二队，为英格兰、苏格兰

[1] 郭嵩焘. 伦敦巴黎日记//走向世界丛书. 长沙：岳麓书社，1984：217.

人。院内放一牙球，后立一人举旗，旗落则两队同驰。互以锤攻球，以力大将球击中圈外者胜”[1]。有体育课教学：学生们“一习运动手足，左右步趋，并听教者指挥。一列阵，或分或合，或前或后，疾徐疏散，趋教者为程式。一习跳跃，设一高架，及两凳而空其中，使之猱升鸢击，倒悬翻跌，备极轻捷。”[2]

其中对西方马术表演的介绍最为详尽：“堂中一巨坪，覆以玻璃，木栏环之。坪中堆草山，中开一道。前为池，长丈四五尺。编草为篱数十架。赛马时，草山两旁各设篱，外连木栏二三道相接续，高约四尺，一跃而过。相接二三道则连跃。最后取篱置草山前，状如甬道飞腾，跃过一篱，篱前即池也。凡马十四匹，跃过池前者七八，跃入池心又腾而上者五六。过池马力过猛，骑者颠而下，四人。随颠随起，又上马怒驰，有跃至五六次者，真神勇也。妇女五人，有骑乌骓者，凡三跃过池，横坐马上，若无事者。”这是跳越障碍赛马。还有一种表演是“一玻璃巨厅，用浮泥铺地以防马驰失足，上方树铁柱为门，以止马。平列小儿数十。有顷，一人骑马前导，则教习也。后分二行随入，左右各十二马。左皆青马，右皆白马。入即平列，向上免冠为礼。教习列马左方传令。左右驰骋，或分或合，纵横交互。一听教习传令，立即改变。人马相习，转折变化，自然应节。”又“凡马八匹，亦以一马立左方传令，皆教习使之腾跃驰逐，或举前足，或四足齐举，亦左右纵横，连番腾跃。”“又有九马排比而入，亦教习自试者也。并不传令。九或连行，或分三行，由左横行而右，又由右横行而左，或时交互错杂以行，变化随意，从容中节。已而其中一人连声传令，马或转头向上，或又折而向上，或周环疾驰，或跨越腾跃，或交互转变，使人眼迷心慑”[3]。这当是马术表演中的舞步骑术。

---

[1] 郭嵩焘. 伦敦巴黎日记//走向世界丛书. 长沙：岳麓书社，1984：256.

[2] 郭嵩焘. 伦敦巴黎日记//走向世界丛书. 长沙：岳麓书社，1984：642.

[3] 郭嵩焘. 伦敦巴黎日记//走向世界丛书. 长沙：岳麓书社，1984：669.

（二）张德彝所记述的近代西方体育

张德彝对近代西方体育的介绍，分散在他的《随使法国记》《随使英俄记》和《欧美环游记》等书中。其中有对西方羽毛球运动的最早描述，当时他将羽毛球称之为“巴塔多尔”，很可能是对“badminton”一词的音译[1]。有对西方赛艇活动的描述。在《随使英俄记》中他这样写道：泰晤河上，每年都要举行的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两校传统赛艇活动又要开始了，只见“轻舟竞渡，鸥鹭同趋，衣帽各异其色，以便观者易辨先后”。其所用之“舟，长丈余，宽三尺，体轻而易行，如华人所谓水车水马”一般[2]。据说当时英国泰晤河上的赛艇活动，除大学之间的校际比赛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赛事活动，每年都举办数次。赛艇的宽窄不一，最窄的为 1 人艇，另有 2 人艇、4 人艇和 9 人艇[3]。有对西方旱冰活动的介绍，他在记载中称之为“假冰嬉”。他说，常见一位名叫班格的英国小姑娘，“每日亥初来作戏，其翻身仰射，倒体回旋，飘洒超群，便捷有出于意外者”。他所见到的假冰嬉，其场地是在室内，活动者所穿的鞋和冰鞋式样相同，唯前后有 4 个小木轮[4]。这种旱冰活动在当时的法国也很盛行，这在黎庶昌的《西洋杂志》中同样有所记录：法国的旱冰场，“用石脑油和沙土筑平。有一人独溜者，有数人合溜者。有溜而成熟，一足往来，飘飘若仙者；有两足作骑马状，蹬而溜者；亦有装束女子数人结队而溜者。种种情状，不一而足”[5]。

在张德彝的书中，对西方的学校体育课，特别是有关小学生的体育比赛活动，也有较为详尽的记述：在英国的小学里，学生分为

---

❶ 张德彝. 随使法国记. 长沙：岳麓书社，1985：233.

❷ 张德彝. 随使法国记. 长沙：岳麓书社，1985：593.

❸ 黎庶昌. 西洋杂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120.

❹ 张德彝. 随使英俄记. 长沙：岳麓书社，1986：680.

❺ 黎庶昌. 西洋杂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125.

4等。头等者，15岁以下；二等者，13岁以下；三等者，11岁以下；四等者，6岁以下。每等皆设有体育课。各等之间还要进行比赛。如头等、二等的比赛项目主要有：赛移物之力，以能运行者胜；赛抛球之远近；赛踢球之远近；赛随便抛踢，以路远数多者胜；赛跑360尺。又有头等赛跑1里半、赛跑900尺；二等赛跑洋里四分之一；三等、四等的比赛项目主要有赛跳墙高7尺、赛跑250尺。另有各等共同比赛项目：跑3里；拄棍跃高；赛跑300尺；赛跃高，旁立木牌，号以尺寸；跑360尺，中途横有木栅，高约3尺。这分明就是一种结合少数球类运动的现代田径运动会❶。张德彝还介绍了当时西方儿童的一些主要体育游戏项目，有30多种，诸如跃蛙、飞带、掷巾、赌远、跳索、超沟、骑驹、夺界、看饼、获敌、对戏、助王、擒王、威敌、学步、捉摩、捕鼠、诱捉、逐马、捉藏、击物、逐猫、放猫、遗巾、捕兔、捉铃、直跃、旋跃、夺旗、比力等等❷。

（三）洪勋所记述的近代西方体育

在洪勋的《游历瑞典挪威闻见录》中，曾介绍有西方的跳水运动和水球运动。他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王宫附近，修建有一种特殊的游泳池，“水中央竖柱架板为基址，筑室百十间于其上。中有池长方，周围百余步，木堤横亘之，分而为二。置梯四隅，三面各悬镜，一方巾栉数事，供易衣梳拭之用。其一面为岑楼，方丈，自顶及地四重。泅者多十余龄童子，分数十人为一班，两两跃下，浮水面而作诸剧。每食顷易一班，乃自楼而下。善泅者至楼顶背水立，足趾垂外，仅以指著檐，翻身腾跳入水，久立始出。后有皮制球，径五尺，抛掷水中，壮者八九，蹴踏为戏。”洪勋一开始还以为这是瑞典皇家为了选拔海军将士，后来通过组织者

❶ 张德彝. 随使英俄记. 长沙：岳麓书社，1986：393.

❷ 张德彝. 欧美环游记.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67.

了解到，这原来是一种健康身体的体育锻炼活动[1]。

瑞典、挪威的滑雪世界闻名，这在洪勋的见闻中也有记述。他说："溜冰之戏以欧洲论，唯瑞典挪威行之最盛。溜者著复履，重底，中空寸许，以铁为之。带则以革，持木竿长丈许，撑之不步而走。或以踪迹作草书，如蝌蚪痕。"又有"童儿女，跨冰舟，长约三尺，高尺有咫。以木为之，底平，镶铁板，昂其前，有饰之兽头者，状其吴越之龙舟，以篙为浆"[2]。同样的记述还见于黎庶昌的《西洋杂志》。其中也介绍到瑞典、挪威人在滑雪时，足摄一铁棱，其尖上昂，两手张棚，御风而行，如挽弓状[3]。

第三节　基督教青年会的体育活动

基督教青年会，简称青年会，1844年6月6日由美国人乔治·威廉斯创立于伦敦。又有女基督教青年会，简称女青年会，1855年由罗勃次女士和启内德夫人创立于伦敦。青年会是一个世界性的组织，总部设在日内瓦，其声誉可与红十字会相提并论。它的职责一开始主要是在青年职工中进行宗教活动，后来发展成为进行广泛社会活动的机构，特别是在1908年以后，它将自己的发展目标，明确地定位在主要是提倡德、智、体三育的养成，以发展完全人格。

中国近代最早的青年会组织是从学校开始建立的。1885年，中国第一个"学校青年会"组织在福州英华书院成立。1895年，又有来会理在天津建立了第一个由65名会员组成的"校际青年

[1] 游历瑞典挪威闻见录（二十三）//小方壶舆地丛钞．杭州：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

[2] 游历瑞典挪威闻见录（二十三），//小方壶舆地从钞．杭州：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

[3] 李长林．清末中国关于欧洲近代体育活动的记述．体育文史，1989（1）．

会”。1896 年，全国学校青年会组织已增至 27 处。于是，同年来华的穆德便召集 27 处的青年会代表于上海，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青年会组织——“学塾青年会”。后来由于青年会组织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城市青年会组织的发展，原来的“学塾青年会”名称已不适应，遂于 1902 年将“学塾青年会”改名为“中韩港基督教青年会总委办”，也就是后来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这个组织名称一直使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并成为“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团体会员。与教会学校不同，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社会传播和社会推广方面。

一、建立体育组织机构

在中国近代体育史上，青年会系统是最早建有体育组织的团体。它们的组织形式主要表现为设有体育管理部门和建有民众社团组织两方面。所谓设有体育管理部门，是指在由上到下的青年会组织机构中，即从全国协会到地方协会，青年会均设有体育部，以专门负责青年会系统的体育工作。体育部的负责人称为“体育干事”。体育干事实行聘任制。早期的体育干事主要由一些来华工作的外国传教士充任。例如 1908 年，爱克斯纳（Max Josaph Exner）受国际青年会总会的派遣，来到中国，担任上海青年会体育干事。由此，在青年会组织中就形成了一个基本的体育管理网络，从而保证了体育工作的落实。

爱克斯纳，1871 年出生于奥地利，11 岁时随全家移民美国，16 岁时加入青年会，并开始到各地传教或表演。19 岁时选择在美国春田学院研修医疗、体育教育等课程。这些课程是专为体育干事们设置的必修课程。1892 年，他从春田学院毕业后，任卡尔顿学院的体育主任一职。1898 年，获得卡尔顿学院的科学学士学位。1898 — 1907 年，他先后在美国的麻省、纽约、肯萨斯等地的青年会担任体育干事。爱克斯纳是第一位来华服务的体育专业人士，他

在向中国人介绍西方各种新兴运动项目的同时，还在上海兴建了青年会体育馆，创办了“青年会体育干事训练班”，发起组织了旧中国的第1届全运会和成立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爱克斯纳于1911年因病返美，1943年去世。

所谓建有民众社团组织，是指那些主要由青年会发起成立的一些全国或地方的早期民间体育组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1910年10月18日成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体育社团组织——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它的发起人是时任上海青年会体育干事的爱克斯纳，所以他就任了这个组织的“全国委员会主席”。这个组织中，除一半的董事为外国人以外，也有当时几位中国社会名人，如唐绍仪、伍廷芳、王正廷、张伯苓等。虽然这个组织的成立在当时是临时性的，无固定会址、机构和组织系统，当它完成了举办第1届全运会的使命以后，实际就已不复存在了，但是，它对后来中国体育社团组织建设的影响却是巨大的，所以，后来成立的中国奥委会（1924年成立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组织，仍然将它追认为自己的“前身”，并把每年的10月18日，作为自己的“成立纪念日”。

二、宣传和推广体育运动

青年会对近代西方体育的宣传和推广，就形式而言，主要是通过出版物和演示会来进行；就作用而言，主要是对于近代新兴球类运动项目的传播。出版物包括刊物和图书，例如早在1899年6月，青年会的全国组织就出版有《学塾月报》的刊物，后改名为《学生青年报》。1911年又出版有《青年进步》杂志。刊物中辟有体育的专门栏目，或报道体育消息，或讨论体育问题。后来的青年会组织，甚至发展到创办自己的体育类专业杂志，如天津青年会的《体育周报》；出版自己的体育类专业图书，如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发行的《体育与人生》《黎氏网球射击法图解》等等。

特别是1915年，由上海青年会出版的《足球规则》《队球（排球）规则》《网球规则》《篮球规则》《垒球规则》和《运动规则纲要》6本书，是我国最早出版的运动规则类图书。

演示会具有面对面、零距离进行体育宣传的特点，因此，在新闻媒体不是很发达的条件下，这种形式更多地为当时的青年会组织所采用。演示会通常是以几个人组成一个演讲团，到一个地方或单位后，先由一个人主讲某种运动项目的基本方法和规则，然后由演讲团的全体成员进行现场表演，以便学习者进行模仿。例如在1904—1908年间，天津青年会的体育干事饶柏森，就曾在京津一带地区，经常组织这种演示会，以宣传西洋体育，激发中国青年的体育兴趣[1]。在上海，青年会于1912年有关体育演示工作的统计是：体育部成员，110人；使用健身房的总人数，3789人；使用娱乐场地的总人数，1978人；使用浴场的人数，12788人；参加体育培训的总人数，18555人[2]。

青年会对近代体育的宣传和推广，就其作用而言，贡献最大的是对篮球运动项目的引进和介绍。早在1895年，诞生于美国的篮球运动就被来会理介绍到了中国。

来会理（Dsvid Willard Lyon，又译李昂），1870年5月13日生于浙江省余姚县的一个教会家庭，后返美就学。1891年毕业于伍斯特学院大学，并于1894和1916年，分获该校硕士和博士学位。他除在美求学外，其余时间主要是在中国，共在中国各地工作了34年。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所以于1895年9月成为青年会北美协会总会首次派来中国工作的传教士，并于10月5日乘船抵达上海。11月中旬经汉口、青岛、北京到达天津。因为当时凡到华北传教的人都认为北京是教育制度的中心，而天津则是发达的西方教育中心，所以来会理来到中国后便决定将天津作为其基督教青

❶ 谷世权. 中国体育史. 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9：51.

❷ 郝更生. 中国体育概论. 曹守和，等，译. 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3：153.

年会工作的策源地，并创建了第一个“校际青年会”组织。也就是在这里，来会理向中国人最早介绍了美国的篮球运动。

1895 年 12 月 8 日，在天津北洋医学堂召开的第二次基督教演讲会上，来会理提出了青年会的第一要义就是以德育栽培道心，并重体、智二育。所以分别在会前和会后，向到会的基督教徒和懂英语的青年学生们表演了最新发轫于美国的篮球运动（1891 年）。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来会理的《中国青年会早期史实之回忆》文章中，同样可以看到这一史实：“天津青年会之最初运动，是每周一次的查经会”，以及“辩论会”等等，“此外，会员对篮球亦极感兴趣，故一时有成为群众运动的气概。但在玩篮球以前，他们的一番姿态很是可观。他们必须盘好自己的发辫，修短长长的指甲，把不便利的长袍脱去。这样，他们便把书生的尊严放弃，而换上一副高兴活泼的姿态了。但是，这种运动只在会所所在地草场围墙的背后举行，颇有狭隘不便之概”[1]。可见，最初的篮球运动在天津青年会中还是一种偷偷摸摸的行为。但到 1896 年时，情况似乎就完全不同了，天津青年会已开始向社会公开发布篮球比赛的消息了。在美国纽约的基督教青年会历史图书馆内，收藏有 1896 年天津青年会《天津公报》发布的篮球比赛公告，原文为英文。第一次公告的时间是 1896 年 1 月 11 日，其内容是：一场篮球赛将于今日下午举行，所有爱好运动的青年，请于四时踊跃参加。第二次公告时间是 1896 年 1 月 18 日，内容为：如果天气好的话，今天下午四时将举行篮球赛，来参加这项运动吧！第三次公告时间是 1896 年 4 月 4 日，其内容是：上星期六下午举行了一场热烈的篮球赛，另一场将于今日下午四时举行，来学学这项运动吧！[2] 从此以后，篮球运动在中国社会开始得到较快的传播和发展。篮球最初曾被来会理称之为“新球戏（New Gailey）”。

---

[1]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周年（1885—1935）纪念册. 转自董尔智. 对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一点考证//体育史论文集（三）. 中国体育史学会，1987.

[2] 董尔智. 对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一点考证//体育史论文集（三）. 中国体育史学会，1987.

三、组织多种层次和形式的运动比赛

从近代中国早期举办的体育比赛情况来看，无论是全国性的运动会比赛，还是地区性的运动会比赛，青年会系统都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作用，甚至出现了操纵中国早期运动会比赛的状况。在青年会系统组织的运动比赛中，既有层次的区分，如地区性的比赛、全国性的比赛等等；也有形式的不同，如单一项目的比赛或多种项目的比赛等等。

从比赛的层次来看，青年会系统较早组织的地区性比赛，主要集中在天津和上海。例如 1902 年，天津青年会在天津的奥地利租界内，举行了有各学堂参加的以田径为主体的第 1 届联合运动会。据说当时还曾有几所官办学堂参加比赛，使观众达到了 5000 多人。联合运动会从 1902 到 1911 年，在天津共举办了 8 届。[1] 青年会举办的天津联合运动会，后来成了 1913 年华北运动会产生的重要基础。在上海，1900 年成立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1902 年起，他们开始发起举办上海运动会。这些均为中国近代地区性运动会之始。

青年会组织的全国性比赛，主要是 1910 年在南京召开的第 1 届全国运动会，以及后来在北京召开的第 2 届全国运动会。此外，青年会系统还组织、操办了中国早期参加远东运动会的运动员选拔赛等等。

从比赛的形式来看，较多的是单一项目的比赛。其中较早的有 1905 年 6 月 2 日上海青年会组织的棒球赛。比赛在当时的上海青年会球场举行。参加比赛的队伍只有两支，一支是青年会代表队，一支是圣约翰大学代表队。1908 年 2 月 29 日，天津青年会组织举办了天津市第一次网球比赛。1911 年，在上海青年会召开的运动

[1] 董守义．华北体育联合会的沿革//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

会上，由柯兰克专门组织了两场排球表演赛。这次比赛成为上海排球赛的开端。

柯兰克 (John Howard Crocker)，1870年生于加拿大，曾获美国春田学院荣誉体育教育硕士学位。他是1896年加拿大全国男子五项全能冠军。1908年，他担任加拿大参加伦敦奥运会代表团经理。1911年，受青年会北美协会派遣来到中国，到上海青年会接替爱克斯纳的工作。柯兰克曾出任第2届上海远东运动会的中国代表团经理。正是通过他的灵活运作，使袁世凯及其内阁为这届运动会提供了3万银元的资助，并且向来到上海参赛的各国领队们表示：中国政府将由衷地支持发展体育事业。柯兰克还曾先后多次为江苏省教育协会，为官方举办的体育传习所讲授体育方法、田径竞赛处理法、游戏及游戏场等专业课程，为中国近代早期培养了大量体育领导人才。

青年会组织的多种项目比赛，主要有1908年福州青年会举办的学校联合运动会。比赛项目设有二人三足竞走、盲瞎竞走、囊躯竞走、穿衣竞走等等。当时有英华书院、格致书院、三一书院的100多名学生参加了这次比赛。

四、培训体育人才与修建体育场馆

青年会在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的又一重要作用，是充分利用自己早期的体育人才优势和体育场地设备优势，大量培训体育人才。早在1908年，上海青年会体育干事爱克斯纳就创办了“体育干事培训班”，培养了20名体育专职人员。这个培训班后来改为“中华全国基督教青年会体育专门学校”，学制初为2年，后改为4年。教授课程主要有解剖学、生理学、卫生学、急救法、教授法、运动生理学、各种运动法、运动技术等等。

1913年，又有葛雷等人在浙江的莫干山开办了“暑假体育干事训练班”，学员十多人。学习内容有体育概论、运动规则、篮球、

排球、体操、游泳、室内田径运动等项目，还有中华武术。其目标主要是为大城市的青年会培养体育干事。

葛雷（Dr Robert Gailey），1869年11月6日生于美国马里兰州，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是学校的美式足球队员，曾当选为全美美式足球明星，1896年毕业。1898年来到中国天津青年会工作，继续向中国人推广美国的篮球运动。1906年调往北京青年会，1930年退休并继续住在北京，直到1941年返美。

1915年8月，又有中华女基督教青年会在上海创建了“青年会女子体育师范学校”，修业年限2年。教授内容：术科有球类运动、田径、体操、游戏等；学科有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生物学等等。该校办学10年，毕业了9届毕业生约150人，对于我国女子体育的开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该校后来并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体育科。

在体育场馆建设上，基督教青年会也走在了社会的前面。例如1900年，上海青年会成立，在老靶子路租空地做运动场。1906年，当上海青年会在四川路建成会所时，建立了健身房、墙手球房、弹子房、游泳池等较为完善的体育娱乐设施。1909年，上海青年会的健身房落成，爱克斯纳带领他的“体育干事训练班”学员专门进行了体育表演，并在施高塔路又购地25亩，修建运动场，召开运动会。

在天津，1897年天津青年会在北洋大学附近建立会所，同时建有体育设施。1913年，天津青年会又在东马路建立会所，其主体建筑就是一个篮球馆。室内可供打篮球、排球、羽毛球和垒球；另有单杠、双杠、双环、拉力器等设备；还有健身房、淋浴室，楼上则建有坡度环形跑道，有看台和运动员做准备活动的场地，这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体育场馆设施。

1908年成立的广州青年会，亦于1915年在长堤建成了一座健身房和体操室，成为广东最早的室内运动场。场地除设置篮、排球两用的球场外，还有单杠、双杠、木马、吊梯、肋木、平衡梯等设

备。健身房旁还建有一个10码宽、25码长的室内游泳池，并设有跳板装置。

1916年福州青年会也在福州的南台建有四层大楼的会所，大楼内不仅有一个篮、排球两用的球场，而且还有一个25米长的游泳池，并有跳水台。

由上可见，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就青年会作用的实质而言，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的一种工具。但是，我们在讨论青年会的历史作用时，应把青年会与青年会中具体工作的人区别开来；应把早期的青年会与中、后期的青年会区别开来；应把青年会的德育宗旨与智育、体育的一些具体措施和实际效果区别开来，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它的作用。

第四节　中国早期的体育大众传播与体育经济活动萌芽

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了经济近代化的进程。由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转化，在生产力的因素之外，最根本的特征是自然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这种转变在中国和在大多数后发展国家一样，不是自发地在传统市场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而是在外来因素的作用下被迫产生和进行的。所以，中国近代史上有关体育的商品经济活动和体育的大众传播，应该说也是随着西方近代体育的传入而开始的。

一、体育大众传播

所谓传播，具有传递、输送、沟通、交流信息的意思。体育大众传播是一个过程。它表现为体育的专业化群体，凭借一定的机构

和技术，通过技术手段（如报刊、广播、电影、电视等）向为数众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受众，传播体育符号的内容。在中国近代体育史上，最早传播体育文化的技术手段较为单一，主要依靠一些综合性的报纸杂志。

如创办于1872年的上海《申报》，它在4月30日的创刊号上，出现了“观西人驰马角胜”的体育内容报道。又如创办于1876年的《格致汇编》，在其创刊号上，在比较中外妇女生活的时候，也介绍有近代西方的妇女体育活动状况：“西方妇女，每于暇时，或抛球以为戏，或走路以遨游，或乘骑以赛驰驱，或操舟而自拨荡。此皆所以练习身力者也。无论贵贱，均乐为之。所以西国妇女，比中国者多为属强健。”

此外，创办于1868年9月的《万国公报》，在1895年4月的一期上已朦朦胧胧地有了关于奥运会方面的相关信息。特别是创办于1891年的《中西教会报》，在1900年7月，已有了关于法国巴黎召开第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消息报道。该报道被认为是中国人对奥运会的最初了解，是奥林匹克运动传入中国的开始时间[1]。还有，在1903年第198期的《大公报》上，曾以“蹴鞠竞争”为题，出现了中国本土有关足球比赛的消息报道：“战国时斗鸡、走狗、六博、蹋鞠之风各国皆是。而北京近日蹋鞠之习亦甚风行。因英国公使馆之北所圈余地甚大，遂改为抛球场。美国公使馆之西所圈余地，亦改为抛球场。每日练习，华人往观者，以千百计。”

在1903年7月的第九号《广益丛报》上，更有了人们对于体育学术问题进行研讨的报道，尤其值得注意。报道说：是月17日晚8时，在上海的英大马路青年会，有140多人参加了关于体育问题的讨论会。其主持人为黄佐廷，先后发表演讲的有西人华克尔，他在论述体育对人体的作用时说：体育能够“练身体，除疾痛，即所以浚智识。”认为体育“一有益于已有职业之人，二有益于各学

[1] 罗时铭. 奥林匹克运动传入中国时间考. 体育文化导刊，2004(12).

堂之学生，三有益于毕业出堂之学生。”中国学者顾俊一的演讲则以“体育与灵魂有密切之关系”为主题，指出：“一如欲延年益寿，非习体操不能得。凡华人之未老先衰、不耐劳苦操作者，甚至以七十为古稀者，皆因未受体育之故。并引瑞士人操身增寿之谚以证之。二如欲增进道德心，非习体操不能得。凡人之强有力者，必皆心迹光明。若阴险狠猾之辈，大率因力不胜人，体弱而不能有为之故。三欲增长智慧，非体操不能得。凡人执业劳苦，故其灵性必须休息，运动始有进步，优胜劣败为身体为始基。”西人巴乐满在演讲中则充分肯定了中国古代就有重视体育的传统，认为孟子的所谓养浩然之气就是一种体育精神，而这种精神在今日之中国正合时宜。

在中国早期的这些综合性报纸杂志中，尤以创办较早的上海《申报》影响力为最大，对体育的宣传报道也最多。以下是部分年度中《申报》体育报道内容的汇总。

部分年度中《申报》体育报道内容的汇总

年度	报道的体育内容
1872	驰马角胜，中西各国团练，龙船竞渡，对弈，西人赛马赛船，西人赌赛足力，水龙盛会
1875	西商操演，西人于港赛马，寓沪西人赛马，日本赛桨船，美国赛奇会，中国团兵操演，中秋竞渡，赛走，西人赛船赛力
1896	洋操纪实，宜昌武试，元宵佳节赛灯，民俗迎神会，西兵操演，西人赛灯，西兵团操，西人春秋季赛马（连续报道），城隍赛会，马戏龙舟，西湖竞渡，重九登高，水军赛会
1901	西兵会操，印兵操演，英兵操演，法兵操演，日兵操演，德兵操演，联军合操，民俗娱神祭神，校试骑射，西人春秋季赛马，考试技勇，武试展期，法督阅操，西人赛船，改习洋操，教习洋操，建设武备学堂

（接续表）

(续表)

年度	报道的体育内容
1905	练兵述闻，拟调回游学武备生，上海公部局华童公学简章(其中规定体操为必修科)，沪学会附属义务小学简章（规定体操为五科之一），洋操号衣广告（多次），武备学生考章，春赛定期，开办武师范学堂，拟借营房基地为运动场，文武学生分途管辖（文归学务处、武归练兵处），南洋公学将开运动会，师范生练习兵操，北方大学堂体操改用华字口令，记南洋公学春季运动会，国学添设体操，宝山学堂举行运动会，宝邑学堂运动会，京师大学堂第一次运动会，西人赛船，续京师大学堂运动会，工巡局请拨地扩充操场，预备科操场将次竣工，留学生编辑军队教科书，学堂练习兵操，教习体操，准给澄衷学堂体操枪械，大学堂拟开运动会，游学预备馆开辟操场，论幼稚园注重游戏原理，学生课余赛球，观模范运动会，城东女学开第二回游艺会，镇郡四学校开运动大会，民立上海中学学堂秋季运动会，两人竞走
1906	教育会附设体育传习所，经华商会体操会开会礼节，华庆公司专制练兵军衣、学堂操衣，龙门师范学堂举行第二次模范运动会，纪运动会，商部高等商业学校举行运动会，记务本女塾运动会，广明小学定期举行运动会，论华商体操会衬之有益，运动会迁地，竞业学校运动，华人青年会开展夏季运动会，学堂会练日操，沪南创办商学界体操会，青浦竞新公学运动会（松江），上海中央学校章程（其中有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科目），记徐家汇西塾运动会，青浦西溪小学堂运动会（松江），务本女塾暑假体操传习会章程，阿格登洋行军衣妙品（含学堂操衣），沪商体操会定期耀武，华商体操会耀武续志，华商体操会出队赴饮序次，华商体操会联队赴宴志盛，华商体操会来函，华商体操会续录，沪南商团体操会定期开操，体育会迁设操场，商学补习会体育部暑假记，记西城小学堂游艺会，记闵行行镇体育社，群学会体育部拟招新班生，瑞典式体操法之开祖海立克林传 1766 年 11 月 15 日出生，务本女塾暑假体操传习会给凭，练兵处派定南北集合秋操随员表，清江马队改良操法，(续)上海市商业体操会试办章程，体操会议章程，商业体操会举行大操，南市商业体操会庆祝立宪，中学堂定期举行运动会，秋季运动会，中学堂运动会纪事，松郡又开运动会，澄衷学堂秋季运动会，义务小学校定期运动，记澄衷学堂运动会，龙门师范运动会，花业公学群学会附属小学秋季运动会，运动会类志，详记健行公学大运会，西城小学运动会顺序，复旦公学定期运动，松秀女学校开游艺运动会，梅溪学堂运动会，学堂联合运动，《申报》谢券——北爱国女学校纪念日运动会，竞新公学运动会，《申报》谢券——南市花业公学堂运动会，竞胜体育会试办简章，《申报》谢券——务本女塾运动会，正蒙学社开运动会，游学预备科运动会，记君羊学会运动会，体育会定期开会，城中商业消防体操会简章

(接续表)

（续表）

年度	报道的体育内容
1910	体育会开会之先声，体育会开会纪略（扬州），三等之运动场（时评），敦请青年会全班体育专家演惊奇夺目大技艺，张园开大运动会，万国赛马会，沪城体操会第二次毕业，华商义勇队赛夺月杯，青年会举行运动会，各校议开联合运动会，澄衷学堂举行远足会，广东运动员赴宁，全国大运动会之先声，武阳联合运动会续志，全国大运动会，女学运动会先声，各报馆恭祝全运会，学堂合开运动会（本埠新闻），苏省大运动会预备情况（苏州），联合运动会变更原因，学生练习野操，小学联合运动会志盛（常州），卢浦两等公学运动会记盛，中国体操学校运动会预志，锡金拟开联合运动会，《申报》谢券——清心中学堂定于11日开运动会，武昌学界开小学运动会，教育总会举行运动会，女学联合运动会记盛（常州），《申报》谢券——贞元小学校定26日开学艺会，鄂城小学举行运动会之惨状，鄂省运动会纪事，冀中女校大开运动会，冀中女学运动会详情，比赛足球大捷胜，上海高等实业学堂VS圣约翰大学，全盘5次，广益中学生雪地操练（长沙），《申报》谢券——精武体操学校定于十二月初一下午假座新舞台开运动会。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发行量的不断攀升，以及社会影响力的不断增大，《申报》又开始辟有“体育专栏”。有时取名“体育运动”，有时取名“体育消息”等等。1923年，《申报》又在上海创办副刊《体育与人生》。遇有重大体育赛事，《申报》甚至还出版发行专门的《运动特刊》，以示宣传与纪念，如1915、1921和1927年中国承办远东运动会时，以及1934年的第10届远东运动会召开时，《申报》都专门出版发行了远东运动会特刊。

与综合性报刊中的体育宣传报道相比较，体育专业书籍报刊的出版发行活动则要稍微晚一些。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的体育图书当是1890年由上海广学会出版发行的《幼学操身》。该书由中国人翟汝舟和英国人庆丕合著，由近代史上鼎鼎大名的洋务实业家盛宣怀作叙。叙中说：“泰西以养生之术多，所考验其俗，又便捷轻利，往往游戏中寓角力之意，童而习之，白首不厌。特未有专书为初学先导者。兹庆君纂辑《幼学操身》一书，凡为图三十有

二，各有说义，取浅近于指授，其行习也有序，其程课也有时，彻始彻终，同条共贯，植基于蒙养，取类于修身，其嘉惠幼学，可谓勤矣。今海宇多暇武备，建修生徒之颖异同者群萃，而州处优游乐育多士奋兴，诚得是书以引而进之。运用熟，则手足多暇，气体固而神智自生。体用兼备有开，必先异日干城御侮之资，将于是在乎揆诸古人设教之旨尤有合也。余故乐为叙之。”由此可见，这部我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体育图书曾得到盛宣怀极大的推崇。这是否与这本书的编排内容，是将我国传统的导引术和近代的普通徒手体操糅合在一起，而与洋务派所主张的“中体西用”学术观点吻合有关呢，则不得而知了。

进入 20 世纪以后，随着近代西方体育的不断传入与传播，我国体育专业书籍报刊的出版发行活动也开始逐步走向活跃。这其中尤以 1904 年上海广学会出版发行的《体育图说》为代表。该书的原作者为美国人罗克斯，由中国人姚受庠翻译。分上下两卷，上卷为徒手体操，下卷为哑铃体操。每一动作均有详细图解和练习要求，如徒手操第十图中的“屈背”后屈，其要领是：“先屈项，继则前斜体之重心于腰上，首肩缓缓向后倾倚，至不可再下乃止。”又如哑铃操的第四十八图“正置肩上”，其要领是：“上臂平肩，落手于同一线，手背向下。习十六次。”从图示中可以发现，当时国人已经开始注意到体育锻炼的科学性和规范性问题，所以作者在书的序中说：“以下各练习，在乎敏快中式而已。”至于为什么要编写此书，作者则有一段非常美妙的论述，代表了当时中国人对体育的基本认识：“盖闻太上立德，才次之，力又次之。然三者辅，车而行，不可得而分也。有才无德，谓之小慧；有力无德，谓之小勇；有才有德而气体不充，根底不固。虽有才德，将安用之。是体育之讲不可缓也。”正是带着这样的目的，作者“爰不揣陋于课读之余，手译此编，颜曰体育图说。”

1909 年，中国图书公司又出版了徐傅霖的《体操之生理》，这是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第一部关于体育自然科学方面的论著。作者

在书中就“人体运动器官，骨骼，躯干及头的运动，上下肢运动，运动的强弱，运动的性质，体操的基本形式”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阐述。

有关体育专业报刊的最早出现是在1909年。由中国体操学校在上海创办的《体育界》，被公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份体育专业杂志。1909年4月，《体育界》由上海的中国体操学校体育界杂志社编辑出版，中国图书公司发行，24开本，铅字排印，总编辑为著名体育教育家徐一冰先生。《体育界》初为不定期出版，出至第10期时曾一度停刊。1918年10月复刊后改为月刊，刊号续前。出版至第20期时，又因学校迁往浙江南浔而停刊。以下是1909年4月20日出版的第一期《体育界》目录：

天津列国军人竞技会	乐天
场隅琐谈	可可
中外汇报	
南浔女子学校运动会	南浔访事员
万国体育会	记者
脊柱弯曲与学校生徒	录日本《日日新闻》
体育家今日之责任	黄君锦
小说	
体操教员	美哉
专件	
武士道（上篇）	录河南杂志

体育专业书刊的出版发行，不仅有利于体育的宣传普及，加快近代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播速度，而且也促进了体育出版业经济活动的萌芽。

二、体育经济活动萌芽

近代体育作为“西方文明”的一种物化载体，其传入中国的时间，大致是在 19 世纪中叶，最初主要是在外国侨民中流行。有记载表明：在 1848 年的上海租界里，已经出现了室内保龄球和室内墙手球运动。与此相适应，有关体育用品方面的最初体育商品经济活动也开始萌生。当然，这种体育商品经济活动当时更多的是仅仅局限于租界，局限于外国侨民随身从国外带来的体育用品。所以，在当时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中是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根本引不起人们的注意。只有在进入 20 世纪以后，随着近代体育在中国影响的不断扩大，中国早期的体育商品经济活动才真正开始渐渐地兴起。

（一）体育服装的生产与销售

体育操衣，也就是运动服装的销售和生产，应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出现的体育商品经济活动。在1905年3月28日的《申报》上，曾有这样一则消息："上海生记号专售洋操、军服号衣"。这大概是我们看到的中国最早的有关运动服装的销售广告。后来在1906年7月20日的《申报》上，又有了有关体育操衣的生产广告：华庆公司专制练兵军衣、学堂操衣、洋服。其中介绍说：本公司是在亲自考察东西洋各国各区商厂后，选上等衣料制成操衣、洋服。在1906年8月3日的《申报》上，也有一则关于"湖北汉口镇新开得胜军装公司"的广告，其中亦有介绍说：本公司专运英、德、法各国、各种军装皮件，精造新政军用衣帽、服饰、器物、皮靴、皮鞋、皮匣、皮带，以及学堂需用"操帽操衣"等各种男女体衫。

操衣，最早也称"戎衣"。郑观应在1893年的《盛世危言》"学校篇"中说：每于午饭既毕，就空地习兵式体操，一律更换戎衣。在体育用品的制造和销售上，为什么是运动服装走在了体育商品经济活动的前面？我们认为这与当时的以下几个因素有关：

一是政府的鼓励。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晚清政府就以学部的名义颁布了一个《奖励制造教育用品章程》，其中指出："照得教育日兴，所需教育用品甚众，若不自行制造，则一切仰给他国，非所以保利源而兴艺术。虽精巧之器未能遽言自制，而通常用品，近来各省颇有自行仿制者，亟应提倡，以期振兴。并晓喻各学堂：遇有需用教育用品之时，宜就本国所有者购用。虽价值稍昂，物质稍逊，不足为病。务使学生皆有土物是爱之心，而制造教育用品者亦可资借鼓励，推广改良，并不至因销路阻滞不能持久。"章程中强调："本部规定《奖励制造教育用品章程》通行各省，深望各地方随时提倡，各处学堂相与维持，除分咨外相应咨呈查照办理可也。"宣统三年（1911），在《学部奏咨辑要》中又公布了一

个《奖励制造教育用品章程七条》，其中第二条中说："教育范围甚广，今就现时急需奖励者，略举于下……体操器具、体操衣帽靴及其原料如织呢、编草帽辫之类。"第五条是："自章程颁布之日始，所有各项教育用品制造业，均准将所制教育用品呈送二份，向本省提学使司禀请奖励。由提学使司考查属实，按其等级给予头、二、三等奖牌，传知各学堂一律购用。一年之后，确系办有成效者，再由提学使司报明本部，酌核或咨明税务处免税，或另筹奖励之法。"在第七条中则指明："此项奖励章程专为提倡本国教育用品制造业起见，其一切贩卖外国教育用品者概不奖励。"

二是中国民间的纺织品生产相对有比较良好的基础。早在我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中国就有了"男耕女织"的生活传统。到了近代，浙江宁波的华商于1887年就开始集资办起了"通久"轧花厂。他们购置外国蒸汽引擎和锅炉，有40架日本最新式轧花机，雇用了三四百名工人，并聘用日本工程师和机匠，进行棉花加工。上海的"棉利公司"创办于1891年前，有资本15000两，机器40台，每天轧出皮棉约56担[1]。在纱锭生产方面，创办于1887年上海的华新纱厂，到1894年时，已有纱锭15000枚、布机350台。又如上海的裕源纱厂，是1894年由商人朱鸿度所创办，有英国纱机25000锭，资本约有30万两[2]。应该看到，这些条件为体育操服的生产提供了坚实的原料支撑。

三是生产体育操服的技术含量相对不高，容易获得市场准入。

中国人对运动服装的认可和接受，大概是从20世纪以后开始的，因为有资料表明：即使在篮球运动开展最早的天津，最初人们打球时也不穿运动服装，而是"三长"的奇景，即人人都穿长袍——找根腰带把长袍系起来而不肯脱掉；人人都有长辫子——因为参加运动不方便都盘在头上；人人都有长指甲——猛然传球

[1] 陈争平，等. 中国近代经济史教程.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109.

[2] 严中平. 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1443.

指甲可能被碰断疼痛无比[1]。在 1902 年天津最早举行的一次运动会上，运动员穿着的服装仍比较随便。有的穿又肥又大的衣裤，只是裤管较短；有的穿短裤短褂或短裤短褂连在一起[2]。即使在 1910 年的第 1 届全运会上，在东吴大学与金陵大学的足球比赛中，两队的运动员还是各穿不同色的自制的布球衣，无号码，穿方头球皮鞋，头上盘着辫子[3]。

（二）体育器材用品的销售

除运动服装以外，体育器材用品的生产和销售同样是早期体育经济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所不同的是，体育器材用品首先是从销售活动开始的，而且首先是从外国洋商开始的。例如上海和天津的惠罗、汇司、福利等大型外国公司或商店，首先开始附设经销外国的体育器材用品。据 1911 年 7 月 11 日《申报》介绍，上海汇司公司经销有外国体育用品“大踢球”，球上有 TROJAN MATCH 英文字样，价定五元起。内用软橡皮，价从一元五角起。又有上海最大的杂货行惠罗公司，主要销售英制体育用品，如“网球板，英国所制，质坚耐用。沪上擅长此技者，皆用之。”（《申报》1915 年 5 月 23 日）一些中国商人看到代销外国体育用品有利可图，所以随后也陆续开创了一些出售外国体育用品的商店和公司，如“上海生记号”“华庆公司”和“东亚公司”等体育用品销售点。

（三）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

在近代中国早期体育经济活动方面，还包括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的内容。众所周知，体育基础设施的投资，在经济上的促进作用除了表现为对大量劳动力的需求以外，还表现在对建筑、装饰材料等

---

[1] 董尔智. 对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一点考证//中国体育史学会. 体育史论文集（三）. 1987：145.

[2]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体育》编辑委员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478.

[3] 体育史料：第十一辑.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4：75.

部门产品起着相当大的拉动和带动作用。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可以追溯到1848年英国人在上海开设的第一个跑马场。跑马是西方侨民最早传到上海且影响最大的体育娱乐项目。有记载表明：仅1850—1861年的11年中，西方侨民就分别在上海的大马路（南京东路）和静安寺路（南京西路）边兴建过3个跑马场。这些跑马场既是西方侨民赛马取乐的娱乐场所，也是他们进行各类体育竞赛的活动场所。

在上海兴建的各类体育场地设施中，虹口娱乐场（Hongkew Recreation Ground）又称"新公园""靶子场公园"，是上海公共租界最繁忙的综合性体育场。它最早是万国商团的靶场。1895年上海工部局在北四川路底购得农田237亩多地，建成虹口靶场。1901年，上海运动事业基金会在靶场西边购地准备开辟体育场，不久基金会将产权让给了工部局，由工部局继续扩充地盘，设计建设体育公园。1905年，虹口娱乐场按英国格拉斯哥体育公园模式开工建造，到1909年建成，取名为"虹口娱乐场"。园内设有高尔夫球场1片，足球场3片，草地滚球场5片，草地网球场和硬地网球场数十片。此外，还有棒球场、曲棍球场和田径场等等。在各场地四周植有非本地花草树木，它们随着球类活动季节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

虹口娱乐场是按照欧洲人的生活习惯而安排运动项目的：冬季以足球、曲棍球为主；夏季以草地网球、草地滚球为主；篮球、田径等项目终年可活动。由于冬夏项目不同，所以场地划分、管理方法也随季节而变化。如夏季足球场全部改为滚球场及网球场，高尔夫球场则限制在每天的九点之前活动，其余时间分配给网球等项目使用。虹口娱乐场主要是供外侨进行体育活动的地方，所以它最早曾限制中国人入内。1909年娱乐场使用规定中有"中国人不得入内，但侍奉外国人的佣人例外"的条文。到1911年时，对华人的限制略有放宽，"凡衣着整齐的西装华人可以入内"。但一直到1928年公共租界纳税人委员会通过了"公园放开案"，才正式对中

国人开放。虹口娱乐场的体育设施在当时的上海乃至中国都可以说是一流水平，所以由它承办了1915和1921年的第2届、第5届远东运动会。

这种综合性的体育场地设施还有上海的汇山公园。1909年，上海工部局于华德路（今长阳路）和韬朋路（今通北路）交界处购得土地36亩多，于1911年6月30日建成了汇山公园。园内设有草地滚球场6片，草地网球场17片。由于这两项运动都在夏季进行，所以冬天仍作一般公园开放。

单一的体育场地设施主要有上海游泳总会游泳池。该池建于1892年，由外国侨民查理·麦尼发起建造，资金来源于会员的入会费。地址选在跑马厅内公共体育场的东北角，池长100英尺，宽32英尺，深3.6～6英尺。池边设有3副跳板。辅助设施有更衣室、热水淋浴室、酒吧等。共耗银4900两。该池专供参加游泳总会的外国侨民使用，从未向华人开放。还有：上海划船总会游泳池，建于1905年，地址选在南苏州路划船俱乐部内，池长33米，宽9.8米，深1.83米，为室内泳池，专供划船总会会员使用；上海公共游泳池，建于1906年，由公共租界工部局建造，地址选在北四川路底，总造价18500两白银，为室内游泳池，长100英尺，宽33英尺，深3.6～6英尺，设有跳板、高跳台、淋浴室、侍役室等辅助设备，1908年又在池北建有看台，只向外国侨民开放；上海青年会游泳池，建于1908年，地址选在上海青年会健身房内，主要供会员训练之用，所以它又成为第一个向中国人开放的游泳池。

在天津，较早的单一体育场地设施是1901年建成的高尔夫球场，它是由当时天津的俄国侨民体育组织“天津高尔夫球会”修建的，地点也在俄租界内，球场建有9个得胜点。1905年春，第一次在这一场地上举办了天津市最早的高尔夫球公开赛。

（四）体育基金会活动

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体育基金会活动可以追溯到万国体育会

(International Recreation Club)，亦称上海运动事业基金董事会(Shanghai Recreation Fund)，它由4名在华外侨——恩都本士(R. C. Antrobus)、摩尔(J. Whiall)、希尔德(A. Heard)、邓脱(H. Dent)于1860年发起成立。1860年时，在上海浙江路有一个跑马场，4人因为看见租界内地价涨得极快，想起应该把这方地做公共运动场。地共34.5亩，他们在1860年依法收购之。接着召集西侨居留民会，最初集得股份138股，转移了场地的产业权，并选出董事会管理，把它作为公共之用。首先开板球场于其中。

地价是银5365.60两，股东从出租一部分地给各运动总会及畜牧所得的款子来偿还股本。1862年，因太平军进攻上海，使租界地价暴涨，公共运动场的董事会决定出卖该场地，得银49425两。这笔款子即为最早的上海运动事业基金。基金的第一个用处就是在新建的跑马场内购地430亩，用银12500两。购地人的名义是上海运动事业基金董事会。地契708号，英领事馆地产注册715号，日期是1863年11月28日。

"上海运动事业基金自用了买地费及布置运动场费以后余下来的数目，就以出借或其他方法帮助上海社会中运动事业及各种公益事业。上海总会、板球总会、棒球总会、划船总会、外滩公园、虹口公园、公共游泳池、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院均曾受其帮助。""基金董事会的组织是：每年由西侨社会公举四人或五人就任董事职；聘请干事一人，奉董事会之命，执行会务，每年薪水银300两。该会的经常收入为运动场的租金和借款的利息。"据1902年12月的基金清单，该基金会能有"固定的年收入上海通用银元2500元，此款用于有效地提倡运动事业，而不损及信托的资金。"当时基金会的总资产估计达82010.42两银子[1]。

1910年，基金会介入了上海江湾跑马场，并成为该场最大的股东，因而江湾跑马场于同年便对外称"万国体育场"，基金会也

[1] 上海通社. 旧上海史料汇编.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467.

由此对外称“万国体育会”。万国体育会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主要以经营江湾跑马场为营业收入。1931年，该组织因缺少资金而请上海跑马总会担保向汇丰银行贷款，从此上海跑马总会便得到了万国体育会的大部分股份。1936年，由于万国体育会所欠的债务越来越多，不得不以万国体育会的所有土地和房产作抵押，由上海跑马总会向汇丰银行承担了万国体育会的所有债务。1937年，“八一三”事变中，江湾跑马场遭日军破坏，万国体育会由于无法赛马而使唯一的财源被切断，于是决定将江湾跑马场以76万美元卖给日本株式会社。1938年4月，因现金周转困难，万国体育会又将总部的办公大楼出租以求收益，此时的万国体育会，其生存实际已成问题，于是在同年5月召开了股东大会，决议按照抵押的协定，将所有财产全部转让给上海跑马总会，并于当年6月实行。至此，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较早成立的民间体育基金组织——万国体育会，就这样悄无声息地随着社会的衰败而消失了[1]。

[1]《上海体育志》编纂委员会. 上海体育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第五章　中国早期的体育组织与运动竞赛

近代中国早期的体育组织，是随着近代体育运动的兴起和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就其特征而言，它应该是一种认同作用体系，由具有某种共同体育目的或利益的一群人自愿联合组成，拥有一定的成员数量，并具有明确的成员界定。就其作用而言，它应该是促进近代体育的健康、规范发展，推动近代体育的社会传播。近代中国早期运动竞赛的基本特点则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参加的人数有限，运动技术水平也不高，而且主要是由外国人进行组织操办。但即使是这样，它仍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对后来的中国竞技体育比赛活动，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第一节　早期的体育组织

由于晚清社会历史的复杂性，使近代中国早期的体育组织带有以下的重要特征，即不仅有种类上的区分（一是完全由在华侨民创办的体育组织，二是既有西人也有华人共同创办的体育组织，三是全部由华人自己创办的体育组织），而且还出现了作用上的差别（一种是以推动近代体育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宗旨，一种是在体育的合法名义下从事资产阶级革命活动）。

一、以推动近代体育在中国传播与发展为宗旨的体育组织

以推动近代体育在中国传播与发展为宗旨的体育组织，如果从

主要参加的人员成分来区分，可理解为以下三种：一为完全由在华侨民创办的体育组织；二为由西人和华人共同创办的体育组织；三为全部由华人自己创办的体育组织。

（一）完全由在华侨民创办的体育组织

完全由在华侨民创办的体育组织，有上海跑马总会、上海足球联合会、上海划船总会、上海万国象棋会等。

上海跑马总会，是在上海最早成立的体育组织。1850 年，外国侨民霍格等 5 人在上海建立跑马总会，并自任董事。他们以每亩不足 10 两银子的价格“永租”得土地 80 多亩，建成了上海的第一个跑马场 —— 老公园。1854 年，跑马总会把老公园分成 10 块，以每亩超过 200 两银子的价格卖出，而从浙江中路南京路两侧以 9700 两银子的价格圈定了第二个跑马场 —— 新公园。1861 年，他们又以 100036 两银子的价格卖掉第二个跑马场，而在今人民公园处强圈了 500 亩大小的第三个跑马场。此时的跑马总会成员已达 25 人。跑马总会实行董事制，由 7 人组成董事会。董事由每年召开的跑马总会基本会员大会时选举产生，设董事长 1 人。董事会下设书记，是专职管理人员。总会下设两大部门：一是俱乐部，地点在跑马厅看台的楼上，设有滚球室、弹子房、餐厅、酒吧、打牌室等。二为跑马场，内设顾问、执事、监守等职务，多数由总会会员担任。跑马总会会员有正式和非正式会员之分。除华人外，外国人均可申请为正式会员，但申请后需经投票委员会表决。9 ~ 11 名投票委员全部通过才算入会，有 1 ~ 2 票反对则延期通过，有 3 票反对则永远无法入会。1908 年以后，跑马总会开始吸收少量华人为非正式会员（名称有名誉会员、聘请会员、社会会员三种）。当时跑马总会有正式会员 320 人，非正式会员 500 人。正式会员和非正式会员在交纳会费上要求相同，均为每月 10 元，但在权利上却有较大差异，非正式会员只能在节日参加赛马。跑马总会对赛马只进行组织工作，并不供应马匹，参赛马匹由马主私人豢养。跑马总会

的收入除门票以外，主要靠赛马时的博彩抽成。他们采用挂牌定额分彩的方式，由各赌摊的老板向跑马厅交纳保证金后在场内设摊开赌，盈亏由摊主负责，跑马厅坐收盈利。1909 年以后，跑马总会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改为赛马之前发行彩票的方式。分别设置头彩、二彩、三彩和零彩等许多大小不等的彩金，引诱众人购买。其中发行最多的是香槟票，每张 10 元。头彩从 10 万元、15 万元逐步加码到 22 万多元。据说香槟票的得彩概率是五万分之一，而要中得头彩，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当时上海滩上流行这样的歌谣：香槟票，到处销，吸饱了中国人民的血，装满了帝国主义的腰包。

上海足球联合会，于 1902 年由上海租界的侨民创建。该组织在华人中又称“西人足球联合会”（简称西联会）。西联会由正、副会长和委员若干人组成。历任会长和副会长多为英国侨民，委员则有英国、法国、葡萄牙等国的侨民。直到 1927 年后，该组织始有华人委员。

上海划船总会，大约成立于 1859 年。其总会的主要成员均为英国侨民，参加俱乐部比赛的则有英、美、德、丹麦、瑞士、比利时、挪威、日本等国的侨民。划船总会最早建船坞和码头于苏州河口，当地被人们称为“舢舨厂”。后因苏州河船只增多，交通日繁，总会便把码头迁到今恒丰路桥边，故该处曾称舢舨新桥。1905 年，划船总会迁回苏州河口南岸，在白渡桥西侧建立码头，并建造 4 大间 7 小间西式小楼一幢，作为会所。该处占地两亩多，室内建有游泳池、船库、健身房等设施。由于该处江面交通繁忙，不便于比赛，所以总会又在昆山青阳港和黄浦江上游闵行以东的黄家码头，建有郊外俱乐部，作为划船比赛的基地。划船总会曾举办过俱乐部锦标赛、上海锦标赛等赛事。

上海万国象棋会，成立于 1903 年。最初会址在上海泗泾路，后迁至南京西路体育俱乐部内。会员皆为各国在沪外交、工商、金融界人士，以及西方侨民。每星期活动 3 次，主要对弈国际象棋。

在华外侨创办的体育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说，不仅仅是为了体

育活动，其实其中还包含了很大的社交成分，甚至是为了显示某种地位和身份的需要。“刚到上海来的人安顿好了以后，便要考虑加入哪个俱乐部。上海有很多俱乐部，每个国家和每项运动都离不开俱乐部。英国人的俱乐部有三家：乡村俱乐部、上海总会和上海跑马总会。乡村俱乐部位于静安寺路，花园占地 65 亩，里面有舞厅、网球场和游泳池。一个汇丰银行的老职员回忆道：‘你应该被介绍给有关委员会，能成为一位俱乐部的新成员是十分荣幸的。’”[1] 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所以早期的外侨体育组织一般都具有明显的排华性。华人不得参与，似乎成了这些体育组织的共同特点。

（二）由西人与华人共同创办的体育组织

由西人与华人共同创办体育组织，应该是在 20 世纪以后的事。在由西人与华人共同创办的体育组织中，较早的有“四大学体育联合会”，亦称“中华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由苏州东吴大学的司马德教授于 1904 年发起成立，成员包括上海南洋公学、圣约翰书院和中西书院。联合会的主要任务是每年春秋两季轮流在四校组织举办运动会。1909 年因南洋公学和中西书院的先后退出而解体。

司马德，1903 年来中国，任苏州东吴大学数学教授，兼任体育教员，亦协助学校的行政管理工作，曾竭力提倡在东吴大学推行强迫体育。1904 年，由他成立了东吴大学的第一支田径代表队，同时发起成立了“四大学体育联合会”。司马德还是后来“华东八大学体育联合会”的发起人和书记，并担任过 1913 年第 1 届远东运动会的执行委员。司马德在东吴大学共服务了 18 年，于 1921 年死于霍乱。

近代早期由西人和华人共同创办的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体育组织，是 1910 年 10 月 18 日成立的“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

---

[1] 哈瑞特·萨金特. 上海的英国人//马学强. 上海的外国人（1942—1949）.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7.

盟会”。在这个组织的董事会中，除一半为外国人外，亦有几位当时中国社会的名流，他们是唐绍仪、伍廷芳、王正廷等人。

唐绍仪（1860—1938年），字少川，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热心于近代体育推广的社会名流。他自幼在上海学习外语和洋务知识，1874年被清政府选派到美国留学，经中学升入哥伦比亚大学。1885年到天津税务衙门任职，随后被派往朝鲜办理税务，成为清政府驻朝鲜大臣袁世凯的书记官和得力助手。1901年受袁推荐为津海关道。1904年以清政府议藏约全权大臣身份，先后两次与英国办理交涉，两年后签订《续订藏印条约》，使英国确认中国对西藏地方的领土主权。其间又任外务、邮传部侍郎等职。1907年，任奉天（今辽宁）巡抚。1910年一度任邮传部尚书，并成为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的董事。武昌起义后，充当袁世凯内阁全权代表，于1911年12月18日开始与民军全权代表伍廷芳在上海举行议和谈判，达成在湖北、陕西、安徽、江苏、奉天等地的停战协定。1912年1月，继续与伍廷芳秘密磋商关于清帝退位的优待办法，以及孙中山的辞职和由袁世凯继任的各项问题。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提名唐绍仪为第一任内阁总理。经孙中山同意，他加入了同盟会。3月25日到南京组织新内阁，4月迁往北京。唐力图推行“内阁责任制”，同袁世凯要求独揽大权的意图不能相容，被迫于6月16日弃职离京。1938年9月30日，唐在上海寓所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刺杀身亡。

伍廷芳（1842—1922年），字文爵，号秩庸，广东新会人。生于新加坡，1845年随父回国。13岁入香港圣保罗书院，1861年毕业，任香港高等审判厅翻译。1874年留学英国林肯法律学院，3年后获大律师资格，到香港任律师、法官。1896年任清政府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大臣。1902年回国，先后任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职。1910年被推选为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董事。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伍廷芳在上海宣布赞成共和，并两次致函清廷，劝告清帝退

位。12 月被南方独立各省推举为民军方面的议和全权代表，与袁世凯派出的代表唐绍仪在上海正式举行南北议和谈判。次年 1 月，任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协助孙中山制定了一些符合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法规和法令。1915 年以政府外交大臣的身份，同时兼任远东体育协会会长，并在上海主持召开了第 2 届远东运动会。1916 年出任段祺瑞内阁外交总长。1917 年在“府院之争”中曾任代总理。同年 9 月到广州，被孙中山任命为护法军政府外交部长。1921 年 5 月，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任命他为外交兼财政部长，并一度代行总统职务。1922 年 6 月 23 日在广州病逝。

王正廷（1882 — 1961 年），字儒堂，浙江奉化人，著名体育家。14 岁即入天津北洋大学堂，毕业后赴日本留学，并加入同盟会。26 岁始留学美国，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1911 年回国。中华民国成立后，即为内阁成员。先后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副议长、代理议长、代理工商部长，北京政府工商部次长、外交总长、代理内阁总理，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驻美国大使等职。王正廷还有多方面的社会兼职，例如北平中国大学校长、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全国道路协会会长等职。但他最热心的还是中国的体育事业，所以 1922 年，他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和远东地区的第二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也是我国近代体育的早期领袖之一，例如他曾是远东运动会的发起人之一，担任过第 2、5、8 届远东运动会的会长；曾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是第 5、6 届全国运动会的筹备委员、审判委员及竞赛委员会主任；他还以总领队的身份率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先后参加过第 11 和第 14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王正廷 1952 年定居香港，任太平洋保险公司董事长，1961 年去世。

（三）全部由华人创办的体育组织

晚清时期，全部由华人创办的体育组织，大概最早的是 1903 年成立的“无锡体育会”。后来有“杭州体育会”，创建于 1906 年

秋，并在金衙庄地方（今解放街大樟树附近）建设了一个体育场，还开了运动大会，是浙江近代史上较早的运动会，称“丙午年运动会”。曾留学日本的光复会会员蒋篮（字百器）担任了这次运动会的总裁判。蒋自己也在运动会上公开表演了体操，博得到会人们的热烈欢迎和赞赏。特别是文学家汪曼锋先生，还专门为这次运动会填词谱曲，写下了我国近代体育史上的最早的运动会会歌。其歌词如下：“溯我祖五麾六纛，媲美花国奠金欧。国魂不复，武德全休，文采竞风流。青衫白袷，缓带轻裘，辜负了多少健儿身手，误尽了多少英雄入彀。莽神州，只余古国僝僽。休——休，整顿全神，待扶起脂韦宇宙。医我同仇，偕行偕行，浩气摩空，健骨凌秋。碧草平铺骅骝骠，风扬纛影龙蛇走。千夫抉拾，万人俯首，黾勉遮莫夷犹。储能效实，智勇兼修，竞争讵落他人后。秋高气爽，鼓勇同仇，名誉轰击万人口。进兮哉，肃肃貔貅；壮兮哉，龙虎风云斗。联合大同盟，自今伊始岁其有。”[1]

还有“南华足球会”。它发端于1904年，当时的组织基础是华人足球队，由来自广州各校的男生所组成。但作为一个组织的正式成立则是在1908年，并取名为“南华足球会”。由刘铸伯任第一任会长。刘铸伯是伊利斯·卡杜利学校的董事长，他曾把该校作为南华足球会的事务所。后由于该校离广州的愉园球场较远，交通不便，而于次年经湾仔书院院长杨禧同意，将南华足球会事务所迁到了湾仔书院。所以，后来又推举杨禧先生为南华足球会的会长。南华足球会当时有会员约40名，主要从事足球业余训练，以及会内和会外的比赛。1910年，南华足球会代表华南区参加第1届全运会的足球比赛，并取得冠军。1916年，南华足球会更名为“南华体育会”[2]。

在全部由华人创办的这些体育组织中，最著名的是“精武体育

---

❶ 体育史料：第六辑.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37.

❷ 郝更生. 中国体育概论. 中文版. 曹守和. 等，译. 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3：132.

会”。精武体育会，亦称精武体操会，略称精武会。它的前身是精武体操学校，由霍元甲于1909年创办。

霍元甲（1867—1910），河北沧州人，世代习武。兄弟数人均以拳勇闻名，而以元甲为最。幼年身体孱弱，父兄练武时他从旁细心观摩，尽得家传，并博采众家之长创秘宗拳，亦称“迷踪艺”。1909年应友人之邀旅居上海，创办精武体操学校。1910年病逝。后来他的学生陈公哲等人因考虑到使用“学校”这一名称会限制招生范围和有碍广泛传播武术，故于1910年在陈公哲等人倡议下改名为精武体操会，并仍奉霍元甲为创始人。这就是为什么在《精武本纪十周年纪念》中仍坚持说“霍元甲先生发大声于上海，创立精武体操会，在闸北之王家宅”的原因。

陈公哲（1890—1961年），广东中山人，精武体育会创始人之一。他15岁参加健身球社，20岁参加精武体操学校，为精武第一批学员，也是精武的核心领导人员，与卢炜昌、姚蟾伯并称为“精武三杰”，亦称“精武三公司”。曾就读于复旦大学，精摄影技术，拍摄了初期精武书籍的照片，并与程子培共同拍摄了精武体育会电影纪录片5卷。1916年前后，曾两度捐出宅址、家产和房屋给精武会。曾在精武书刊中发表过数十篇研究文章。1927年在南京政府任职。抗日战争爆发后，迁居香港，潜心著述。1953年在香港自任精武总裁，访南洋各地。1957年著有《精武五十年武术发展史》，介绍了他与精武的关系，并应邀回大陆参加了全国武术观摩大会。1961年病逝于香港。

在1914年以前，精武体操会的活动还主要是限于推广武术。后来开始扩充学科，改良形式，并增加了兵操、文事、游艺。其中特别是游艺一科，引进了大量的近代西方体育项目，诸如足球、篮球、网球等等。所以从1914年起，随着人们对体育认识的加深和体育观念的转变，也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精武体操会又改名为精武体育会。改名后的精武体育会，其活动宗旨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出现了“以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民为主旨”

的说明。大致从1914年开始，精武体育会就开始向全国和世界各地发展自己的分会组织。1920年前后，在新加坡、槟榔屿、雪兰峨、吉隆坡、芙蓉、雅加达、三宝垄、马六甲、西贡、仰光、西丰、森美兰、怡保、金宝等华侨集中地区，都先后建立了精武会海外分会。在香港、澳门、新加坡、槟榔屿、雪兰峨、吉隆坡等地区，甚至还成立了精武女会或女子部。据不完全统计，迄止1929年，精武会已有分会42个，会员40多万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精武体育会是一个有相当影响的体育组织。所以，孙中山先生在1920年精武会庆祝成立十周年之际，专门为会刊《精武本纪》作序，并亲笔题赠"尚武精神"大字匾额。

二、在合法名义下从事资产阶级革命活动的体育组织

在这一类组织中创办最早的是安庆爱国会下设的"体操会"，由陈独秀等人创办于1903年。体操会的主要负责人除陈独秀外，还有当时各校的体操老师。该会规定，会员每天习体操两小时，星期日合操，并定有严格的纪律。体操会还发起了要求各校增设体操课的活动，为促进体育的发展和革命思想的传播作出了贡献。1904年，该组织被清政府下令解散。

在浙江，1905年有著名的"绍兴体育会"成立。它是由光复会领导人徐锡麟等人创办的，会址设在绍兴城府山麓古贡院之豫仓。绍兴体育会成立后，据说当时入会青年十分踊跃，一月之内报名参加者竟达数百人之多。体育会的主要活动是集各校学生每月会操一次，内容有兵操和枪操。同年8月，徐锡麟等创办大通师范学堂后，体育会会址即移至大通师范学堂，故又称"大通体育会"。1906年冬，徐锡麟去安徽后，绍兴体育会改由革命女杰秋瑾主持。在秋瑾的领导下，体育会十分注重军事训练，习武打靶，培训革命骨干，并积极联络金华、处州、绍兴等各地的革命力量，使绍兴体育会一时成为革命党人荟萃之所，为反清革命作出了贡献。

1906年，在浙江处州的首府丽水，又成立了“丽水体育会”。会址设在丽水城东南隅“利用织布公司”旁的关帝庙内。丽水体育会是由毕业回乡的留日学生陈达和阙伊，与先期归国的革命志士一道创办的。他们通过体育会招收了一批有志青年，一面授予体育技能，一面进行革命思想教育，训练和发展处州所属各县的革命力量[1]。

在上海，有1905年成立的“商余学会”。该会成员主要为租界洋行的职工，设有体育部。体育部会员最初约500人，后来发展到2000多人。商余学会的下属各单位都有操场，会员主要习练徒手操和枪操。教练有的毕业于广东武备学堂，有的来自浙江武备学堂，也有日本士官学校的骑兵科毕业生。起初教法新旧不一，后来经过大会操才统一了口令和操法。辛亥革命中，会员参加了攻克上海兵备道署和江南制造局的战斗。

有“商业体操会”。该会成立于1907年，会员多是商业从业人员，共1000余人，入会时须有所在店铺的担保，会长是李平书。商业体操会的会操地点设在沪军营附近的南操场，面积30多亩，地面铺有黄沙。安置有天桥、绳梯、吊竿、沙坑等设备，并建有大芦席篷一座，内有各种体操器材。该会规定，会员每天早上到操场进行操练，起初只教徒手体操，后来又聘一军事教官教练枪操。操练时组织严密，动作认真，并安排有野外战斗演习等内容。会员中不少人参加了攻克江南制造局的战斗。

有“沪西士商体操会”。该会亦成立于1907年，由吴馨、顾松泉等人发起组织，会员200多人。备有步枪数十支，主要进行兵操和枪操训练。该会还配备马匹20余匹，组织了一个马队。马队会员配有统一黑呢制服，长统马靴和马刀，在光复上海时担任攻占老西门、尚文门的任务。

有“沪学会体育部”。沪学会是光绪年间由马湘伯等组织的知

[1] 姚廷华. 浙江的“体育会”考//体育史料：第四辑.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1：34.

识分子团体，1909 年设体育部。主要以锻炼青年体魄为宗旨，参加者有 200 多人。会员定期出操，地点在闸北火车站精武体育会操场。教练先是由沪军巡防教官兼任，后由武备学堂毕业生任教。操练内容有新式体操、教练洋枪和军事科目。辛亥革命时，这个体育部的成员参加了攻克江南制造局的战斗。

有“商业补习会体育部”。该组织成立于 1908 年，会长苏本炎。出操地点有两处：一是九亩地操场；一是大南门民主中学操场。

以上这五个体育组织主要集中在上海的沪南沪西一带，后来他们联合组成了“上海商团公会”。

在上海的沪北租界区，还有一个较为著名的体育组织“华商体育会”。

第二节　早期的运动竞赛

近代中国早期运动竞赛的基本特点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参加的人数有限，运动技术水平也不高，而且主要是由外国人组织操办。但即使是这样，它仍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对后来的中国竞技体育比赛活动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一、学校运动会

目前发现最早的学校体育运动会，是 1890 年在上海圣约翰书院召开的学校田径运动会。但圣约翰书院是教会学校。而在中国人的官办学校中，最早召开运动会的是上海南洋公学，他们在 1899 年举办了第一次学校体育运动会。这在 1915 年 3 月 29 日出版的《南洋》杂志第一期第 6 页上有明确的记载：南洋“于民国纪元前 13 年，为母校开学之第三年，即开第一次运动会，为沪上各校先。后遂习以为常。”据说当时的上海市民，对体育和运动会还

都不太了解，因而当听说南洋公学开运动会时，市民们非常新奇，从四面八方涌入学校观看，使徐汇路上为之拥塞。（注：关于南洋公学的第一次运动会，也有资料认为是在1898年[1]。）

在当时国立学校中最早召开学校运动会的是保定师范学堂。1904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圣诞，保定师范学堂于是日开第一期运动会。悬各国旗章，陈各样赏品，教员、学生及小学堂学生约千余人，并邀各学堂生员及稍通学务女眷来观者，约千余人。后期不得入者，尚有二千人”。运动会从下午一点开始，到六点结束。竞赛内容包括“步操、徒步竞走、送旗竞走、吴越竞走、单脚竞走、御舆竞走、提灯竞走、回转捉鬼、计算竞走、蛇目竞走、三足竞走各样运动之法。”在保定师范学校召开的这届运动会上，还安排有学务处王、丁二总办的体育演说。他们就学校为什么要举办运动会，以及运动会的团体之竞争，与个人、国家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各自的演讲。最后共同指出：体育“虽属游戏，实足观人性质品格，亦教育中一要事云”。从而强调了召开体育运动会在学校中的重要性[2]。

影响最大的国立学校运动会，是1905年召开的京师大学堂第一次体育运动会。1905年4月25日，在天子脚下的皇城京师大学堂，竟然也破例地召开了建校以来的第1届体育运动会。运动会召开前，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曾发函通知北京各学堂，介绍了召开运动会的理由，以及举办时间、地点和目的，并邀请各学堂学生都来参加比赛。函件说：“直隶湖北等省，屡开运动大会，若京师者，首善之区，尤宜丕树风声，鼓舞士气。兹拟定于四月二十四日，学堂将开运动会。”“伏恳学界诸君子，是日十二点钟贲临以光盛举。谨将运动会条目奉上，如各学堂学生愿到会场演习者，乞自认何类，先期限示知敝堂报名处，以便接待。”

[1] 《上海体育志》编纂委员会. 上海体育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01.

[2] 成都日报：第四十八号. 1904年冬月十九日.

在这届运动会上，两天共完成了 32 个项目的比赛。第一天有 15 项：掷槌、800 米突竞走、跳远、200 米突竞走、掷球、跳高、顶囊竞走、100 米突竞走、提灯竞走、牙形竞走、300 米突竞走、400 米突竞走、一脚竞走、600 米突竞走、掩目拾球竞走。第二天为 17 项：掷槌、顶囊竞走、掷球、越脊竞走、跳高、100 米突竞走、提灯竞走、二人三脚竞走、牙形竞走、拉绳、职员匙蛋竞走、来宾竞走、各学堂学生竞走、600 米突竞走、掩目拾球竞走、各科选手竞走、1000 米突竞走。在两天的比赛中，到场观摩的不仅有王公大臣、学务大臣，还有各国的驻华使节、夫人和大批的记者，以及数千名的普通观众。大学堂的各科学生都报名参加了运动会，甚至连一向学究气十足的国学进士馆、仕学馆的"老夫子"们，也都报名参加比赛，给当时的北京乃至全国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影响。

二、校际运动会

在中国近代体育史上，最早举办的校际运动会是 1898 年由天津北洋大学发起，有当时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电报学堂等参加的运动会。后来著名的天津市各校联合运动会就是在这一运动会的基础上，于 1902 年形成传统的。

1903 年，在山东烟台，出现了有几所学校联合举办的"烟台阖滩运动会"。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有 50 多人。他们除比赛拔河、夺旗、装麻袋、搬山芋、三足竞走、算术竞走、退步竞走等游戏性项目外，还出现了当时较为时髦的田径比赛项目，如 100 码跑、200 码跑、跳高、跳远、掷木球、盘杠子等，并诞生了百码跑 12.8 秒的好成绩。

后来，1904 年有在苏州东吴大学召开的华东"四大学体育联合会"运动会。1905 年有湖南省武备学堂和兵目学堂召开的联合运动会；有北京汇文书院和通州协和书院联合的运动会；有杭州各学堂联合举办的"乙巳运动会"，当时的比赛项目已设置有 22 个。

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905年在广州东校场举行的“两广学务处校际运动会”，共有47所学校的男子代表队参加了这次比赛。1906年，又有湖南高等实业学堂主办的长沙校际运动会，设有兵式体操、田径和武术等比赛项目；有宁波举办的“宁属各学堂运动大会”，比赛有徒手体操、哑铃、跳栏、铁杠、跳高等项目。特别是1907年，在南京召开了“宁垣学界第一次联合运动会”，又称“江南第一次联合运动会”，共有86所学校参加，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校际运动会。共有69个运动项目，大致分为五类：一为赛跑类（称竞走）游戏，如夺旗竞走、笔算竞走、写字竞走、持蛋竞走、三足竞走、障碍物竞走等。二为田赛项目，如持送铁蛋（推铅球）、跳高、持竿跳高等。三为体操类项目，如瑞典式体操、木棍体操、单人球竿、哑铃琴歌、兵式体操等。四为军事体育项目，如击剑、刺枪、柔术、赛马等。五为情景游戏，如要塞占领、恢复路权、列国争球、陆地行舟、球战等。

三、省市运动会

在省市运动会方面，走在最前面的是四川省，他们早在1905年就举办了四川省第一次运动会，并留下了一份较完整的比赛秩序册，当时称四川省第一次运动会章程。章程中不仅有开会的宗旨、成员分工、设备安排等内容，更有一天比赛中的整个项目安排顺序表，使我们看到了早期体育比赛秩序册的基本制作方法。

午前	八时
开会	训词；开会之词
第一次	普通体操（参加单位和人数略）
第二次	器械体操（参加单位和人数略）
第三次	徒手竞走（参加单位和人数略）
第四次	蛇形竞走（参加单位和人数略）

第五次	武装竞走（参加单位和人数略）
第六次	传旗竞争第一回（参加单位和人数略）
第七次	传旗竞争第二回（参加单位和人数略）
第八次	投轮竞走（参加单位和人数略）
第九次	传球竞走（参加单位和人数略）
第十次	分柑竞走（参加单位和人数略）
第十一次	一人一脚竞走（参加单位和人数略）
第十二次	上学竞走（参加单位和人数略）
第十三次	皿球竞走（参加单位和人数略）
第十四次	提灯竞走（参加单位和人数略）
第十五次	二人三脚竞走（参加单位和人数略）
第十六次	算术竞走（参加单位和人数略）
第十七次	投囊竞争（参加单位和人数略）
第十八次	乘马竞争（参加单位和人数略）
第十九次	蛙飞竞走（参加单位和人数略）
第二十次	乘人竞走（参加单位和人数略）

午后	一时
第一次	兵式体操（参加单位和人数略）
第二次	障碍竞走（参加单位和人数略）
第三次	哑铃体操（参加单位和人数略）
第四次	三人四足（参加单位和人数略）
第五次	击剑（参加单位和人数略）
第六次	豆囊（参加单位和人数略）
第七次	月虹竞走（参加单位和人数略）
第八次	二人三足正步（参加单位和人数略）
第九次	连环（参加单位和人数略）
第十次	唱歌（参加单位和人数略）
第十一次	木棒、球竿体操（参加单位和人数略）

第十二次　　东文竞走（参加单位和人数略）
第十三次　　来宾运动（参加单位和人数略）
第十四次　　优胜旗竞争二次（参加单位和人数略）
第十五次　　正步四列行军唱歌

闭会　　　　闭会之词；军乐[1]

四、旧中国第1届全国运动会

1910年10月18日至22日，旧中国第1届全国运动会在南京南洋劝业场举行。这是由当时基督教青年会系统组织和筹办的体育赛事。全国分为5个区域，各区域指派1名精明强干的青年会干事担任体育委员会主席，负责组建本区域的委员会，以及本区域参赛项目的选择和参赛队员的选拔，并负责筹集经费，以支付本区域在南京参赛的费用。为召开第1届全运会，基督教青年会共承担了2500美元的经费开支。全国委员会由5个区域的体育委员会主席组成，全国委员会主席则由这次运动会的发起者——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爱克斯纳担任。第1届全运会原名“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认为“第1届全国运动会”。参加第1届全国运动会比赛的共有140名运动员。他们分别是代表华北地区的有20人；代表上海地区的有40人；代表华南地区的有28人；代表吴宁（苏州、南京）地区的有31人；代表武汉地区的有21人。比赛共设田径、足球、网球、篮球4个大项。其中田径赛又分成3个组别，即田径高等组分区赛、中等组分区赛和全国各校联合赛。田径的径赛类项目有50、100、220、440、880码跑，120码栏和880码接力跑；田赛类项目有跳高、

[1] 四川学报，1905，第十九册．转引自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432.

跳远、撑竿跳高和12磅铅球、12磅链球。成绩的录取则以前三名为限。其团体计分方式以5、3、1计算，即第1名得5分，第2名得3分，第3名得1分。最后以团体总得分最多者为锦标队，奖给银杯一只。大会田径赛的全国高等组锦标队是上海地区代表队，计获得52分；全国中等组锦标队是华北地区代表队，计获得39分；全国学校联合组锦标队是圣约翰大学代表队，计获得37分。对于田径赛的个人选手，大会分别奖以金牌、银牌和铜牌。金牌选手的详细结果见下表：

项目	全国高等组	全国中等组	全国学校联合组
50码		华南郭兆仁6秒	
100码	上海黄灏10.8秒	华南郭兆仁11.2秒	圣约翰韦宪章11秒
150码		华南郭兆仁16.8秒	
220码	上海韦宪章25秒		圣约翰韦宪章25秒
440码	华南郭兆仁58秒	华南郭兆仁56秒	南洋大学唐榕炳58秒
880码	华南郭兆仁2分20秒		圣约翰马约翰2分25.8秒
120码低栏	上海潘文炳15.8秒		圣约翰潘文炳15.4秒
880码接力	上海队1分48.5秒	华北队1分47秒	圣约翰队1分44.2秒
跳远	上海潘文炳19呎5吋	华北翟承修18呎3吋5	圣约翰潘文炳19呎0.5吋
跳高	吴宁赫从光5呎4吋	华北孙宝信4呎11吋5	天津青年会孙宝信5呎4吋25
撑竿跳高	上海古熊彪9呎8吋		南洋大学唐榕炳9呎9吋
铅球	华北李树池38呎0.9吋	华北孙宝信40呎9吋25	天津工校李树池38呎9吋25
链球	上海黄灏111呎5吋		南洋大学黄灏110呎4吋5

（根据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第471－472页的内容制作）

第1届全国运动会的足球比赛冠军是华南地区代表队。篮球比赛冠军是华北地区代表队。网球进入复赛的最后四名选手则全部是圣约翰大学学生，所以它的最后冠军则应该是上海地区代表队。

第1届全国运动会比赛坚持了奥林匹克运动的业余原则，参赛选手几乎全部来自学校。此外，由于它的发起者是青年会系统的来华工作人员，因此，参加的选手也大都来自青年会系统和教会学校，比赛场上使用的都是英语。但是运动员头上拖着长辫子，嘴上高呼祝皇上和皇太后万寿无疆，却又成了这届体育运动会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第1届全国运动会的召开，对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据说在5天的比赛中，观众累计达到了4万多人。1910年10月18日的《申报》曾以“各界之观会热”为题，详细报道了社会各界，特别是一些学校组织前往观赛的情况，包括一些女子学校的老师和学生，盛况空前。从此以后，一个以奥运会形式为蓝本的体育赛事活动，便逐渐正式走向了全中国。

第三节　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1894年国际奥委会的成立，标志着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产生。由于奥林匹克运动的传播和推广主要是依靠奥运会来实现的，因此，考察奥林匹克运动传入中国的时间，实际应定位在中国人最早是在何时接触、了解或认识奥运会的。

一、奥运传入中国的最早时间

关于奥运传入中国的最早时间，学术界曾经有过多种说法，例如：有1895年传入说，有1904年传入说，有1907年传入说。现在较新的认识是1900年。这是因为在1900年7月的《中西教会报》

上，已有了关于法国巴黎召开第2届奥运会的消息报道。《中西教会报》为月刊，1891年2月创刊，在上海出版，美国人林乐知任主编。1893年停刊。1895年1月复刊。1912年1月起，改名为《教会公报》。1917年2月停刊。在庚子六月第67册《中西教会报》的《时务摘要》栏目中，曾以“法国，观赛人众”为题，间接地向我们提供了巴黎的奥运会比赛信息。原文如下：“西贡五月十二号来电云：巴黎赛会，各院安置与赛各物，现将次告竣。每日入内观赛之人，实繁有徒，以故颇形拥挤云。”五月十二号是农历时间，换算成公历当是6月8日。查巴黎奥运会的开始时间是5月14日。这段文字报道的是奥运会已经开过半个多月后的情况。从中使我们最少了解到两点重要情况：一是当时的巴黎奥运会比赛，直到半个月后，所有的会务工作才开始基本稳定，并进入有序运作；二是半个月的巴黎奥运会比赛，每天都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观者前往观看。

我国研究人员也曾发现，早在1895年4月的《万国公报》上，已经能够朦胧地看到有关巴黎举办第2届奥运会的相关信息报道：“西历一千九百年，法京将为十九周大会。具录本报。今法人欲先绘一图，户部出有赏格云：凡绘画大会之图者，计取超等三名，各赏法金六千福兰克。特等四名，各赏四千福兰克。一等五名，各赏二千福兰克。二等六名，各赏一千福兰克。并许先看划定地段图式，以便诸画师自行分划界限。交卷以四个月为限。”[1] 这段引文当时在《万国公报》上，是以“大会征图”为题而进行的一段报道。

文中所说的大会，即指奥运会和世界博览会。因为第2届奥运会和世界博览会是同时在巴黎举行的。这届奥运会从1900年5月14日起，10月28日结束前后持续了5个半月。因此，《万国公报》上所说的“十九周大会”，与实际召开的时间基本是吻合的。但是人们认为，这段文字还是不宜作为中国人最初对奥运会的认

[1] 万国公报“大法国、大会征图”：第75册. 1895：15138.

识，其理由是：第一，文字对奥运信息的透露毕竟太过含糊，普通大众很难从这段文字中知道是奥运会，是体育比赛；第二，文字报道的主体内容毕竟是关于巴黎大会的图案征集，一般人很难从文字中分辨清楚它是为博览会还是为奥运会服务的图案征集活动。第三，从巴黎奥运会本身情况看，由于法国政府是将举办奥运会的筹备工作交给博览会的组织者进行的，而他们不懂体育，更不懂奥运会，甚至弄出了擅自将奥运会取名为“国际博览会锦标赛”的笑话，致使法国自己的报纸杂志在使用名称时都混淆不清，就更不要说外国的媒体报道了。因而导致了很多人当时并不知道奥林匹克是怎么回事。

基于以上理由，所以我国学者现在一般将中国人最初了解奥运会的时间，最后锁定在 1900 年[1]。

二、中国人的早期奥运情结

自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起，一部近代中国的历史，几乎就成了一部中国人民受尽屈辱和灾难的历史。什么英法联军、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哪一次战争不都是以清政府的失败和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告终，哪一次战争不是使近代中国一步步地走向了半殖民地的历史深渊。中国成了一块任人宰割的肥肉，似乎永无出头之日。中国人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认识奥林匹克运动的，因而首先看到的是奥运为世界各国（不管是强国还是弱国，是大国还是小国，是宗主国还是殖民地）在体育运动比赛方面所提供的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平台。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被激发了，似乎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展示民族自我的窗口，看到了华夏民族也能走向世界的希望。尽管当时的中国人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真正意义还知之甚少，但是，他们还是依然从对奥运会的最初了解和认识

[1] 罗时铭. 奥运来到中国.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21.

中，提出了“我们也要走向世界”的口号。

这首先是1907年10月24日这一天，有一位中国人在天津青年会第5届学校联合运动会的颁奖仪式上，在热情洋溢的即兴演讲中发出了以下的倡议：此运动会的成功，使我对吾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充满了希望。去年雅典奥运会期间❶，虽然许多欧洲国家奥运选手技术水准很差，得奖希望渺茫，但他们仍然派许多选手参加。照此看来，我国也应立即成立一支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队。目前最需要的是加紧训练，提高运动员的技术水准，以早日出现在奥运会的赛场上。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要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中国人。他不是别人，正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体育家张伯苓先生。

正是在张伯苓先生首倡要参加奥运会的影响下，1908年《天津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竞技运动》的文章。文章介绍了第4届奥运会即将举办的消息：“再过几个星期，伦敦举行一次盛大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是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一次运动会。世界上没有一个运动会能与奥林匹克运动会匹敌。”并且提出：“中国到底要等多久才能产生一位真正有技术水准的选手在国际奥运会上得到奖牌呢？那可能是难以评价的问题。不过，只要我们有信心，相信那并不是一件难事。国家有责任发展体育，不只是派选手到雅典参加奥运，而且要积极争取二年一度的奥运在中国举行。”❷

同年8月，张伯苓被派往美国华盛顿参加世界第四次渔业大会。会后他带着关心体育的心情，顺道考察欧美教育。在伦敦，正赶上举办第4届奥运会，使他亲自感受了奥运会的盛况。回国后，在10月23日南开学校操场举行的“第6届天津学校联合运

---

❶ 指1906年的雅典奥运会，这是为庆祝奥运会十周年而举办的一届奥运会。这一传统没有延续下去，所以这届奥运会也没有被正式记入夏季奥运会的届次中。

❷ 当时人误把1906年的届间奥运会认为是正式奥运会，距1904年正好两年，距1908年又是两年，所以有此“二年一度”的说法。

动会”颁奖仪式上，学生们惊喜地通过发明不久的幻灯放映，看到了伦敦奥运会的盛况。在那一张张的幻灯片上，既记录有开幕式上各国选手高举本国国旗列队入场的情景，也记录有不同国籍运动员同场竞技的场面，还记录有一些人们从未见过的运动比赛项目。幻灯放映使目睹的学生兴奋不已，群情激奋。于是，他们自发地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奥林匹克专题演讲会。正是在这个演讲会上，有人不失时机地在演说中提出：我们应该派教练到各地去发掘人才，将来参加奥运会才是可行的，并最后提出了三个初始的中国奥运梦想：

中国何时才能派一位胜利选手参加奥运？

中国何时才能派一支胜利队伍参加奥运？

中国何时才能举办奥运，邀请世界各国的选手到北京参加比赛？

这是中国人的奥运梦想，也是中国人的奥运情结。从此以后，它不仅推动着中国人对奥林匹克运动的了解、认识和初步的尝试，而且也激发起中国人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通过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参与，借助于奥运会体育竞赛的舞台，让我们这个久经压迫和剥削的民族也能走向世界，享受民族平等的权利，这简直就成了当时中国人的政治呐喊。尽管当时的中国人可以说对奥林匹克运动这一西方文化的真正内涵还是知之甚少，甚至有着许多的误解，但它的那种最高表现形式——吸引各国选手平等地参加奥运会比赛活动的做法，却深深地吸引着我们这个民族的目光。所以，很快就在中国大地上吹起了一股“奥林匹克风”。这首先是 1910 年 10 月 18—22 日，在中国的南京尝试按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模式，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的第 1 届全国运动会。接着中国又与菲律宾和日本一起，于 1913 年发起并组织召开了远东运动会。特别是 1932 年，中国终于有了第一位运动选手角逐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实现了中国人的第一个奥运梦想；1936 年，中国又有了一支运动队伍走进了柏林奥运会，实现了中国人的第二个奥运梦想。而一百年后的今天，北京终于获得了 2008 年奥运会举办权，从而圆

了中国人的最后一个延续了百年的奥运梦。

三、最初的奥运会活动模仿

虽然早在奥林匹克运动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已有召开体育运动会的先例，而且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发现，我国最早举办的具有近代意义上的体育运动会，是1890年5月20日圣约翰大学召开的学校田径运动会，它被中国体育史学界公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体育运动会，但是像奥运会那样，带有综合性运动项目比赛形式的运动会，则是从1910年在南京召开的第1届全国运动会开始的。第1届全国运动会，也称“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人们之所以认为第1届全运会是中国人对奥运会活动的最初模仿，是因为：第一，由其竞赛组织的形式来看，已完全类似于奥运会。例如，它的参赛队是按照当时中国的一些地区划分而确定组建的，并规定了每个代表队在比赛中都应有自己的专色标志，以示区别。第二，在项目分组和成绩录取上也有比较规范的要求，如大会共设有田径、足球、篮球、网球4个大项，每个大项中又各自分成全国高等组、全国中等组和全国各学校联合组3个组别。成绩的录取则以前三名为限。虽然从比赛的内容设置和组织方法来看，我们还不能说这届全运会就完全和奥运会等同，但它确实与奥运会已相当地接近，体现出奥运会比赛的基本色彩。第三，在召开的时机选择上也有模仿的痕迹。现代奥运会从第2届到第4届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为了扩大奥运会在世界的影响，以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奥林匹克运动，其组织者都将召开的时机选择在和世界博览会一起进行。这就是为什么第2届奥运会开了167天、第3届奥运会开了145天、第4届奥运会开了187天，一个个都开成了马拉松式的奥运会的原因之一。近代中国的第1届全运会同样选择了在当时最有商业影响力的南京“南洋劝业会”会场（即今南京的玄武门附近）进行比赛。南洋劝业会，是我国清末规模最大的商业博览会。据说

它在开馆时曾由当时的审查总长杨士琦宣读圣旨，由两江总督张人骏致开幕词，非常隆重。当时从国内各省、各大商埠以及东南亚国家地区征集到的商业展品计有420类之多，开放展出的时间达6个月之久，吸引了大批的中外客商和游人。第1届全国运动会选择在这样一个大型的商展期间召开，无疑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力。

第六章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演变与发展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一般是指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产生在中国各族人民中的所有体育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的总和。它既包括已经成为历史的体育，失传了，尘封了；也包括尚在流行的体育，动态的，发展的。我们这里所介绍的当然是仍在流行的民族传统体育，它们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

第一节　传统娱乐体育的演变与发展

五千年文化的积淀，使中国的传统娱乐体育不仅种类丰富，而且活力四射。其中晚清时期仍在民间流行的就有棋戏、摔跤和溜冰等活动。

一、棋　戏

棋戏在我国的传统娱乐体育项目中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是个大家族。散落在我国各地民间的棋艺游戏可谓品种繁多、花样各异，诸如方棋、直棋、五子棋、梅花棋、粪缸棋、三子棋、炮棋、八仙棋、方格棋、弹子棋、银线棋、四围棋、九宫棋、连环马棋等等，多达数十种[1]。这里所介绍的主要是流传广泛的围棋和象棋。

[1] 麻国钧. 中华传统游戏大全. 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90：86.

(一) 围 棋

围棋在清代乾隆、嘉庆时期达到鼎盛，道光、咸丰、同治年间仍保留着盛行的趋势。其典型的表现是出现了“十八国手”之说。他们分别是僧秋航、申立功、金秋林、潘星鉴、任渭南、沈介之、董六泉、施省三、周星垣、李湛源、李昆瑜、黄晓江、程法堂、楚桐隐、陈子仙、周小松、赖秀山、张介轩等人。这些国手中被称为“老寿星”的僧秋航，为江苏仪征人，据说他活到120岁，在逝世前一日还与人对弈。十八国手中被认为最有骨气的是李湛源，他是江苏南通人，据说当时在京师生活的国手们与王公贵戚对弈时，总在暗中让一手，以博得对方的欢心。然而“李独耿介，不以利动其心”。因李的棋名大，在京的王公贵戚们为了求得清名，不惜金银财宝，想以重价贿之，求其让一二局而成名。李被缠得烦不过，只得敷衍许诺，但到了对局时却把对方杀得更惨。权贵们十分怄气，命人去责备他，他的回答是：“谁要你那些臭钱!”据说李晚年穷困潦倒，最后病死于破庙中。十八国手中最年轻的是浙江海宁人陈子仙，据说他12岁时即跻身国手行列，并获“第一国手”之誉。《尘见闻录》载：“围棋施范而后，以陈子仙为最著。子仙12岁，即以第一国手闻。盖历来国手中最称年少者也。”

晚清时期的围棋活动除十八国手之说以外，另一重要表现是出版了不少围棋方面的著作和围棋谱。如流传于世的就有王存善光绪二十一年刻本《寄青霞馆弈选》八卷、光绪二十三年刻本《寄青霞馆弈选续编》八卷和《寄青霞馆弈选再续编》二卷；有鲍鼎的《蜗篯弈录》，其中收有八种棋谱，分别为《围棋近谱》《晚香亭谱》《黄龙士全图》《弈括》《弈理指归续编》《国弈初刊》《国弈二刊》和《国弈三刊》；有邓元惠的《弈潜斋集谱初集》十册和《弈潜斋集谱二编》四册；有黄绍箕的《海昌二妙集》三卷；有周小松的《皖游弈粹》一卷、《餐菊斋棋评》一卷和《新旧棋谱汇

选》四卷。此外，还有楚桐隐、章芝楣的《合评潘景斋谱约选》一卷；董六泉的《董六泉选棋谱》一卷；徐耀文的《国朝弈汇》三卷和《稼书楼弈谱》一卷；王彦侗的《六家弈谱》六卷；刘子迎的《听秋轩弈谱》一卷；方梦园的《蜀山草堂弈存》一卷和《待月弈存》初编、二编、三编；陈子仙的《陈方七局》一卷；常棣华的《子仙百局》一卷等。

（二）象　棋

在清朝的乾隆、嘉庆年间，中国的象棋曾发展到全盛时期。就国手而言，有“江东八俊、河北三杰”之誉；就流派而言，有周廷梅的毗陵派、赵耕云的吴中派等；就棋谱而言，有四大排局名谱等。晚清时期，此等遗风不减，仍有不少显贵好于此道而影响民风。在溥仪《我的前半生》中有慈禧太后喜好象棋的记载：一次慈禧与太监下象棋，对弈时这个太监只顾棋盘上的局势，说奴才杀老祖宗的这只马。不意的一句棋语引来了杀身之祸。只见慈禧太后立刻恼羞成怒，对着太监吼道，那么我就杀你一家子。这个太监就这样平白无故地被杀害了。

在李伯元的《南亭笔记》中则记录有红顶商人胡雪岩以仕女代为棋子的象棋活动。说胡雪岩有妾 36 人，“当使诸妾女，衣红蓝比甲，上书车、马、炮”。“有一台高盈丈，画为方罫，诸妾遥遥对峙。胡与夫人据栏杆上，以竿指麾之。谓之下活棋。”[1] 当然，胡雪岩的这种下活棋虽“别开生面，饶有创新”，但却是封建地主官僚荒淫无耻生活的自我曝光。

晚清时期亦有不少的象棋棋谱传世。最为有名的是浙江余姚人吴梅圣的《梅花谱》一卷和江苏镇江满族人巴吉人的《反梅花谱》。这是晚清时期两大高水平的象棋全局谱，堪称双璧，代表着晚清象棋艺术的最高成就。《梅花谱》，又名《象棋让先秘谱》，

[1] 张如安. 中国象棋史. 北京：团结出版社，1991：358.

或称《小梅花》。全谱五局四十九变，均为让先屏风马破当头炮局。原仅靠手抄流传，直到1929年才通过钱梦吾的努力而在《天津商报》发表，并印成单行本传世。《反梅花谱》出自巴吉人的心得著作《象棋梅花心法谱》，因后人由其抄录的八局中有破《梅花谱》中的屏风马之局，遂改名为《反梅花谱》。《反梅花谱》强调了当头炮的实战威力，集中反映了“以炮制马”的思想，共有六种不同阵势。晚清流传于世的象棋谱还有于国柱的《烂柯神机》一卷，傅佐廷的《棋谱秘录》三卷，姑苏来青阁云记造《烂柯真机》一册，四川李少斋《胜券秘》一册，顾舜臣《象棋新谱》一册，杭州孟尝门客所辑《蕉竹斋》象棋谱一本，无名氏的《新增神妙变化象棋谱》上、下二集，无名氏《效古子象棋谱》上、下二册等等。

二、摔 跤

摔跤在清朝时期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曾建有专门的摔跤专业队，称为“善扑营”。咸丰、同治年间，这种形式继续存在，所以同样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摔跤手，如大祥子、钩子术、倒跤虎等名家。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有一段对大祥子的介绍：其人“身体格外魁梧，且臂力特大。”“当恭邸与英、法各国议约之际，特偕此公前往，以备不虞。后以功渐至记名副都统。”在同治以后到光绪年间，著名的摔跤手还有二双子、德顺、蔡福子等人。

晚清的摔跤，在民间也非常流行，而且不同的民族保留有不同风格的摔跤形式，由此构成了一幅中华民族的摔跤彩绘。

（一）蒙古族摔跤

在蒙古族中间，摔跤和赛马、射箭一起，被称为“男儿三项游艺”。说明摔跤在蒙古族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蒙古族摔跤要求

参赛的选手成偶数，多时可达上千人。“贯跤者，分东西列，二人跃出场，抗空拳相持搏”（《新疆礼俗志》）。比赛采用单淘汰制，无时间限制。每次赛前，按习俗先推一长者对参赛人员进行编排和配对。比赛时，摔跤手身穿摔跤服，在摔跤歌中跳着狮舞步或鹰舞步出场。裁判员发令后双方握手致敬，然后互相抱摔。抱摔时只允许抓住对方的上衣、腰带，而不能抱腿或抓裤子。以膝盖以上任何部位着地者为负。所以《清稗类钞·技勇类》载：蒙古族摔跤“必须将负者按捺于地，其负者不能挣扎再起，乃分胜负”。并要求“胜者扶负人起”。“连胜十人者为上，以次至五等。”获胜的前三名为重奖者，往往奖以好马。

（二）朝鲜族摔跤

朝鲜族摔跤有三千多年的历史。18 世纪的《京都杂志》中，介绍了朝鲜族摔跤有内勾、外勾、箍脖等多种技巧。这些技巧流传到其他国家后，称为“高丽技”。在朝鲜族那里，平时在沙滩、地头，甚至打谷场上，都能看到他们的摔跤表演。而每逢端午节、中秋节，更是朝鲜族人摔跤比赛的节日。来自四方的摔跤手云集一起，争标夺魁。人们常选一头肥壮的黄牛作为奖品，以奖给摔跤的优胜者。朝鲜族摔跤的最大特点是使用腿绳。腿绳用长 3 米的麻布或白布做成，以 90 厘米围在腰际，然后有伸缩性地缠在右侧大腿上。腰带用的是约 1.5 米长的带子。比赛时双方蹲着身躯，略向前倾，右膝着地，左膝弯曲，足掌轻扣地面。搂着对方右肩，各用右手抓住对方的腰带，左手抓住对方的腿绳。随着裁判员的一声令下，双方同时起身用力。比赛中不许扭对方的脖子和胳膊，不许用头部或拳头伤及对方。经过多局较量后，获胜者牵着黄牛在锣鼓声中绕场一周。

（三）彝族摔跤

彝族是游牧民族的后裔，摔跤也是他们的传统体育活动。相传

远古时代，有一家兄弟三人上山放牧牛羊，看到牛羊打架很是有趣，便学着样子摔起来，三人玩得高兴，而且牛羊也养得肥壮，于是别的人家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摔起跤来，从此形成传统。每逢彝族火把节或彝历年，摔跤是必须有的内容。彝族摔跤有自己的独特方式，例如在四川越西、喜德一带，人们曾将其摔跤动作归纳为下绊式：将对手的重心移动后，用脚或膝别住对方，使其失去重心而被摔倒。挑式：在双方移动的过程中，抓住有利时机将对手抱在空中，用膝或腰胯的扭转，将对方猛摔在地。缠腿式：用肩将对方抵紧，用腿将对方的腿紧紧缠住，使对方被迫失去重心而倒地。过胸摔：在移动中突然用力将对方抱住，自己后倒，扭身将对方摔倒。在云南滇中、滇南彝族中则有一种摔跤类似于国际的自由式摔跤，其形式为裸上身，着长裤或短裤，系腰带，可用脚绊，以双肩着地分胜负。在滇西北、滇东北地区彝族中流行的是预备式摔跤，比赛时双方先相互抱住对方的腰或抓住对方的腰带，一手从对方肩上一手从对方胁下穿过斜抱于背后作预备姿势后才开始比赛。比赛中可用脚绊，也有的不用脚绊，多数以将对方摔倒在地为胜。有的则是以将对方抱起扔出场外为胜。最后以三战两胜为赢。彝族摔跤一般不搞决赛，能连续战胜两个以上对手的就可得奖。

在中华各民族的摔跤活动中，还有羌族的摔跤，这种摔法有两种：一是双方交叉抱住对方的腰带，用力把对方摔倒。这种摔法不得用脚踢、脚绊，以连续3次将对方摔倒者为胜。二是称为抱花肩的摔法，即双方互相抱住肩膀，以脚将对方绊倒者为胜。在哈萨克族中，还流行一种马上摔跤。其比赛双方都骑在马上，等裁判员发令后，两马相接，双方展开激烈搏斗，但不允许拉扯对方衣服或用拳头击打对方。以把对方摔下马或把对方抱至自己马上者为胜。

三、溜　冰

在中国北方，一些民族长期生活在冰天雪地的寒冷地区，因此逐渐形成了一些冰上游戏活动。清代满族人入关以后，更是将他们的冰上游戏发扬光大。进入晚清社会以后，尽管皇家组织的这种溜冰庆典活动越来越少，但民间的溜冰活动依然活跃，如《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说："十一月，看各处滑冰。如城内什刹海及外各濠皆有之。"这是对北京城中溜冰活动的记载。

成书于1884年的《津门杂记》中还有对当时津沽一带民间所流行的"跑冰"情况的记载："有所谓跑凌鞋者，履下包以滑铁，游行冰上为戏。两足如飞，缓疾自然，纵横如意，不致倾跌。寓津洋人，亦乐为之。借以舒畅气血。"告诉人们不仅天津的民众喜爱这种冰上游戏，即使在天津的洋人也乐于此道。原因只有一个，有利于健康。所以我们读到了这样的诗篇："往来冰上走如风，鞋底钢条制造工，跌倒人前成一笑，头南脚北手西东。"[1]

溜冰在满族青少年中尤其流行，他们对溜冰也叫打赤溜冰，或曰滑自溜。一到冬季结冰的季节，他们就会利用天然的水池、河面或自行泼浇的冰道进行溜冰活动。

第二节　传统养生体育的演变与发展

养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保健长寿。在五千年的华夏文明中，养生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中国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文化特色的养生体育。晚清时期的中国养生体育，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条件下而不断对传统进行继承和发展的。

[1] 李静山增补都门杂咏．咏冰戏．1872.

一、导引养生的演变与发展

导引一词，具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的导引包含肢体活动、呼吸运动和按摩等多种锻炼形式，所以《抱朴子》中写道："或伸屈、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或踯躅、或徐步、或吟、或息，皆导引也。"狭义的导引就是指肢体活动，亦如唐人王冰所云："导引，谓摇筋骨、动支节。"晚清时期的导引养生主要是对传统《五禽戏》《八段锦》和《易筋经》的继承与发展。

《五禽戏》最早为华佗所创编，但其原来设计的动作未能流传下来。明代开始出现了由后人重新创编和改造的《五禽戏》。以下是刊行于道光十二年（1832 年）《万寿仙书》中的五禽戏法。虎形：闭气，低头，捻拳，战如虎发威势。两手如提千斤，轻轻起来莫放气。平身吞气人腹，使神气上而复下，觉腹内如雷鸣。或七次。如此运动，一身气脉调和，百病不生。熊形：如熊身侧起，左右摆脚，前后立定，使气两胁旁，骨节皆响。亦能动腰力，除肿。或三五次止。能舒筋骨而安神，此乃养血之术也。鹿形：闭气，低头，捻拳，如鹿转头顾尾。平身缩肩立，脚尖跳跃，跟连天柱，通身皆动。或三次，每日一次也可，如下床作一次更妙。猿形：闭气，如猿爬树。一只手如捻果，一只脚抬起，一脚跟转身，更运神气，吞入腹内，觉有汗出，方可罢。鸟形：闭气，如鸟飞头起，吸尾闾气朝顶，虚双手躬前，头腰仰起，迎神破顶。

与传说中的华佗五禽戏相比，晚清时期的发展变化更多地表现为：一是动作难度的降低，似乎更适合老年人研习；二是动作过程中增加了对呼吸方面的要求，加强了意念方面的锻炼作用。

《八段锦》是一套由八节动作编排而成的导引术势。八段锦之名最早见于洪迈的《夷坚志》：政和七年，起居郎李似矩"尝于夜半起身，嘘吸按摩，行所谓八段锦者"，并称之为"长生安乐法"。但其详细练习方法不清楚。到了南宋人曾慥所辑的《道枢》中，

始有较为具体的八段锦动作要领。宋代的八段锦练习，有文武之分。其“武八段”采用的是立式姿势；其“文八段”采用的是坐式姿势。到了明代，八段锦又出现了南派和北派的不同，南派的练习保持了传统的坐式和立式，北派则通常采取骑马式而使练习的难度增加。

晚清时期的八段锦主要继承了南派的坐式风格，并演变成了十二段锦。所以《内功图说》云：此导引功法，“旧名八段锦”。具体内容如下。第一段：闭目冥心坐，握固静思神。动作要求：盘腿而坐，紧闭双目，冥亡心中杂念。凡坐要竖起脊梁，腰不可软弱，身不可倚靠。握固者，握手牢固，可以闭关却邪也。静思者，静息思虑而存神也。第二段：叩齿三十六，两手抱毗仑。动作要求：上下牙齿相叩作响，宜三十六声。叩齿以集身内之神，使不散也。毗仑即头。以两手十指相叉，抱住后颈，即用两手掌紧掩耳门，暗记鼻息九次，微微呼吸，不宜有声。第三段：左右鸣天鼓，二十四度闻。动作要求：记算鼻息出入各九次毕，即放所叉之手，移两手掌按耳，以第二指叠在中指上，作力放下第二指，重弹脑后，要如击鼓之声。左右各二十四度，两手同弹共四十八声。仍放手握固。第四段：微摆撼天柱。动作要求：天柱即后颈。低头扭颈，向左右侧视，肩亦随之左右招摆，各二十四度。第五段：赤龙搅水津，鼓漱三十六，神水满口匀，一口分三咽，龙行虎自奔。动作要求：赤龙即舌。以舌顶上腭，又搅满口内上下两旁，使水津自生，鼓漱于口中三十六次。神水即津液。分作三次，要汩汩有声吞下。心暗想，目暗看，所吞津液直送至脐下丹田。龙即津，虎即气。津下去，气自随之。第六段：闭气搓手热，背摩后精门。动作要求：以鼻吸气，闭之。用两手相搓擦极热，急分两手摩后腰上两边，一面徐徐放气，从鼻出。精门即后腰两边软处，以两手摩二十六遍。仍放手握固。第七段：尽此一口气，想火烧脐轮。动作要求：闭口鼻之气，以心暗想，运心头之火，下烧丹田，觉似有热。仍放气，从鼻出。脐轮即脐丹田。第八段：左右辘轳转。动作要求：

曲弯两手，先以左手连肩圆转三十六次，如绞车一般。右手亦如之。此单转辘轳法。第九段：两脚放舒伸，叉手双虚托。动作要求：放所盘两脚，平伸向前，两手指相叉，后掌向上，先安所叉之手于头顶，作力上托。要如重石在手，托上，腰身俱着力上耸。手托上一次，又放下，安手头顶。又托上。共九次。第十段：低头攀足频。动作要求：以两手向所伸两脚底作力攀之，头低如礼拜状，十二次。仍收足盘坐，收手握固。第十一段：以候神水至，再漱再吞津，如此三度毕，神水九次吞，咽下汩汩响，百脉自调匀。动作要求：再用舌搅口内，以候神水满口，再鼓漱三十六，连前一度。此再两度，共三度毕。前一度作三次吞，此两度作六次吞，共九次吞。如前，咽下要汩汩响声。咽津三度，百脉自周遍调匀。第十二段：河车搬运毕，想发火烧身，旧名八段锦，子后午前行，勤行无间断，万疾化为尘。动作要求：心想脐下丹田中，似有热气如火，闭气如忍大便状，将热气运至谷道，即大便处，升上腰间、背脊、后颈、脑后、头顶止。又闭气从额上、两太阳、耳根前、两面颊，降至喉、下心窝、肚脐、下丹田止。想是发火烧，通身皆热。

光绪初年，又有无名氏将宋代的立式八段锦改造成以下的练习口诀，使其文意更加通达，动作也更加简便易行：两手托天理三焦，左右开弓似射雕。调理脾胃单举手，五劳七伤往后瞧。横拳怒目增气力，两手摩足固肾腰。摇头摆尾去心火，背后七颠百病消。

《易筋经》始见于明天启四年的一种手抄本。易，是改变的意思；筋，是指筋骨肌肉；经，是方法。易筋经，也就是指改变筋骨肌肉的方法。在晚清的《内功图说》中，载有完整的《易筋经》图文十二势。现抄录于下。

韦驮献杵第一势：立身期正直，环拱手当胸。气定神皆敛，心澄貌亦恭。韦驮献杵第二势：掌托天门目上观，足尖着地立身端。力周腿胁浑如植，咬紧牙关不放宽。舌可生津将腭抵，鼻能调息觉心安。两拳缓缓收回处，用力还将挟重看。韦驮献杵第三

势：足指柱地，两手平开。心平气静，目瞪口呆。摘星换斗势：只手擎天掌覆头，更从掌内注双眸。鼻端吸气频调息，用力收回左右侔。出爪亮翅势：挺身兼怒目，推手向当前。用力收回处，功须七次全。倒拽九牛尾势：两腿后伸前屈，小腹运气空松。用力在于两膀，观拳须注双瞳。九鬼拔马刀势：侧首弯肱，抱顶及颈。自头收回，弗嫌力猛。左右相轮，身直气静。三盘落地势：上腭紧撑舌，张眸意注牙。足开蹲似踞，手按猛如拿。两掌翻齐起，千斤重有加。瞪睛兼闭口，起立足无斜。青龙探爪势：青龙探爪，左从右出。修士效之，掌平气实。力周肩背，围收过膝。两目注平，息调心谧。卧虎扑食势：两足分蹲身似倾，屈伸左右腿相更。昂头胸作探前势，偃背腰还似以砥平。鼻息调无均出入，指尖着地赖支撑。降龙伏虎神仙事，学得真形也卫生。打躬势：两手持脑，垂腰至膝间。头唯探胯下，口更啮牙关。掩耳聪教塞，调元气自闲。舌尖还抵腭，力在肘双弯。掉尾势：膝直膀伸，推手自地。瞪目昂头，凝神一志。起而顿足，二十一次。左右伸肱，以七为志。更作坐功，盘膝垂眦。口注于心，息调于鼻。定静乃起，厥功维备。

二、行气养生的演变与发展

行气，也称吐纳术，现代人称之为静气功。它是一种以呼吸运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锻炼方式。晚清时期的行气养生首先表现为人们对呼吸运动有一种较为清晰的大众化理解。比如就行气的呼吸形式而言，人们提出了三个关键词：息、呼吸、吐纳。何为息？鼻气一出一入谓之息。何谓呼吸？气出谓之呼，一则动天干；气入谓之吸，一则动地支。何谓吐纳？吐从口出，纳从鼻入；吐唯细细，纳则绵丝。

就行气的呼吸行为而言，人们提出了十六字妙诀："一吸便提，气气归脐；一提便咽，水火相见"。对于这十六字妙诀，席裕

康在其《内外功图说辑要》中有一段具体的解说：右十六字仙气，名曰十六锭金。乃至简至易之妙诀。无分于在官，不妨政事；在俗，不妨家务；在士商，不妨本业。只于二六时中，略得空闲及行、住、坐、卧，意一到处，便可行之。口中先须嗽及三五次，舌搅上下腭，仍以舌抵上腭，满口津生，连津咽下，汩然有声。随于鼻中吸清气一口，以意会及心目寂地，直送至腹脐下一寸二分丹田元海之中，略存一存，谓之一吸。随用下部轻轻如忍便状，以意力提起使归脐，连及夹脊双关肾门，一路提上直至后顶玉枕关，透入泥丸顶内，其升而上之，亦不觉气之上出，谓之一呼。一呼一吸，谓之一息。气既上升，随又似前，汩然有声咽下，鼻吸清气送至丹田，稍存一存，又自下部如前，轻轻提上与脐相接而上，所谓气气归脐，寿与天齐矣。凡咽下，口中有液愈妙，无液亦要汩然有声咽之。如是一咽一提，或三五口，或七九，或二十四口。要行即行，要止即止。只要不忘作为正事，不使间断，方为精进。如有疯疾，见效尤速。久久行之，却病延年。形体变，百疾不作。自然不饥不渴安健胜常。行之一年，永绝感冒等疾，耳聪目明，心力强记，宿疾俱瘳，长生可望。由此可见，行气养生的妙处旨在于一种呼吸与意念活动的组合。

晚清时期的行气养生在其具体功法上广为流传的主要有“六气歌诀”“闭气歌诀”和“布气歌诀”等等。所谓六气歌诀，是由呵、呼、呬、嘘、吹、嘻六个字组成的呼吸方法。其歌云：呵属心王，主其舌，口中干涩，身烦热，量疾深浅以呵之，焦腑疾病自消灭；呼为脾神，主其土，烦热气胀腹如鼓，四肢壅闷气难，呼而理之腹如故；呬法最灵应须秘，外属鼻根内关肺，寒热劳闷及疮肤，以斯吐纳无不济；嘘为肝神主其目，赤翳昏昏泪如哭，都缘肝热气上冲，嘘而理病更神速；吹属肾脏主其耳，腰膝冷多阳道痿，微微纵气以吹之，不用外边求药饵；嘻属三焦有疾起，三焦所有不和气，不和之气损三焦，但使嘻嘻而自理。

闭气歌诀的口诀是：忽然身染疾，非理有损伤。敛意归闲室，

脱身卧木床。仰眠兼握固，叩齿与焚香。三十六咽足，丹田气越常。随心连引到，损处最为良。汗出以为度，省求广利方。

布气歌诀，是一种行气疗法。其口诀为：修道久专精，身中胎息成。他人凡有疾，脏腑审知名。患儿向王气，澄心意不轻。传真气令咽，使纳数连并。作念令其损，顿能遣患情。思神自逃遁，病得解缠萦[1]。

这种关于行气方面的锻炼方式，在《内功图说》的“分行外功诀”中同样亦有介绍：“每日于暇时，不必拘定子午，择一片刻之闲，使心静神间。盘足坐定，宽解衣带，平直其身，两手握固，闭目合口，精专一念，两目内视，叩齿三十六声，以舌抵上腭，待津生时，鼓嗽满口，汩汩咽下。以目内视，直送至脐下一寸一分丹田之中。再以心想目视丹田之中，仿佛如有热气，轻轻如忍大便之状，将热气运至尾闾，升至肾关，从夹脊双关升至天柱，从玉枕升泥丸，少停，即以舌抵上腭，复从神庭降下鹊桥、重楼、绛宫、脐轮、气穴、丹田。”

三、静坐养生的演变与发展

静坐养生，在中国亦有着久远的历史，关于晚清时期的静坐养生，贡献较大的是江苏无锡人丁福保。他曾整理过许多古代文化典籍，如《静坐法精义》《佛学大辞典》《说文解字诂林》等名著，其中《静坐法精义》一书，对流传于晚清的静坐养生有较为全面的介绍。

比如有人问道：到底何为静坐之法，应该怎样进行？书中的解答是：释道元之坐禅仪日，学般若菩萨，当起大悲心，发弘誓愿，精修三昧，广度众生，不为一身独求解脱。尔乃放舍诸缘，休息万事。身心一如，动情无间，量其饮食，不多不少。调其睡

[1] 席裕康. 内外功图说辑要.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305-307.

眠，不节不恣。结跏趺坐，先以左足按右腿上，右足按左腿上；或半跏趺，或以左足压右足，皆可。次以左掌按右掌上，以两大拇指面相拄。徐徐举身，良久。复左右摇振，乃正身端坐。不得左倾右侧，前躬后仰。令腰脊头项，骨节相拄，状如浮图。令耳与肩对，鼻与脐对，舌拄上腭，唇齿相着。目须微开，免至昏睡。身相既定，气息既调，宽放脐腹。一切善恶，都莫思量。念起即觉，觉之即无。久久忘缘，自成一片。若得此意，自然四大轻爽，所谓安乐法门也。

又如有人问道：为什么一定要结跏趺坐？书中的回答是：诸坐法中，结跏趺坐最安稳，不疲极。此是坐禅人坐法。摄持手足，心亦不散。所以有诗云：若结跏趺坐，身安入三昧。威德人敬仰，如日照天下。除睡懒覆心，身轻不疲懈。觉悟亦轻便，安坐如龙蟠。见画跏趺坐，魔王亦愁怖。何况入道人，安坐不倾动。

又有人问道：静坐时的缘中是什么意思？书中亦有明确的答复：佛氏所言之缘中，道家则谓之中黄，即两目齐平处之中间也。智者大师小止观曰：尔时当系念鼻端，令心住在缘中，无分散意。又曰：觉心志散慢，身奸逶迤，或口中涎流，或时有闇晦，尔时应当敛身急念，令心住缘中。身体相持，以此为治。又，道藏续编中之太一金华宗旨曰：止观是佛法，原不秘的。以两目谛观鼻端，正身安坐，系心缘中。道言中黄，佛言缘中，一也。不心言头中，初学但于两目中间齐平外系念便了。光是活泼泼的东西，系念眼之齐平处，光自然透入。不必着一念于中黄也。此数语已括尽要旨。其余入静出静前后，以小止观书印证可也。又曰：缘中二字妙极。中无不在，遍大千皆在里许，聊指造化之机，缘此入门耳。缘此为端倪，非有定着也。此一字之义，活甚妙甚。

还有人问道：静坐时一定要学习运气循环的方法吗？书中的解答是：静坐时以此心注于两眉间，此为古来口口相传之秘诀，学者不可不习。释道两家皆如此说法。所以书中认为，如欲作道家弟子者，必学运气循环之法。如欲归入佛家者，则不必学此循环法也。

因为作者本人的体会是：余学佛有年，故于此循环法，虽知之详而未尝实行也。

第三节　传统练武体育的演变与发展

练武体育诞生于古老的军事活动。所以在西周奴隶社会时期，春搜、夏苗、秋狝、冬狩的田猎活动，是与军旅的训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普遍开展的武装长跑活动，其主旨是为了提高军队机动作战的能力。但是随着一些短兵器军事作用力的下降，舞刀弄剑逐渐增加了健身和娱乐的色彩。所以，亦武亦体成了传统练武体育的重要特色，也是传统练武体育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进入晚清社会以后，虽然中国人面对的是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但传统的练武活动仍有着广泛的市场。

一、武艺的开展

首先是官方控制下的武艺活动的开展。主要表现在武科考试和旧式军队的训练上，以及学校教育中的武艺要求。

晚清时期仍然沿用封建的武举制度，以选拔武艺人才。考试级别分童试、乡试、会试三种。考试形式分技能考试和理论知识考试，共通过三场考试来进行。第一场为试射，分马射与步射两种。第二场考开弓，弓为硬弓，拉硬弓以试臂力；考舞刀，要求能挥舞80到120斤重的大刀；考掇石，即举重物。第三场为古代军事理论知识考试。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开始，便有大臣们建议将原有武科技能考试中的弓、矢、刀、石废除，而以考试枪炮取代。但未获批准。其理由是：“武科改试枪炮，原为因时制宜起见，唯科举之设，无非为士子进身之阶。至于训练操防，尤以营伍学堂为辅才之根本，所有武场童试及乡会

试，均着仍照旧制，用马步箭弓刀石等项，分别考试。”（《德宗实录》卷430，2页）所以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朝政府才在会试中将原有武科考试中的弓、矢、刀、石技能，换成了枪炮操练形式[1]。

清朝的军队原为“八旗”和“绿营”，这些军队的训练，主要内容就是传统的骑射和“弓刀石技勇”之类。鸦片战争后，虽然有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等新式军队的兴起，但传统的武艺训练在军队中仍占有很大的比重。例如曾国藩的湘军中，始终讲求“束伍技击”之法，并要求朝夕训练。在淮军中，葛士达曾极力主张教步卒习射，配备毒兵、腰刀，与火器配合。对于马队训练，也是专习弓矢，间以长矛，加以马刀。他还创编了一大套习练长矛办法的技术。又有办理东三省练兵事宜的定安，也主张在新式军队的操练中添练传统的“五行八卦阵式”，“令与洋枪队相辅而行并加以演刀矛藤牌杂技，击刺纵跳，以尽步队之长”[2]。又如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中，在一次校阅“参用西法”训练的军队活动时，亦特别提出要阅视御前大臣们的马步射。

清军中的武艺训练，除了内容繁多庞杂以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结合实战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基本功训练。在清人王鑫之的《练勇刍言》中，专门讨论有军队武艺训练的十种基本功法：一为练目法。王鑫之说：目贵明而活。操习时就如贼在眼前，我这一下杀他某处，定要杀中他某处。这双眼上顾下顾左顾右顾，总要常跟着锋尖，有一点痴呆就不中用了。因此他介绍的练习方法有：平时洗面时，睁开眼睛，用手捧水浇之；也可用指头当做刀尖看，对眼乱射；或将一个指头指着上眼边或向下指，眼即随之上下顾。习之既久，则自然活泼而不闭。二为练耳法。操习时用心听金鼓号炮之属，一丝毫也不错乱，于哨长、什长及本队长人讲话做声，听得

[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 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13.

[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578.

极，虽咳嗽一声也晓得是某人，庶临阵不乱，夜间尤宜。三为练口法。营中最宜肃静，无论不当做声的决不可做声。可闻喇叭天鹅声，大呼枝贼，喇叭歇即须闭口，不得任我乱声。四为练手法。手贵劲而活。平时习武艺的军器，较临随时略重，且常习刀石之类，则力自长。而于习时运得极灵，随来随应，即格即杀，一下有无数妙用，一下有无穷变化，手法乃为绝高。五为练足法。足贵捷而稳。沙袋系足，行路睡卧，均不可一刻解开。开始每足上只系六两，过五日加二两，又五日加二两，加至一斤，行走跳动如常，则临阵解开，自极轻快。又脚所站处要如钉铁柱一般。六为练身法。身贵硬健而轻活。腰要扎得极紧，头、项、肩、膊等均要极紧而又极活。平日身上要放些物件，临阵解开，则身更轻快无比。七为练心法。练心要练得极稳极静，无丝毫忙乱躁暴，方为有用。八为练胆法。胆贵壮，其练之也，以心为主，此心见得理明，则气自雄，胆自壮。九为练气法。气必能养，而后能用，尤必能善养而后发之不可遏。兵家言：静如立山，动如河决；静如处女，动如脱兔。所谓静者，即养之时；所谓动者，即用之时。静如山立、处女者，即善养之谓；动如河决、脱兔者，即发不可遏之谓。然气有大养、小养之分。小养者，平日无事时常纳气归于丹田，从容呼吸，虽急用力、极快走，不强闭气，亦不使其乱喘习。大养者，平日处事待人极当，忍气即是养气。十为练精神法。神足而后气旺，精足而后力强。故时常必提撕振奋，勤习武艺，谨守营规，时时鼓舞，以打仗为事。不可久坐，不可贪睡，令其疲痿。诚以精神愈用愈出，不妄用固是练，常用之亦是练也。

晚清的学校教育中，亦有武艺方面的要求，特别是对八旗子弟的教育，在形式上仍较为注重骑射。规定凡满人读书考试，文科的举人、进士，也必须会骑射才能被录取。皇亲国戚的子弟也是自小习练骑射，如同治皇帝就曾就学于大武术家王书本先生。所以同治帝掌握政权以后，在宫内专门设有“杆子库”，以传习武艺。杆子库即武技场，因重视大杆教育故名杆子库。在杆子库的教育中，亦

有民间子弟从学，一批常有二三百人之多。晚清时的王义本、庞万春等武术名家，据说都是从杆子库教育出来的。杆子库教育一直延续到光绪初年才逐渐废除。此外，由于同治皇帝本人酷爱武艺，尤善摔跤，因此他还常迫使小太监们和他一起摔跤，以供其玩要取乐。当时的宫中仍设有“善扑营”。善扑营主要以练习“相扑（摔跤）、勇射（拉硬弓）、骗马（骑术）”等为内容。其中摔跤主要供统治者玩赏，有的摔跤者充当护卫等等。

其次是农民革命斗争中的习武活动。晚清时期的农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大大小小有数十次之多，著名的就有太平天国运动、小刀会、捻军起义、义和团。其革命性质也是多重的，既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斗争，也有和封建统治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但是，不管在哪种性质的农民革命斗争中，武艺均发挥了重要的战斗作用，是重要的斗争武器。例如发生在1841年的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这是中国人民反帝运动的先声。在这次斗争中，许多石工、丝织工以及其他行业的工人，都组织有武馆。工余时间常请武术老师到馆中教授武艺。打仗时，工人们举起三星队旗，从武馆中取出大刀、长矛等武器，雄赳赳地开赴战场，与农民兄弟并肩战斗。在农民军中，则有两位精通武艺的著名首领颜浩长和韦绍光：颜浩长身体魁梧，目光炯炯，人们称他为“定拳长”；韦绍光高大有力，善拳术，曾在村里的武馆中与乡人练习武艺。另有一对擅长武艺的农民夫妇，丈夫周春是一位义军的领导人，常穿铁锁作屐练功；妻子阿凤则善使“飞铊”，人称“飞铊凤”，又惯舞双刀，刀法称“双飞蝴蝶”，亦称“草上飞”。此种刀法曾流传于沙亭冈。周氏夫妇并肩作战，后来加入了太平天国革命军。

在太平天国队伍中，武艺训练一直是重要的内容。还在金田起义之前，利用宗教联络起义农民的革命组织“拜上帝会”的会众，就在一些地方设立“大馆”，作为宣讲革命道理和打拳习武、操练兵马的场所。之后在平南花洲又修筑了许多营盘，并修建了一个“上帝坪”，专作练武之用。各地会众到金田村“团营”（集中编制

营伍）后，由著名将领杨秀清等人负责操练。

金田起义后，太平天国对于操练武艺更有明文规定："凡各衙各馆兄弟，在馆无事，除练习天情外，俱要磨洗刀矛，操练武艺，以备临阵杀妖，不得偷安。"❶ 所以，太平天国的武艺训练有着各种各样的内容和各种各样的方法，如杨秀清为提高部队机动作战的能力，曾要求军队跟着他的马跑，认为谁能跑在他的马前头，就算是好兵。太平天国军队中练习跑步能力的另一种方法是：以大旗数面，各领一队，牵线急趋，以捷疾不脱落为合式。太平军中还有一种赤脚进行负重跑步的方法：当脚上打泡，"则以刀破之，血出如缕，翌日仍督以走，血淋淋不止。既而皮又结，则再割之。如是三五次。血尽皮坚，胜于草履，而举步如飞矣。"虽马队亦难追及❷。登山训练也是太平军的武艺科目，方法是"立标于高山绝顶，悬金钱于上，令其下驰走夺标，能由平地直走至巅不喘息者，得上赏。"❸ 正是这些训练，大大地提高了太平军的战斗力，使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太平天国的军队是"以人众为技，以敢死为技，以能耐劳苦、忍饥渴为技，其打仗亦有熟习之技。"❹

太平天国队伍中更有许多膂力过人、精通武艺的著名将领，他们身先士卒，英勇善战，具有极高的威信，如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丞相曾天养等人的高强武艺，都是著称当时的。特别是英王陈玉成，这位太平天国后期的青年杰出将领，自幼习武，14 岁参加太平军，因其骁勇善战长于指挥而屡建奇功，又以"杀回马枪"而驰名，在战场上常化被动为主动，克敌制胜，23 岁时被封为英王，在太平军和劳动人民中极受爱戴。

太平天国队伍中的女兵训练亦有很多武艺的内容。"八百女兵都

---

❶ 吴兴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卷七．上海：文明书局，1932：4.

❷ 潘钟瑞．苏台麋鹿记：卷上//太平天国（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281.

❸ 朱用孚．摩盾余谈//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第 1 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102.

❹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五//太平天国（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159.

赤脚，蛮衿扎裤走如风”，这便是太平天国女军的写照。女军中曾涌现出不少能征惯战的将士，如洪宣娇和苏三娘，都是威震敌胆的女将。洪宣娇是洪秀全的妹妹，武艺高强，常在战斗中“解衣纵马，出入清军，刀术妙速，一军骇目。”在江口牛排岭战斗中，她率领女军勇猛杀敌，取得胜利。所以在广西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民谣：妇女去跟洪宣娇，会打火炮会耍刀；牛排岭前大摆阵，杀得清兵跑断腰。苏三娘，也是勇悍异常，“侠声遍八桂”。在每次战斗中，她总是一马当先，挥戈杀敌，往往以少胜多，大败清军。曾有诗赞曰：路人争看苏三娘，灵山儿女好身手。两臂曾经百余战，一枪不落千人后。两百健儿听驱遣，万千狐鼠纷藏逃[1]。太平军中还有一位名叫杨二姑的女将，也是每逢战斗，“辄以黄巾裹头，大红战裙，与其夫并辔而出，冲锋陷阵，人莫能敌。又能于马上刺人，百发百中，中者莫不立倒。刀长七寸，锋利无比。每临阵，胸前垂一革囊，囊中累累者，皆利刃也。自称飞刀神手”[2]。

武艺还是太平天国对人才进行培养和选拔的重要内容。在天国所设立的各级考试制度中，武考的内容就包括马射、步射、开弓、舞刀、举石等传统武艺活动。考试合格者被分别授予艺士、英士、毅士、猛士以及武状元等称号。而且这种考试是“不论门第出身”的，体现了农民革命的平等思想。

1900年爆发的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是以农民和破产失业的城乡居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组织的最初结社就是依靠武艺活动来维系的，所以义和团原名义和拳。它是以民间流行的操演拳术的结社和信奉白莲教的群众为基础，而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民间革命组织。义和团运动的特点是：以练习拳棒为由，组织和武装群众，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

[1] 三结合编写组. 太平天国金田起义.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45.

[2] 吴兴凌善清. 太平天国野史：卷20. 上海：文明书局，1932：45.

义和团运动期间，山东、直隶等地曾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练武热潮。如在河北一带流传的民谣唱道：大师姐，二师姐，耍起刀，快如飞。这是对女性练武的描述。又有描写实战练武活动的："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逮着洋毛子（指外国侵略者），砍个脖子齐。"有描述刀术的：刀随身转，掌上拳上，越快越好，不要迟延[1]。

当时的北京城内，设坛八百余所，参加义和团的群众达到10万人左右。在景山后面的宫墙下，每天都有大批青少年操练拳术枪棒，且"无论士农工商，以至各行贸易之人，无不愿学"。经师传授，"立即武艺精通，身体灵爽，并刀枪锤械，各项技艺娴熟。各巷设立拳厂者，不胜枚举。"[2] 义和团练习拳法一般以25人为一团，每团设一团首负责。在佐原笃介等人编辑的《拳事杂记》中，介绍有少年拳民操演武艺的具体情况：作拳势之后，便往来舞蹈，或持竹竿秫秸木梃等物，长者以当长枪大戟，短者以当双剑单刀。各分门路，支撑冲突，势极凶悍，几于勇不可当。每演时，必聚童子数十人合练之。欲演拳势，即时手舞足蹈，颇极超距之能，退时则一揖而罢。驱逐外敌的革命活动，使传统武艺训练也获得了新生。

由上可见，晚清时期的传统武艺仍然是广大人民群众强身健体、除暴安良，乃至保家卫国的重要手段，正是武艺所具备的这种多种功能，使它在轰轰烈烈的多次农民革命运动中，不断得到继承和发扬。

二、武术的发展

武术与武艺，虽一字之差，却大相径庭。在古代世界各国，几

[1] 程英. 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历史歌瑶. 北京：中华书局，1962：448.

[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240.

乎可以说都有武艺的存在，因为它是为军事斗争服务的技能，但唯独中国，在传统武艺的基础上又衍生出武术这一独特的体育文化，确是非常值得人们研究的文化现象。考察晚清时期中国武术的发展，大致呈现出高低起伏的波浪状态，特别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采取了禁止民间习武的措施，不但不许民间私置枪械，甚至于无地主富商作保，竟不准民间武师传授武术，使武术的发展一度跌入低谷。但在清廷统治力量所难以控制的地方，在民间节日、庙会或各种喜庆集会的场所，武术的表演和交流仍有着广泛的市场，所以晚清武术的发展更多地是在半公开或较秘密的条件下进行的。

（一）少林拳术的发展

少林拳术有着悠久的历史，一则“十三棍僧救秦王”的故事，使少林拳术更是享誉天下。那么少林拳术的特点是什么？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黄宗羲在其《王征南墓志铭》中曾有以下一段解说：“少林拳勇主于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所谓内家者，以静制动，犯者应手即仆，故别少林为外家。”这里的意思是说，少林拳术更多地注重刚性，注重主动进攻。然而事实上少林拳术也有柔的一面，所以与黄宗羲同时代的吴殳在《手臂录》中说得清楚：少林僧洪转者，“犹知以柔制刚，以柔制强之意。冲斗学于少林，唯取其刚强者，以自立一门，又非少林之法也。”

到了晚清时期，少林拳术的发展可能更多地趋于阴阳合一、刚柔相济的道路，但略显刚性，可能还是少林拳术区别于其他拳种的重要方面。所以近人吴图南在其《国术概论》中是这样描述少林拳术的特点的：少林拳术可归纳为上、中、下乘三种品格。所谓“刚柔变化能达极品者，为上乘；刚多柔少，而谨守成法者，为中乘；至若一拳一掌之微有刚无柔，专事于血气之勇者，斯品下矣。”这是在少林拳术的表现形式上而言。在少林拳术的拳种发展上，晚清时期亦有进步。在尊我斋主人所辑录的《少林拳术秘诀》中，

介绍了白玉峰是如何融合少林旧法而创增百七十余手的事迹：他将拳术具体分为龙、虎、豹、蛇、鹤五式，形成了所谓的“少林五拳”，并强调了不同拳式有不同的练习方式。如龙拳的练习，需要的是“暗听，气注丹田”；而虎拳的练习，则要求“鼓实全身之气”；蛇拳的练习，需要注意的是“气之吞吐抑扬”；鹤拳的练习，则须“凝精铸神，舒臂运气”。不同的拳式也有各自不同的练习目标。比如龙拳在于练神、虎拳在于练骨、豹拳在于练力、蛇拳在于练气、鹤拳在于练精等等。

（二）八卦掌的产生与特点

八卦掌是产生在晚清时期的一项新的拳种，它的创始人是董海川。董海川（1795 — 1880 年），河北文安县人，自幼习武，名闻乡里。成人后，遍游吴、越、巴蜀，见闻日广，技艺益精。在精研诸家拳种的基础上，取长补短、融会贯通，并将道家的八卦学说和导引练气之法运用于拳术之中，而独创八卦掌，但秘不示人。直到 1865 年，董海川在北京肃王府当差护院，最初仅向人传授罗汉拳法，后为府中典仪某人窥知其术而跪拜求教，董始将其独创之八卦掌公开传授。各地闻风而来执弟子之礼者不下数十人之多，得其真传者有尹福、程廷华、马维祺等人。

从技术技能的角度看，八卦掌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以掌代拳，并以围绕走转不停为主（间以相机进退）；二是以八种拳法为基础，各掌声雷动又变化八式，含八八六十四卦之意。由于习此掌法者长期苦练绕转，步法轻灵矫捷，加以身法、手法之不断变化，宛若龙飞凤舞，所以使八卦掌又有“龙形八卦掌”“游身八卦连环掌”等之雅称。董海川之后，研习八卦掌者仍大有人在，亦有不少论著问世，并有将八卦掌概括为八种掌法和六十四式等的名目，但从总体上看，其两大技术特点没有多大改变。

（三）形意拳的流传

形意拳，原名“心意六合拳”，或曰“六合拳”。据说为明末清初的山西人姬际可（字隆丰）所创，似乎是由枪法演变而来。因为《六合拳谱》上有姬际可“变枪为拳，理会一本”的说法。形意拳曾提出了较为明确的“六合”理论，即所谓心与意合、气与力合、筋与骨合、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因而在技法理论上特别强调形变，强调形变的轮回。在拳谱中，提出了“前后各有六势”。但每一势的形变都应做到“一势变为十二势，十二势仍归一势”，以此连绵不断。

形意拳发展到晚清时期，在动作外形上又更多地出现了仿生的趋势，注意接受各种动物的动作特点；在动作编排上也吸收了五行学说中相生相克的理论，使拳术体系更加合理完善。所以，吴图南在其《国术概论》中说：形意拳外采凶禽猛兽之掌长，内本五行生克之原理，使其拳以五行、十二形为体。这里所说的“五行”，就是指以“劈拳、崩拳、躜拳、炮拳、横拳”五种基本技法，以象征金木土火水五种物质之间的相生相克之意。而所谓的十二形，则是十二种动物的动作形态，即龙形、虎形、猴形、马形、鼍形、鸡形、鹞形、燕形、蛇形、豹形、鹰形、熊形。十二种动物的动作特征各异，有的勇猛，有的轻灵，有的矫健，有的敏捷。由于研习者的资质和专注不同，往往对某一方面有所侧重。如身轻灵便者，可能相当于鹞、燕诸形；力大势猛者，则可能相当于虎形、鹰形等等。

（四）太极拳的发展

举世闻名的太极拳，在其起源问题上旧有的传说是创自唐代放宣平，或曰出自宋明之时的张三峰（丰）。后来大家逐渐认为应产生于河南省温县的陈家沟，但在其时间和具体人物上又有差别。在陈鑫的《太极拳谱图说》中，认为应是由陈卜创编于明代初

年。他说："明洪武七年，始祖讳卜，耕读之余，而以阴阳开合、运转周身者，教子孙以消化饮食之法。理根太极，故名曰太极拳。"而根据唐豪先生的考证，认为太极拳应是由明末清初的陈王廷所首创，因为在《陈氏家谱》中曾说陈王廷为"陈氏拳手刀枪创始之人"。而且，在陈氏家族中曾遗有陈王廷一首长短诗，诗中有这样的感叹："叹当年，披坚执锐，扫荡群氛，几次颠险。""到而今，年老残喘，只落得黄庭一卷随身伴，闲来时造拳，忙来时耕田。教下些弟子儿孙，成龙成虎任方便。"由此认为，陈氏早年曾有军旅生涯，年迈后寄情黄老之术而创编了太极拳。当然，在太极拳的产生问题上，也有人提出不是在陈家沟，而是出自山西。如《清史稿·王来咸传》云："清中叶，河北有太极拳，云其法出于山西王宗岳。"王宗岳是清初的人，乾隆年间还在世。由上可见，有关太极拳的创始人和创编的时间问题，还有待于学术界的进一步考证。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太极拳在晚清时期获得了很大发展，不仅在民间的普及化程度有提高，而且还形成了多种流派。除陈（王廷）式太极以外，又陆续出现了杨式太极，即以杨澄甫（1883 — 1936 年）为代表的杨式大架，其拳式舒展大方，稳重沉着，是谓杨式太极；武式太极，即以武禹襄（1812 — 1880 年）为代表的武式小架，其拳式紧凑小巧，身法较低，是谓武式太极；吴式太极，即以吴鉴泉（1870 — 1942 年）为代表的吴式中架，其拳式以柔化见称，不纵不跳，是谓吴式太极；孙式太极，即以孙禄堂（1861 — 1932 年）为代表的孙式小架，其拳式舒展圆活，动作敏捷，故亦称活步小架，是谓孙式太极。

第四节　时令节日中的体育活动

古代人民常年从事紧张的劳动生产活动，只有当各种民俗节日到来的时候，才有可能得到一定的休闲时间。在这些时间里，他们

开展多种多样的文化娱乐活动，其中包括体育的竞赛与表演。随着历史文化的积淀，一些活动逐渐具备了传统的性质，成为各地不同风俗习惯的组成部分。在每年的固定日子里，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举办这些传统体育活动，由此我们称之为时令节日中的体育。

一、龙舟与风筝

龙舟竞渡，是中国古代一项历史悠久的水上竞技运动。晚清时期的龙舟竞渡，无论在南方的苏州，还是在北方的天津，均非常盛行。在苏州，每逢农历的五月五日，胥门、阊门、南濠、北濠以及枫桥，都有龙舟活动。对此，《清嘉录》中有较为详尽的记载："龙船，阊胥两门，南北两濠，及枫桥两路水渎皆有之，各占一色。四角枋柱，扬旌拽旗，中舱伏鼓吹手。两旁划浆十六，俗呼其人为划手。篙师执长钩，立船头看，曰挡头篙。"苏州的龙舟竞渡除比快以外，还要进行水上游戏表演。如在龙船的"头亭之上，选端好小儿，装扮台阁故事，俗呼龙头太子。尾高丈许，牵彩绳，令小儿水嬉。有独占鳌头、童子拜观音、指日高升、杨妃春睡诸戏……"其时，两边岸上的游客，还要纷纷争买土罐掷到河中，龙舟上的人则纷纷跃入水中，奋力争夺，"以为娱乐"。凡得土罐多者，还要受赏。也有"投鸭于河，龙舟之人争入水相夺"的游戏。苏州每年一次的龙舟竞渡活动，其场面也是非常壮观的：男女老少，倾城出动，七里山塘的游人摩肩接踵，"几无驻足之地"；河中的画船舟楫，亦是楫如鱼鳞，几无行舟之路；"欢呼笑语之声，遐迩振动，成市十日而罢"，令人流连忘返。

天津，原本没有龙舟竞渡活动，但在清代乾隆下江南时，路过天津，住在海光寺，恰逢端阳节至，"无以为欢，同城文武忧之，旋由操海船业者诸家，仿造三江闸龙舟办法，作竞渡之戏，选梨园中善武技者，得十人，衣彩衣，在舟上作种种武技。舟作龙形，上悬秋千、皮条之属。献武技者，作诸般身手，使观者惊魂动魄。寺

固濒水，即于寺前水中作戏，乾隆御览大喜，赏马蹄金十锭，黄带子十根。赐‘奉旨竞渡’”（戴愚庵《沽水旧闻》)。从此以后，天津的竞渡活动开始兴盛。例如清人麟庆1843年农历五月四日乘舟经天津三岔口时，便亲眼目睹了津门的竞渡之戏，这在他的《鸿雪因缘图记》第三集中有记述：1843年“五月初四日，余过楼下，见龙舟旗帜翱翔，游舫笙歌往来，虽稍逊吴楚之风华，而亦饶存竞渡之遗意。因思三闾大夫以谗被放，五日投汨罗江，至今群争吊挽，何忠爱之感人耶?”由此，他还特意请人专门绘制了一幅《津门竞渡图》。

天津的龙舟竞渡，一般都是由一些富家子弟发起，他们常年坚持训练。每到端阳节，便“出而作戏，高标‘奉旨竞渡’字样，气焰之高，不可一世。演者不论若干人，均扎黄带子，以木刻成马蹄金状，系于黄带上，谓御赐之物。唯演者善泅者少，不善泅者多，故每年竞渡，必有遭灭顶之灾者，因使官府出示禁止。演者以‘奉旨竞渡’相抵抗，则禁者自禁，演者自演。光绪十六年夏，竞渡之风甚盛。民间以龙舟作戏者，则河为之塞”（戴愚庵：《沽水旧闻》)。

风筝，亦名纸鸢，又名鹞子。晚清时期，放风筝仍是民间一项重要的体育娱乐活动。

例如在天津，每当入秋以后，天高云淡，风力平稳，人们会纷纷进行放飞风筝的活动。在旧城区内，在娘娘宫，在南市三不管，在西头如意庵等繁华地带，有着众多的风筝摊位，业主边放边卖，购者甚众，使得整个津城“风鸢漫天舞，童叟竞相嬉”。所以，嘉庆年间的樊彬在描述天津的《津门小令》词中说：“津门好，薄技细搜求。烟管雕成罗汉笑，风筝放出美人游。花样巧工留。”咸丰年间的诗人周宝善在其《津门竹枝词》中，亦说到了天津的风筝：“书生结绾已残年，手挽红绳放纸鸢。一片筝弦风送响，蒲弓曳满在遥天。”晚清时期，天津还涌现了一大批风筝艺人，当时享有盛名的有魏元泰、张七把兄弟、老金记兄弟、帘子李等人，其中

最著名的是“风筝魏”的创始人魏元泰。魏元泰生于1872年，幼年读过私塾，后因家贫辍学，16岁时开始学习扎彩手艺。从1898年起，专门从事风筝的制作。他所创造的几十个风筝品种，使天津的风筝制作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他做过丈八的“麒麟送子”、七丈长的“鲇鱼”，以及小到不足一尺的“鹰”，大小风筝，形态不一。他做过一套四个不同颜色的“喜重逢”蝴蝶风筝，用一根线放上天去，它们就在空中缓缓地自动调换位置。他还做过硬膀带字且能变化的风筝，当风筝放起来以后，把线使劲往回一扯，就出现白色的字；往上一松，字又变成了红色。他做的“公鸡”能在空中斗架；他做的“飞机”能在空中丢撒传单。特别是他做的“八仙庆寿”风筝，更是别具一格：八位神仙足踏的云彩和淡蓝色的天空色彩调和，神采各异的八仙随风飘舞，时而拂袖远去，时而飘飘欲落，宛如天仙下凡一样，给人们带来吉祥和欢乐。

又如在山东潍坊，民间自古就有清明时节放风筝的习俗。到了清代的乾隆年间，潍坊城里的白浪河两岸更是出现了放飞风筝的盛况。时任潍坊县令的郑板桥就留有“纸花如雪满天飞，好将蝴蝶斗春归”的诗句。同时代的潍坊人郭麟也有“纸鸢儿子秋千女，乱草新来春燕多”的诗句，统统描述了当时潍坊人民放飞风筝的情景。晚清时期，在潍坊的白浪河边，每到春季，依然是“凌空纸鸢高入云，倒影河流夕照红”的场景。

晚清风筝活动又一活跃的场所是江苏省南通市。据清光绪年间的《通州直隶州志》“民赋志”载：“风鸢，出如皋，自草、虫、鱼、鸟，以至仙佛，无巧不具。一排九雁、十三雁者，可折叠藏之。”说明南通风筝不仅造型优美，种类繁多，画工细腻，颇具丰富的想象力和吸引力，而且可以放飞游戏，折叠收藏，具有浓厚的观赏文化价值。南通风筝大致分为“板鹞”和“造型”两大类。其中“哨口板鹞”是南通最典型、最富有特色的代表，也是全国绝无仅有的，它以独特的音响效果而独树一帜，闻名于世。

二、舞狮与舞龙

中国的舞狮活动大概是从佛教传入后才兴起的，南北朝时期已有这项活动的记录。据说在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446 年）五月，宋朝交州刺史檀和之奉命伐林邑，林邑王范阳使用了象军参战。这支象军由于士兵持着长矛骑在又高又大的象背上，所以使仅仅拥有短兵的敌方连接近它都很困难，结果宋军的士兵吃了大亏。后来先锋官振武将军宗悫想了个办法。他说，百兽都害怕狮子，大象大概也不会例外。于是命人连夜用布、麻等做成许多假狮子，涂上五颜六色，又特别张大了嘴巴。每一个“狮子”由两个士兵披架着，隐伏草丛中。他还在预定的战场周围挖了不少又大又深的陷阱。当第二天敌方又驱动象军来进攻时，宗悫放出了假狮子。这些“雄狮”一个个翻动着斗大的口，张牙舞爪直奔大象。大象吓得掉头乱窜，宗悫又乘机指挥士兵万弩齐放，受惊的大象顿时没命地向四处奔跑，有不少跌到陷阱里，人和象俱被活捉。从此，舞狮首先在军队中流行，然后传到了民间。舞狮一般由两人合作扮一头大狮子，叫太狮；一人扮着一头小狮子，叫少狮。另有一人扮武士，手拿绣球作引导，并先开拳踢打，以诱引狮子起舞。狮子则伴随鼓点的快慢轻重，忽而翘首仰视，忽而回头低顾；忽而回首匍匐，忽而摇头摆尾。可谓千姿百态，妙趣横生。

晚清时期，民间仍有舞狮活动的传统，尤以南方为盛。例如在福建闽中一带，民间广泛流行有单人舞狮、双人舞狮，以及多人多狮舞的活动；在连城地区，则有文狮、武狮活动的区分。所谓文狮，主要注意表现狮子的形意神态，其动作细腻。例如有洗面、舐足、嗅物、捋须、搔痒、缘柱、钻穴、打滚、登山、下山、过桥、滚球、抚小狮等动作的表演。其间也有戴假面具的滑稽人，引逗欢乐。武狮又称青狮，主要表现狮子威武凶猛的性格，因而重于技巧的表演。动作有跳跃、跌扑、登山、踩球、翻转等，同

时体现逗狮人的聪明、果敢和机智灵活。舞青狮者一般都具有武术功夫，因为舞狮中二狮相遇时，往往要较量武艺，动手打斗。在闽南，还流行舞“狮阵”的活动。一场舞狮有几十甚至上百人参加，个个手提兵器，与狮共舞。其中的“宋江阵”有108人同场表演，十分壮观。

在浙江的临海，则有一种黄沙舞狮的独特表演。表演时要用八仙桌搭一个九层高台，先由一两个人出场表演武术功夫，然后在锣鼓声中，“狮子”随舞球者登场，做滚翻、掀扑、腾跃、施威等动作，舞过片刻，狮子作休息状。此时有几十个狮子接连出场，一一跃上高台，表演翻筋斗、竖蜻蜓、倒立等动作，表现了较高的动作难度。

舞龙也称耍龙灯，又叫龙灯舞。舞龙早在我国汉代民间就已非常流行，在唐宋时期的“社火”“舞队”表演中，舞龙已是常见的表演形式。吴自牧《梦粱录》中描述过南宋杭州的元宵之夜：“草缚成龙，用青幕遮草上，密置灯烛万盏，望之婉蜒如双龙之状。”龙灯是由多节组成的，一般单数，九至十三节不等。有单龙戏珠和双龙戏珠之分。表演时的花样常有蛟龙温游、龙头钻裆子、龙摆尾、蛇脱皮等。舞龙时不管表演哪种花样动作，表演者都得用碎步跑动。舞龙表演主要是表演蛟龙的动作，常看到一条巨龙追捕着红色的宝球，飞腾跳跃。时而高耸，似飞向云端；时而低下，如入海破浪。显示出表演者的高度的技巧和默契配合。

晚清时期，各地民间均有舞龙活动，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苏州胥门外的百花洲龙灯队。他们平日刻苦操练，练就了一手舞龙的绝技，既能调舞于地势崎岖之处，又能在周转余地甚小的舞台上表演。他们可以表演龙灯结、中间穿、龙跳板、回龙招、跪舞、大花、小花等十多种套路，还能连续调舞，行进两里多路。特别是在龙灯照舞不歇的情况下，他们能从容不迫地更换舞龙队员，显示出高超的技艺。在苏州，除了一般的舞龙表演外，还有一种称为“香龙”的表演。那是用稻草扎成的龙形，然后在龙身上插上捧香，专

在夜间舞弄。要起来香火翻飞，煞是好看。舞龙既是民间的一项体育娱乐活动，也是一种美好愿望的寄托。因为龙是一种吉祥的化身，通过舞龙，则可以引来一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

三、秋千与拔河

秋千，亦称千秋。晚清时期，秋千游戏仍在广大的少儿和仕女中间流行。据说在紫禁城的坤宁宫和后宫各宫室，每到清明时节，均竖起秋千一架，直到立夏的前一日，这些秋千才被卸下来。在李声振的《百戏竹枝词》中有一首《秋千架》，其中说到：半仙之戏，无处无之。仕女春图，此为第一。词中曾对两位正在进行秋千活动的女子有如下一段描述，可谓栩栩如生："日影垂杨舞半仙，御风图画两婵娟，飘红曳绿浑闲事，蹴损汀钩剧可怜。"

拔河，古代也叫牵钩或拖钩之戏。据《隋书·地理志》载：这种活动最初可能产生于春秋时期的水上交战项目，后来逐渐演变成一项民间的多人较力游戏，到唐代的时候已经非常成熟。在唐人封寅的《封氏闻见记》中，已有非常具体的活动方式介绍："拔河古用篾缆，今则以大麻绳。长四五十丈，两头分系小索数百，挂于胸前。分二朋，两相齐挽。当大绳之中，立大旗为界。震鼓叫噪，使相牵引，以却者为赢。"

晚清时期，拔河游戏在民间仍有流行。例如光绪年间，在甘肃的洮州地区，"每岁正月元旦及岁时各节，皆无异俗。惟正月初五午后，有扯绳之戏。其俗在东西门外河滩。以大麻绳作两二股，长数丈。另将小绳均挂大绳之末。分上下二朋，两钩齐挽。少壮威，牵绳首，极力扯之。老弱旁观。鼓噪声可撼岳。以西城门为界，上下齐扯。凡家居上者，上扯；家居下者，则下扯。胜者踊跃欢呼，负者颇为失意。其说，以为扯势之胜负，即以占年丰欠焉。相沿已久，不知自按襄汉拔河之举、上古牵钩之俗？"（《洮州府志·风俗》）

下编

民国初年与北京政府时期的体育

（1912—1926年）

《中国体育通史》第三卷下编，为民国初年和北京政府时期的体育。其时间跨度是从1912年至1926年。这是近代西方体育在中国的初期发展阶段。辛亥革命胜利，不仅结束了一个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而且也迎来了一个气象万千的资产阶级新时代，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由此，在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潮、民主与科学思潮，以及国粹文化思潮的影响下，中国人开始了对近代体育发展道路的不断探索和求证，使中国近代体育获得了初步发展。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在1915年上海举办的第2届远东运动会的直接影响下，人们在价值观念上，出现了由体育强兵、强种、强国向体育竞技、健身、休闲娱乐的观念转变。在传播路线上，随着近代学校体育制度的确立，体育又开始由学校向社会渗透，现代体育文化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认同。在社会影响上，不仅有更多的社会精英关注中国体育的发展，而且有更多的普通民众开始关注大大小小的体育运动会。

第七章　影响近代体育初期发展的主要社会思潮

任何时期的体育发展，不仅受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而且受社会发展思潮的影响。在民国初年与北京政府的这段时期内，影响中国体育发展的思潮主要有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潮，民主与科学思潮和国粹文化思潮。

第一节　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潮

所谓军国民主义，也称军国主义，本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国民教育，主要是在“尊君”“爱国”的口号下，借口培养“军国民”而用专制主义和沙文主义毒害青少年和国民，并强制其接受军事训练，以培养对外侵略的士卒和对内镇压人民的打手。中国人是在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接受军国民主义的，因此，不同阶级和不同人群在倡导军国民主义的时候，其动机和目的是不一样的。

一、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潮兴起的时代背景

从军国民主义发生的历史来看，应该说在兵器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就已见端倪，而且无论中外莫不如此，它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侵略或自卫活动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最早它只是一种战略思想。如中国古代提出的“全民皆兵”和实行的“寓兵于农”制度；如古希腊斯巴达人长期实行的体育军事教育和训练活动。但是，作为一种

军国民主义思想和制度的形成，则是从近代社会才开始的，并首先发生在欧洲的德国和亚洲的日本。这些国家出于对外侵略扩张和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的需要，无不提倡军国民主义，并将军国民教育作为其最有效的灌输手段。例如在1889年德国威廉二世公布的教育法令中，明确地把“德意志人和沙文主义、军国主义的教育”列为学校教育的宗旨，使学校成了培养“尊君”“爱国”军人的场所❶。在日本，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也已确立起军国民主义的教育体系。他们在国民教育中，通过学校、家庭、社会的三位一体，向大众灌输尊皇、武国、神国的教育❷。例如在1880年的《教育令》中规定：“从小学起，实行尊皇、爱国和国民武勇精神的教育宗旨”。1886年，中等学校也增加了兵式体操一科。力图以武士道精神，锻造出大和民族的国魂。

中国的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潮，主要发生在清末民初的这一段历史时期内，并在民国初期形成了高潮。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潮最早是由一批留日学生直接从日本引进的。如1902年，首先有留日学生蔡锷、蒋百里、铁生、飞生等人，先后在《新民丛报》《江苏》和《浙江潮》等刊物上发表有关文章，宣扬军国民主义。蔡锷以奋翮生的笔名在《军国民篇》中说：“国民之体力，为国力之基础；强国民之体力，为强国民之基础。”所以他提出：“军人之知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质，不独限之从者”，而是认为“凡全国国民，皆亦具有之。”蒋百里在《军国民之教育》的文章中则主张：要扩充军人教育于学校和社会。飞生的《真军人》文章中甚至提出“非军国民主义无以发公共之观念”。特别是梁启超，更是在他的《中国之武士道》文章中明确指出：学生“必习体操，强其筋骨，而使人人可为兵也。”他在《新民说·论尚武》的文章中说：“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

❶ 曹孚. 外国教育史.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315.

❷ 万峰. 日本军国主义.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所以，他赞赏古希腊的斯巴达人，“惟其以尚武为精神也，故专务操练躯体，使之强壮。”称道德国威廉二世对柏林小学的训示：“凡我德国臣民，皆当留意体育，苟体育不讲，则男子不能担负兵役。”他认为：“有健康强固之体魄，然后有坚韧不屈之精神。”所以他呼吁：“吾望我同胞，奋其雄心，鼓其勇气，无畏首畏尾以自馁也。”[1] 这种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潮在体育界得到了认同。他们甚至把日本迅速崛起的原因归结为“乃以彼所谓武士道者夸炫于宇内”（《形间拳微》）。认为1904年日本之所以能战胜强俄，是因为他们大力提倡柔道的结果，从而要求我们的国人也要“渐知拳术之为国魂”（《太极拳呼解》）。因而在1911年的《教育杂志》上，有人撰文提出：“中国之击剑、枪术、弓法、骑法等为最佳运动，”主张用作学校体育课的内容，“以代西式体操”[2]。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达到抵御外侮、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目的，也是积极提倡尚武，主张推行军国民教育。如邹容的《革命军》中要求国民养成具有冒险进取、赴汤蹈火和死不旋踵的英勇气概。他说：“全国男子，有军国民之义务。”陈天华在《警世钟》里说：“国家是人人有份，应该人人保守国家的权利，自应人人当兵。”在《国民必读》中则指出：“中国非人人有尚武精神，人人有当兵资格，决无希望”。所以1902年，蔡元培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时，特别重视军事训练。他自己也“断发短装，与诸社员同练步伐。”[3] 1903年由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的拒俄义勇队（后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确立的宗旨就是“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在他们

[1] 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等. 中国近代体育文选.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15.

[2] 熊晓正. 传统的批判与批判的传统. 体育文史，1987（2）.

[3] 蔡元培. 蔡元培选集.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330.

的组织建设中，甚至通过分成“射击班、讲习所和体操科”的形式，“进行军事训练”[1]。

广大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在思想认识上推崇军国民主义，而且更多的是付诸他们的革命行动。如1905年，徐锡麟、陶成章等人在浙江绍兴创办的大通师范学堂和体育会，其宗旨就是通过严格的军事和体育训练，以培养会党人员的军事素质。所以学堂规定：“本学校学生，咸为光复会会友。”1907年由谢逸桥、温靖侯等人在广东梅县创办的松口体育会，其目的也是集中革命党人进行军事和体育训练。1907年由杨镇毅、王伟等人在浙江临海创办的台州耀梓体育学堂，在其《开办简章》中亦明确自己的办学宗旨是：“陶冶品性，造就体操教员，预备后时一般军人之资格。”又有1908年，由杨沧白等人在四川创办的重庆体育学堂，虽然名义上是为培养体操教员，而实际上则为推翻清王朝统治训练革命人才、积蓄革命力量。总之，借体育的名义，进行事实上的军事训练，以培养革命的武装力量，几乎成为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宣扬军国民主义而进行人才培养的一种普遍模式。所以，当他们终于通过流血牺牲换来了中华民国的诞生以后，其军国民主义教育依然是他们培养人才的重要措施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内要求结束军国民教育的呼声日渐高涨，特别是一批留欧美学生，对德国、日本的军国民主义教育非常反感，他们提出了民主、自由、个性的教育理念，并以德国战败为由，要求修改教育宗旨。1919年4月，在以范源濂、蔡元培为正副会长的教育部调查会上，提出了“军国民教育一节，于世界潮流容有不合”的意见，因而要求应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新的教育宗旨。从此，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潮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1] 陈旭麓. 近代中国八十年.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429.

二、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及其主张

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资产阶级的教育家等一批进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当时主要是站在救国救民的立场上而提出和提倡军国民主义的。

（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及其主张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孙中山、黄兴、秋瑾等。

孙中山（1866—1925年），名文，字德明，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流亡时化名中山樵，后来人们都习惯地称呼他为孙中山。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在孙中山的体育思想中，首先认为军国民教育有关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曾说："要造成一个好的国家，便先要人人有好人格。"[1] 而好人格是从教育中产生的。所以，1912年孙中山在《临时政府公报》第二十一号中说："查民国新建，奖励游学，而培养人才，实为当今急务。"[2] 因为"将来种种事业，非有多数的人才不可"[3]。

人才怎么培养？当然是要使受教育者在体育、智育、德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所以他说："必须全国的人民，都要有体育、智育、德育的人格才好。"他指出：青年要"研究体育、智育、德育"。"专拿青年会的宗旨讲，是用体育、智育、德育三项标准来救国，就是这件，便应该被欢迎。""注重体育、智育、德育三项，改良人类来救国，是全国所欢迎的，也是我们想救国的党人所应该欢迎的。"[4] 他在一次对军队的演说时指出："诸君欲身任非常之事业，则必受非常之教育乃可。此非常之教育为何？即军人之革命队

❶ 孙中山全集：第8卷. 北京：中华书局，1981：319.

❷ 孙中山全集：第2卷. 北京：中华书局，1981：126.

❸ 孙中山选集：上卷. 北京：中华书局，1981：431.

❹ 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315、319、325、326.

伍精神教育是也。"[1] 可见，在当时革命条件下，孙中山所强调的人格塑造，确有着明显的军国民教育倾向。这是因为在投身革命的漫漫征途上，他深切地认识到，尚武精神不可小视，因为它关系到国力的强盛与民族的盛衰。他曾说："处竞争剧烈之时代，不知求自卫之道，则不适于生存"，欲求"自卫之道"就不可不重视军国民教育[2]。

其次，孙中山认为，体育是实现军国民教育的重要手段。孙中山曾非常明确地指出：体育"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3]。这意味着他一开始就高瞻远瞩，把体育与民族存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来看待，并且提倡尚武精神，以求中华民族从精神上和体格上强盛起来，不被他人欺侮。后来他看到精武体育会从宗旨到运作方式上都与自己的主张相吻合，便大加赞赏，希望该组织担当起重塑民族体格的重任。所以他对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曾给予热情的关注。精武体育会于1909年在上海成立，短短数年间，其分会发展到全国许多大中城市，而在南洋的华侨也相继成立了分会。该组织的宗旨十分明确，就是要让国人扔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同时，为了推广武术和其他健身方法，该组织对中华民族固有的和西方传来的体育活动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这种做法深得孙中山先生的赞赏。因此，在1919年精武体育会成立十周年之际，孙中山先生应邀亲自为该会题写了"尚武精神"的匾额，并亲自为该组织出版的《精武本纪》刊物作序。他在《精武本纪序》这篇文章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自人类日进于文明，能以种种经验资用器具而抵抗自然……然以利用种种器具之后，渐举其本体器官固有之作用，循用进废退之公例而不免予淘汰，此近来有识者所深忧也。"当时精武体育会作为独树一帜的一个体育组织，正在为振兴中华民族的精神

[1] 孙中山全集：第6卷. 北京：中华书局，1981：10.

[2] 孙中山. 精武本纪·序//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等. 中国近代体育文选.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

[3] 孙中山全集：第4卷. 北京：中华书局，1981：18.

和体格作出不懈的努力，引起了孙中山先生的重视。从他对精武体育会的赏识和支持，可以看出民族传统体育是不可偏废的。在清末民初的这段时间内，西方文化以及体育活动的诸多内容大量传入中国，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许多人对西方体育项目津津乐道，热情参与。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交融的过程中，人们喜欢什么项目或选择什么项目来参与固然是一种个人行为，但大多数人长期乐于外来的东西，难免会使本民族的传统被冷落，甚至因为失去了文化的载体——人，而导致传统体育项目的失传。尤其是在当时的中国体育界，存在着唯西方体育为佳和盲目搬用外国经验的倾向，许多人言必称希腊，总是认为本国的体育不足为取，唯有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等体育发展水平领先的国家值得效仿，甚而忘记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丰富内容，忘记了其中蕴涵着的无穷无尽的宝藏。针对这一情况，孙中山先生指出："概自火器输入中国之后，国人多弃体育之技击而不讲，询至社会个人积弱愈甚"，他还深表痛切地指出："我国人曩昔，仅袭得他人物质文明之粗末，遂自弃其本体固有之技能，以为无用，岂非大失计耶。"[1] 这话对推动当时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三，孙中山对军国民教育中忠孝问题有着他自己的解读。忠孝是军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孙中山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赋予了它新的内涵。他说："民国没有君主，忠字便于工作可以不用"，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说忠字可以不要，试问我们有没有国呢?"所以他认为："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2] 关于孝，孙中山说："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

[1] 孙中山全集：第4卷. 北京：中华书局，1981：18.

[2] 孙中山全集：第9卷. 北京：中华书局，1981：243-244.

步得多。”“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因为他认为：国民能不能像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事业那样来讲究孝，关系到国家的强盛与衰亡。他说：“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于工作，自然可以强盛。”[1]

第四，孙中山的体育思想源于他的体育实践。尽管孙中山先生长期以来为了民族解放的大业戎马倥偬，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体育的问题，但他个人并未将体育锻炼置之脑后。他善于根据不同的环境，利用现有的条件，因地制宜地开展体育活动。他曾经认真地学习骑马，并且基本掌握了策马奔驰的技能。1921 年，他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检阅雨花台的炮台，一时传为佳话。后来，他还与部属一起，到龙蟠虎踞的钟山骑马打猎。他在上海居停期间，早上起床以后便携夫人宋庆龄到花园里的网球场打打网球，晚餐以后则出门散步，几乎成为了他每天的生活常规。节假日期间，孙中山先生最喜好的体育锻炼是登山远足，广西的叠彩山、广东的鼎湖山、广州的白云山，以及其他许多名山古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1923 年的某一天，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登上了肇庆的鼎湖山，他当时已经年近六旬，却健步如飞。上山第三日，他们随处游览，到了一处瀑布旁边，这里飞瀑流泉、层崖叠嶂，景色蔚为壮观，瀑布下面形成了一个碧波荡漾的大水潭。孙中山先生身临其境，心旷神怡，一时间勃发了游泳的兴致。他纵身跃入水潭，畅游其间，就仿佛回到了家乡和自己的少年时代。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这一段往事，就在飞瀑之下的水潭旁边竖立了一块石碑，上面有宋庆龄女士亲自书写的一行大字：“孙中山游泳处。”

黄兴（1874 — 1916 年），湖南人。使他与体育结下不解之缘的因素，最早可追溯到他的童年时代。儿时的黄兴经常“听乡间老辈谈洪、杨革命事迹，特别是太平军攻长沙的故事，非常向往”。

[1] 孙中山全集：第 9 卷. 北京：中华书局，1981：244.

所以，“稍长，喜读太平天国杂史”[1]。喜爱爬山、游泳、钓鱼，无所不能，尤其热衷于习武强身之道。据说他曾从浏阳拳师李永球学乌家拳术，“只手能举百钧”。儿时的他，常常邀集小伙伴们在屋后地坪上习拳比武，骁勇强健，以豪侠称于乡里。所以人们对他日常生活的记载是：“君于文事之外，更娴武术，平居无事，喜控烈马舞剑以为乐，从之游者，实繁有徒。”[2]

黄兴与体育的结缘，还与他青年时代在两湖书院所接受的新式教育有关。两湖书院是由张之洞于1891年创办的，是一所带有西学色彩的新式学堂，按中体西用的方针培养时务人才。黄兴对其中的兵法和体操课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他甚至认为“不习兵操，无以强身有为”[3]。

1902年，当黄兴带着革命的思想留学日本弘文学院时，他更加注重体育和军事训练，并“常求教于日本军官讲授军略，暇即参观士官联队各地兵操。且每日晨起，必赴神乐坂武术馆，演习枪弹骑射。”[4]天长日久，黄兴竟然练得每射必中，弹无虚发，因此赢得了不少奖牌。1903年，他在日本参加拒俄运动，组织义勇队。黄兴懂得军事知识，由他给义勇队教授枪法[5]。同年，黄兴从日本回国，受湖南明德学堂之聘，任学监（即教务主任），兼任历史和体操教员，教授内容主要是兵操和器械体操。据黄一欧所记，黄兴在明德学堂时，一边任教，一边通过体育活动联络同志，发展会党。他当时已剪辫，在学堂时多着操衣。他喜欢体育活动，下课后总是在操场上踢足球、翻杠子、跑圈子等。在教学中他常以尚武爱国的思想教育学生，强调强国必先强身，强身必行体育锻炼。

---

❶ 毛注青. 黄兴年谱长编. 北京：中华书局，1991：13.

❷ 天忏生，等. 黄克强、蔡松坡轶事.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10.

❸ 蒋君章. 百战功高黄克强//黄兴传记资料（二）. 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157.

❹ 刘揆一. 黄兴传记//辛亥革命（四）.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❺ 何香凝. 我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秋瑾（1875 — 1907 年），祖籍浙江山阴，生于福建厦门。原名闺瑾，乳名玉姑，又名瑜娘，字璇卿，号竞雄。少学经史、诗歌，善骑马、击剑，有女才子之称。1904 年赴日本留学，1905 年回国，在上海加入光复会。同年 7 月再渡扶桑，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成为革命分子。年底回国，被推为浙江主盟人。1906 年任浔溪女学堂教习，秘密发展革命组织，筹备暗杀行动。1907 年接替徐锡麟主持大通师范学堂。同年 7 月因起义失败而被捕，并英勇就义，时年 33 岁。留有《宝刀歌》《精卫石》等文学作品，并有《秋瑾集》存世。

秋瑾对体育的倡导，首先与她从小所受的教育和生活环境有关。她出生于书香门第，也是一个开明的官宦家庭，因此，自幼即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加之天资聪慧，具有个性，所以 7 岁时即以父兄均未有缠足为由而拒绝裹脚。一双自然活泼的天足使她拥有正常的运动能力，因此，16 岁时，她即随表哥学习骑马和练拳、舞剑。并常与兄妹们一起登山吟诗、舞剑放歌。20 岁时已有小才女之雅号，成了一名文武双全的新女性。1895 年，她与王子芳结婚后来到北京，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以及受 20 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的“女权革命”和“振兴女学”等主张，使她“痛愤庚子之变”，开始以提倡女学为己任。她开始认识到“女子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仰给男子。今新少年动曰革命，革命，吾谓革命当自家庭始，所谓男女平权是也。”[1] 所以她终于毅然抛弃了家庭，离开了丈夫儿女，于 1904 年只身来到日本留学。在积极参加留学生革命活动的同时，她始终注意自己的体育锻炼。在她 1905 年 9 月 12 日从东京写给其兄长的信函中有如下一段话：“妹近日在校，身体甚耐劳，日习体操，能使身体健壮。”其对兄长的希望是：“并祈随时卫养身体为要，饮食务求兹养，衣服必求洁净，对于卫生甚有益者。”

[1] 吴芝英. 记秋女士遗事. 时报，1907-07-16.

秋瑾对体育的倡导，应该说最初也是从妇女解放，从反对对妇女的缠足而开始的。她在 1904 年发表的《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一文中说：上天生人，男女原没有分别。何以女人生来就必须缠足，为何如此地不公道呢？一出生就被视为晦气，没到几岁，也不问好歹，就把一双雪白粉嫩的天足脚用白布缠着，以致肉烂骨折，以讨亲朋邻人一声“某人家姑娘脚小”罢了[1]。秋瑾虽未亲身经历缠足的痛苦，但她对缠足乃是因社会男性歧视女性而起的恶习则是深痛恶绝。所以她说：世上最不公平的事，就是我们二万万女同胞了。腐儒们所宣扬的“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和“夫为妻纲”等等胡说，还不是因为男人们怕我们有了知识、学问之后，会爬到他们的头上去。因此，她鼓励中国的妇女，不要自己放弃，不要形同男人的一个奴隶。要将自己的子女，不分男女，送进学堂。在家要读书写字，千万不要缠足。她在《敬告姐妹们》的文中指出：今日的二万万男子入了文明新世界，而我们二万万女同胞还沉沦于黑暗的地狱。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所以她号召妇女，为求独立，应有志气，去女学堂，参与女工艺，以谋得一技之长，养活自己[2]。在日本留学期间，秋瑾还和陈撷芬等人在日本发起成立了“共爱会”，这是中国近代妇女最早成立的爱国组织。其宗旨就是：“反对清廷，恢复中原，主张女子从军，救护受伤战士”（徐双韵《记秋瑾》）。1907 年，她又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报》，并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以为创设中国妇人协会的基础”为其办报的宗旨[3]。

秋瑾所倡导的体育，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特别推崇尚武精神。这既与她所受到的同盟会革命思想的影响有关，也与她眼中所看到

---

❶ 秋瑾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5.

❷ 秋瑾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3.

❸ 秋瑾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0.

的中国长期被外敌蹂躏的现实有关。所以，在她的《青卫石》小说中，有“身体运动多健壮，不似从前姣又柔”的描写。在《秋瑾集》中，有许多尚武、扬武的诗句。如《宝刀歌》：一寸常萦爱国心，双臂能将万人敌。誓将死里求生路，世界和平赖武装。莫嫌尺铁非英物，救国奇功赖尔收。《剑歌》：走遍天涯知者稀，手持长剑为知己。《宝剑歌》：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恃铁血主义报祖国。《同胞苦》：我今必必必兴师，扫荡毒雾见青天，手提白觅民，舍身救民是圣贤。正是在尚武体育的理念影响下，所以当1907年1月秋瑾接管了大通师范学堂以后，仍然坚持了学校以往的传统和做法，实行军事化管理，并将兵式体操作为学生教育的主要内容。

大通师范学堂是一所只设有一个体育专业的学校，由革命党人创办于1905年。所以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说：“凡党人来者，仅习兵式体操专修科，均于6月毕业。”于是，“大通学堂遂为草泽英雄聚会之渊薮也。”据说大通学堂共招收了4批学员，毕业了3届300多人，其中不少人都成为辛亥革命的骨干。秋瑾主持下的大通师范学堂，每天都有兵操训练，女生也不例外。而作为一校之长的秋瑾自己，也是于大庭广众之下骑马戎装，无视守旧绅士们的嘲讽。秋瑾和她的大通师范学堂，为中国近代体育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二）教育家群体的代表人物及其主张

在宣扬军国民教育思想的教育家群体中，主要有蔡元培、范源濂、徐一冰等人。

蔡元培（1868 — 1940年），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他既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又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一生是在为民族解放和捍卫民权的奋斗中度过的，同时也为中国近代教育与科学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成就具有开创性和奠定基业的极大作用。蔡元培的兼容并

蓄思想不仅贯穿在他的办学思想行动中，而且体现在他对西方体育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中。蔡元培的体育思想与实践，应当被视为他的革命、学术与教育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他的革命、学术和教育的经历有着明显的阶段性，因而它的体育思想与实践也呈现出阶段性。他的军国民教育思想主要反映在1915年之前。

早在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以前，他就向当朝皇帝提出了强兵以自卫的建言，从而间接地与当时已经成为时代最强音的“尚武”社会风潮发生了联系。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他意识到康梁维新变法的局限性，将眼光投向未来，选择了另一条教育树人的强国道路。由于革除社会的弊病当从政治入手，而政治变革必先培养人才，因而教育乃是培养人才的根本途径。1898年冬季，蔡元培还归故里，担任绍兴中西学堂校长。这所学校自开创以来便以东西方学术等量齐观为特色，从西方传来的体育活动深受该校学生喜欢。在这所学校担任校长，既是蔡元培投身教育的开始，也是他实际接触学校体育的一个重要契机。从1898年到1902年，在这4年间，他先后在绍兴中西学堂和上海南洋公学担任负责人，主持了这两所学校的大部分教学工作。与绍兴中西学堂相比较，南洋公学在推崇西方教育方面尤为主动，学生开展的体育活动更加有声有色。蔡元培先生在主持学校工作期间，鼓励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并且采用了当时在军队已经普遍开展的兵式体操。他在该校开设的体育课，深受学生欢迎，他甚至在1901年受聘亲自担任上海南洋公学特别班的总教习。在任教期间，开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育思想和主张，并付诸实践。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积极采用在教会学校等新式学校中盛行的体育方法和手段，在体育课中实施。而他的主张则是开办新学必须一切更新，教授学生新式体操必不可少，这意味着他已经在其教育实践中对如何开展体育的教育有了比较明确的理念和方法。

1904年新学制颁定，当年4月蔡元培先生邀集同仁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该会的任务之一就是针对新学制如何在中国

推行等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在由他主持的讨论会上，他对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体操科目的含义实际上应当理解为体育表示十分赞同。中国教育会成立后不久，相继创办了爱国女学和爱国学社两所学校。顾名思义，这两所学校的办学宗旨就是要培养男女学生的爱国精神。蔡元培先生也在爱国学社开学典礼上明确提出要注重精神教育和军事教育，学校对各门学科，包括当时被称为“体操科”的体育课都必须重视，学生通过学习这些科目，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他在《苏报》上撰写的文章中也特别提出：“学子重精神教育兼必重军事教育，而尤以新兵式体操为首。”

为了拓展视野，更完整地更全面地了解世界，蔡元培在1907年至1926年间先后5次出国，并且在国外生活的时间长达12年之久。在这期间，他广泛吸取国外学校教育的方式方法，其中包括不断产生的新的体育手段和方法，为日后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并领导文化教育事业以及推行学校体育教育做好了准备。可以说，在这期间他的思想和主张也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完成了从单纯地提倡尚武和强国强种到提倡对人实施全方位教育的转变。1912年，蔡元培先生就任教育总长，他首先明确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应理解为实用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五育并举教育方针（后来更改为德、智、体、美四育）”，体育就像西方国家已经采用的那样，列为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学校则将其作为常设课程。

蔡元培的军国民教育思想，首先表现在他的教育改革中。在辛亥革命前后，蔡元培鉴于民主革命的需要，曾竭力主张实行军国民教育，把军国民主义或军事训练作为体育。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后，结束了清末教育上的改良方针，开始确立比较完整的新式教育制度。1912年4月设教育部，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同时发表了他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从这个《意见》中可以看到蔡元培当时的教育改革思路。他说：“据清季学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宗旨而加以修正，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

教育、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认为“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所以军国民教育自然成为新教育内容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蔡元培认为：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是强兵富国之教育，都非常需要。他甚至明确地指出“军国民主义为体育”[1]，这就为他后来始终注重体育教育提供了基本的认识基础。所以，他始终强调身体健康与国家民族的复兴有着密切的关联。他在《真正的近代西洋教育》一文中明确表示，中国人身体羸弱，令人担忧，依靠一些弱不禁风的人上阵，保卫国土，岂能保证杀敌制胜？那么，国家面临着这样的困危应当怎么办？他主张和平时期就要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当整个民族的体格强壮起来，国家才有希望，他说：“国家既强，临时授以军事智识，亦可执戈以保卫国家。”认为：“军国民教育就个人言，在补自卫力之不足；在国家言，在求国家之强盛。”[2]

在蔡元培的思想认识上不再将体育和军国民教育相提并论，大概是从他 1916 年由欧洲考察回国以后开始的。他从此对学校举办运动会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在《北京大学 22 周年开学式演说词》中，他已经明确指出：“本校提倡运动会”，是为了“来涵养心灵”。他在《运动会的需要》一文中说：“运动会的本身实有许多长处：第一，鼓励运动的兴会。人类的行为，不能专靠理智。在理智上我们固然知道运动的必要，但没有催发兴会的作用，或者鼓励不起来。鼓励的作用就在运动会。不但喜欢运动的人借此增加高兴，不至厌倦，就是不大喜欢运动的人，受了刺激也可奋起一点。第二，加增校外同学的社交。一校的同学交换知识，联络感情，自然有很多机会，对于他校的学生就不容易了。偶然如辩论会、游艺会，固然可以联合各校的学生，但此等机会，愈多愈好，运动会就是重要的一种。第三，养成公德。团体的荣誉就是个人的荣誉。宁

[1]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1025.

[2] 蔡元培全集：第 2 卷. 北京：中华书局，1984：131.

正真而败，诡诈而胜。”“英国牛津、剑桥两大学，用运动会的规则，养成自重急公的习惯，很有成效。我们承认，凡有运动会，都可以有这种成效的。”❶

当然，在充分肯定运动会对学生产生积极的示范和教育作用的同时，蔡元培也非常清楚地告诉人们：“体育之提倡，贵于全体4万万人中，设尽4万人体育发达，余者仍颓唐故我，则全国体育依然列于软弱之类。”❷因此，他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文章中说：“体育是要发达学生的身体，振作学生的精神，并不只在赌赛跑跳，或开个运动会博得名誉体面上头。其所以要比赛或开运动会，只是要引起研究体育的兴味。因恐平时提不起锻炼身体的精神，故不妨和人家较量较量。”蔡元培说：“其实体育最要紧的是合于生理。若只求个人的胜利，或一校的名誉，不管生理上有无危险，这不要说于身体有妨碍，而且成为一种机械的作用，便失却体育的价值了。而且，只鹜虚名，在心理上亦易受到恶影响。因为，常常争胜的结果，可使学生的虚荣心旺盛起来。”所以他说：“开个运动会和竞技等，倒很可以调剂机械作用。因为变化常态而添出兴趣，是很好的。只要在心理上使学生彻底明白体育的目的，是为了锻炼自己的身体，不是在比赛争胜上。”蔡元培对当时社会上一些变味的学校运动会，诸如“每校注意选手，不谋普及；这等选手专门运动，不必尽心于本分的功课；专以运动为竞胜的作用，毫不注意于身体的平均发展是否紧张过度，妨碍卫生”等现象，曾提出过严肃的批评。但是他始终认为：“这些弱点不是运动会本身的坏处，乃提倡运动的人要牺牲部分运动员，去传播学校虚荣的原故。它的结果不但这一部分专门运动的被牺牲了，而且多数不配当选手的反把运动的兴趣都牺牲了。”

---

❶ 蔡元培全集：第4卷. 北京：中华出局，1984：184.

❷ 蔡元培. 在南开学校全体欢迎会演说词//苏竞存. 中国近代学校体育史.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25.

因此他说："我们不忍执行这种牺牲的手段，所以近几年来，不敢用揠苗助长的方法来勉强提倡运动会。"[1]

范源濂（1875 — 1927 年），字静生，湖南湘阴人。是继蔡元培之后的又一任教育总长，在他的教育理念中，也是积极主张推行军国民教育。1914 年，他发表了《今日世界大战中之我国教育》的文章，其中指出：作为学校教育，最重要的就是要"明世界之大事，示科学之重要，振尚武之精神，阐爱国之真义。"他在解释为什么要提倡尚武时说："吾国人以爱和平著称于世界。"他又说："和平固甚可爱也，然独惜光荣之和平，非不武之国民所得而爱之耳。"他认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今日之天下安乎？否乎。故振起学者尚武之精神，又当务之急也。"所以他强调："诚以充实国力之最良制度，莫如全国皆兵。"[2]

徐一冰（1881 — 1922 年），原名益彬，又名逸宾（在中国体操学校原始发起人告示栏中也写成徐一丁），浙江嘉兴人。徐一冰的体育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他把体育与救国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于徐一冰的孩童时期正处在内忧外患、多灾多难的年代，所以他从小就"立志挽文弱"。东渡日本，学的是体育；回国兴学，办的是体育。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即"通过体育来强民强种，伸张中华之气。"[3] 所以他在《敬告教育界》中说："强国之道，重在教育；教育之本，体育为先。"因为"国人精神不振，疾病靡已，而死亡相继者有之。考其原因，无非废弃体育之害。"1914 年，徐一冰作《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其中指出："夫人有健康强固之身体，然后有坚韧不屈之精神。"故他大声疾呼："人种不强，国家安顿。"面对政府的腐败无能，眼见国民体质衰弱，国势危亡，他痛心疾首，决心投入体育事业，宏志强种强

1. 蔡元培. 运动会的需要. 北京大学日刊，1922-04-23.
2. 范源濂. 今日世界大战中之我国教育. 中华杂志，1914（23）.
3. 缪晖. 三代爱体育 —— 访著名作家徐迟. 新体育，1983（3）.

国，并为之奋斗了一生。他曾多次向人们解释说：体育之原理，为保存人类之健康。人生之天职，仍须经营一切事业，俾有益于国家社会，此一天职非有健康的身体不可。体育正是维护吾人身体健康之法，实为教育上以及事业上之根本，吾人处世立身之道[1]。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把“增强中华民族体质，洗刷东亚病夫耻辱”作为自己所创办的中国体操学校的校训。

大约从1914年以后，徐一冰开始了对军国民教育的反思。表现了他对“学校体操竟以尚武为唯一目的，以兵操为主要教材”做法的不能认同。他在《体育与武力辩》中说：“若误以军事为体育，专门从事武事，发生违背人道之举动，如此好勇斗狠，不能称之为体育。”他认为：“吾人讲体育，须识体育为人类纯乎天然之生活。饥则思食，渴则思饮，静则思动，倦则思息。而游息，而睡眠，皆体育也。人类进化，妨碍天然于无形，于是有体操，有运动，所以补救天然体育之缺憾，辅助人类进化之药石也。”[2] 因此，他在抨击军国民教育的同时，提出了“正当体育”一说，并号召全社会都来真正地重视研究体育。因为“体操一科，与生理学、心理学有密切关系，断非无教育无知识之一二兵士可以能胜任也。而小学校为童年运动，其修养尤非从生理心理及美学上研究不可。”为此，他曾向当时的政府提出六点建议：第一，小学校、中学校体操及游戏，亟宜统一教授。学业之进行，必循阶级，由浅入深。第二，学校体育，亟宜革除兵式教练一门。第三，高等小学、中等师范，亟应添习本国技击一门。第四，宜由国立建设一体育专门学校以示模范。第五，各省宜由行政长官，置设学校体操视学官。第六，女子大、小学校体操游技科，必须延聘女子教员教授[3]。这些认识即使在今天看来，仍对指导我们的学校体育工作具有启发意义。

---

[1] 徐一冰. 体育与武力辩. 体育杂志，1914(1)：2.

[2] 徐一冰. 二十年来体操谈. 体育周报：特刊. 1920：61.

[3] 徐一冰. 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 体育杂志，1914(2).

综观徐一冰先生的一生，是为中国近代体育的传播与发展，特别是为中国近代学校体育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有益贡献的一生。所以人们没有忘记他，1914 年 6 月，北京政府教育部曾授予他一枚一等嘉禾章和一块“教恩无穷”的匾额。同年 11 月，江苏巡按使又授予他一枚七等嘉禾章，以表彰他对中国体育和教育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三、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潮对近代体育发展的影响

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潮对近代体育发展的影响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影响则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学校体育发展的影响；二是童子军训练活动的兴起；三是对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一）对学校体育发展的影响

中国近代学校体育制度的最早确立是在 1904 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公布以后，那时在强种强国的潮流中，已出现了要求实行军国民教育的呼喊。如 1906 年的《学部奏宣示教育宗旨折》中，已提出要把“尚武”列为宗旨之一，并要求“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特别强调学校体育课应以兵式体操为主，这是因为：“体操一科，稍长者，以兵式体操，严整其纪律，而尤时时勖以守秩序，养威重。”所以在 1911 年的《请定军国民教育主义案》中，提出了对学校实行军国民教育的具体要求是：“奏请特颁谕旨，宣布军国民教育主义；通令高等小学及与之同等以上之学堂，一律注重兵式体操；中等以上学堂，一律打靶，并讲授武学；各种学堂，体操课一律列为主课。”

辛亥革命后，在建构学校体育的思路方面，仍要求应以军国民教育为主线。如 1912 年 1 月 19 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14 条)，其中规定：高等小学以上，体操科应注重

兵式（《临时政府公报》第4号）。1912年7月10日，教育部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共有80多人参加会议，大会提案92件。会议最后确定的教育宗旨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特别是1915年，在《大总统颁定教育要旨》中，对教育中的"尚武"问题更是作了详尽的解说。指出："国何以强，强于民；民何以强，强于民之身；民之身何以强，强于尚武。"而"尚武之道分之为二，曰卫身，曰卫国。合之为一，卫身即卫国，卫国即卫身也。"因此"今之言国民教育者，于德育智育外，并重体育。使幼稚从事游戏，活泼其精神；稍长进习兵操，锻炼其体格；极至掷球角力，习为常课；运动竞走，时开大会。凡所以图国民之发育者，无所不至。此民之所以能卫其身也。"[1] 这种军国民教育意识，在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和知识界曾有着广泛的市场。

在军国民教育思潮影响下，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正式提出了"军国民教育"。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实行军事编制，开设以兵式体操为主的体育课程。所以当时的学校体育课内容，几乎可以说完全被兵式体操和军事训练所代替。在1915年全国教育联合会作出的《军国民教育实施方案》中，可以看到以下的一些条文："小学校学生宜注重作战游戏；各学校应添中国旧有武技；师范学校及各中等学校之体操学科的时间内，宜于最后学年加授军事学大要；中等以上学校之兵式操，最后学年宜实行射击；中等以上学校应取严格锻炼主义；各学校应表彰历代武士之遗像，随时讲述其功绩。"

此外，在茅盾先生对自己学生时代生活的回忆中，也有关于学校实行军国民教育情况的描述："当时的体操课为操枪、翻铁杠、走天桥、行军。现在想来，湖州中学的体操课，实在是正式的军事训练，远足是急行军的别名罢了。"[2] 又有李泳斋也在回忆文章中

[1] 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 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76.

[2] 茅盾. 我走过的路. 2版.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72.

说："我十六岁时（1918年），考入开封留美学校。该校当时开展的体育项目有足球、篮球两项，均由外国人指导。但每周两节体操课，却都是军事操。"[1] 相同的回忆还有徐中慧，他说：1914年，我入开封优级师范学堂的附属小学。"一两年后迁校至后营门，就有了体操教师，每周两节体操课，由老师领着走步、跑步、变排、游戏。"[2] 在张秀塾的回忆文章中，同样是这样描述的："我进中学是1912至1915年，那时的年龄17至20岁，学校是龙安联合县立中学。"学校也很重视体育，但体育的主要内容"还是兵式体操、徒手操、器械体操、游戏等"[3]。

由上可见，无论是在东南沿海的浙江省，还是在中部地区的河南省，或者是西部地区的四川，军国民教育在学校中是普遍的现象。究其原因是：在国际上，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国内，则是因为1915年日本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当时全国上下掀起了大规模的爱国运动，纷纷提出要加强军国民教育，加强军事训练和体育，以实行全国皆兵，挽救国家危亡，从而使军国民教育思潮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最高点。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传播和现代体育在中国的初步发展，这种原有的军国民教育思潮才遭到怀疑，遭到批判，人们对学校体育的认识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

（二）童子军的兴起

童子军最早起源于英国。1899年，英帝国主义派贝登堡领兵镇压南非川丝发尔人的反殖民斗争，被围困7个月之久，贝登堡利诱当地少年，加以训练，为其传令、送信、运输、侦察，使他摆脱了困境，于是他回国后即组织了几十个儿童，按他在南非的

[1] 河南学校体育情况的回忆//河南体育史料：第一辑.

[2] 河南学校体育情况的回忆//河南体育史料：第一辑.

[3] 张秀塾. 清末民初的学校体育. 四川体育史料，1984（4）.

方式进行训练，称之为“Boy Scout”，是童子、少年侦察员或义勇队的意思。我国译为“童子军”。中国最早是在1912年，在教会学校的武昌文华书院开始成立童子军，以后又有上海仓圣明智女子学校成立了女童子军。1915年，全国成立了童子军协会，属于社会组织。

在军国民教育思潮影响下，我国的童子军训练很快就受到了北京政府的重视。1919年，教育部曾向各省区教育会，发布了《推广童子军案》的公函。其中指出：“自童子军倡办以来，各省闻风兴起，其辅助教育，有益青年，实尽人皆知。惟主持童子军者，多半为从前未曾躬受童子军教育之人，不过仅凭学理上之研究。而各国成书多未翻印，书肆印行者缺而不全，于童子军之真精神真作用，未能窥其蕴奥。其他如愿词、规律、服制等，更未能一致。此由各省区尚乏研究之机关，故未能大收推行之效果。谨拟推广办法如下：(1) 各省区师范学校，应从速一律添授童子军课程。(2) 各省区教育会，应设童子军研究会。(3) 所有童子军组织法，以及愿词、规律、服式，均由各省区教育工作者会研究完善，发布一律仿行。(4) 由各省区教育会翻译欧美各童子军用书，以灌输童子军之智识。(5) 各省区已办童子军者，每年定期择适宜地点举行会操一次。(6) 各省区已办童子军者，应组织协会”[1]。

国民党时期，童子军训练继续得到政府的重视。南京政府教育部亦曾向各省区教育厅、会发布了《推广童子军教育案》的函件。其中认为：“童子军训练，为实施新教育之良好工具，在教育占有重要地位。”并归纳了童子军训练的优点起码有四个方面：一是“发挥天赋本能，养成善良之品格。”二是“适应童子之心理，利用童子之余暇，俾随时有学习常识、常技之机会。”三是“练习人群报务，以建立青年高尚之人格。”四是“锻炼体格，养成健全之国

[1] 国家体委文史工作委员会. 中国近代体育议决案选编.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12.

民。”文件指出：“吾国近十年来，各地教育界热心提倡，积极进行，但全国童子军尚未一律举办，不得不共谋推广。”文件说：“本联合会曾于民国八年，议决推广童子军办法，函请各省区教育会施行在案。现全国童子军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业经订有中华民国童子军联合会章程，从事筹备。除函请从速筹备进行，期一年内成立外，应各省区协同组织，一致进行。并依现时状况，重拟办法四条函请各省区酌情办理。其办法如下：（1）各省区师范学校，应从速添授童子军章程，以养成教练人才。（2）各省区已办童子军而未设联合会者，应从速组织省区童子军联合会。其未办童子军者，应从速举办，并先设置童子军研究会，研究指导。（3）童子军名称及服装，各地颇多讨论，应由各省区教育会郑重研究，提出于全国童子军联合会，公同认可，一致施行。（4）各校童子军经费，应正式列入学校预算。”❶

1926年，童子军改由国民党中央领导，称“党童子军”。1929年改称“中国童子军”。1934年又改名为中国童子军总会，仍由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领导。在国际上，1920年曾成立有国际童子军组织❷。

（三）对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影响

辛亥革命以后，在军国民教育思潮影响下，不仅学校以兵式体操为主要内容的体育课教学普遍为人们所重视，而且全社会在普遍推崇西方兵式体操的同时，亦有很多人主张要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挖掘和整理，这是因为：“体育名词，本我固有，体育历史间见错出。远寻，源于儒家之游艺舞蹈，释、道之修养锻炼。其间力士侠客技击等事，史不绝书。”总之，“一切体操之术，概

---

❶ 国家体委文史工作委员会. 中国近代体育议决案选编.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13.

❷ 苏竞存. 中国近代学校体育史.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68.

为释、道二家所发明。”[1] 甚至有人认为：“拳艺者，体育之最上乘也”[2]。因而他们呼吁，应从民族传统体育中找出“在时间上、能力上、经济上都合算”的“适宜运动来”[3]。亦如马良在《中华北方武术体育五十余年纪略》中所说：“辛亥以后，民国成立，国人益重体育。各界人士，竞尚各种体操，各种运动。嗣渐多趋重我固有之武术。而强民主义，始得倡行无阻矣。”主要表现为：“各名流或组织武术机关，造就武术教材；或会集各界人士，研究武术；或著述武术专书；或编辑武术杂刊；或设武术场，传授生徒；或延（聘）武士，教授其子女。而军警或以为正式体操，或以为普通运动。各男女学校，或列入正课，或列入课外；各军警长官，更多编辑一部分专门武术之军队；各村镇庄乡，更多组织武术场，聚集同志，练习武术。至此武术教育，遂得复振。”[4]

所以，在1912年至1925年间，我国出现了一批著名武术机构和组织。它们是：1912年创办的“天津中华武士会”；1912年创办的“北京体育研究社”“北京剑术研究会”和北京的“中华尚武学社”，以及成都的“四川武士会”；1914年创办的北京“行健会”；1918年创办的上海“中华武术会”“武术学会”“上海第一公共体育场国术部”和“北京武术体育会”；1919年创办的“重庆冀蜀国术馆”“青岛中华武术会”“山东武术传习所”；1920年创办的上海“中华国技研究会”；1922年创办的北京“中华国技武术研究社”；1923年创办的上海“武术研究会”，北京“国强武术研究社”“群武社”，以及“天津武术学会”“天津进德武术会”和“天津道德武术研究会”；1924年创办的北京“陶然武术团”“四民武术研究社”，“安徽拳术研究会”；1925年创办的上海“致柔拳社”等[5]。

---

[1] 体育周报，1919（16）.

[2] 教育杂志，第三年（6）.

[3] 体育周报，1919年（39）.

[4] 马良. 中华北方武术体育五十余年纪略. 体育与卫生，1924，3（3）.

[5] 林伯原. 民国期间民间武术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体育文史，1994（3）.

这些机构和组织，一般都是将自己的宗旨定位在对武术的提倡、研究和推广上。例如1912年成立的北京体育研究社，它将自己的宗旨确立为："以提倡尚武精神，养成健全国民，并专事研究中国旧有武术，使成系统。"因而在任务中提出主要是："组织体育学校讲习会，调查体育状况，编译各种体育图书，研究中国固有武术、东洋柔道、欧美体育等。"[1] 又如1912年成立的天津中华武士会，确定的宗旨是："传习中国固有之武术，锻炼国民之体魄。"为此，它把自己的工作任务定位在"以形意拳、剑术为主，其他技术随时逐渐加入"。

这些民间武术机构和组织，甚至还通过举办全国武术大会的形式，以显示传统体育的力量。如1919年8月31日，上海中华武术会举行大会操，实践孙中山"富国强种"的军国民教育主张。1923年4月22日，又有马良、唐豪、许禹生等人联合发起，在中国上海举办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全国武术运动会。计有来自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山东等地的20多个武术社团的选手参加了表演比赛。如上海的"武术进德会""精武体育会""中华武术会""上海公共体育场"，北京的"北京体育研究社"，山东的"山东武术传习所"，以及"常州进德国技学校""南翔英德社"等武术团体均有代表，参赛的还有著名武术家王怀琪、许太和等人。大会虽以振兴中华武术为目的，但由于当时军阀混战、政局动乱，使许多武术社团和武术名家均未能参赛。而且，大会也未能制订出比赛规则和设置评定成绩优劣的大会裁判。所以，严格地说，这次武术大会并不具有完全意义上的全国性质和近代体育运动会的性质。

发生在20世纪初期的"军国民教育"风潮，它一方面是源于外来军国民教育思潮的影响，特别是一大批留日学生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与洋务运动后人们逐渐形成的强兵、强种、强国的体育

[1] 体育丛刊：创刊号. 1924：1.

观念有关。正像后来一些学者所说的，“我国人之提倡体育救国也，亦既数十年矣。然而吾人仅仅听到一大串口号，如体育救国也，集中军训也，国术救国也，踢毽子救国也，放风筝救国也。徒尚虚名，实质于国是一无裨补。”[1] 军国民体育的实施，并未能实现“体育救国”的理想，相反，这种教育越来越表现出对学生身心的严重摧残。所以，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军国民教育思潮逐渐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第二节　民主与科学思潮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的两面旗帜。就民主而言，五四时期人们主要是追求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它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科学，是五四运动高举的又一面旗帜。早在19世纪末期，面对中国社会在列强虎视眈眈下将被瓜分的危机，一些进步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就已开始接受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并试图以此作为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就曾起到这样的作用。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非但没有缓解，且有加剧之势。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19年，巴黎和会无视中国的正义要求。一切都在表明：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达尔文理论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是更有影响力。所以，陈独秀在其《吾人最后之觉悟》文中说：“进化公例，适者生存。凡不能应四周情况之需求而自处于适宜之境者，当然不免于灭亡。”由此，科学救国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科学主义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提倡。

---

[1] 王殿贤．现阶段之中国体育．勤奋体育月报，1937（3）．

一、民主与科学思潮兴起的历史条件

中国人对西方民主的最早觉悟，大概是从甲午海战失败以后开始的。如康有为曾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中提出了中国长期积弱的根源就在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因而他指出："各国行宪法"乃是近世的趋势。但是，康有为企图在不推翻封建王朝的基础上，要实现所谓的民主，最多也只能是依附于封建君权的一个附属品。而事实上就连这一点也不可能实现。1904年，孙中山在《民报》的《发刊词》中首先提出"民族、民主、民生"，从而出现了最初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到1912年1月1日，又建立起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性质的中华民国，使得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第一次在中国得到实践。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得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就被袁世凯轻意窃取，导致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1]。"虽然挂了代议的德谟克拉西的招牌，实在尚是神治的、军治的、官治的政治，和民治的政治，相去甚是很远很远的。"[2] 因此，中国人民"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3] 为此，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社会精英们，在五四运动中便高举起民主的大旗。

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的口号首先是由陈独秀在1919年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正式提出的，当时称为德、赛二先生。他在文章中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于工作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于工作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他甚至提出，为了民主与科学，不惜流血牺牲。"若因

---

❶ 毛泽东. 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 湘江评论：创刊号. 1919.

❷ 仲九. 德谟克拉西的教育. 教育潮，1919，1（1）.

❸ 陈独秀. 吾人最后之觉悟. 新青年，1916，1（6）.

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治的压迫、社会的攻击和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1]

二、民主与科学思潮的代表人物及其体育主张

在《新青年》的感召下，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等一大批影响巨大的人物，也纷纷在不同的时间，利用各自场所撰写文章，发表演讲，共同向国人进行着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使之很快成为一种普遍的时代精神，从而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和中国人的现代化过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批时代精英也开始了对近代体育的重新认识和解读。

（一）陈独秀论体育

陈独秀（1879—1942年），字仲甫，安徽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轻视体育教育有着深刻的反省。他说：我国之青年，“千万之中，鲜有面红体壮者，以致被称东方病夫，如此民族将何以图存。”[2] 虽说这话说得有些过头，但是，他从民族存亡的高度提出问题，无非是想引起国人对体育的重视。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中国的教育，自古以来，专门讲德育，智育也还稍稍讲究，惟有体育一门，从来没人提倡，射、御虽是体育，但也没有人说明，以至全国人斯文委弱，奄奄无生气。这也是国促种弱的一个原因。”所以他在自己主编的《安徽俗话报》上，大力宣传体育的意义和作用，还作过一首宣传体操的《醒楚歌》。陈独秀也曾极力主张实行“军国民教育”，号召青年参加军训，准备效命疆场。所以，1902年，在他所组织的进步团体“励志学社”（后改名“爱国会”）中，曾规定“每日习体

[1] 陈独秀. 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新青年，1919，6（1）.

[2] 陈独秀. 新青年. 新青年，1916，2（1）.

操，以二小时为率。”1905年后，他在芜湖创办的“安徽公学”和“徽州公学”，每班每周也都安排有4~6节的体操课。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首先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并在1915年的《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了以下的新思维：应该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认为体育活动应该注重人性，因为“教育儿童直接的目的，是要寻种种机会，用种种方法，训练儿童身心各种感官。使各种感官及观察力、创造力、想象力、道德、情感等本能，渐渐地自由生长发育。”[1] 所以，他开始反对以往的军国民教育，反对学校体育中的兵式体操，甚至还包括反对学校中开展剧烈的竞技比赛和将拳术引进课堂。他说：兵式体操属军国民教育思想，应少输入青年杀人的思想；庚子年的神拳，也不适于现在；剧烈的运动比赛，于身体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并助长竞争心、忌妒心、虚荣心[2]。所以他提倡学校体育的“兽性”教育。他对“兽性”的解释就是：“一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二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三曰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四曰顺性率真，不饰伪自纹。”[3] 他向人们介绍说：欧美国家学校虽也主要是读书，但并不废锻炼身体。以德国为例，重视体育之后，民力大张，青年死亡率锐减，使列国无与伦比。他又说，其他如英、美、日本国之青年，亦皆以强武有力相高，竞争、角力之会，野球、远足之游，几无虚日。其重视之程度，不在读书授业之下。他认为，青年健壮活泼，有助于国民之进取、有为之培养[4]。因此他说：“游戏、体操、

[1] 陈独秀. 新教育是什么样//戚谢美，等. 陈独秀教育论著选.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289.

[2] 陈独秀. 新教育的精神//戚谢美，等. 陈独秀教育论著选.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229.

[3] 今日之教育方针. 新青年，1915，1（2）：35.

[4] 陈独秀，新青年. 新青年，1916，2（1）：52.

手工、图画正是用作生长发育这些本能的工具。所以小学的游戏、体操不专是发育体力的，兼且是发育各种器官、肢体之感觉神经及运动神经反应的本能和道德情感。”[1] 从而把体育和心理健康和道德情感教育都糅合在一起了。

（二）李大钊论体育

李大钊（1889 — 1927 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五四运动前后，他不但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功勋卓著，而且也注意关心民众体育问题。1922 年 5 月 1 日，他曾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五一纪念日对于现在中国劳动节的意见》一文，其中也谈到了关于体育的问题。他说：“人体的健全，全在身体和精神保持平均调剂的发展，有动作的时候，必须有休息的时候。而休息的方法，并不只是睡眠，有益身心的娱乐，亦是调剂倦怠、慰安疲劳的最重要的方法。”他又说，“游艺”对小孩固然要紧，就是对成年人亦很重要。他认为：“游玩不是奢侈的事，乃是必要的事。”这是因为它“可以苏慰工作的疲倦，可以免除堕落的恶习，可恢复身体的健康、精神的畅旺，可以补少年时教育不足”。李大钊所说的游玩，是指一切有益于民众身心健康的文化体育活动。因此，他在木村帮助创办新式学堂时，为了保证学生的游玩，曾建议把部分香头地退出来修成操场。所以，在这篇政论文章中，他同样强烈地要求有关当局，能在工人们聚居的生活场所组织建设公园、运动场、俱乐部等，以为工人的业余文化体育活动提供条件。

在李大钊的思想认识中，非常注重健康活动中的“动以养生”。他认为:“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所以他曾对友人说：“西洋文明为动的文明，中国文明为静的文明。惟其动也，

[1] 陈独秀. 新教育是什么样//戚谢美，等. 陈独秀教育论著选.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289.

故进取；惟其静也，故保守。”[1]

（三）毛泽东论体育

毛泽东（1893 — 1976年），又名润之，湖南湘潭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五四运动前后，每个中国人都在努力探索着各种各样的救国救民的道路，正在长沙省立第一师范学习和工作的毛泽东，同样也在考虑着这一问题。由于近代以来，中国人常常被帝国主义者蔑称为“东亚病夫”，所以当时的毛泽东也曾一度把目光放到了走“体育救国”的道路上。早在1913年春天，毛泽东就曾在湖南省图书馆大量阅读了18、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学者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代表作，对严复的《天演论》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进行过深入的钻研，接受了进化论思想，并推崇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出的“三育并重”的观点。所以1917年，他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新青年》杂志第3卷第2号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的著名论文。文章以近代科学的眼光，就体育的概念、目的、作用，以及体育与德育、智育的关系，体育锻炼的原则和方法等问题，均作了详尽的讨论，闪烁着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光辉。文章除前言外共分8节：释体育；体育在吾人之位置；前此体育之弊及吾人自处之道；体育之效；不好运动之原因；运动之方法贵少；运动应注意之项；运动一得之商榷。

毛泽东在文章一开始就通过揭示中国积弱的现象，而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体育的重要性。他说：“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而究其原因，则在于在体育问题上，“提倡之者不得其本，久而无效”，他认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因此他说：“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

[1] 谷世权. 中国体育史. 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7：247.

效远。”那么，什么是体育呢？他的理解是：所谓“体育者，人类自养其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因此他说：“故夫体育非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这样的认识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深刻的。

关于如何才能够获得体育锻炼的效果？毛泽东的理解是：一要有锻炼的自觉性。“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二要有恒。“日以为常，使此运动之观念相连而不绝，今日之运动承乎昨日之运动，而又引起明日之运动。”三要充满兴趣和快乐。因为“兴味者运动之始，快乐者运动之终；兴味生于进行，快乐生于结果。”所以运动中的兴趣和快乐都是很重要的。由此，他对当时学校体育中存在的一些不良倾向，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比如体育课程设置，“多有形式而无实质”的问题；体育课教学时，“教者发令，学者强应，身顺而心违，精神受无量之痛苦”的问题；以及教室光线不足、学校不讲卫生的问题等等。总之，毛泽东认为：体育具有“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使人“身心并完”的作用。因此，国家提倡体育，从对个人来说，则可以“养生”；从对国家来说，则可以“卫国”。所以他主张通过发展体育，走救国救民的道路。

（四）恽代英论体育

恽代英（1895 — 1931 年），江苏武进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和青年领袖。1917 年前后，恽代英正在武昌中华大学学习和工作。当时他对体育的关注，更多地是站在学校如何关心全体学生的健康这一角度上。在 1917 年的《青年进步》杂志第 4 册上，他发表了《学校体育之研究》的重要论文。他首先在关于学校体育的目的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学校之不可不重体育，此不待烦言而解。然学校之重体育，果应以何者为目的?”却在理解上很不一样，有的“以行军国民教育”，有的“以保卫学生之健康”，有的“以此为每年运动会唯一之预备”。恽代英认为，学校体

育的目的，应该加以澄清。他的理解是：学校体育就是“保学生健康”，“应对于各学生，无论其体质强弱，平均加以注意。”而不是“除例行的体操外，毫不加以注意。而于其中有运动能力者，则注意特甚，以为不如此不足以使学校名誉飞扬。”

恽代英对当时学校体育中比较普遍存在的“军国民体育”和“选手体育”的做法，均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说，军国民体育，其结果就是学生“究其对于强健身体之关系，毫不知晓，终无异于军队之从鞭笞教令中得来学问者而已。”而选手体育的危害呢，则是让更多的人“骛于虚荣，枉正道以求不可必得之名誉。”所以他指出：“吾国学校之体育，断不可不研究改良。”要“改片断的体育，为有系统的体育；改偏枯的体育，为圆满的体育；改骤进的体育，为渐进的体育；改枯燥的体育，为有兴趣的体育。”他甚至还向当时的学校体育工作者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革建议和措施。主要包括：一是要加授生理卫生学；二是要定期对学生进行体格检查；三是要增加学生体育锻炼时间；四是要提倡在学校中多开展田径、球类运动；五是要注意运动安全；六是要注意女生特点，认为学校的“女学之体操，不应与男子学校同一宗旨，同一手续”。总之，他认为：学校必须重视体育，学校体育的目的必须明确，学校体育应有好的措施和方法。只要学校体育能对“各学生，无论其体质强弱，平均加以注意。苟各学生之体育皆可以及格，虽夫何特优之运动家，在运动会中不能出人头地，而就学校天职言之，已无愧能尽其职者。”❶

五四前后，恽代英还对婴幼儿体育、妇女体育，以及各级学校的体育进行研究。他对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体育、美学、伦理学等学科曾广泛涉猎。他很强调德育、智育、体育的三育并重教育，主张“小儿运动决当于襁褓时即行之”。主张设立儿童院和儿童俱乐部。主张小学生应操“八段锦”，以作为课间体操；课外可开展踢

❶ 恽代英. 学校体育之研究. 青年进步，1919（4）.

毽子、打球、跳绳等活动。主张中学也应开展早操和课间操活动。大学，则应是“任其组织足球、网球会，课余自由游艺。”他主张体育与卫生相结合。认为“无论男女，皆当以卫生之念”，使自己在日常饮食、起居、睡眠等诸方面，养成良好健康的生活习惯。1921年10月，他受聘出任泸州川南师范学校教务主任，不久便带领20多名师生走访川南各县，进行宣传演讲，说明体育的重要性。正是在他的发动下，终于在1922年4月召开了川南联合运动会，从而推动了川南地区体育的发展。

恽代英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青年领袖，对体育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亦非常关注。在他主编的《中国青年》杂志中，刊登了不少关于体育研究的文章。如在第57期上，转载了一篇《南洋周报》上的文章《打倒贵族式的体育制度》，他还专门为其加了按语，以表示他对当时体育发展中所存在问题的态度。他对当时“每个学校都有许多缴了体育费而不能享受体育权利的学生”的现象，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说：“有些卑陋无识的办学者，因为要在球战运动会中为自己的学校争声誉，不惜牺牲全校青年之体育权利，以供养几个贵族式、军阀式的选手。这是何等不平，何等急待改革的事呢!”[1] 因此他们明确指出：学校体育的目的，就是“保学生之健康”。

（五）周恩来论体育

周恩来（1898—1976年），江苏淮安人。1913—1917年间，曾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一年半。1919年4月回到母校，即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青年时代的周恩来，对体育已有自己的独到的认识。在中学毕业时他曾写道：国民教育“莫不以发达身体、陶养性情为第一要务，知识之启发尚次

---

[1] 恽代英. 打倒贵族式军阀式的体育制度. 按语. 中国青年：汇刊第3辑第57期//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 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 1988：392.

之。”认为只有“健身体”，才能“根基固”。他多次撰文指出：学生在校读书，一定要“三育竞进”，强调“读书、励行、健身。”他反复说明，学生的成长“不外进德、修业、锻炼身体三项”。因而在南开读书的日子里，他一直自觉认真地进行各种各样的体育锻炼，包括练长跑、打网球、打篮球、打排球、踢足球等等。他曾是班级“勇”队的排球主力队员之一，在班级跳高比赛中，获得过第三名的好成绩。他热衷于对体育的提倡。1916 年他被选为“敬业乐群会”会长时，主要负责童子部的工作，他特别注意为儿童体育活动的开展创造条件。在体育宣传方面，他更是一位积极分子。有人研究发现他在南开求学期间，曾给校刊写过 79 条体育报道，校刊上几乎每周都有他写的体育消息。南开学校有重视体育的传统，每年都要对学生进行一次体格检查，规定学生必须参加体育考试。身为校刊纪事编辑的周恩来，就以“考试合格”为题，在校刊上连续写了七期纪事，进行宣传配合。

1918 年秋，周恩来留学日本时，也曾积极组织中国留学生进行郊游、游泳、旅行、爬山等活动。甚至在 1920 年 1 月因参加五四运动被捕和受拘禁的困难条件下，他仍坚持做操以锻炼身体[1]。

（六）杨贤江论体育

杨贤江（1895 — 1931 年），生于浙江余姚，中国现代教育理论家。1917 年毕业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1920 年和李大钊、恽代英等 7 人被选为中国学会评议员，1921 年担任《学生杂志》编辑，约于 192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以李浩吾、叶公朴、李谊、曲它等笔名写过许多文章。最著名的教育著作有《新教育大纲》和《教育 ABC》等，是我国用马列主义观点研究教育史和教育原理的较早著作，对我国无产阶级的教育理论研究有开拓性的作用。他努力于文化教育战线上的革命斗争，在青年中威信很高。在他的

[1] 邢捷. 五四运动前后周恩来同志的体育活动. 体育文史，1984（2）.

教育著述中，有不少关于青年健康和体育的文章，如《体育的四大要素》《我所希望于今年的学生的》《好习惯怎样造成》《健康第一》《怎样保持健康》《青年与游戏》《课外活动与实际生活》和《莫忘了体育》等等。

在这些文章中，他对体育有多方面的论述。他提出："体育是造成健全人格、养成具足人生的工具"，"体育的目的在使感觉灵敏、姿势优美、筋肉发达、内脏完整、动作敏捷、精神充实，一句话，是在造成强健而美的体格和本质"。他曾在研究中指出，体育的效能是什么？体育的效能就是可以增强体质和健康，所以他说"运动、体操为养身之必需"：就是可以使感觉敏锐，思维发达，所以他说"平时迟钝的儿童，若常练习，可以为敏速"；就是可以锻炼意志，所以他说"体质弱者，意志亦弱。故吾人不时应养成坚强之体魄，使真体内充"；就是可以养成团体生活习惯，所以他说"游戏是必需品，不是奢侈品"，"游戏的真正意义，在于培养团体精神"，而登山旅行则是培养不畏艰险、勇敢、顽强等意志品质的良好方法。

杨贤江特别强调体育内容中的运动与卫生问题。他说运动是青年生活的重要内容，每天应该有 2 小时的运动。至于运动的具体内容，他认为可根据需要自行选择，因为"体操、竞技、拳术、球戏、登山、徒步、骑马、游泳、跑步等等，都可以达到体育之目的"。但是他认为运动的目的是发展身心。因此对于那"为出风头的体育政策，我们是反对的，轻视的"。在卫生问题上，杨贤江的认识是："卫生，是保持健康，增进活力，健全心意之谓。"卫生应包括物质卫生（清洁、节制）和精神卫生两种。在精神卫生方面，他说："吾人的精神生活应该是活动的（发达身体），奋斗的（有进取心），多趣的（天真乐观），认真的（真情实感）。"所以在体育的锻炼方法上，他主张持之以恒，动静结合，适量不过，讲究实效。杨贤江还提出，参加体育锻炼要提高自觉性，要"信仰体育"，把参加体育活动视做个人"应尽的义务"，而最终要"使能在

健全人格上发出效力来”，以准备担负改造社会的重要使命。他还说过“纵然无病，纵是强健，乃与真实的人生无补，有何足贵？牛不是有大力气吗？但谁愿做牛！”杨贤江在当时青年中享誉甚高，被视为良师益友，从他所主编的《学生杂志》的《通讯栏》中可知，不少青年在他的指导和启发下进行工作、学习和体育锻炼。

三、民主与科学思潮对近代体育发展的影响

正是在民主与科学思潮的影响下，在一批社会精英的高度关注下，中国近代体育在五四运动前后开始走上了初步的现代化。

（一）促进了体育价值观念的变化

虽然在当时落后的国情条件下，仍有人继续关注体育的强兵、强种、强国作用，但健身、娱乐、竞技的体育观念逐步确立。例如在1921年6月5日出版的《申报远东运动会特刊》上，人们对举办国际运动会，对奥林匹克运动所体现的那种和平与友谊的宗旨已有了一定的认识：“国际运动会者，破除国界，避免战争，保持和平之具也。”是“奖励文艺，沟通民情之具也。知乎此，则远东运动会为非虚设矣。不然徒论分数与锦标之多寡”，“则去希腊奥林匹亚运动会之本意远矣”。当然，人们同时认为，国际赛场也是一种国力强弱的相互竞争，体现国民的素质。即如1921年5月30日《申报》的《远东运动会特刊叙言》中所说：“所谓强与弱者，不经比较，无由而知。然由弱而至于强，不经修养，无由而得。故欲强国家内之各个人者，其途径有二：临时之比较与平时之修养是也。假使平时之修养不知，则临时之比较自劣，此一定之理。”所以在1924年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章程》中，非常明确地指出：通过体育竞技活动，可以达到“联合全国体育团体，以促进国民体育”的目标；通过提倡全国之业余运动，还可以增进运动员的运动道德等等。在我国参加的远东体育协会的《远东

体育协会章程》中，也写有这样的话：通过体育的竞技活动，可以促进个人和社会体育，提高业余运动界竞技标准与求运动成绩普遍的进步，以及增加国际感情。其最终目的，广而言之就是为振兴各地的运动精神。一句“运动精神”，正是当时中国人对体育竞赛活动本质内涵的解读。

体育不仅是一种比赛，也应该是一种休闲和娱乐。所以，1920年首先有麦克乐在其《新体育观》中指出：就体育而言，“我们的宗旨，不能只讲运动，乃是利用运动，供给儿童一个境遇，激动个性，按阶级秩序来发展。使他在游戏的里边，得着良好的习惯，也可得着能力的经验，准备他的生活。”麦克乐说：正因为如此，“所以采用的教材，是要变通儿童心性的发展，不是拿儿童的心性来迁就教材的。”“游戏的种类，就是按着儿童的年岁和本性发展的阶级排列的。”麦克乐甚至主张：国家“最好在各处派定公共运动指导员二三人，使其一面在城内空场提倡种种游戏运动，一面又在学校与体育教员联络，组织学生服务团使学生将习得之游戏与运动，于课暇分教全城儿童。”[1] 所以，在1927年12月召开的第10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决议案件中有这样的记载：“小学应切实实施休闲教育案。”其中指出：“小学皆兴味教学，教学即娱乐。”明确要求每日正课外和星期日，学校应安排有各种各样的休闲活动。其中与身体有关的活动有“球术、游戏、田径赛、跳舞、国技等”。综合性的活动，则包括运动会、游乐会等。在1927年第102册的《青年进步》杂志上，发表有郝更生的《十年来我国之体育》一文，其中也说到体育就是“用天然及科学方法，以谋求个人身心上之进步，俾享有快乐及康健之生活也”。

但是，仅仅是比赛，是休闲和娱乐，还不是体育的完全真实和体育的全部。所以，人们在充分肯定体育竞技、休闲和娱乐价值的同时，仍始终把体育对人体的最本质的健身作用放在首要位置上。

---

[1] 麦克乐. 五十年来中国之体育及武术//《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 1923.

1923年，杨贤江在《青年对于体育的自觉》一文中说："我们的体育目的，是在使感觉灵敏，姿势优美，筋肉发达，内脏完整，动作敏捷，精神充实；是要使天然的一架人间机器，能运用得法而且充分；能常保光泽而且结实。总结一句：是在造成强健而美的体格和体质。"他说："我有一句话劝告青年：在你的每天的生活中，切不要忘记最和你有关系的体育生活啊!"因为"体育生活就是使你保住健康，增进健康的。缺少体育生活的人生，决不是具足的人生。"他要求青年"应懂得体育运动的真义，使能在健全的人生观上面发生出效力来。"[1] 所以，在1923年，在《请规定师范学校体育教育方针案》中有如下的表述："师范学校教授体育有二大目的：1. 健身目的；2. 教学目的。教朝操及课外运动，完全为健身起见；教正式体操课，完全为增高体育知识技能，以为将来担任小学体育教员之准备。"[2] 麦克乐在《体育的将来》一文中也谈到了体育对体格锻炼方面的作用，他说在体育中因为重视教育，注重娱乐，已经剥夺了很多对体格健康的注意。教育与娱乐固然重要，但是器官的健康更为重要。于是他说："我们需要悬垂运动发达胸部，也需要运动的刺激以改进其内部器官的机能。我相信对常态体力的发达，将要有合理的注意。"他还特别提出了5个有利于体格健康发展而应该思考的问题。对体育健身作用的特别关注，当然还与近代中国人始终认为人体强壮，国家也就能强大的认识是联系在一起的。如1921年5月30日，《申报》在《远东运动会特刊叙言》中仍是这样强调为什么要关注远东运动会的理由：那是因为"国家之强弱，由于各个人之强弱。弱积而成也。故欲强国家者，必先强其国家内之各个人。"而体育则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

---

❶ 学生杂志，1923，10（4）：1-6.

❷ 国家体委文史工作委员会. 中国近代体育议决案选编.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36.

（二）促进了体育基础学科理论的发展

首先，在自然学科方面，1920年麦克乐在《新体育观》中明确提出了体育的发达，要以新科学作为根基。他在这篇文章中，就“身体的功能与构造”“器官运用之分别”和“本能发展之秩序”等一系列的体育自然科学课题，进行了说明。所以，1920年，上海青年会出版发行了他的重要体育自然科学著作《体育上肌肉动作应用表》。1921年，又有中华书局出版了由沙井特著、江孝贤译的《健康学》，内容分运动、饮食、淋浴、睡眠、衣服等20章。特别是1924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本《运动生理》著作，作者程瀚章在这本书中就“人生与运动，运动的生理本态，运动生理学的分类，运动对于血液、循环器、呼吸器、消化器的影响，疲劳”等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讨论。同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气候与健康》一书，作者顾寿白。1925年，又由上海青年会出版了《健康与卫生》，作者胡贻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救急法及卫生大意》，作者杨鹤庆。1927年11月，中华书局又出版了葛绥生的《运动与卫生》一书。

其次，在社会人文学科方面，主要有1917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运动技术概要》，这是由远东运动会中国委员会编著的一部技术性著作。内容包括远东运动的概略、章程，各种运动方法，历届远东运动会成绩等。1919年10月，由南京共和书局出版了王小峰的《小学联合运动会组织概要》，书中对“运动种类，组合方法，分组，审查，裁判员”等进行了介绍。同年，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体育史》。1920年，广州青野书店出版了黄祥霖《学校体育行政》一书，这是一部全面讨论学校体育问题的专著。全书共分8章，主要有“学校体育行政意义、精神，研究教员修养，体育管理法，发育论，体育卫生，体育统计法，学校体育视察”等内容。同年中华书局还出版了由江苏省教育会体育研究会编写的《体育之新研究》，包括“女子体育原理，中小学当注重

课外运动”等内容。特别是1924年10月，中华书局出版的罗一东写的《体育学》，是一本较为完整的从宏观上讨论体育问题的社会科学专著，共分总论、发育论、运动论、卫生论、实施方法论5个部分。其总论部分有6章，分别是：第一章体育之意义；第二章体育为人生要素之一；第三章体育与精神之关系；第四章体育与人生观；第五章体育之划分；第六章体育学与其他科学之关系。下面再分四编。第一编发育论，有12章，分别是：第一章细胞分裂与身体之发育；第二章个体发生与系统之发生；第三章骨之发育；第四章筋肉之发育；第五章呼吸器之发育；第六章循环器之发育；第七章脊柱之发育；第八章儿童发育之秩序；第九章儿童发育之各期所生之影响；第十章儿童游戏之特质；第十一章青年期游戏之特质；第十二章儿童体重与身长之增加时期。第二编运动论，有7章，分别是：第一章运动之生理的分类；第二章运动及与筋肉之效果；第三章运动及与神经系统之效果；第四章运动及与血液循环之效果；第五章运动及与呼吸系统之效果；第六章运动及与消化系统之效果；第七章运动及与排泄系统之效果。第三编卫生论，有5章，分别是：第一章卫生之定义及目的与方法；第二章卫生学之区分；第三章由外来原因所起之健康妨害；第四章传染病；第五章沐浴及于健康之研究。第四编实施方法论，有3章，分别是：第一章实施方法之类别；第二章自育实施之方法；第三章十分间体操。

同年，上海东亚体育专门学校还出版了庞醒跃的《体育哲学管理》，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讨论了体育范围、目的意义，游戏与体育，人生发育秩序，瑞、德、美体操之比较等问题；下编讨论的是具体体育教材，以及运动会、体育场管理办法等。1925年，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又出版了张信孚等的《体育与人生》一书，该书着重讨论的是“体育与人生健康的关系，体育与心才发展，体育与社会”等问题。1926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郝更生用英文撰写的《中国体育概论》一书。该书对当时的中国体育界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亦如后人所评论的：郝更生“于1926年用英

文编写出版的《中国体育概论》，是一部目前留存极少但很有价值的专著。这首先体现在它的开拓性：迄今为止，我们还没发现比其更早的主要是面向外国人的中国体育的英文专著，特别是在当时西方体育在中国渐为流行之际，作者的这种举措是难能可贵的。再者，是它的史料性：该书上至黄帝，下至当时，全方位地探讨记述了中国体育的历史发展和当时状况；为当今的体育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可贵的资料。其三，是它的学术性：本书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我国体育界理论研究的水平，还多方面地体现出作者的独到见解，有些观点至今仍有学术价值。”❶ 应该说，这样的评价是比较客观和准确的。

再次，在民主与科学思潮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学校体育也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即学校在设置体操课程的同时，也吸取教会学校的普遍做法，广泛开展课外体育活动。而且，在课外体育活动中，又主要实施的是田径、球类等近代运动项目。这就使学校体育由过去的单纯体操课，逐渐向体操课加课外体育活动的形式（即所谓双轨制）过渡，并最终于 1923 年，使在中国实行了 20 年之久的兵操教育，在学校体育中彻底废除。

第三节 国粹文化思潮

所谓国粹，从字面上可理解为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固有的长处与优点。而实际上在国粹文化思潮中，人们对它的理解可归纳为三种：一是在广义上，泛指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二是指中国文化的精华；三是指中国文化的民族精神与特性❷。现在我们对它的理解一

❶ 郝更生．中国体育概论．译者的话．曹守和，等，译．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3：1.

❷ 郑师渠．晚清国粹派．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7.

般还是定位在民族精神和民族遗产的意义上。国粹一词不是中国固有的词汇，它是20世纪初留日学生从日本直接引进的一个汉语造词，后来逐渐在中国流传。

一、国粹文化思潮兴起的时代背景

中国近代史上的国粹文化思潮是从20世纪初开始掀起的，其主要原因是甲午以后，尤其是1900年之后，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已完全沦为半殖民地社会，亡国之祸迫在眉睫。而且，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民族危机不同，此时的入侵者不仅拥有经济、军事上的优势，而且在文化上也居于领先地位，并注重使用文化侵略的手段，这是一种带有毁灭性的而且不易被广大人民所识破的侵略行为。因此，一批头脑清醒的爱国知识分子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说："其亡人国也，必先灭其语言，灭其文学，以次灭其种性，务使其种如堕九渊，永远沉沦。"[1] 他们指出：文化乃是一个民族的"元气"，是民族延续的根本，"学亡则国亡"[2]。所以，他们提出要进行文化救亡，从而掀起了一个以"保种、爱国、存学"为目的的国粹文化思潮。力求通过一场"古学复兴"运动，以再塑中华。特别是他们面对当时中国出现的一种主张"全盘欧化"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认为更应思考中国在如何学习西方获得发展的同时，又能避免重蹈西方的覆辙。正是在这种反思中，他们开始重新评估传统文化的价值，并主张向传统文化复归。如章太炎说："近来有一种奴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盲目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

---

❶ 邓实. 鸡鸣风雨楼独立书、人种独立策一//光绪癸卯政艺丛书：上编一. 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73.

❷ 黄节. 国粹学报序. 国粹学报，第一年第1册第1期.

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1] 由此可见，当时的国粹文化思潮，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着很强的现实用意，所以国粹派一经出现，便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共鸣，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文化思潮。

二、国粹文化思潮的代表人物及其主张

国粹文化思潮当时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发展。国外的发展有着较为明显的反清色彩，所以与革命派的关系密切；国内的发展则有着“抑西扬中”的基本文化取向，表现为文化保守。国粹文化思潮的代表人物有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在体育界的代言人物主要是马良和蒋维乔。

（一）马良的国粹体育

马良（1878 — 1947 年），字子贞，河北保阳人。中国近代武术家。他幼承家学，后从平敬一学少林拳和摔跤术。清末从戎，任军职至旅长兼济南卫戍司令官、济南镇守使。马良曾将所习拳技和摔跤术参照兵操练法，编成新式武术法，在其任职的武备学堂和军旅中传授。1911 年马良任陆军第九协统驻扎山东潍县时，邀集一些武术名家，发起编辑武术教材，定名《中华新武术》。1914 年，马良担任陆军 47 旅旅长兼济南卫戍司令官时，再次广邀各派武术专家修订了《中华新武术》。马良为什么要搞新武术？这是因为他认为：“考世界各国武术体育之运用，未有愈于我中华新武术者。”所以他说，中华新武术，“我国之国粹，我国之科学”。他甚至建议在全国推行一种标志各级官阶身份、共三等九级的“佩剑制度”，以发扬中国传统的“武德”和“武风”。

[1]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272.

客观地说，作为一名武术家，对中国传统武术进行研究、推广，是无可非议的。但马良的问题是，他的真正用心，在当时则是想借推广所谓中华新武术、所谓国粹体育之名，而行抵制奥林匹克运动、抵制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为实。所以，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当时先进社会力量的猛烈抨击："近来很有许多人，在那里竭力提倡打拳。记得先前也曾有过一回，但那时提倡的，是满清王公大臣，现在却是民国的教育家。"他们"把'九天玄女传与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与尼姑'的老方法，改称'新武术'，又是'中国式体操'，叫青年去练习"[1]。当然，正像鲁迅先生在《拳术与拳匪》中所说的："中国拳术，若以一种特别技艺，有几个自己高兴的人，自在那里投师练习，我是毫无可否的意见"，"现在反对的，便在：（一）教育家都当做时髦东西，大有中国人非此不可之概；（二）鼓吹的人，多带有'鬼道'精神，极有危险的预兆。"鲁迅的批评，不仅有利于维护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方向，而且也引导了近代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健康发展。

（二）蒋维乔的国粹体育

蒋维乔（1873—1958年），字竹庄，号因是子，江苏武进人。中国近代气功养生家。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秘书长、北京政府教育部参事等职。1914年，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蒋维乔写出《因是子静坐法》一书，首先在北京大学提倡"静坐法"，而后风行全国。学校里，特别是大学，教师、学生大都积极效法，有的还把"静坐"编入课程，大学生们组织起了自己的"静坐会"。在社会上，仅以提倡静坐的湖南"同善社"为例，其触角遍布18个省，就连偏僻的小县，差不多都有它的分社。《因是子静坐法》一书出版后，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更是再版14次之多。难怪当时有人惊叹："民国以来，于今也有8年，什么教育、实业、政

[1] 鲁迅．随感录三十七．新青年，1913.

治，丝毫没有长进，”“独有两件事情，我国国民的程度可长进了。第一样是扑克，第二样是静坐。我国男女老少，除了正正当当劳工不计外，差不多没有一个不是内行。”“静坐几乎成了国民的趋向。”确实，仅就静坐本身而言，它是一种健身方法的介绍，能够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但在一个旧势力十分强大而又不好运动的国度里，竭力地进行提倡，上升到国粹的高度，而且对其消极的方面又未加提示和批判，这就在客观上迎合了当时社会上一批反对新文化、固守旧文化的封建势力的政治需要。所以，有人批评说：“这样子的静坐，即令能却百病，能延年，也不过替我们中国多造些人类的寄生虫和社会的蟊贼。”[1] 当然，也阻碍了现代体育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因为它宣扬的是静的体育。所以，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同样批评说：“静坐之法，为朱陆之徒者咸尊之。近有因是子者，言静坐法，自翊其法之神，而鄙运动者之自损其体。是或一道，然予未敢效之也。愚拙之见，天地盖唯有动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后的蒋维乔虽仍然推崇国粹文化，特别是他创编的《因是子静坐法》，但在对体育的理解上则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和变化。1920 年，他在《我的体育观》中说：“近十几年来，大家知道国家衰弱，是因为国民体魄之不强，所以提倡体育的呼声，几乎遍满全国。”然而他说：“我要问我国的体育家，在实施体育的时候，究竟在这育字上面有十分的领会么?”他认为：要理解体育，首先要知道“我们这个人，是物的方面心的方面两者合成的。物的方面就是肉体，心的方面就是精神。所以讲到体育，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可偏废的。体操和运动，虽然可以强健筋肉，活动血脉，实在它的效验不过偏重于肉体罢了。至于精神，就不能顾到。所以于‘育’字未必完成。依我的见解，必须兼用修养的功夫，方得完成此‘育’字的意义。”因而他特别指出：“我所以主张动的修养，静的修养，两者并用。动的修养就是体操和运动，务

[1] 僻静坐. 体育周报，1919（11）.

必要使学生知道此等体操运动的真正好处，于生理上种种益处。自己站在自动的地位，不要看做照例功课。”而“静的修养，就是叫精神安静”。他说：“我从前曾做过一册因是子静坐法，说得十分详细。能够照这方法去做，固然极好。如若不能照样做，也要每天规定一时一刻，闭目静虑，叫精神可以休息休息才是。”[1] 从中可以看到，此时的蒋维乔对东西方两种体育文化的互补性，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三、国粹文化思潮对近代体育发展的影响

国粹文化思潮对近代体育发展的影响首先是武术走进课堂，从而在学校体育教育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此外，是加快了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挖掘、整理与改造，从而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更能适应现代社会人们的需求。

（一）武术走进学校课堂

1914 年，徐一冰在《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中，就已主张将武术列为高等小学、中学和师范学校的体育课正课内容。1915 年 4 月，北京体育研究社在“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次会议上，也曾委托北京教育会代为提出《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议案。文件在批评当时学校体育“皆袭他人之形式，未克振己国之精神”的前提下，根据“近年北京、天津之体育社，北京各学校之教授拳术，青年会且特开此班，南中运动会亦演此术”的实际情形，认为中国武术进入学校课堂的条件已经成熟，因而提出了三项建议：一是拟请于学校体操科内兼授课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必修科以振起尚武精神，并具体提出可将“小学体操科目改列为游戏、普通体操、武术；中学改列为普通体操、兵式体操、

[1] 蒋维乔. 我的体育观. 长沙体育周报：特刊，1920（1）：19.

武术。二是拟请教授武术者编定讲义，说明原理，用科学的目光唤起学生之注意。三是拟请于师范学校内将中国旧有武术列为主课，以裕师资。这一提案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同，并呈报教育部。后教育部采纳了上述建议，明令“各学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此项教员于各师范学校养成之”。

1916 年，教育部还委派许禹生、孔廉白等人赴济南考察马良推广的“中华新武术”，审查了由马良创编的《中华新武术》系列中的《摔角》和《拳脚》两科教材，并建议将《中华新武术》作为学校教授武术的参考用书。

许禹生（1878 — 1945 年），北京人。因幼时多病而发奋习武，先后师从刘德宽、杨继侯，精太极、八卦及其他诸家拳艺。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科，获学士位。1912 年在北京创办体育研究社，曾任私立北京体育学校校长多年。30 年代起，先后任行政院咨议、教育部体育委员、北平市国术馆馆长、北平市体育委员、北平市立体育专科学校校长、北平市社会局体育督学等职。许禹生除精于武术技击外，亦兼重学理。曾主编《体育季刊》和《体育月刊》等武术杂志。撰有《太极拳图解》《罗汉行功法》《国术要义》《少林十二式》等著作。

1918 年，全国中学校长会议又决定“以《中华新武术》列为全国各中学校正式体操”。同年，在上海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教育联合会，也一致通过山东代表提出的“以《中华新武术》列为全国高等以上各学校并各专门之学校之正式体操”的建议。所以，1919 年 4 月 17 日，北京政府教育部专门发了一个《教育部关于提倡中学校练习武术咨》，强调指出：“查吾国固有武术，于锻炼身体裨益甚多，自应提倡，以存国粹。”文件说，同时考虑到“惟现在师资、课本均属缺乏，此项练习尚难一律实施。嗣后各中学校如能聘有相当教员，自可列为体操课程之一项，以时练习。其试验成绩，应并入体操及各种运动分数内计算，借以唤起学生之注意。”1919 年秋，经国会辩论，最后通过了“中华新武术”为全国学校正式体操的决定，并通令全国实

行。从此，武术成为学校体育课程中的一项重要的合法内容。

据北京体育研究社1924年6月对北京、河北、辽宁、吉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江西、安徽、福建、浙江、陕西、四川、广东等40所中学以上学校的调查，将武术列为正课的（含选修课）占52.5%；只在课外开展武术活动的占22.5%；未列入正课，课外亦无开展的占25%。很多学校反映，武术列入正课，学生对之颇有兴味[1]。武术课程走进学校，不仅改变了社会上对传统体育的偏见，而且也对武术的新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由于教学的需要，使传统拳路的整理、武术理论的阐述和武术教材的编写，在这一时期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具体表现为：

一是人们开始运用近代西方体育理论，求解民族传统体育的锻炼价值和作用。即对武术的认识，从“致用之志”的观念，向“卫生之方”的观念转变，更多地从培养“身心并完”的人的角度，站在“体育真义”的立场，去求解民族传统体育的锻炼价值和作用。这首先是当时政府的要求。在1919年4月16日《教育部关于采录体育咨询案办法咨》中，明确提出学校要“注重国技”。认为“夫一国之体育，必须具一国之精神。我国武术，实中华民族精神所寄，且种类颇富。其与生理原理相合者，务须选择加入，以为体育之基本。”[2]所以同样是练气、练力、练形、练技的过程，但以往人们更多的是从掌握某门技术或提高技击效果出发，重在自卫应敌。“夫技击之学，重自卫以备非常”，认为“小效卫人，大效卫国”，这才是武术教学的根本（《中华新武术·拳脚科》）。然而现在不同了，人们开始从身体锻炼的意义去定义中华武术。如在1919年北京体育研究社呈教育部的《请定武术教材文》中，人们的认识是：“我国拳术以美术技能之兴趣，引人入胜锻炼身体，能使全体内外身心二者平均发育。”因而应以“最良好之运动法”加以提倡。由此，一些武术家开始参考体

[1] 段钢成，等. 中国体操学校//体育史料：第七辑.

[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857.

育图书，并按生理学的基本原理，将拳种分为对人体具有健身价值的三种类型，以示区分。如将形意拳、八卦掌、八极拳、罗汉功等运动较为迟缓，又富于注意力的拳术，归为“强健筋肉、发展体力”的类型；将具有运动捷速、跳跃便利特色的各种长拳，归为“活泼肢体、敏捷思想”的类型；将少林十二式、太极拳以及各种气功类的拳术，归为“流通气血、强健精神”的类型。此外，他们还研究了如何根据不同年龄和生理特点而进行的拳术分类标准。提出“多好活泼又好繁华”的年轻人，宜习潭腿、查拳、翻子、八卦、红拳、少林等“绚烂猛烈之拳术”；“骨节不甚柔软、跳跃亦微觉困难”的中年人，则宜习太极、八卦、形意等“手法既极简单、步法又不费力”的拳术等等，从而拉近了与近代西方体育科学的距离。

二是人们开始注意对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方法的改造和研究。中国传统武术的教习大多采用个别辅导和单独习练的方法，这种教学显然不适合学校的武术教学活动，因此，一些武术家又开始了对武术教学方法的改造和研究。主要有对传统拳路练习法的改造和对拳术基本动作的重新整理与编排。对传统拳路练习法的改造，主要是变单人教练为团体教练。其具体做法是将每一拳路分解为不同的单式，再按拳路顺序连接成不同的段趟，配以口令，分段练习。据《体育丛刊》记载，北京体育研究社曾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并坚持了多年。“自民国纪元，吾社（北京体育研究社）成立，京师各校渐向社中聘请教员，教授斯术。乃查照体操教练规程，订定团体教练之法”[1]。

对拳术基本动作的重新整理与编排，主要是“依学拳术当然之顺序，按习他种科学方法排列之”。其具体做法是从风格各异的传统拳械套路中，选抽出一般的基本动作，再按武术套路的基本原理，编排成新的各式招势相承的练习。其较具代表性的成果是《中华新武术》。

---

[1] 何启君，胡晓风. 中国近代体育史. 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9：143.

（二）加快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挖掘、整理与改造

从挖掘与整理方面来看，这一期间的主要成果有尊我斋主人著《少年拳术秘诀》，陆师通、陆同一著《北拳汇编》，以及《易筋经》《八段锦》《十二段锦》《少年拳术》《精义拳经》《拳术见闻录》等出版物[1]。在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改造上，则主要表现为大量新武术学说和方法的诞生。如在出版物方面有唐范生著《武术的研究》、许宠厚著《太极拳学》、孙福全著《形艺意（拳）学》和《八卦掌学》、徐愚忻著《拳术学教科书》、朱鸿寺著《拳艺学初步》和《拳艺学进阶》、向逵著《拳学》、马良著《中华新武术》和王怀琪由多个出版单位出版的多部著作等，其中以王怀琪的贡献最大。

王怀琪（1891—1963年），中国体操学校第4期毕业生，近代武术家，曾长期在上海的中学里任教，主要从事中小学体育教学研究，在学校体育界有很大影响。王怀琪出版有多部著作，如由大东书局出版的就有《易筋经十二式》《易筋经廿四式》《女子八段锦图》《五禽戏舞蹈图》《五禽戏图》《八段锦全图》《八段锦教授图》《笼球游戏》《室内棒球术图解》《最新女子篮球游戏》；由中国健学社出版的有《女子跳舞挂图》《女子叠罗汉挂图》《袖珍八段锦图》《体育测验法》《星球规则》《徒手游戏三百种》《同阵游戏大全》《鞭打游戏》《跳舞场》《三段教材(正编、续编、三编)》《庆祝体操》《国耻纪念体操》《图阵联络体操》《中国叠罗汉》《叠罗汉大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反正游戏》《国旗体操》《手巾体操》《女子手巾体操》《堆砌图案》《西湖风景叠罗汉》《徒手叠罗汉》《器械叠罗汉》《跑冰术》《八段锦舞》《八段锦》《实验深呼吸练习法》《业余运动法》《易筋经二十四式图说》《易筋经十二式图说》等。早在1913年，王怀琪就开始

[1] 马良．中华北方武术体育五十余年纪略．体育与卫生，1924，3（3）．

对中国传统的“八段锦”参以今之体操动作，改编成《中国十分钟体操》，后改名《中国体操八段锦》。他还将中国传统的“易筋经”改编为《易筋经廿四式》，后又改名为《中国体操易筋经廿四式》。改编后的“八段锦”和“易筋经”，由于其“方法不难，而运动量不过高深，且收效宏远”，从而受到学界的普遍欢迎，商务印书馆也曾为此多次再版，还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1]。

除武术以外，人们认为，传统的民俗体育活动也应提倡，“如旧历正月之演狮灯，习诸武术；端阳之竞龙舟，奖励竞漕；他如骑马试剑，斗鸡走狗，田猎射击，角艺围棋，赌弹击球诸事”[2]。

民族传统体育改造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仿照现代西方体育的形式召开运动会。如 1923 年长沙举办了类似的“风筝运动会”。在其竞赛规程中，已有着浓厚的近代体育比赛色彩。它有比赛的宗旨：“以提倡民间固游戏，增进民众健康为宗旨。”它有参赛的资格要求：“凡本市民众，不论男女，品行端正者，均得报名参加。”它有竞赛分组：“将参加者分为男子、女子、儿童三组。”它有比赛类别：分为平面的风筝比赛，“如一片瓦、又字、蝴蝶采金瓜等”；立体的风筝比赛，“如灯笼、飞艇、响七星等”；线状的风筝比赛，“如鲇鱼、蜈蚣等”。它有评判标准和分数：如艺术分，含构造分、意义分；如技能分，含时间分、高度分、奇技分[3]。总之，完全可以看到一种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比赛方法。

四、鲁迅对国粹体育的批判

鲁迅（1881 — 1936 年），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近代著名文学家和思想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是鼓吹思想革命和

[1] 王怀琪．三段教材正编：第 2 卷．上海：国光书局，1924：2.

[2] 体育周报，1919（17）.

[3] 陈奎生．长沙市风筝比赛报告．体育研究与通讯，1934，2(3).

文化革命的激进战士，曾以辛辣的笔锋，猛烈抨击当时的社会时弊，特别是对当时一股尊经复古的思想逆流深恶痛绝。亦如他在《出了象牙塔·后记》中所说："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道路。"由于当时的这股思想文化逆流在社会上依然有着强大的势力，并以竭力排斥和抗拒外来的新思想新文化为己任，因而遭到了鲁迅的严肃批判。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鲁迅对当时以武术为代表的国粹体育的提倡，采取了反对的态度。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杂感，"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热风·题记》)。1918 年 10 月 15 日，鲁迅在《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上发表了《随感录三十三》一文，其中对蒋维乔所提倡的静坐活动，进行了批判。他说："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须想一个方法排除他。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拉西拉，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例如一位大官做的卫生哲学，里面说'吾人初生之一点，实自脐始，故人之根本在脐。……故脐下腹部最为重要，道书所以称之曰丹田。'用植物来比人，根须是胃，脐却只是一个蒂，离了便罢，有什么重要。"在这篇杂文里，鲁迅特别批判了一个据说有"天眼通"即特异功能的神童，明确指出那是一种伪科学。

在批判静坐的同时，1918 年 11 月 15 日，他又在《随感录三十七》的文章中，对马良等人所提倡的新武术活动进行了批判。他说："近来很有许多人，在那里竭力提倡打拳。记得先前也曾有过一回，但那时提倡的，是满清王公大臣，现在却是民国的教育家，位分略有不同。至于他们的宗旨，是一是二，局外人便不得而知。现在那班教育家，把'九天玄女传与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与尼姑'的老方法，改称'新武术'，又是'中国式体操'，叫青年去练习。"他非常反对那些"竭力提倡打拳"者们提出的，要将"新武术"用于体育上和军事上的观点，认为"依我想来：两手拿着外

国铜锤或木棍，把手脚左伸右伸的，大约于筋肉发达上，也该有点‘效应。’”然“无如竟不见效应！那自然只好改途去练‘武松脱铐’那些把戏了。”因为“用在军事上。中国人会打拳，外国人不会打拳：有一天见面对打”，“即使不把外国人‘板油扯下’，只消一阵‘乌龙扫地’，也便一齐扫倒，从此不能爬起。无如现在打仗，总用枪炮。枪炮这件东西，中国虽然‘古时也已有过’，可是此刻没有了。藤牌操法，又不练习，怎能御得枪炮？”鲁迅曾尖刻地在《随感录六十四》中写道：“北方人可怜南方人太文弱，便教给他们许多拳脚：什么‘八卦掌、’‘太极拳，’什么‘洪家、’‘侠家，’什么‘阴截腿、’‘抱桩腿、’‘潭腿、’‘戳脚，’什么‘新武术、’‘旧武术，’什么‘实为尽善尽美之体育，’‘强国保种尽在于斯。”然而他认为，与其宣传这样的国粹，还一如“我们改良点自己，保全些别人；想些互助的方法，收了互害的局面罢！”

对于鲁迅的批判，当时曾有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鲁迅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是否过于偏激和不客观，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我们从鲁迅以下文章中的一段话，可以了解到当时鲁迅的真正想法。他说：总之，对于中国拳术来说，“若以为一种特别技艺，有几个自己高兴的人，自在那里投师练习，我是毫无可否的意见”。“现在所以反对的，便在：（一）教育家都当做时髦东西，大有中国人非此不可之概；（二）鼓吹的人，多带着‘鬼道’精神，极有危险的预兆。”[1] 对于他的这种真正的思想表白，在后来的一篇《这回是第三次“按语”》中，就可以看得更为清晰了。他说：“在五六年前，我对于中国人之发‘打拳热’，曾确反对过，那是因为恐怕大家忘却了枪炮，以为拳脚可以救国，而后来终于吃亏。现在的意见却有些两样了。用拳来打外国人，我想，大家是已经不想的了。所以倒不妨学学”。并认为：“所以为生存起见，也得会打拳，无论你做的事是文化还是武化”[2]。

---

❶ 鲁迅. 拳术与拳匪. 新青年，1919，六（二）.

❷ 郑光路. 鲁迅与武术、气功，体育文化导刊，2003（1）（11）.

第八章　近代学校体育的初期发展

与晚清相比，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学校体育得到了较为快速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一直将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例如还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初，教育部就曾颁布过两个重要的临时教育法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那是因为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国家仍处于战争期间，各地的学校大多停办，有的甚至成了兵营。蔡元培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接受教育总长这一职务的。由于他"深感辛亥革命后，教育思想及方法俱有所改变，清末所颁行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合乎帝制，而不适于共和，自不能满足国人的要求。"[1] 于是决定尽快拟订全国统一的暂行教育通令，以维持教育秩序。所以，1912年1月19日，即启用中华民国教育部印信的当天，以教育部名义通电各省，正式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有14条，其中规定：各级各类学堂均改称为学校；监督、堂长，一律改称校长；各小学一律于3月4日开学。并要求高等小学以上学校，应注重兵式体操。《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主要是对学习年限和学习的科目进行了统一规定。其中要求：初等小学为4学年，学习科目中有游戏与体操；高等小学也为4学年，学习科目中设体操（兼游戏）；中学4学年，学习科目中有体操；师范学校也是4学年，学习科目中同样设有体操。这些临时规定，一直延续到"壬子癸丑学制"的正式公布。

[1] 陶英惠. 蔡元培年谱：上册.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227.

第一节 “壬子癸丑学制”对学校体育的要求

“壬子癸丑学制”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公布的第一个新学制。最早是1912年9月公布的“壬子学制”，后来教育部又陆续发布了有关学校的几种法令，内容有与“壬子学制”不同之处，于是在1913年将它们合并称为“壬子癸丑学制”。

1912年9月3日正式颁布的“壬子学制”，对学习年限作了一些调整。它规定小学校4年毕业，为义务教育。毕业后升入高等小学或实业学校（乙种）。高等小学校3年毕业，毕业后升入中学或师范学校或实业学校（甲种）。中学4年毕业，毕业后升入大学或专门学校或高等师范学校。大学预科3年，本科3年或4年毕业。师范学校预科1年，本科4年毕业。高等师范学校预科1年，本科3年毕业。实业学校分甲、乙两种，各3年毕业。专门学校预科1年，本科3年或4年毕业。“壬子学制”公布后，至1913年8月，教育部又陆续公布曾在临时教育会议上议决的《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师范教育令》《专门学校令》《大学令》《实业学校令》，以及各种学校规程等，丰富了学制内容。后来人们将它们综合定为一个统一的系统，称为“壬子癸丑学制”。它对各级各类的学校体育均提出了具体要求。

一、对小学校体育的要求

在《小学校令》中，规定了小学教育的宗旨是：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需之知识、技能。围绕这一宗旨，其初等小学的课程设置有修身、国文、算术、体操、手工、图画、唱歌7门，另有女子加缝纫课；高等小学的课

程是修身、国文、算术、体操、手工、图画、唱歌、本国历史、地理9门。此外，男子再加农业，女子加缝纫。对初等小学体育课的课时规定是：一年级每周4学时，含唱歌1学时；二、三、四年级则是每周3学时体育课。体育课的内容，一年级是游戏；二、三、四年级是游戏和普通体操。对高等小学体育课的课时规定是：一、二、三年级均为每周3学时。其体育课的内容规定为游戏、普通体操和男生兵式体操。

在当时的教育文件中，特别要求对于“儿童身体，宜期其发达健全。凡所教授，必适合儿童身心发达之程度。”因而规定“体操要旨，在使儿童身体各部平均发育，强健体质，活泼精神，兼养成守规律、尚协同之习惯”。所以在学习内容上要求：“初等小学校，宜授适宜之游戏，渐加普通体操。高等小学校宜授普通体操，仍时令游戏，男生加授兵式体操。视地方情形，得在体操教授时间或时间以外，授适宜之户外运动或游戏”。[1]

从当时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体育教学中可以看到以下的教育内容安排。（1）规定内容：体操；游戏；运动；呼吸。（2）随意内容：掷球；掷袋；推圈；跳绳；踢毽；柔术（限高等生）；器械运动。（3）锻炼内容：旅行；拟战。（4）联合内容：联合体操；运动会。（《教育公报》第四册，1914年9月）

后来在1916年1月公布的《初等小学校体操科教授要目草案》和《高等小学校体操科教授要目草案》中，对小学体育课教材内容作了更进一步的细化，这对于引导小学体育课教学的规范化，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初等小学校体操科教授要目草案》规定：一年级和二年级，分游戏和体操两类。游戏主要是授以个人游戏及团体游戏，或授以表情游戏；体操是用瑞典式基本运动。三年级和四年级分

[1] 教育部订定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 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148.

游戏和徒手两类。游戏主要授以竞争游戏、表情游戏、行进法等；徒手是用瑞典式连续徒手操第一部（三年级用）和第二部（四年级用）。

在这个《要目草案》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关于以上教学内容安排时的注意事项说明，共有7条：（1）游戏教材，或个人或团体或竞争或用器或表情或行进法等，均可随时随地酌量教授，但须顾虑学生之体质、教材之难易，并不可过于剧烈，致碍身体之发达。（2）查部订初小一年级课程，仅有游戏一门，恐学生有放纵喧哗之弊，应酌授各个体操，使其稍知纪律，且为将来各种体操之基础。（3）各个体操之节数，应授其必要，舍其相同，万一于一二学年中不能教授完毕，亦仅可于三四学年酌量教授之。（4）连续徒手，初、高、中三等学校，应有简易及繁难之别，但教授时，须循序渐进，不得与生理上有所违背。（5）第一学年可酌授步伐。（6）第二学年可酌授排列诸法。（7）第三、四学年应注意步伐及各种行进[1]。

此外，在《高等小学校体操科教授要目草案》中，也有对一、二、三年级体育课学习内容的具体规定。如一年级有游戏（或个人或团体或表情或行进法均可采用）；有徒手（温习初小用连续徒手之全部）；有舞蹈（练习步法以后授以单式或复式之方舞，或授以简单之列舞圆舞等）；有兵式（部队运动）。二年级有游戏（同前）；有徒手（用瑞典式连续徒手第一部，但每段教材应与初小所授稍有区别为佳）；有哑铃（用瑞典式连续哑铃第一部）；有舞蹈（同前）；有兵式（持枪运动）。三年级有游戏（同前）；有徒手（连续徒手第二部）；有哑铃（连续哑铃第二部）；有球竿（用瑞典连续球竿第一部）；有兵式（小队运动），等等。其中同样有关于实施中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如提出：1. 女子高等小学校，应免课兵操。2. 二、三年级可授以跳高等之课外运动。3. 连续体操之教程有分为一学年

[1] 教育公报. 第二年第11期，1916年1月.

者，有分为数学年者。教授时应将已授之课随时温习，得有前后连络之益。4. 教练时应注意步伐及各种行进[1]。

二、对中等学校体育的要求

1912年9月28日，教育部令13号公布《中学校令》16条；同年12月2日，部令28号公布《中学校令施行规则》52条；1913年3月19日，教育部又公布《中学校课程标准》。以上三个文件确定的中学教育宗旨是：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围绕这一宗旨，中学共开设有13门课程，分别为修身、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乐歌、体操。其中女生再增加家事园艺和缝纫两项。中学体育课教学的目标则是："在使身体各部分平均发育，强健体质，活泼精神，兼养成守规则尚协同之习惯。"其课时的规定是：男生为每周3学时，女生为每周2学时。内容包括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两种，而"兵式体操尤宜注意"。但对于女子中学来说，则可"免课兵式体操，可代以舞蹈游戏"[2]。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教育部还曾对学校的课外活动有过重要的指示。1912年12月18日，公布了一个《教育部关于各学校应于体操正科外兼作有益运动训令》，其中指出："本部公布宗旨，以军国民教育为道德教育之辅，原期各学校学生重视体育，养成强壮果毅之风。惟学校教课势难于体操一科，独增教授时数，凡办理学校人员宜体此事。引导学生于体操正科外，为种种有益之运动。专门以上学校体操不列正科，尤宜组织运动部，随时练习，以免偏用脑力。每年春秋两季应酌开学校运动会，互相淬励，以惰弱为耻，以勇健为荣。庶学生体躯日强，智德亦因以增进。兹外患交

[1] 教育公报. 第二年第11期，1916年1月.

[2] 教育杂志，1913，5（2）.

迫，非大多数国民具有尚武精神，决不足以争存而图强也。”[1] 从这段文字中，不仅使我们对当时人们主张的军国民教育思潮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且对后来学校体育的双轨制，也多了一份认识。

三、对师范学校体育的要求

师范教育分为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两级。1912 年 9 月 29 日，教育部令 14 号公布《师范教育令》；同年 12 月 10 日，部令 34 号公布《师范学校规程》；1913 年 2 月 24 日，教育部令 6 号又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综观以上文件，当时对师范学校确定的教育宗旨是：以造就小学教员为目的，女子师范学校以造就小学教员及蒙养园保姆为目的。围绕这一宗旨提出了对师范生的教养要求是：由于“健全之精神寓于健全之身体，故宜使学生谨于摄生，勤于体育。”因而在体育的目标上，是“在使身体各部平均教育，强健体质，活泼精神，兼养成守规则尚协同之习惯，并解悟高等小学及国民学校体操教授法。”所以“体操宜授以普通体操、游戏及兵式操，并教授法。女子师范学校免课兵式体操。”在课时数上，师范男生每周 4 学时，女生为每周 3 学时，本科阶段为每周 2 学时。高等师范学校的体育课时数则一律规定为“每周 3 学时，教材为普通体操、游戏及兵式体操”。在当时的大学中，是不专门设置体育课的[2]。

第二节　学校体育的双轨制

所谓“双轨制”，是指在 1915 年上海举办第 2 届远东运动会的

---

[1] 北洋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848.

[2]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影响下，我国的官办学校也开始接受教会学校的做法，在学校的课外体育活动时间里，大力提倡和开展近代田径、球类等运动项目。但同时，在官办学校的体育课堂教学中，仍坚持以规定的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的教学内容为主。学术界将当时学校体育发生的这一现象，称为“双轨制”，或曰“双轨现象”。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1922年的“壬戌学制”公布以后才开始消失。所以，从1915到1922年间，可以理解为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的“双轨制”时期。

双轨制的出现，与人们对体育的认识发生变化有关。在近代中国，体育作为教育制度中的一门真正的课程设置，是从1904年开始的。当时规定各级各类学堂均要开设体操课。然而当时的体操课设置，主要是为了进行尚武教育，实行的是军国民教育制度。例如在《定军国民教育主义案》中曾明确指出：“欲使全国人民克尽当兵义务，必先于学校教育趋重尚武主义。”这种认识，即使在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也没有被改变：“欧战以来，世界各国鉴于国际民族之生存竞争日趋险恶，无不汲汲于国民体育之增进，以充实其国力，盖时势使然也。”[1] 直到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学校体育，亟宜革除兵式教练一门”。认为兵操教育“本非学校体操保存康健之普及法也”[2]。所以，出现了对军国民教育的反思。首先是徐一冰，他在《体育与武力辩》的文章中说，自1905年以来，我国的学校体育一科，竟以尚武为唯一目的，以兵式体操为主要教材。以致舍本求末。其最大的害处就是“误以军事当体育”[3]。结果造成了两方面的消极影响：一方面是损害了广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故愚观现今之体育，率多有形式而无实质。非不有体操课程也，非不有体操教员也，然而受体操之益者少，非徒无益，又有害焉。教者发令，学者强应，身顺而心违，精神受无

❶ 推广体育计划案//国家体委文史工作委员会. 中国近代体育议决案选编.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6.

❷ 徐一冰. 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 体育杂志，1914（2）.

❸ 徐一冰. 体育与武力辩. 体育杂志：创刊号，1914.

量之痛苦，精神苦而身亦苦矣，盖一体操之终，未有不貌瘁神伤者也”❶。另一方面是严重破坏了学校体育的声誉。由于人们误以军事为体育，结果使得“一般无知识无道德之营弁之兵士，竟一跃而为教师。品类不齐，非驴非马。既不识教授为何物，又不知学校为何地。酗酒狂赌，好勇斗狠，无所不为。不一年，学校之名誉扫地，社会之信仰尽失，学生父兄多仇视体操一科。”❷

还有，由于国家规定高小以上学生一律以兵操为主要教材，使得深受青少年欢迎的西方近代体育娱乐项目，也一直被排斥在学校体育之外。这不仅使学校体育未能有效地发挥增进学生健康的积极作用，而且在 1910 和 1914 年的两届全运会上，以及 1913 年参加远东运动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组成人员中，几乎都成了青一色的教会学校的学生代表，而公立学校学生能够插足者极少。面对这样的现状，1914 年春，徐一冰决意将中国体操学校的办学宗旨，由创办初期的“提倡尚武精神”而改为“提倡正当体育”。著名的“精武体操会”，也跟着在 1914 年将自己的组织名称改为“精武体育会”。体操与体育，虽是一字之差，但它所透露出的信息则是：当时的中国人已经在体育观念上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

后来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特别是上海第 2 届远东运动会的召开，使一大批体育理论工作者和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也都先后纷纷加入到了对“军国民教育”进行批判的行列。其中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青年领袖恽代英，他在 1917 年发表的《学校体育之研究》的论文中就曾经有所质疑：军国民之教育，是否该施行于全国？即使施行，又“应以何种方法施行之”？他在文章中说：学校之养成军国民，应与军队之纯以鞭笞为教育者异。指出“学生不但应使之强健，且应使之知所以强健之理。不但应使之健康，且应使之知所保健康之法。故所谓军国民教育，非但请拨枪支，练习打

❶ 二十八画生. 体育之研究. 新青年，1917，3（2）.

❷ 徐一冰. 二十年来之体操谈. 体育周报：特刊，1920.

靶，即足称此头衔而无愧也。”[1] 在1919年出版的长沙《体育周报》上，更是充满了有关对军国民体育问题的讨论。如有的说，体育的目的是什么？体育的目的就是生活上的满足。而军国民体育的结果，恰恰与“生活上满足”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体育本是人生的生活手段，而军国民体育“简直是把活动的人变成了一种机械，一点性灵都不许他存在”[2]。有的说，“兵操是机械的动作，束缚个性自由发展；兵操是偏枯的动作，妨碍身体平均发展。”并特别指出，共和国家应该发扬民治精神，用不着讲强权的“军国民主义”。况且，“含有军国民主义意味的兵操，也违背德谟克拉西（民主的音译）的精神。”[3]

由此可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当时已有不少人能够从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和民主、自由的观点探讨体育问题，明确提出反对军国民体育，反对学校的兵操教育。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其内部因素当是封建的伦理道德对知识分子束缚的解除，以及近代以来民主科学思想的传播大大激发了知识分子的个人意识和追求客观真理的愿望及行动。而外部原因则可能是外敌对中华民族的虎视眈眈这一似乎与科学发展毫无关系的问题，又恰恰在此时格外地凸现出来，因而鞭策着人们用更科学、更理性的态度去思考学校教育中的体育问题。因此，虽然1915年时仍有人以“富国强兵”为据，坚持学校要进行兵操教育的主张，如在袁世凯1915年推行的《特定教育纲要》中，仍提出要以“尚武教育为纬”，“以尚武教育为体”，但与全社会的反对者力量相比，那只能是一种无病呻吟了。改变现有的学校体育教育形式，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

例如1915年10月17日，江苏巡按使齐耀琳曾发了一份《江

[1] 青年进步：第四册，1917.

[2] 朱剑凡. 军国民体育的结果. 体育周报，1919-07-07.

[3] 体育周报，1919-11-24.

苏省巡按使公署关于各校应于体操正课外兼作课外运动饬》的文件，其中指出："近阅京外各学校所报周年概况及历届本部视学报告，各校主管教员对于体育一门，能知注意、极力提倡者固属不少，而随便敷衍，视为具文，所在皆有。查体育一端，为智训道德之根本，锐敏之脑力，活泼之精神，兴事立功之资，捍国卫家之先，皆于是乎。"文件认为："欧美各国学校教育，于体操正科外皆力行课外运动。教师之指导，医士之护视，既周且挚。其运动之法，几于无美不备，而社会之中，体育会运动场等亦复林立错置。运动之优劣，分数之比较，报纸之端，日日的所登载。士女之口，人人以为美谈，用是风气流行。凡在少年无不踊跃趋赴，或标名于国内，或竞胜于国外。故其国民体格魁硕，精神充足。以之构思，则多所发明；以之应事，则易于奏效。"所以文件说："我国识时之士，多亦见及。故本年全国省教育会及全国师范校长会议，均有注重体育之建议，亟宜应时势之需求，筹划切实办法，以为进行之准。京外各学校，自国民学校以上迄于大学，并各专门学校学生，年龄程度虽各有不同，而莫不有相当之练习，应即特筹课外运动之法，由各校长体察情形，明定运动章程，多备运动器械，务使全校学生分组练习。每人必习一种以上之运动，将来全国或有一省举行运动会时，本部于中学以上各校，即以其选手得奖之多寡，为其成绩优劣之标准。以上办法，应请转饬各学校切实筹办。限于二月以内，将其运动章程、器械各色、习练人数缮详贵公署，汇咨本部以便查核。"[1]

不仅如此，等到1919年4月召开全国第一次教育调查会时，一项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宗旨的新教育议案，终于在这次调查会上获得通过。其中特别指出："自欧战终了后，军国民教育一节，于世界潮流容有未合。"而且，"注重人格主义，英国是也。美国教育，为人格主义所推衍，故能产生共和精神。法

[1]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848.

国自共和成立以后，国中主持教育者，极力发挥共和精神，国基因以巩固。”所以提出：“吾国以共和政体应世界潮流，当采英、法、美三国之长，故拟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教育宗旨。”在此精神下，1919 年的第五次教育联合会对学校体育的改革问题，更是作出了专门的决议。文件说：“近鉴世界大势，军国民主义已不合教育之潮流，故对学校体育自应加以改进。”其改进的内容包括：减少兵操时间，增加体育时间；增加体育经费；注重师范学校体育；注意女子体育；改良高等小学和国民学校的体育；实行身体检查；改良运动会等[1]。课内的体操教学，是当时欧洲大陆和日本所采用的主要体育手段；课外开展的田径、球类活动，则是当时美国、英国所采用的主要体育手段。这是两种不同的体育体系：前者重视整齐、严肃的机械式的锻炼，贯输绝对服从等封建专制思想；后者则注意于活泼、愉快、机智的运动，培养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观念。两种显然不同的体育体系，却能在课内和课外同时得到推行，可说是中国特有历史上的一种特有的现象。这种学校体育的“双轨制”，一直延续到 1922 年的“壬戌学制”公布以后才开始消失。

第三节　学校兵操的废除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引发了人们对军国民教育的反思，导致了中国学校体育双轨制现象的发生。随着人们对学校体育目的、意义、作用等认识上的升华，接踵而来的一个较为现实的问题是，怎样对待学校体育中的兵操教育。

[1] 第五次教育联合会决议. 教育杂志，1919，11（11）.

一、兵操废存之争

大约从1919年开始，中国体育理论界开始了对学校体育中是否要保留兵式体操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的发起人是黄醒。

黄醒（生卒年月不详），字胜白，湖南长沙人。1912年任长沙楚怡学校体操老师。1918年12月在长沙创办《体育周报》，并任主编。生平除著有《应用体操》一书外，还发表有《世界和平后体育上之趋势》《为什么提倡静的体育》《运动会与提倡体育》《体育前途的大障碍》等多篇体育研究论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利用《体育周报》这个阵地，曾发起《征求全国体育家讨论体育问题》的倡议，组织了几次重要的专题学术讨论，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如1919年9月组织的关于"脚的解放"的讨论，对推动女子体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1919年11月24日，黄醒又在《体育周报》(长沙）上组织了《学校应否废止兵操》的讨论。他在文章的一开始就声明说："我在着手要写我对于'学校应否废止兵操'的意见以前，要申明我的态度，并不是因为德国失败，我才附和打破军国民主义，主张废止兵操；也不是因为山东问题，我才觉得中国危迫，主张保存兵操。"他强调自己"是用极自由的意志，平心静气地说良心话。"这个良心话是什么呢？就是"说来说去，废兵是件无疑的事。"他坚决认为："我们为将来人类的安全计，为种善因计，绝对地要废止学校的兵操。"他说："这废止兵操就是铲除强权的偶像，为世界废兵的张本。"[1]他更多地是从世界政治发展的高度，谈学校应废除兵操教育的问题。

对学校兵操为什么要废除，江孝贤是从另一个角度来阐述的。他在文章中首先肯定地说："兵操应插入学校之课程否？曰，否！

[1] 黄醒. 学校应否废止兵操. 体育周报，1919-11-24.

一定不可也，兵操乃军事学校中之专课，与普通学校何有哉!”他认为：“以有兴味与教育价值之游戏运动，养成活泼健全之青年，使学兵操于有事之秋，则因元力之充足，爱国心之激动，于数星期中所获之成绩，必远胜于日日操练之兵士。”他还从兵操对学生身体的摧残方面论证了兵操必须废止的理由，他说：“兵操必须学者成为机械，目前视，腿频举，右手右肩，久荷在铳；一动一止，唯令是从；苟不闻号令，则虽目眩力疲，亦必强自支持。是人之自动自制之本能与兴味，将与身体一并而为兵操牺牲之也。”这是在生理上。而心理上的伤害则是“常见学生于兵操时，辄疾首蹙额，畏葸不前，一若将受莫大之痛苦，是即就学生之本心，亦不欲兵操立足于学校也。”所以他的结论是：“今日学校，何不从事文明建设之教育，而仍不忘于此野蛮破坏之兵操乎?”[1]

在这场讨论中，也有人认为，学校的兵操教育还是应该坚持。如张宝琛认为:“欲论吾国学校应否废止兵操，当先解决吾国今后立国方针，应否取军国民教育主义。”他认为，从英、美、法、意在对德和约中对我国山东问题的处理来看，国人应该注意到“公理正义之不足恃，来日之祸患，方兴未艾矣。”所以他指出：“今日之中国，除励行军国民教育，以发奋图强外，别无他路可走也。”他说，我承认“德谟克拉西的教育，所谓民本民治民民的主义，所谓自由平等互助的德性，所谓个人健全的发展，社会公平的进步，人类圆满的幸福，均为现代时代之尊长潮流新精神，余非不承认之”。但是“盖军国主义者，20世纪之最流行国家主义也。世界一日未大同，则国家主义一日不能抛弃，国际之战争，终不能避免。”所以他认为，我们仍然要坚持军国民教育，当然也就仍然要坚持兵式体操。因此他说:“鄙见以为，欲谋吾国体育之进步，宜致力实施方法上之研究，教材选择上之注意，或将吾国固有之拳术，尽力设法提倡之，而于兵式操存废问题，诚不必嚣嚣然争论也。”[2] 他的主张是，不

[1] 江孝贤. 学校应否废止兵操. 体育周报，1919-11-24.

[2] 张宝琛. 学校应否废止兵操. 体育周报，1919-11-24.

是去讨论废存的问题，而是如何去改进改变兵操的教学问题。

二、1922年的教育改革（“壬戌学制”）

1922年的教育改革，是以北京政府公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案”为标志的。这场改革的原动力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而直接原因则是1919年后，随着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来华讲学，使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开始在我国得到广泛传播，从而对中国教育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体育上的影响是，有一些学校，如长沙雅礼学校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都分别在1919和1920年率先宣布在本校废除兵操教育。1921年，在“第7届全国教育联合会”会议上，又有11个省同时提出了改革学制的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形势，所以当时的北京政府不得不宣布对中国的学校教育进行改革，并于1922年11月1日正式公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由于1922年是“壬戌年”，所以这个改革案又称“壬戌学制”。“壬戌学制”采用的是美国“六三三制”，即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在教育宗旨上则提出了以下7项目标：一是适应社会之需要，二是发挥平民教育精神，三是谋个性之发展，四是注意国民经济力，五是注意生活教育，六是使教育易于普及，七是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由此可见，这场教育改革的特点就是：中国的学校教育，开始从过去的抄袭日本而变为仿效美国。

三、《课程标准纲要》中的体育规定

“壬戌学制”公布的第二年，北京政府又公布了一个《课程标准纲要》。这个《纲要》中，不仅正式将学校“体操科”改名为“体育科”，而且对学校体育的目标、内容以及组织形式等也都作了相应的规定。例如对小学体育的目标要求是：（1）发达儿童身体内外各器官的功能，以谋全体的适当的发展。（2）顺应儿童爱好

活动的本性，发展其运动的能力，以养成日常生活及国防上所需的运动技能。（3）培养儿童敏捷、勇敢、耐苦、诚实、公正、快活、牺牲、服务、守法、合作、互助、爱国的公民，以做复兴民族、御侮抗敌的准备。在课时要求上的规定是：小学体育课占总课时的10%，初中体育课为16学分（含生理4学分），高中体育课为10学分（包括健身法、卫生法）。

在教材内容方面，提出了体育课要以田径、球类、游戏、体操为主要教材。兵式体操则被彻底废除。初中和高中还要分别加授生理、卫生等方面的知识，使学校的体育课教材内容安排更趋科学化。在教学方法上，则开始推广“三段教学法”，即将一节体育课分为三个段落来组织教学，有初段、中段和后段：初段是准备运动阶段，主要有队列练习和上下肢的运动；中段是“主运动”阶段，一般包括体操、各种竞技运动和游戏；后段是整理运动阶段，主要有走步和呼吸运动。“三段教学法”将一节课的教学分为准备运动、主运动和整理运动三部分，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体育课的“准备部分、基本部分、结束部分”有一定的相似性，符合人的生理活动变化规律，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第四节　体育专门人才的培养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随着学校体育的变化、运动竞赛活动的增多，以及女子体育在中国的逐步兴起，我国的体育专业教育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社会需求。所以，1916年，基督教中华女青年会曾向北京政府教育部作了一份关于在上海试办女子体育师范学校的报告。其中指出：“欧美各国对于女子体育非常注重，诚以体育不讲求，则德育、智育亦无收发达，难冀其受完全教育。近年以来，我国女子教育已逐渐发达。体育一门，在上海等处文明先进之区固已力事提倡，至开通较迟之地，则尚未尽注意及之。此虽由于千百

年来女界之积弱既深，破除未易，而师资缺乏，实其主因。敝会有鉴于此，特于民国四年间，在上海试办女子体育师范速成科。当时因校舍狭窄，只收学生六人，民国五年毕业后，任职各女学颇承学界许可，而各省女学之愿保送学生来校肄业者亦络绎不绝，遂决议扩充校舍，增学名额。”[1] 1919 年 4 月 14 日，又有教育部专门作了《关于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均设体育专修科与体育讲习会训令》，其中指出：“高等师范学校设体育专修科一项，查北京、南京两校业已先后举办。此外，各校均宜察酌情形量为筹设。并为增进体育学术起见，得于设立研究科时特置体育研究科，力求深造，以备他日体育上根本改良之用。”[2] 由此，体育专门人才培养在原有一些专业学校（如中国体操学校）的基础上，又创设了一些新的体育系、科和学校。详见下表：

学校名称	学校性质	创办时间	创办地点	备　注
浙江体育专门学校	私立	1912	杭州	原名浙江体育学校。学制本科 2 年，选科 1 年半。共办 26 期，毕业 1000 多人。1933 年停办。1920 年前后曾有朝鲜和越南学生就读。创办人王卓甫
上海女子青年会体育师范学校	青年会	1915	上海	第 1 年招 1 年制简易班，第 2 年始招 2 年制专修班。校长陈英梅。共办 9 期，毕业生 200 人。1925 年并入金陵女子大学
上海爱国女学体育科	私立	1916	上海	蔡元培创办。招收高小毕业生，学制 2 年。共 12 届毕业生，600 多人。停办时间不详
广东女子体育学校	私立	1916	广州	招收高小毕业生，学制 2 年。1922 年该校还存在。停办时间不详

（接续表）

[1]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851.

[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854.

（续表）

学校名称	学校性质	创办时间	创办地点	备　注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专修科	国立	1916	南京	第1届学制2年，第2届起3年。1923年学校改名为国立东南大学，同时科改系，学制变4年。1927年，该校又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1940年体育系曾一度改5年制。1943年又增设体育专修科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专修科	国立	1917	北京	第1届学制2年，第2届3年，第3届起4年。1923年改名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1930年科改系。1940年体育系改5年制。1945年增设体育专修科
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体育专修科	公立	1918	广州	只办了两期，毕业生66人
成烈体育专科学校	私立	1918	上海宝山	原名中华体育学校。1919年迁苏州，改名苏州私立中华体育学校。1927年又改为成烈体育专科学校。1949年并入华东师大。1952年又并入华东体育学院
上海东亚体育专科学校	私立	1918	上海	创办人傅球。学制2年，招收高中毕业生。1935年停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于上海再建。毕业生1500多人
北京私立体育学校	私立	1919	北京	学制3年，共办4期，毕业生约150人
南京体育师范学校	私立	1919	南京	创办人邵汝干。学制2年。5年后停办
东南女子体育师范学校	私立	1919	上海	创办人为女子青年会体育师范学校毕业生秦醒星。该校以舞蹈人才多和篮球好而出名
兰溪私立浙东体育专科学校	私立	1920	浙江兰溪	原名浙江金华道体育专科学校。至1929年毕业学生264人。1931年停办

（接续表）

（续表）

学校名称	学校性质	创办时间	创办地点	备　注
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体育专修科	公立	1921	成都	原为音乐体育科，学制3年。1929年学校改名为成都师范大学，称音体专修科。1930年称音体系。至1931年共毕业101人。同年该系并入四川大学体育系
上海体育师范学校	私立	1921	上海	校长吴志青。该校为中华武术会的附属，修业年限2年。仅毕业1届学生即停办
浙江体育师范学校	私立	1921	杭州	学校为军人所办，学制2年。教学内容主要为军事体育，毕业生多在军警界服务，1927年停办
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学校	私立	1922	上海	创办人陆礼华。学制2年，招收初中毕业生。1928年学校改名为私立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共有毕业生1000多人。学校不仅设施一流，而且篮球有名，曾远征日本和朝鲜，并建有第一支女子足球队
中山体育专门学校	私立	1923	苏州	创办人朱重明。原名中国体育学校，学制2年。1927年为纪念孙中山改名为中山体育专门学校。1936年停办。共有毕业生1842人。该校以童子军训练科最出名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系	公立	1924	北京	学制2年。只办了两期后停办
上海沪江女子体育学校	私立	1924	上海	创办人孙和宾。修业2年。该校在第3届全运会上的表演曾获得好评。两届学生后停办
奉天私立体育专科学校	私立	1924	奉天	创办人尚大勇。学制2年。1931年因九一八事变而停办

（接续表）

（续表）

学校名称	学校性质	创办时间	创办地点	备　注
东吴大学体育专修科	教会	1924	苏州	学制2年。开始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与东吴大学合办。1926年改由东吴大学独办，同年增设4年制体育系
西南体育专科学校	私立	1925	重庆	创办人刘慎旃。学制2年。1927年停办
金陵女子大学体育系	教会	1925	南京	1915年建校，1925年上海女子青年会体育师范学校并入后始改体育系，学制4年。1930年增设体育专修科，学制2年。1952年并入华东体育学院
辽宁省立师范学校体育科	公立	1926	沈阳	修业年限3年。因九一八事变改制

在这些培养体育人才的专业学校或系、科中，尤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专修科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专修科最具代表性。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专修科。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建于1915年，它的前身是1902年创立的三江师范学堂，1905年改称两江师范学堂，辛亥革命时停办。1915年，在两江师范原址设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6年始设体育专修科，学制两年。第1届毕业学生30余人。第2届时改学制为3年。1923年，南京高等师范改名为国立东南大学，体育专修科改为体育系，学制4年。1927年，又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体育系属大学教育学院，学生毕业后授予教育学士衔。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央大学西迁重庆，增设2年制体育专修科。1946年迁回南京，1948年8月改称南京大学。1952年在全国高校调整中，南京大学体育系、科和金陵女子大学体育系、上海体育专科学校合并，共同在上海成立了华东体育学院，后改名上海体育学院。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始设体育专修科时，曾聘美国人麦克乐任科主任。**麦克乐**（C. H. McCloy），1886年生，1912年在美国马里他学院获硕士学位，193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擅长田径和体操。先后于1915—1919年和1921—1924年两次被国际青年会派来中国服务。麦克乐曾担任过江苏省教育会体育传习所教授（1915）、南京高师体育科主任（1916）、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协会体育部干事（1917—1919）、东南大学体育系主任、全国体育研究会主席、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书记（1921—1926）等职，主编过《体育季刊》（第三卷起改名为《体育与卫生》杂志）。麦克乐还留下了大量的个人著作，主要有:《舞蹈》(上海青年会,1915年),《网球》(商务印书馆，1917年),《棍棒》(商务印书馆,1917年),《篮球》(商务印书馆,1918年),《柔软体操》(上海青年会,1919年),《体育上肌肉动作应用表》（上海青年会，1920年),《游戏运动》(浙江省教育会，1921年),《柔软体操》(浙江教育会，1921年),《体操步法撮要》(商务印书馆,1923年),《田径赛运动》(商务印书馆，1923年),《运动技术标准》(中央大学，1925年),《体育教材》(商务印书馆，1928年),《分级器械运动》(上海青年会,出版时间不详),《学生健康的检查》(商务印书馆，1931年)，《个人田径赛运动成绩之测量》(商务印书馆，1931年）等。他为近代中国的体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

麦克乐在南京高等师范一年后去上海青年会工作，学校另聘美国人乔格任体育科主任，以后又聘美国人饶冰为科主任。1923年，

---

[1] 关于麦克乐的在华工作时间问题，学术界大概有两种意见。一是在来华时间问题上，主要有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吴文忠《中国体育发展史》，提出麦克乐的来华时间是1915年。有人根据麦克乐1924年在《体育与卫生》第3卷第4期所写的《作新民的伟人》文章中的时间推算，他的来华时间应是在1914年。有汤铭新在《我国参加奥运沧桑史》第44页中提出的，麦氏来华时间为1913年。本文依吴说。二是在离华时间上，有熊晓正在《再论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的麦克乐》文章中提出的1924年（见中国体育史学会编《体育史论文集》（二），1986年)。有汤铭新在《我国参加奥运沧桑史》第44页中提出的1926年。本文依汤说。

饶冰回国，学校再聘麦克乐为体育系主任。1926年麦克乐回国后，由留美学者、南京高等师范体育专修科第1届毕业生吴蕴瑞接任体育系主任。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专修科从创办到结束，前后30多年，共毕业专科生（二年制和三年制）16届203人，本科生19届199人。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专修科。其前身是1902年12月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04年改称优级师范科，1908年又改称优级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7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始设体育专修科。第1届学制2年，第2届学制3年，第3届学制4年。1923年，北京高等师范改名北京师范大学。1930年，体育专修科改为体育系，学制4年，采取学年和学分并行的培养制度。体育专修科初创时的科主任是焦荣，聘有美国人舒美珂任教，担任翻译的是袁敦礼。1919年，由袁敦礼担任科主任。1922年袁到美国留学，主攻生理、公共卫生和体育，1927年学成回国。再次担任师大体育系主任，直到1948年。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专修科在创办初期，因留学日本的教师较多，因而对体操教学较为重视。其间也聘用过美国人和英国人担任体育原理、体操和舞蹈等课程的教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专修科刚创办时，师资和经费均较困难，招生规模较小，一般只招收一个班学生，等毕业后再招一个班。以下是1920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专修科课程设置情况：

课程名称	一学期周学时数	二学期周学时数	三学期周学时数
伦理	2		2
教育心理	3（心理）	3（教育）	3（教育）
应用解剖学	3	4	4
体育史	2		
生理学		2	2
国文	2	2	2

（接续表）

（续表）

课程名称	一学期周学时数	二学期周学时数	三学期周学时数
国语		1	1
英文	5	5	5
军事学		1	1
乐歌	1	1	1
兵式操	3		
兵式训练		2	2
田径运动	2	2	2
舞蹈	1	1	1
竞技游戏	1	1	1
拳术	4	4	4
体操术	3	3	3

（见《教育公报》第六期，1921年6月20日）

第九章　近代社会体育的初期发展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体育推进，首先是从城市开始的，而且主要是在大城市。通过大城市的示范作用，再影响到周边地区和中小城市。

第一节　城市民众的体育活动

1912年5月，北京政府内务部曾收到一份由孟锡绶等人提出的成立北京体育总会函，从中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对发展社会体育的理解和认识："窃我国专制时代，国民不担负军人义务，故置国家强弱安危豪不关于。念今者共和成立，国民均跻于平等，即人人有国家之责任。若仍晏安偷惰，不思振作精神，固民国之邦基，谋自强之幸福，则弃平权之利益，失共和之民格矣。"因此他们认为："夫欲谋自强，巩共和，要非武力不为功；是共和之国民，非人人有军人之知识，有军人之能力不可。"所以他们说："锡绶等不揣绵力，冀尽国民之天职，爰集热心公益者组织北京体育会。"可见他们创办体育组织的目的非常清楚，是为了"钟点每日不过两小时，以便养成军国民之资格。"[1] 在当时社会体育推广中，同样渗透着的是浓厚的军国民主义教育色彩。

1915年，在《江苏省巡按使公署关于各校应于体操正课外兼作课外运动饬》文件中，亦在民众体育方面提出了要求："至公

[1]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840.

众运动场所，足以养成多数国民之体力，关系极重，亦当设法组织，应于省城内先行筹设，以为模范。再行饬属，渐次仿行。”❶

1919年，教育部公布了一份《推广体育计划案》，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对发展民众体育的要求和措施。首先，《推广体育计划案》介绍了出台的背景，是因为“欧战以来，世界各国鉴于国际民族之生存竞争日益险恶，无不汲汲于国民体育之增进，以充实其国力，盖时势使然也。”《计划案》指出：“吾国体育问题，素为国人所轻视，全国人口既无明确之统计，其生存死亡率自无切实之比较，然考证事实体察情形，国民体育未能与他国抗衡，盖无可讳。近年各地学校虽渐知提倡体育，而社会心理积重难返，不免事倍而功半。”《计划案》通过与日本的比较后说：“试观日本数十年来之体育，何等注重，然较之欧美各国社会体育之能普及者，尚觉瞠乎其后，近今鉴于时局之影响，朝野上下尤为研究提倡，不遗余力。”因而《推广体育计划案》最后认为：“吾国非积极进行，断无倖存于国际竞争之理。”所以要在全国“推广体育计划，谨请大部采择施行。”

《推广体育计划案》的具体内容包括对社会体育概念的解释，认为所谓“社会体育者，指学校军队以外一般社会之运动而言。期以锻炼心身，养成坚实之国民也。”对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的关系，《计划案》的说明是：“若社会体育之机关不备，学校体育无论如何讲求，终难收完善之效果。”对于社会体育推广计划中的组织关系，《计划案》的界定是：“令拟由各地教育机关，组织社会体育。”

此外，就社会体育的具体发展，《计划案》中提出，在体育设备上可以考虑：第一，特设公共体育场，并指出各省治、道治地方，可先组织模范体育场，逐渐推行于县治及镇集。第二，利用公园。第三，开放学校运动场。第四，利用庙宇教练场等隙地。在指

❶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849.

导和奖励方面，《计划案》的要求是：第一，设指导员，并巡回各地，实地教授。第二，发起运动会，并联合各地方体育机关，每年举行数次，施以相当之奖励。第三，利用学校教师，为指导之辅助。《计划案》还认为：在社会体育推广中，应大力"提倡武术，以发展国人之特殊运动"。应"施行各项讲演及他方法，以力谋体育之普及。"[1]

第二节 民间组织的大型比赛

中华民国成立后体育的万千气象，同样表现在体育竞赛活动上。然而与后世所不同的是，当时的一些竞赛活动主要是通过民间力量发起和组织的，而且主要是集中在沿海的大城市，如上海、天津等口岸城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中国的体育竞赛活动，也是由沿海走向内地、由大城市走向中小城市的。

一、上海万国竞走与上海万国足球赛

上海万国竞走赛，始于1904年，每年冬季的一个星期日举行。辛亥革命后停办，1922年续办。1933年停止。中华民国成立以前，参赛者只限于外国侨民，并按国籍组队。分别有法国、日本、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美国、葡萄牙、犹太等队参加。比赛设团体冠军和个人冠军。团体以英格兰队获冠军最多。1922年，此项赛事恢复以后，始有华人介入。开始为个人，如1922年万国竞走赛上，中国人陈和清以个人资格参赛，穿布鞋走完了全程。1926年，上海中华队开始加入团体比赛。从1928到1933年间，上海万国竞

[1] 国家体委文史工作委员会. 中国近代体育议决案选编.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7.

走赛的所有团体和个人冠军全部由中华队所得，其中的个人冠军获得者有周余愚、石金生、蔡正义等人。1931 年，此赛事还曾举办了一届万国女子 1 英里竞走赛，成绩也以中华队为最好。

上海万国竞走赛的比赛路线是以静安寺路（南京西路）的王家库为起点，经静安寺路、极斯菲而路（万航渡路）、白利南路（长宁路）、兆丰公园（中山公园）、别罗根路（哈密路）、虹桥路，由交通大学折回，沿姚主教路（天平路）、贝当路（衡山路）、辣斐德路（复兴中路）、亚尔培路（陕西南路）、福煦路（陕西北路），经威海路入跑马厅。终点设在跑马厅的大看台前。全程 51 华里，规定 3 小时 20 分内走完。

上海万国足球赛，亦称上海国际杯足球赛。始于 1908 年，至 1940 年停办，共办 33 届。由上海足球联合会主办。参赛队按不同国籍的侨民组成，比赛采用淘汰制。早期参加比赛的主要有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德国、葡萄牙、犹太等队。1924 年，上海中华足球联合会成立。从当年起，组成中华队参加国际杯赛，但均在半途即遭淘汰。直到 1929 年后的第 27 届、28 届，才取得了冠军。1932 年后，中华队水平下滑，战绩不佳，直到 1934 年后，才东山再起，于第 31 届和第 32 届杯赛中，再夺冠军。上海万国足球赛中，取得冠军较多的外国足球队依次为英格兰队 15 次、苏格兰队 6 次、葡萄牙队 5 次、爱尔兰队 1 次。另有一次比赛未能有结果。

二、上海万国运动会与上海埠际足球赛

上海万国运动会，亦称上海国际运动会。1926 年由外国侨民发起，隔年举行一次，到 1937 年停办，共举办了 6 届。第 1 届上海万国运动会由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承办，于 1926 年 10 月 9 至 10 日在上海的中华运动场举行。参加者有中华队、美国队、英国队、法国队、日本队、俄国队、荷兰队和葡萄牙队。中华队以上海

运动员为主，外国队以在上海的外国侨民为主。第1届上海万国运动会的会长是美国领事克银汉，副会长是唐绍仪，总裁判是王正廷。以后各届会长，均由各国领事或王正廷轮流担任，各国在租界的驻军和童子军负责维持运动会的秩序。比赛的项目和规则均参照当时的远东运动会。第1届上海万国运动会共设置了17个小项。比赛结果：中华队得到7项冠军，名列第一。英国队得5项，法国队得4项，日本队得3项（其中两项为并列冠军）。

上海埠际足球赛，始于1908年，由上海足球联合会和香港足球联合会共同创办。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终止。前后共举办了20届（其中1915—1923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中断）。最初一届的埠际足球赛为沪、港对垒。以后的每届比赛，除沪、港队必定参加外，亦不断有其他队伍断断续续地加入，如天津队参加过6次比赛，汉口队参加过1次（1924年），日本横浜队参加过1次（1914年）。比赛的地点，根据约定分别在上海和香港两处轮流举行，共有11次在上海，9次在香港。在历届的30场比赛中，上海队胜15场，平1场；香港队胜9场；天津队胜5场，平1场。

在前9届比赛中，代表上海的选手均为旅居上海的外国侨民。从1928年的第10届起，始有华人足球运动员李惠堂、周贤言、戴麟经、冯运佑等入选上海队。但在此后的比赛中，仍以外国侨民为主。

三、上海与天津的万国篮球赛

天津万国篮球赛，始于1925年，由天津的外国侨民体育会发起和主办，止于抗战前夕。参赛的主要有天津的一些学校代表队和驻津美军队、驻津意军队、外国商人队等。在1925—1928年的3届比赛中，冠军一直为外国队所得，分别是美国驻军十五联队、外国商人队和美国水兵队。直到1928—1929年度的第4届篮球比赛，南开大学队经过激烈争夺才获得冠军，第一次打破了由外国队

垄断天津篮坛的局面。

上海万国篮球赛，始于1925年，止于1937年。参加的有上海“中华队”和美、英、葡、朝、加等外侨队。

第三节 妇女体育的兴起与发展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广大妇女长期遭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她们被禁锢在家庭的狭小天地里相夫教子、侍奉公婆，没有社会地位。而且，在几千年的宗法社会中，这种现象也几乎没有改变过。直到近代发生的戊戌维新运动，由康、梁等人搬来了西方的“天赋人权论”，倡导男女平等，批判歧视和残害妇女的封建伦理道德以及女子缠足等陋习，倡办女子教育等，这才撼动了中国妇女解放的大门。人们开始认识到：“故妇学是天下兴亡强弱之大源也。”“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美（国）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日（本）是也。”故而振臂高呼：“中国之妇女深居闺阁，足不出户，此风一日不改，则中国一日不强。”[1]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女子者，文明之祖也，国民之母也。故女子之体魄一弱，关乎全国人种之问题。”因此，“吾以为，急救目前女子之方法，断自体育始。”[2] 对中国女性的这种早期的体育呐喊，在辛亥革命后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妇女解放的进一步宣传，一些上流社会的女性更加注重于行动上的觉醒。她们大胆冲破世俗的偏见，突破封建家庭的牢笼，积极投身于社会的变革，带头向封建伦理道德挑战。

当然，从总体上看，这种变化当时还只是局限在少数上层社会的知识女性中。对于中国大多数妇女来说，她们的生活依旧和过去

[1] 梁启超. 论女学. 申报，1876-03-30.

[2] 张肩任. 急救甲辰年女子之方法. 女子世界，1904（6）.

一样。直到1915年第2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的召开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妇女才真正迎来了自我解放的春天，也迎来了中国近代妇女体育的兴起与发展。

一、近代女子体育的产生

1903年的《癸卯学制》公布，中国的女学教育还未能纳入正式教育体系，只是被列入在家庭教育之中。但在早期创办的现代女学中，已有学校体育活动走在最前面的，也是对社会发生较大影响的上海“中西女塾”。从这所学校走出的不仅有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宋氏三姐妹”，而且还因为1898年维新派人士经元善集资创办中国自己的第一所女子学校经正女学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学习中西女塾，得到林乐知的帮助，所以曾在经正女学任教的李提摩太夫人说，该校学生宿舍的陈设布置完全仿照中西女塾。她甚至向经正女学的女董事们建议，让她们去参加和考察中西女塾学生的结业典礼。

中西女塾，又称“马克谛耶女子学校”，是外国教会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收费的女子学校，1892年由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和海淑德共同创办。在1892年2月17日的《申报》广告栏里，可以看到“中西女塾”的告白：“启者，本塾设在英界三马路监理会堂之后，由南第二十一号洋房内，专收中华女子。教以中西文字与有关实用之学，以及刺绣、缝纫、杂技等。每月暂收修业洋三元，借资津贴。准于二月十八日开塾。如愿来学，请至本塾报名。须请妥保立写保单。欲知详细章程，或至中西书院，或本塾限阅可也。特此布闻。中西书院监院林乐知，中西女塾总教习海淑德合启。”

1892年3月15日中西女塾正式举行开塾大典。当时沪上中外名人应邀出席，苏松太道台聂缉规木也出席了大会。先由美国驻沪副总领事易孟士致欢迎词，接着由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发表正式演

讲。次日又举行女宾典礼，6名女生与来宾见面，校长海淑德发表讲话。中西女塾基本采用美国学制，同时参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变通，形成亦中亦西、土洋结合的特色。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说，这正是外来文化所必然要经过的一个本土化过程。中西女塾在培养目标上强调自由教育，注重全面培养。主张促进学生的道德、智力和身体等多方面的全面发展，为以后的生活做准备。所以把“爱、生活、成长”确定为校训。在具体的课程安排上，体育亦是学生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那些穿着西式裙装的小姑娘们，常常在外籍老师的带领下，在绿树成荫的校园操场上欢快地练习跑步和打排球，或在明亮的新式体育馆里做钢琴体操或跳舞。她们既是一批时代的娇宠，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批新式女性。

如果说戊戌变法运动首先叩开了中国妇女解放的大门，表现为中国男性对妇女解放的关照的话，那么，20世纪后则更多地开始表现为中国妇女的自我觉悟。所以在20世纪初，在妇女体育问题上，一个早期的追求自我解放的女性群体，终于摆脱了中国妇女长期作为男性社会附属的窠臼，她们在高呼“女子者，强国之元素，文明之母，自由之母，国民之母”的同时[1]，在“讲复女权，就一定先讲不裹脚；讲兴女学，就一定先讲读书”的口号下[2]，也纷纷讨论起中国的女子体育问题。例如何亚希在《求学问何用》的文章中说：“求学问，强身体，用以捍患，用以保国。其用为极大矣。”[3]张肩任在《急救甲辰年女子之方法》中对女子体育作用的理解更是宽泛，她说：体育之法，“练其胆识，练其身体，练其冒险耐苦之精神志气，使人人有军人之资格。鼓吹以古来之任侠风，输以国家思想，一呼而起，一跃而走。病夫既苏，国家可理。”[4]这其中，刘瑞莪的有关体育问题论述应该说最为浅显明白，她认为：“体操

[1] 曾竞雄. 女权为强国之元素. 女子世界，1904（3）.

[2] 杜清持. 男女都是一样. 女子世界，1904（6）.

[3] 何亚希. 求学问何用. 女子世界，1904（8）.

[4] 张肩任. 急救甲辰年女子之方法. 女子世界，1904（6）.

诚急务矣，可以活筋骨，可以怡性情，可以强种族。”因此她说：“故体操者，学堂必不可缺者也。虽然，吾谓女学之体操为尤要。盖女子者，国民之母也。一国之中，其女子之体魄强者，则男子之体魄亦必强。我国人种之不及欧美者，亦以女子之体魄弱耳。”所以她呼吁，女学更要注意设置体操课程，因为“将来造成新国民，养成新民族，皆此辈女子之责矣。”❶ 这一认识，得到了社会女学界广泛的认同。所以丁初我在《女学生亦能军操欤》中也说：“吾中国男子弱矣，惟女子之弱实致是。矫正身体，厥惟体育。吾女子其急注意！吾办女学者其急注意！”所以她无不肯定地说：“今日女子之教育，断以体育为第一义。”❷ 当然，在这样的一个中国早期女性自我解放的群体中，尤为值得注意的重要代表人物，就是号称“鉴湖女侠”的秋瑾。她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女革命家、杰出的诗人和女子解放运动的领袖，也是倡导中国女子体育的先驱者。

以上内容告诉我们：从“三寸金莲”的小脚女人，到运动场上的你追我赶，近代中国女性终于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所以可以认为：从 1844 到 1906 年间，当是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初始阶段。其理由是：第一，在那些早期创办的女子学校中，我们确实看到了体育已成为它们的一项教学内容。而且为了保证体育教学内容的完成，有些学校已有较为完备的体育设施和场地。例如上海的务本女塾，不仅有游息场和运动器材，甚至还有体操棚那样的体育建筑。第二，以秋瑾为代表的一批倡导女子体育的先驱者的带动和示范，亦为近代女子体育在中国的萌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在她们创办的面向社会的早期女性杂志中，也已经能够看到有关体育的宣传资料。例如 1904 年出版的第 10 期《女子世界》，在其《纪事、外国》栏目中，就有以《大运动会》为标题的新闻报道，其中详细介绍了日本女子大学关于召开第 4 届秋季运

❶ 刘瑞莪. 记女学体操. 女子世界，1904（7）.

❷ 丁初我. 女学生亦能军操欤. 女子世界，1905（13）.

动会的情况。这可理解为是对社会的一种女子体育宣传和鼓动。第三，在那些早期创办的女子学校中，我们还看到了一些学校已有召开体育运动会的传统。1905 年 3 月，上海《时报》中就有这样一条消息："十五下午，上海务本女塾及幼稚舍举行秋季运动大会。运动会次序如下：1. 缘绳，2. 射的，3. 身体矫正术，4. 花园（唱歌、游戏），5. 算术竞走，6. 跳绳，7. 小兵队，8. 庭球，9. 跳舞（对舞），10. 运粮竞走，11. 剖梨竞走，12. 上学竞走，13. 连球体操，14. 抢旗竞走，15. 抛球竞争，16. 跳舞，17. 裁缝竞争。"第四，由于直到 1906 年，女学还没有能被当时的清政府纳入正式的教育体系，女学中的体育教学缺乏规范和要求，所以女学中虽然有体育，但那是自发的、松散的，因而也是不完整的。这就是我们之所以把这段时期理解为中国近代女子体育初始阶段的主要原因[1]。

二、女子体育的形成与初步发展

（一）女子体育的形成

如果从女子体育发展的时间段来把握的话，可以认为近代中国女子体育大致从 1907 到 1923 年进入了形成时期。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有以下一些理由：

第一，从 1907 年起，晚清政府颁布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这两个重要的法规文件，终于使女学教育

[1] 在有关中国近代女子体育发展的段落划分上，有人提出应划分为：启蒙阶段（1900—1911）；发展阶段（1912—1936）；停滞阶段（1937—1945）；恢复阶段（1946—1948）。见许燕耿《我国近代女子体育的兴起与发展》，《中国近代体育史文集》第 85 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 年。也有人提出："我国女子近代体育发端于清末维新运动之际，它的兴发则在 1907 年清政府颁布女子学堂章程之后，至五四运动以后，女子体育开始了新的发展"。见郑志林《略论我国近代女子体育的兴起》，《体育文史》1994 年第 3 期第 3 页。而笔者的理解则拟分为：肇始期（1844—1906），形成期（1907—1923），发展期（1924—1949）三个阶段。与以上学者的看法略有不同。

正式在教育界立住了自己的脚跟，也为女子体育的真正实现提供了法律基础。在1907年颁布的《女子小学堂章程》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总体教育要求："童年身体期于发达健全，凡教授各种学科，须合女子心身发达之程度，勿得逾量增课，致有耗伤。""女子缠足最为残害肢体，有乖体育之道，各学堂务一律禁除，力矫弊习。"在关于具体的体育课要求上，"其要旨在使身体各部发育均齐，四肢动作机敏，咸知守规律、尚协同之公义。其教课程度，在女子初等小学堂，初则授以适宜之游戏，时或与音乐结合授之，渐进授普通体操。在女子高等小学堂，则授普通体操或游戏。凡教授游戏，虽当使之活泼愉快，但须注意使之不蹈放纵之行为。又依体操所习成之姿势，务常使之保持勿失。"并规定女子初等小学堂的体育周课时为4，女子高等小学堂的体育周课时为3。其体育场地、设备的建设，则要求"须适应学堂之规模"，"于道德卫生上均无妨害，且便利儿童通学之所。"[1] 在1907年颁布的《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其教育的总要求也有如下一段话："女子必身体强健，斯勉学持家，能耐劳瘁。凡司女子教育者，须常使留意卫生，勉习体操，以强固其精力。至女子缠足，尤为残害肢体，有乖体育之道，务劝令逐渐解除，一洗积习。"而关于体育课的具体要求是："其要旨在使身体各部均齐发育，动作机敏，举止严肃，使知尚协同、守规律之有益。其教课程度，授普通体操及游戏，并授以教授体操之次序法则。"其规定的体育周课时为2。对体育场地的要求已提出了要分室内、室外两种[2]。正是这样的一些规定和要求，使得当时的女子学校体育有了一个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第二，为了满足各种女学对体育师资的需求，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女子体育专业教育。据考证，1906年7月，上海务本女塾曾率先举办"暑期女子体操传习所"，当为我国近代史上开培

---

❶ 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3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6：40.

❶ 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3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6：35.

训女子体育师资之先河。接着在1907年的7月8日至8月25日，苏州长元吴劝学所，亦在苏州南石子街东首的公立女子小学堂内，举办了为期6周的“夏期女子体操游戏讲习会”。其目的是“养成女子小学校教员”。在这些短期培训班的基础上，汤剑娥等人于1908年在中国上海创办了正式的“中国女子体操学校”。

汤剑娥，又名汤琳，中国体操学校创办人徐傅霖之妻，曾留学日本体操学校，擅长体操运动。汤剑娥等人为什么要创办女子体操学校呢？这是因为她们发现“今日女学校中之体操一科，有最大之弊二：一曰无体操之女教员也。女学校之体育事业，假男教员之力以求发达，若他学科则犹可，而体操一科，则决不相宜。何则，体操乃锻炼身体而兼振作精神者也，教师非躬自模范而竭力矫正，生徒姿势则不能有效果。况若教师于生徒前解除外衣而为种种之运动，已多种种之窒碍。生徒身上某部之歪斜必须矫正，男教员又不能亲手加之，苟万不得已而为之，则于风俗上岂非大不相宜耶。一曰教材之不适当也。女子之体操运动，与男子颇多异点，施教之方法标准万难通用。今则课以女子生理上极不宜之运动者有之，是非惟无益而又害之也。况今日男子之体育，既误入异途矣，更不忍使女子一误再误。盖女子体育宜兼发挥其优美之情操，苟养成粗暴之人物，恐非社会上之幸福也。”正是基于以上理由，所以她们认为：“然则非养成体操之专科女教员，不足以挽旧社会之顽风，不足以拯新发现之流弊，此即同人等创办是校之微意也。”❶

中国女子体操学校，后改名为中国女子体育师范学校。从1908年到1937年，共毕业学生45届，计1751人。其中首届招生20余人，皆为文理兼通、身体强健，且不缠足者。学业定为1年半。开设课程除各种体操运动之术科外，还有伦理、教育、国文、数学、音乐、体育学等学科类课程。中国女子体操学校除正常的教学活动以外，每年还要举办学校运动会，以此检查学生的学习情

❶ 张天白. 中国女子体育专业教育始于何时. 体育文史，1991(2).

况，并通过运动会的形式向社会宣传近代女子体育。1909 年 11 月《民吁日报》曾对中国女子体操学校的运动会作过一次报道："初二下午，该校开第二次运动会，男女来宾千余人。会中运动节目计有四大部。"正如该报在最后的评论中所说："其本校材料之新颖，操演之精确，平时练习之功可见，良为近来女校所罕见。即东方诸国女校，殆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日出而教授，于中国女界体育前途，裨益真非浅鲜也。"中国女子体操学校确实为中国近代女子体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第三，出现了近代中国体育史上的第一批正式女子运动员。例如 1916 年，江苏省运动会在扬州市召开，上海爱国女校的运动员前去作篮球表演赛，轰动了全城。1921 年，广东省举办第 8 届省运会，有 5 个队参加了女子排球的比赛。特别是 1923 年 5 月 21 日，第 6 届远东运动会在日本大阪举行。中国派出了一个由 113 名运动员组成的参赛队伍。由于从这届远东运动会开始，正式设置了表演性质的女子体育比赛项目，所以中国也第一次派出了自己的女选手。她们是中国女子排球（亦称队球）队和女子网球队。

女子排球队最初打算让广州的南华女排代表中国出席，后来考虑可借此机会在全国更广泛地提倡女子体育，因而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选拔。最后有 16 位选手入围，她们是：上海的苏祖祺、张畹清、贺生曦、陈彦融、高爱鸿，苏州的陈翠英、苏同文，南京的岳继先，广东的熊可欣、李首民、王星瑗、李晴雪，天津的郝雨春、高玉珍，北京的陈彩英、黄振球[1]。女子网球队则由贺生娥、黄翠实两名队员组成。在第 6 届远东运动会上，中国女排最后以 0 比 2 败给日本队，获得表演赛第 2 名。中国女网则分别败给菲律宾和日本，获表演赛第 3 名。虽然成绩不算理想，但它却是中国女子运动员第一次正式参加大型运动会的比赛，而且是第一次走出国门参加国际性的体育比赛，所以，其意义远远超过了体育比赛本身。正像

[1] 张畹清. 回忆中国首次女子排球队出国参赛. 体育文史，1989（4）.

1923 年上海《大公报》所登载的评论那样："此次中国女子与赛，本意不在争胜，为向世界宣传中国妇女对于竞技之觉醒耳。"

(二) 女子体育的初步发展

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初步发展是在 1924 年以后，这是因为有以下一些因素：第一，学校中的体操科在 1923 年被正式改名为体育课，从此兵操内容被彻底废除，近代西方体育中的田径、球类等运动项目在学校得到普遍实施。这一变化为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教育基础。第二，在 1924 年的第 3 届全运会上，正式设有表演性女子体育比赛项目。从此在历届全运会上，以及一些省市地区运动会上，人们都能看到中国女子运动员正式参加比赛的娇娆身躯和飒爽英姿，例如湖南省在 1924 年的第 7 届运动会上，开始设置女子体育比赛项目。第三，女子体育在项目的选择上，也表现出越来越大胆的趋势。一些原来都认为只能是男子进行的项目，竟然也有女子开始涉足。其中最典型的就是 1924 年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支女子足球队的诞生。1924 年，在上海的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体育老师沈昆南从伊文思外文书店看到了一本外文版的书籍，其中有关于介绍英国女子足球队的组建情况，沈老师便将它买下送交陆礼华校长参阅。陆校长对此很感兴趣，于是和沈昆南一起研究，决定组建一支女子足球队。因为她们认为，这样做不仅是对封建势力的冲击，也是对足球运动是否适合女子运动的一种尝试。而女子体育学校就应该敢于走在社会改革的前头。所以她们经过测试和考核后，最终在第 4 届学生中确定了首批女子足球队员。她们是陈隐青、叶庆云、李鸣皋、冯文湘、俞品端等十多人。经过系统的训练以后，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的女子足球队，竟然也成为上海沪南一带小有名气的足球劲旅。虽然当时没有同样的女队可与之较量，但她们却和当时华东体育专科学校的男子足球队举行过多场比赛。据说双方势均力敌，互有胜负。这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支女子足球队，由于缺乏良好的社会生存环境，最后还是不得不

带着遗憾，于1926年自行解散。但它对近代中国社会的体育影响力，则是永存的。

第四节　体育的大众传播与体育经济活动

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宣传体育活动的主要是一些综合性的报纸杂志。其中尤以创办较早的上海《申报》影响力为最大，对体育的宣传报道也最多。体育专业报刊的出版发行活动，则起步稍微晚一些。现在所知道的第一份体育专业刊物，是1909年由上海中国体操学校创办的《体育界》。

一、体育刊物的出版与发行

在1914年到1926年间，全国新出版发行的体育类刊物约为10种，详见下表。

1914—1925年体育期刊情况表

刊　名	创刊时间	停刊时间	出版地和发行者或主编人
体育杂志	1914年6月	1914年7月	上海，徐一冰、王均卿
体育研究会会刊	1918年1月	仅出一期	南京，南京高师体育研究会
体育周报（长沙）	1918年12月	1920年10月	长沙，黄醒
体育杂志	1919年5月	不详	浙江，傅国芬、黄承熙
精武杂志	1920年	1925年10月	上海，精武体育会
武术	1921年1月	不详	上海，中华武术会
体育研究	1921年10月	仅出一期	上海，南京高师，陈奎生等人
体育季刊	1922年5月	1924年12月	上海，南京东南大学，麦克乐
教育与人生	1923年10月	1924年12月	上海，《申报》副刊，蒋湘青
体育研究	1925年5月	不详	成都，成都高师学校体育会

在以上刊物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上海出版的《体育杂志》、长沙出版的《体育周报》和东南大学的《体育季刊》。

《体育杂志》(上海)，1914年6月由徐一冰、王均卿创办，是上海中国体操学校校刊，铅印24开本。内容有论文、专著、体育史、体育教授法、体育资料、生理卫生知识、译文、小说、文苑、杂谈等。刊物以“忧国之羸弱，造学子于健全”为宗旨。这是现在所知继《体育界》之后较早的中国体育刊物。其总出版期数与截止日期不详。

《体育周刊》(长沙)，1918年12月9日创刊，至1920年10月25日停刊，共出刊60期。由黄醒（原为长沙楚怡学校体操教员）联合湖南体育人士陆鸿仪、陈奎生、徐凯、蒋葆三等30余人创办。刊物“以普及国民体育知识、研究体育学术、促进体育事业”为宗旨。内容分言论、学说、材料、调查、记事、讲演、音乐、小说、通信、杂俎等。每周一期，每期限6～12页，约1万字。从第二期起，每3个月增刊一期特号，主要是讨论体育上的重要问题，广泛征求当代名人意见。《体育周报》内容丰富，文章犀利，思想活跃，对各派主张兼收并蓄，受到当时一些进步人士的支持和帮助，也得到读者和体育界人士的好评。陈独秀、蔡元培、徐一冰等人均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文章。恽代英、毛泽东及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陈奎生等，还担任过该报的发行员。

《体育季刊》(东南大学版)，南京东南大学体育系主编，1922年5月由美国人麦克乐（C. H. Meclog）创办。主要内容有研究论文、体育教材、教法、体育建筑、器材设计、运动生理、卫生、体育工作通讯等。从1923年二卷一期起，改为中华全国体育研究会会刊，编辑机构仍设在东南大学体育系。1923年12月二卷四期起，增辟卫生专栏，由中国卫生会编辑。从第三卷一期起，改名《体育与卫生》，仍为季刊。1925年起，《体育与卫生》并入中华教育改进社《新教育》杂志内，每年出两期体育卫生专号。这个刊物，以介绍体育科学知识和体育学术研究成果为其特色，在南方

体育界有一定影响。

二、体育图书的出版

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的体育图书是1890年由上海广学会出版发行的《幼学操身》。后来在1904年又由上海广学会出版发行了《体育图说》一书。从1909年开始，中国近代体育书刊的出版发行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期。据俞子箴先生的不完全统计，仅从1909至1925年间，全国出版发行的体育图书就达到了107种（体育总论7种；体育原理1种；体育史2种；体育指导3种；体育教学法4种；体育测验3种；体育格言1种；运动会2种；田径运动4种；球类运动12种；游戏18种；体操24种；技巧运动2种；舞蹈3种；健身运动14种；健康教育7种）[1]。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郭希汾的《中国体育史》。

郭希汾（1892—1984），字绍虞，江苏苏州人。少时家境贫寒，无力入学，全靠自学成才，成为中国语言文学教授，我国著名的文学史专家。1918年，他在商务印书馆子弟学校——尚公小学任教，与该校教师庞醒跃等创办东亚体育专科学校，任兼职教员。为解决教材问题，利用商务印书馆的便利条件，在著名的涵芬楼查阅大量古籍，编写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本《中国体育史》，由叶圣陶等人作序，于1919年11月出版。这本书主要偏重写中国古代传统体育项目，全书除首尾的绪论、结论外，共8编，分古时之体操、角力、拳术、击剑、弓术、舞蹈、泅泳、游戏专题。书中资料丰富，并有考证，是当时体育界难得的学术著作。《中国体育史》出版后，受到体育界和广大读者欢迎，曾多次再版，并被收入《史地小丛书》和《万有文库》。《中国体育史》是郭希汾一生20余部著作中的第一部。他曾先后在协和大学、燕京大学、光华

---

[1] 体育研究与通讯，1924，2（5）：61.

大学、同济大学等校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又先后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图书馆馆长，上海文联第2届副主席，上海作家协会第3届副主席，《辞海》副主编等职。

三、体育经济活动

中华民国成立后的体育经济活动，虽然仍主要集中在运动服装的生产与销售、体育器材的生产与销售等这些传统的经济活动方面，但职业体育俱乐部的萌芽，则为这一时期的体育经济增添了一笔重要的色彩。

（一）体育服装的生产与销售

20世纪20年代后，世界纺织业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美国发明了人造丝，这是服装衣料的创举。由于人造成丝是机械化大批生产，价格又便宜，因此在西方各国很快流行起适用、简练、朴素、活泼的人造成丝服装。在中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帝国主义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压迫，又由于中华民国成立以后颁布了不少鼓励发展工商业的政策，由于多次发生的抵制日货运动，使得中国的近代经济活动获得了一个相对较好的发展环境。特别是由于近代西方体育在中国影响力的扩大，中国近代体育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从而导致了体育运动服装需求的市场扩大，使得体育服装的生产和销售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仅从1934年出版的《体育研究与通讯》杂志上，就可看到有关运动服装的生产与销售广告比比皆是。例如在上海的“中央运动器具公司”里，已设有专门的“服装鞋袜部”。该公司在广告的介绍中说：“本公司特请著名技师精制军服、制服、校服及童子军服，定价低廉，交货迅速。球鞋、跑鞋、背心、毛袜等，无不精益求精，美观合用。”又有“大华运动器具公司”，他们打出的宣传品牌是，以“中华最完备的国产运动用品公司”为口号，特别介绍自己设

有完备的工厂，专门制造的“运动服装，定价低廉，欢迎批发”。在“上海少年用品社”的广告中，则是以“精制各种军训用品、童军用品服装等”为保证，特别强调是“自设工厂，大量出品；标准耐用，物美价廉”的体育操服。

（二）体育器材的生产与销售

从体育器材用品的生产制造来看，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的上海“连长记运动器具号”，开了中国人进行体育器材生产的先河。“连长记运动器具号”创设于1909年，开设之初仅承接网球架、网球拍的修理业务。以后也经营各种运动器具，以及自制球拍、网架、游泳衣等类的体育用品，并同时代客修整运动场地和安装体育设备。

作为近代史上较早的体育器材生产厂家，首推河北保定的“布云工厂”。该厂创办于清朝末年，一开始主要是制造工业、音乐等产品，同时兼营体育器具[1]。从民国四年（1915）开始，由于日本强迫我承认二十一条，使“举国同胞，义愤填胸，号呼奔走，抵制日货，以学界为尤盛。唯各校所用体育器具，多为东洋出品，苦无国产，殊感困难。”正是在这一背景条件下，布云工厂“鉴于体育为强健民族之基础，不可一日缺之，遂下决心，创造各种运动品，以应国人需要。”布云工厂在其创业的过程中，“对于创造之技能，尤奋努精进，不遗余力。”所以“举凡球拍、球网、篮球、足球、排球、铁饼、标枪、铅球、铜球，一切体育用品，不独在中国首屈一指，即在欧美各国亦享莫大之盛誉。”[2] 如1930年春，当时的教育部要求布云工厂参加中国发起的“世界运动品比赛会”，其产品受到了一致好评。1931年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特派的考查中国工业专员阿期德，在考察了布云工厂后，亦对

[1] 勤奋体育月报，1935，2（8）.

[2] 勤奋体育月报，1935，2（8）.

布云生产的体育用品的质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所以，在历届华北运动会上，在1933年的旧全国运动会上，布云工厂生产的体育器材都被大会指定为比赛用品。布云工厂在组织生产和销售上也初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做法。如在生产上共设有3个部，分别是："第一为球拍部；第二为制革、制球部；第三为制铁饼、标枪、铜球、铅球，及一切田径赛用品部。"在销售上则分为"事务、批发、函购、门市四股，各专责成。"布云工厂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还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企业理念，在对外宣传中明确指出："本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之宗旨，有完美的设备，精巧的技师，相当的经验，所用材料纯系国产，加以科学的研究，构造精利，务求使用灵敏，超过普通制造，达到抵制外货之目的而后已。"所以，布云工厂的产品当时不仅在国内具有良好的市场，还打进了西欧和东南亚一带。

除布云工厂以外，天津春合体育用品制造厂也是中国近代体育史上创办较早的体育器材生产企业。它创办于1920年，原名春合工厂，创办人兼总经理为傅泊川先生。傅曾是一名中医，也担任过中学教师。他曾为中国体育的落后而焦虑过，特别是看到体育方面所需要的一切用品，"因国人鲜有能制造者，不得不求之于外洋"而很不是滋味，所以决心办一个体育用品制造厂。其厂在创办初期，资本不过5000元，规模不大，生产的范围也很小，只能制作篮球、足球及网球拍等20多个产品，主要在北京和天津一带销售。后来，随着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不断普及，国人对体育用品的需求增大，该厂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至1927年秋，该厂续添股本达到35000元，同时更名为春合体育用品制造厂，扩充了制革部，并聘请燕京大学制革系为其厂顾问。产品"以球类为大宗，次为球拍"，其他还生产运动鞋、田径运动器械、运动服装等等。有工人200多名，产品销售全国，每年销售额达50万元。为了进一步扩大企业的竞争力，1930年，创办人傅泊川委派其弟傅清淮赴欧美考察。傅清淮历时10个月，参观了当时世界最大的

SPALDING 工厂，研究科学管理方法和改良机器，对工厂的发展进行了重新规划，分成制革、制球、网球拍、运动鞋、铁木、针织 6 个部，使生存空间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

在体育用品制造方面，天津利生体育用品工厂同样具有传奇色彩。其创始人孙润生，1911 年曾在天津南开中学任教，做过周恩来的英文和音乐教师。他充分感受了南开的体育气氛，突发了制造“皮球”的设想。于是，他从家乡请来一位初通皮匠活的乡亲，用生产马鞍等器具的皮料，依样画葫芦，开始制作起篮球。虽质量一般，但居然能缝好一个卖出一个。由此，他于 1921 年毅然辞去教员职务，与这个乡亲合办起一个小作坊，取名“利生体育用品工厂”。

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利生生产的篮球在国内体育界已有很高的知名度，如 1931 年举行的华北足球、篮球比赛会，1933 年南京举行的第 5 届全运会，1934 年举行的华北运动会等，都将利生的 B6 篮球作为比赛的“指定标准球”使用。特别是 1935 年，他们生产的矿物鞣制法兰皮篮球，又被第 6 届全运会“指定为标准球”。从此，利生便骄傲地将按此标准生产的篮球命名为“全运号”，更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知名度。此外，为了适应篮球运动普及的需要，他们还生产有适用于砂石场地的 B1 篮球、适用于普通练习使用的 S 篮球，以及可供女子和小学生使用的 B4 篮球、供小学生用的 B7 篮球和供农村学生用的 T 篮球等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篮球产品系列，使他们的篮球年产量在最盛时达到 2 万只，从而稳稳地占据了国内市场。他们生产的篮球，其最好使用质量达到 74 支球队用同一个篮球比赛，263 场比赛后“该球依然圆整如新”。

除篮球外，利生还生产有 F 系列的足球和 V 系列的排球。所以，1935 年时，冯玉祥为他们写下了“用国货方能救国”的题词，国民党元老于佑任先生为他们的题词则是“强种健身”。

（三）职业体育俱乐部的萌芽

20 世纪 20 年代，随着国内体育竞赛活动的逐渐频繁，一些民族资本家也开始涉及体育这一新的文化领域。他们或本人是体育的忠实爱好者，或是将体育作为经商的广告，或是借体育提高自己的社会影响力，纷纷组织起一些带有职业性质的体育俱乐部，从而推进了社会体育竞赛活动的繁荣，活跃了社会体育文化生活。这些体育俱乐部通常由一个或多个企业老板投资组织，人员没有限制。老板决定俱乐部的重大事情，如招聘运动员、组织对外比赛等。运动员的日常生活也是由老板负全责，一般为老板属下公司的挂职职员，从事专业或半专业化的体育训练。仅以上海为例，在 20 至 40 年代间，就有近百个球类运动的俱乐部。俱乐部的经费由老板定期支付，银钱交付也有明确的财会支付手段。当然，正因如此，这些俱乐部的兴盛衰亡也必然与老板企业的经营状况产生了自然联系，有的长盛不衰，有的昙花一现。在当时这种并不合法的体育俱乐部中，由于工作固定，薪金优厚，导致了有专业之长的运动员争相加入，使竞争较为激烈，一般不具有相当水平的运动员是难以入围的。比如足球选手中，能进入职业俱乐部的都是像李惠堂、孙锦顺、张邦纶、贾幼良等那样的国手；篮球选手中则是王永芳、吴成章、李震中那样的名人。

在这些职业体育俱乐部中，创办时间较长、社会影响较大的是上海优游体育会。它创办于 1923 年，创办人程贻泽。

程贻泽（1905 — 1982 年），又名祖懋，安徽歙县人。学生时代即爱好足球、篮球。1923 年毕业于上海圣芳济学院，主持房地产公司，曾先后在上海静安寺路、胶州路、泰兴路等处建造私人足球场、网球场、健身房、篮球房、游泳池。同年创办三育足球会（次年改名为三育体育会），并资助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1 万银元造中华运动场。1926 年，三育足球会发展为甲、乙两支队伍，参加了西人足球联合会（亦称上海足球联合会）主办的足球联赛。同年

冬，程遭匪徒绑架，三育体育会停办。后程逃出匪巢，并于次年又发起组织优游体育会，组建优游篮球队、足球队、网球队，成为上海的一支主力队伍。1928 年，程又创办强华体育会，吸收工商界人士参加，并主办了第 1 届优游杯篮球锦标赛。抗日战争中，程将三育、优游体育会所得奖杯和银盾，全部捐作抗日救国经费。优游体育会直到 1947 年才因经费枯竭而停止了活动[1]。

[1] 蒋志和. 民族资本家创办体育初探. 体育文史，1987（1）；《上海体育志》编纂委员会. 上海体育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644.

第十章　近代竞技体育的初期发展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的体育竞赛活动陆续传入中国，开始是在一些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开展，经过几十年的推广传播以后，逐渐在中国的普通学校和社会上流行起来。到了北京政府时期，各种类型的赛事开始增加，运动竞赛的规模也逐渐扩大。除了在学校经常举行比赛以外，在全国范围内也开展了很多比赛活动，其中包括全国运动会、大区运动会等。在此期间，中国还与日本、菲律宾联合举办了远东运动会。这些运动竞赛为旧中国体育抹上了一笔重彩。

第一节　省市运动会

辛亥革命后，竞技体育的发展首先表现为省市运动会的逐渐增多，从而使体育竞赛活动在地区的广泛性，以及竞赛水平和层次上都获得了较大的提升。这一时期，无论是处于沿海地区的广东，还是处于内地的四川，都曾先后举办过省级运动会。

一、天津市运动会

早在辛亥革命以前，天津市就开始举行市级运动会，从1902年到1911年，天津共举办了8届联合运动会，其中的第7届和第8届还邀请了附近城市参加，这意味着天津很早就具备了开展规模较大的体育竞赛活动的基础。这与天津开埠较早也是有关联的。天

津的这个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的联合运动会，在举行第6届时曾被称为“英－中第六届田径运动会”，实际上它的原名是天津青年会运动会，由基督教青年会的体育干事发起，以该会所辖的普通教会学校为参赛主要单位。同时，在每年秋季还邀集本市公立、私立大中小学校学生共同比赛。自1902年至1925年一共举办了21届，它比1910年创办的全国运动会早7年，比1913年创办的华北运动会早10年，而持续的时间长达23年，这在旧中国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

这项比赛通常被人们称为“学校体育联合运动会”，每当举行比赛时，有军乐队助兴，官绅、学界人士莅临观看并发奖。1913年举行第10届时，将时间改在每年春季。1915年举行第12届时，开始有了年龄限制，凡是年龄在16岁以下、身高不满5英尺的参赛选手要另外组织召开童子运动会，实际上就是为小学生单独举行一个运动会，而学校体育联合运动会则成为中等以上学校参加的比赛了。从项目设置上看，刚开始只有田径项目，1915年增设了球类比赛，在秋季举行。此后每年都固定在春季举行田径运动会，在秋季举行球类比赛。1921年举行第18届时增加了网球。到了1924年第20届时，妇女解放的大潮已经势不可当，女子学校也可以参加各项比赛了。

二、湖南省运动会

湖南省的体育比赛也是首先从学校开始的，逐渐发展成为全省的体育比赛。最早的运动会是在教会学校及传教机构里面开展，由于青年学生喜好田径、器械体操和球类运动，渐渐地有组织的竞赛活动就多了起来。辛亥革命以后，湖南省体育竞赛活动的发展势头更进一步加快。1912年有一位名叫周召南的留日学生归国以后，创办了一所私立体育学校，该校就经常举行体育比赛。此外，湖南省还创办有尚武体育学校和女子体育学校，竞赛活动也很频繁。朱

剑凡创办的周南学校，体育活动很有特色，蔡畅同志就是该校毕业生之一，她曾留校担任体操教师，并于1918年11月主持了全校运动会，1919年去法国留学。湖南最高学府是北宋时代创建的岳麓书院，在清末改为湖南高等实业学堂，辛亥革命后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1906年就在学校前坪举行了第1届联合运动会，包括以上学校在内的长沙中小学参加了竞赛，竞赛项目有团体操、兵式体操和武术表演等。

辛亥革命以后，留学归来的学生越来越多，从上海等体育专门学校毕业后被聘请到湖南任教的人也越来越多，湖南省的体育竞赛水平也在不断提高。1923年前后，湖南省的田径、球类以及游泳选手在历届华中运动会中屡获胜利，参加的运动员多系中学生，这也意味着湖南省各校的体育竞赛搞得轰轰烈烈。

从一些记载上看，湖南省自1905年至1926年共举行过9届省运动会。实际上应该称为学界的联合运动会或者称为参加远东运动会的预选赛，历届湖南省运动会的时间和地点以及部分比赛内容如下：

1905—1926年湖南省历届运动会

届	时　间	地　点	比赛项目或说明
1	1905年	长沙小吴门外校场坪	具体时间不详
2	1910年	长沙经武门外协操坪	具体时间不详
3	1914年5月10—12日	长沙经武门外协操坪	开始有了田径项目的比赛
4	1916年11月	省教育会操坪	具体时间不详
5	1921年5月5—6日	省教育会操坪	为参加第5届远东运动会而举行的预选赛
6	1922年11月28—29日	省教育会操坪	为参加第6届远东运动会而举行的预选赛
7	1924年5月4—7日	长沙协操坪	女子首次参加比赛
8	1925年4月1—3日	衡州	排除了教会学校参加
9	1926年5月21—23日	常德	

由于当时没有关于比赛的详情报道，因而具体情况不甚了解，可是湖南省举办运动会较早，而且比较正规，长时间不曾中断，这是不争的事实，这在全国各省中是少有的。惟其如此，湖南省的竞赛水平在旧中国是比较高的，在每一届华中运动会上都是获得冠军。

三、四川省运动会

根据简略的文字记载，四川省的运动会是在 20 世纪初才有的，1905 年在成都北较场举行了首届运动会，1908 年在成都南较场举行了第 2 届运动会，这届比赛又名“四川大运动会”，实际上这两届都是以学生为主体的竞赛活动。不知因何缘故，四川省的体育竞赛活动长期中断，直到 1924 年和 1925 年，驻守四川的大军阀杨森因为酷爱体育活动，在他的鼓动下，成都又举行过两次全川运动会。从总体上看，地处西部的四川和其他西部省市一样，在旧中国时代体育竞赛活动远远不及沿海地区。可是从现有资料看，1922 年在泸州举行的“川南联合运动会”却很有特色，它甚至有可能是促成杨森策划举办全川运动会的一个原因。

泸州交通不便，与成都相比文化也很落后，以前并不重视体育，据认为 1919 年在泸州举行过一次运动会之后，引起了人们对于体育竞赛的兴趣，曾经学过体育的朱德同志参与过这届运动会的组织筹划工作。而杨森于 1921 年在泸州担任第 9 师师长兼任永宁道道尹时，掌握了川南二十五县的行政大权。他请来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卢作孚来当道尹公署的教育科长，推行新文化运动。在此期间，他们特别注重体育，培养学生的尚武精神，要求各校都举行朝会，出早操。开始时这些新鲜事物受到泸州旧派人物的攻击，可是杨森与卢作孚坚持推行，最终蔚然成风，川南师范学校则成为了推行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卢作孚又聘请了一些教育界的精英来该校工作，其中包括共产党早期领袖人物恽代英。为了宣传革命理论，

培养青年学生，他在该校担任教务长期间，鼓励青年参加体育锻炼，大受学生的欢迎。后来萧楚女等人来校执教，也与学生融为一体。川南师范学校还聘请了一位名叫谢啸仙的教练来创办童子军。他是体育专业毕业的，对于学生的体育锻炼抓得很紧，要求也很严格。除此而外，该校的体育师资力量很强，当地仅有的两位女子体操教师都在该校执教。在地方官员和学校管理者以及执教老师的共同努力之下，川南师范学校的体育课程教学很有成效，体育竞赛水平也很快地得到了提高。

1922 年春季，永宁道决定在泸州召开有 25 个县参加的“川南联合运动会”，目的既是检验该校的体育竞赛水平，同时也是推动其他地方体育活动的开展。这个决定下达以后，各县各校势必要认真准备，加紧练习,而川南师范学校的童子军教练谢啸仙为了争取优胜，甚至要求停课集训，担任教务长的恽代英也主张加紧练习，但不同意停课。据说谢啸仙曾以辞职力争，而恽代英还是坚持不停课的原则，说服了谢啸仙。

阳春三月的一天，川南联合运动会在泸州城溪口的广阔河滩上隆重举行。参加单位有泸州川南师范学校、泸县中学、泸县女子师范学校、江安中学、叙永中学以及富顺、纳溪、南溪、筠连、长宁、合江等二十余县的各所学校。由于女子参加体育活动在四川还没有形成规模，所以除了泸县女子师范学校而外，其他县没有女生参加。开幕时，军乐演奏，各县健儿齐声高唱运动会会歌，歌词大体如下：“联合运动，整刷精神，齐来竞技兮；铜鼓喇叭，飘飘国旗，远壮声势兮；规律严肃，步伐整齐，顾盼生姿兮；奋斗奋斗兮，齐向优胜旗！快哉快哉，吾乃得胜利兮。”

运动场的四周搭起了简易看台，是用砖头垫起木板作为观众的座位，比赛的几天当中，观众十分踊跃。在运动场旁边还用木板搭有一个不高的舞台，是为远道而来的少数民族选手准备的，请他们在这里跳“锅庄”舞和唱山歌。运动员当中有彝族、苗族和藏族等民族，他们身着民族服装，吹起笙、箫、笛子，打起小

鼓，载歌载舞，为比赛增色不少。运动会的承办者为了表彰他们的积极参与，也颁发了奖品。此次运动会上还有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为了鼓励妇女积极寻求自我的解放，专门组织了几位名流的太太到现场剪掉头发，以示与封建习俗决裂，其中包括杨森的三个太太。

比赛的结果，泸州川南师范名列团体第1名，江安县获得第2名，泸县女子师范学校作为初次派遣运动员参赛的单位，在妇女解放运动中作出了表率，实属不易，也得到了奖励。这次运动会对于川南体育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运动会闭幕之后，大家一致认为，泸州川南师范学校和江安中学比其他各县水平高，其主要原因是，他们的体育教师都是从上海聘来的，谢啸仙是从上海聘请来的，江安中学的林先生和熊先生都是福建人，也是从上海聘请来的。

纵观这次“川南联合运动会”，由军阀、地方政府、学校负责人以及执教教师共同合作，成功地组办了体育比赛，在四川体育历史上堪称一个奇迹，而且参与这项事务的人还包括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人物，使这一次的体育竞赛增添了传奇色彩。虽然四川省的体育水平总体上不高，但这次运动会产生的影响却不能低估，尤其是对于远离成都、重庆的区县，无疑会起到较好的推动作用。

四、广东省运动会

从1906年至1926年，广东一共举办过10届规模较大、参赛人数较多的省属运动会，地点都是在广州市。前几届的参赛单位是广州市内的中小学校，从第8届开始，增加了广州市郊县、省内各县、市和香港的学校以及一些体育社团。第1届至第4届均以田径的跳高、跳远、跑步为主要比赛项目，第6届的比赛项目增多，不仅增设了田径的跨栏跑和掷铁饼等，而且也将球类等项目列入，有足球、排球、自行车和赛马。自此以后，随着参赛人数的增加，广

东省体育运动的发展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列入比赛的项目逐届增加。除了广东省运动会，当时的学校运动会也很有特色，与同时代的其他省市相比，居于领先水平。

（一）第1届至第4届广东省运动会回顾

1906年1月10日，首届广东省运动会在广州市东较场举行，大会的名称是“广东省大运动会”。由省学务处主办，学务公所所长姚百怀担任会长。参加单位有广州市区的将弁、陆军、岭南、南武、随宦、求是、进取、时务、时敏、述善、中德、教忠、南海等17所学校，参赛选手均为男生。运动员按身高分为甲、乙、丙三个组进行比赛，这显然是为了将小学生和中学生区分开。比赛项目有二人三足赛跑、负重赛跑、跳高、跳远和撑竿跳高等。比赛结果是，岭南学堂获得团体总分第1名，颁发绣有双龙戏珠图案的奖旗一面，南武、随宦、进取三所学校分获第2、3、4名。第2届省运会于1907年11月由省学务处承办，在东园举行。当时为了提倡尚武精神，鼓励国人求强求富，将运动会改称为“尚武运动会”，后来被定名为广东省第2届运动会。比赛项目以田径为主，有跳高、跳远、跑步等。参赛选手均为学生。第3届省运会于1909年11月在东较场举行，大会名称被恢复为“广东省大运动会”。后来称为广东省第3届运动会，参加比赛的选手仍然是学生，南武学堂获得团体第1名，南武学生陈彦获得个人第1名。第4届省运会于1910年12月在广州东较场举行，当年是庚戌年，这次运动会又称庚戌运动会，是由广东省教育司主办的。

（二）第5届至第10届广东省运会概况

第5届广东省运动会于1912年12月在广州市教育路九曜坊省教育司署内操场（今南方戏院）举行，大会被定名为“广东省运动会”，仍然是由省教育司主办。这次运动会是国民政府成立

之后举行的第 1 次运动会，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因为当时粤省教育总会在文明路两广油鸡优级师范学堂成立不久，吴在民担任会长，黄节担任副会长，他们表示该会将对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同年广东军事体育会也成立了，是由何侠发起的。民国成立以后组建的这些组织能否有利于广东省体育的发展，人们充满了期待。本届比赛总体上说比较成功，后来被称为广东省第 5 届运动会。参赛选手主要还是学生，运动项目以田径的跑跳项目为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届比赛中崭露头角的几位学生选手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次年在马尼拉举行的第 1 届远东运动会和 1915 年在上海举行的第 2 届远东运动会，而且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这对于以后的广东省运动会能够持续开展，无疑产生了促进作用。参加第 1 届远东运动会的广东选手有南武学堂学生丘纪祥、许民辉，他们被选为中华足球队和排球队队员，陈彦入选为田径队队员，都夺得了不错的名次。1915 年第 2 届远东运动会在我国上海举行之前，在第 5 届广东省运动会上表现出色的选手们又参加了预选赛，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王有松等 8 人，培英学校关崇志、谭道景等 4 人，南武学堂丘纪祥、何琳等 8 人，岭南学堂廖崇真、郭琳爽等 6 人入选，显示了广东体育选手的强大实力，而足球运动员唐福祥还担任了中国队的队长。从此以后，广东省的运动会就担负起了为参加远东运动会选拔人才的重任。

第 6 届广东省运动会于 1917 年 2 月 13 — 15 日在广州市东较场举行，广州南部体育会负责筹备和组织，会长由当时的广东省省长朱庆澜担任，副会长为陈廉伯。大会提出以联络各界振兴体育为宗旨，在确定比赛项目的时候便有所扩充，包括田径、足球、队球（排球）等，同时为了使团体比赛更吸引人，增设了国技、体操、游戏、武术等。此外，还有自行车和赛马。有岭南、培英、培正、南武、教忠、真光、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等单位的学生参加比赛，最后团体冠军被岭南大学夺得。同年，第 3 届远东运动会在日本东京

举行，广东有一大批选手入选国家队，如南武学堂的丘纪祥、何琳等5人，岭南学校的郭琳爽等6人。此外，唐福祥、关健安、黄朴入选足球队，郭仲棠等8人参加田径比赛。

第7届广东省运动会于1919年2月在广州市东较场举行。比赛项目和参赛单位与上届相同。比赛结果是岭南大学、培英学校、南武中学分获冠、亚、季军。个人冠军被岭南的余振华夺得，而男子跳远冠军是梁仲勤，他的成绩超过了第1届远东运动会创下的大会纪录。

同年8月，第4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广东籍的丘纪祥出任中国排球队的教练。广东精武体育会当年也在长堤海珠大戏院成立，这对于后来广东省竞赛水平的提高，又注入了新的活力。次年，已经担任广州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的许民辉发明了低网排球，由广东省教育会和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制定了《低网排球规则》，便于女子学习掌握，并先后在广东女子体育学校、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真光学校、培道学校等单位开展起来，也为广东省的排球竞赛活动增添了新的内容。

第8届广东省运动会于1921年4月14—16日在广州市北较场举行。孙中山大总统亲自担任本届运动会的名誉会长，教育部长伍廷芳担任总会长，后来叛变革命的广东军阀陈炯明当时是广东省省长，与其他一干官员也担任了名誉副会长。大会会长是汪兆铭，副会长是金曾澄。比赛项目分为团体运动、竞技运动和表演项目3大类。团体运动包括国技、体操、游戏和武术；竞技运动包括径赛的11个单项、田赛的9个单项以及足球、篮球和男子排球、女子排球；表演项目有千人操、国旗运动等。根据当时的统计，由于孙中山先生亲自参加开幕式，到场观众人数达到17000多。比赛依然是按身高分甲、乙、丙、丁4个组别来进行，有58个单位参赛，获团体优胜的前3名是岭南大学、培英中学、培正中学。获个人优胜的前3名是培英中学的黄简慈、佛山华英中学的司徒展、岭南大学的梅熙甫。香港圣保罗书院获得男子排球冠军、香港南华体育会

获得足球冠军、岭南大学获得篮球冠军。女子低网排球的冠军被培道女中夺得。

同年5月，第5届远东运动会在我国上海举行，以香港南华队为主力的我国足球队蝉联冠军，由广州岭南大学、培英中学、培正中学组成的我国排球队也获得冠军。两年以后，1923年5月第6届远东运动会在日本大阪举行时，我国排球代表队是由岭南、培英、培正等学校的黄仁让、曾恩涛、刘权达、刘权荣、赵善性等人组成，领队及教练仍然是李明德和丘纪祥。而我国足球代表队仍以香港南华队为班底组建，队长梁玉堂第5次参赛，每次都获得冠军，在广东体育史上创造了一项纪录。

第9届广东省运动会于1925年3月16日在广东大学（中山大学的前身，校址在今广州文明路，省博物馆附近）的运动场举行。比赛项目有田径的9个单项和球类的8个项目，并且增设了游泳比赛，同时还设有精武会操、国旗运动、千人操、国术、体操、游戏、舞蹈、童子军会操等表演项目。大会会长是邹鲁，评判部长（即裁判长）是许民辉，竞赛主任是陈彦，以前的优秀选手退役以后开始负责竞赛组织管理工作。此次比赛还选拔出了黄炳坤、梁无恙等参加第7届远东运动会。同年5月第7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时，香港南华会足球队代表我国参赛又一次夺取冠军。广州的梁无恙、黄炳坤则参加了田径比赛，刘权达、赵善性、黄仁让等参加了排球赛，卢惠卿、邓志豪、余碧霞、李翠浓、张杏兰等参加了女子排球表演赛。

这期间，广州市热心体育的人士李朴生、温仲良、孔昭栋、丘纪祥等发起组织了广东省体育协进会；永汉南（今北京路）仰忠街的广东女子体育学校学生李明珠、林焕仪发起组织了“广州女子体育研究会”。这两个组织的建立，对于推动广东省体育的开展又增添了生力军。

第10届广东省运动会于1926年6月21—27日在广东大学运动场举行。比赛原定于5月14日至18日在越秀山市立公共运动

场举行，因工程不能如期竣工而延期改地。本届运动会大约有1000人参赛，设有田径、球类等项目，田径比赛仍然分组进行，而球类项目提前在19日便举行了比赛。担任此次大会会长的人是汪精卫，副会长伍朝枢、陈公博。开幕式于21日上午10时举行，副会长伍朝枢、陈公博分别致词。接着由各女子学校表演国旗操、团体操以及翠鹊舞、翩跹舞、英文舞、古装舞、美国舞、蜻蜓舞等。来宾中有吴稚晖、钮铁生等国民政府要员及外国宾客十余人。会场四周用鲜花作了装饰，门口张贴着多种对联。比赛的几天时间里天气晴朗，到场观看的人很多。运动会特设了一项官厅机关职员赛跑，分为100米、200米和800米几个单项。孙哲生、吴铁城、陈公博、司徒朝、伍大光、褚民谊、谢作楷、灰策、何延年、甘乃光等政府要员都相继参加了比赛。本届运动会的经费除了省政府支付2000元以外，其余均由社会各界捐助。各捐助单位或个人可凭着捐款数额的多少获取名誉职务，例如名誉会长须捐助100元以上，名誉维护会员捐助20元以上，名誉赞助会员捐助10元以上，名誉会员捐助6元以上。作为本次运动会工作人员的事务会员也可捐助。社会各界还为大会提供了奖品，有赠送银鼎的，也有赠送银瓶的。大会原定23日休息一天，由于比赛项目太多而取消，这样也可以增加门票收入。本届比赛的公正性体现得较好，评判部长丘纪祥采用国际惯例，提议修改规则，当运动员不服裁决时，可以层层上诉，直至高级评判委员会裁决。在24日的比赛中，为了增加观赏性，由市区的学生表演兵操，学生们全副武装，表演战阵，亦即队列变换，有的则脚穿草鞋、头戴铜鼓帽，表演散兵战阵。在25日的比赛中，还举行了各个学校的童子军会操以及精武会操，并且临时增加官厅机关职员赛跑及绒球比赛。大会组委会负责人伍朝枢、司徒朝、丘纪祥、赵土伦等参加了绒球比赛（1927年以后各届广东省运动会的情况本节不予阐述）。

第二节　大区运动会

在民国初年和北京政府时期，地方性的运动竞赛活动除省市以外，一些大区性的运动会比赛也同样比较活跃。特别是华北运动会的持久和规模，在中国近代体育史上是首屈一指的。

一、华北区运动会

旧中国的区域性运动会从民国建立后不久便开始举办，而华北运动会是具有代表性的区域性运动会之一。由于当时的记载并不多见，而且还有年代上的错讹，北京体育大学的谷世权先生曾为此撰文予以订正。因此，要确切地了解华北运动会初期的情况较为困难。曾经有人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当年为什么要举行华北运动会，以及华北运动会举办的具体情况，也采访过天津南开大学校史专家梁吉生，掌握了许多口碑资料。根据梁先生的回忆，大体上可以知道一些基本的情况。民国初期，中国北方缺少区域性的体育赛事，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便萌生了一个念头，利用华北几个省市体育活动开展得较好的有利条件，举办华北体育的最大赛事——华北运动会。接着，他邀约了一些热心推广体育的人士，其中包括北京青年会的负责人和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舒美科博士等教育界名流，于1912年开始筹建。决定翌年在北京天坛举行第1届运动会。张伯苓先生的创举可以说是华北运动会能够举办的一个主要动因。除此而外，当时华北各地，特别是京津一带举办学校或学区运动会已经较为普遍，在此基础上筹建一个联合性运动会可以说是水到渠成。因此，华北运动会创建以后自1913年开始，每年都在华北各地（包括东北、山东）轮流举行。由于天津南开学校对于创设这个运动会作出了巨大贡献，因而截至第12届华北运动会（1925年5

月)，在南开学校操场共举行过3次华北运动会，而且每次都由南开学校承办。张伯苓在创办华北运动会的过程中历经磨难。当时国人大多不懂得如何筹办运动会，不得不仰仗基督教青年会及其中的外籍人士，国人大多数也不了解体育，对于运动会甚为冷漠，教育当局也根本不关心这件事情，完全是依靠张伯苓先生和几个热心人在支撑着。张伯苓凭着不屈不挠的劲头，借助自己的关系，筹集资金，寻找场地，他和朋友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将华北运动会成功举办，而且规模越来越大。1913年第1届华北运动会在北京天坛举行。5月的一个下午，北京天坛周围人头攒动，会场外车水马龙，会场内运动员跃跃欲试。开幕式上有一位慈眉善目、精神矍铄的长者端坐在主席台正中，他戴着一副黑边眼镜，穿一身深黑色的中山装，这就是以华北运动联合会负责人身份出席的张伯苓。到1925年举行第12届华北运动会时，大会组织者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由于种种原因，第13届延迟到1928年才举行。第13届以后的情况本节不予阐述，可见第四卷)。每一次的华北运动会，都是张伯苓先生亲自担任会长和总裁判，在天津召开的运动会每一次都是在南开学校大操场进行，南开学校对于运动会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全校师生都很关注比赛动态，南开学校的体育事务所也被借用，作为运动会的办事机构。来自华北各省的运动员都在南开食宿，分别由各省南开同学负责照料，使与会选手感到很亲切。由于组织到位，各届运动会都开得很成功。而张伯苓的组织能力和对于大型体育比赛的掌控能力都得到了体育界的一致赞誉。

在前12届的华北运动会比赛中，南开取得过4次团体总分第1名，1次第2名，2次第3名，并有郭毓彬、逯明等3人次获个人总分第1名。郭毓彬和逯明还曾入选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远东运动会。南开的体育水平较高，取得的成绩较好，这些也被体育界广为称道。

张伯苓先生创办华北运动会，最突出的贡献不仅仅是在华北地区首次举办区域性的体育比赛，而且是打破了外国人对于比赛

操纵和控制的垄断局面，首开中国人自办运动会的先河，这就为以后中国体育界收复体育权利作出了典范。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中国近代早期的运动会，一直受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控制，他们占据了体育团体的领导职务，运动会的主要裁判工作都选派外国人担任，赛场上的体育术语使用英语。在早期的比赛当中，由于国人没有能力自己筹办，这种情况尚可理解，到后来国人已经具备了独立承办的能力，仍然被外国人把持着组织机构则显得很不正常了。华北运动会第10届以前都是由北京青年会中的美国人来负责，到了20世纪20年代，随着全国教育界和体育界反对外国人利用特权操纵教育权和体育权的斗争走向深入，当张伯苓负责筹办第10届华北运动会时，他和其他组织者便作出了一个决断：从筹备到举办运动会，不再允许外国人独揽，而且裁判员和工作人员都选派中国人承担，比赛用语也全部改为说中国话，第10届华北运动会最后真正开成了中国人自己的运动会。以张伯苓先生为首的中国体育界有识之士，敢于抛弃崇洋媚外的陋习，为维护祖国尊严而积极抗争，在体育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此以后，基督教青年会操纵中国体育运动的状况在全国范围内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天津《大公报》写道："自是而后，华北体育界乃大放曙光，纯为独立国家之体育机关矣。各国对我之批评，亦因是而渐佳，中国之体育之才，亦因是而渐众。"这一段话很清楚地指出，第10届华北运动会以后，中国的体育人才已经有能力自己组办比赛了，这不仅得到国内民众的赞誉，而且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好评。

在前12届华北运动会当中，有几届很有特色，被人们保留在记忆当中，第4届华北运动会就是其中之一。第4届华北运动会于1916年5月19日、20日在北京汇文学校运动场举行，一共有27个学校参加，运动员达到了199人。张伯苓在此前成立的"华北体育联合会"上发表《中国急宜讲求体育》的著名演说，引起了人们对土体育的关注，他也在此时当选为华北体育联合会会长。

在这次运动会上，南开学校以较大的优势夺得团体总分第1名，并获得7个单项冠军。周恩来当时在南开就读，他作为运动会的特约通讯员撰写了有关比赛的报道，称此次比赛南开大获全胜为“华北大捷”。

第5届华北运动会于1917年4月20日、21日在南开学校的大操场举行，运动会组委会会长由张伯苓担任，王梦臣等担任执行委员。本届运动会促进了各参赛单位的交流，增强了选手之间的友谊，令人感到比赛的胜负并不比参加比赛更重要。早在华北运动会创办以前，南开与京津许多学校就有着亲密友好的交往，特别是与清华大学，很早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南开与清华的体育交往，与张伯苓先生和马约翰先生的共同促成有关系。1914年马约翰到清华大学担任体育教师以后，交流比赛每年春秋两季轮流在两校进行。在清华比赛时，多由章辑五等人率队前往，有时张伯苓也亲自带队；在南开比赛时，多由马约翰带领清华大学的队员来天津。比赛的项目主要是篮球和足球，由于清华大学的球类项目一向占有优势，在北京市称雄多年，而南开以一个私立中学的资格与之抗衡，战胜对手困难很大。相比之下，清华大学的体育经费也比较充足，聘用了美国博士做体育部主任，校园内修建有“罗斯福体育馆”，其他的体育设施大多从美国运来，数量也不少。南开健儿凭着顽强的意志和刻苦的努力，与清华大学对抗，略处下风，但双方很友好，甚至比赛互有胜负。两校在参加第5届华北运动会时也很注重交流和相互学习。而且本届比赛实际上已经不限于华北选手参加，还包括了黑龙江和辽宁等省份的选手，一共有30多所学校的运动员到来，都住在南开学校。各省运动员仍然分别由南开学校的本省同学负责接待。参加过远东运动会并且取得优异成绩的南开著名运动员郭毓彬，也热心指导外省运动员练习，学校的一些文艺社团还与外省运动员举行联欢会。这次运动会开得很成功，包括南开学校师生和社会人士在内，每天观众多达1万余人。比赛结果南开学校以27分位居总分第1，清华大学以23.5分位居第2，汇文学校以

18.5 分位居第 3。南开学校分别取得半英里、1 英里、440 码、220 码、220 码低栏、1 英里接力和半英里接力 7 项第 1 名。运动会闭幕以后，为了鼓励选手再接再厉，继续创造佳绩，于 4 月 24 日晚在天津东马路基督教青年会会馆举行了颁奖仪式，由张伯苓先生主持，汇文学校的参赛代表致辞，熊希龄负责颁奖。奖品是银杯两只，锦旗两面，都被南开学校获得。颁奖的时候，校乐队演奏乐曲，整个会场充满了欢声笑语。

由于北京、天津等城市开埠较早，接受外来事物很快，运动项目比较接近当时的国际比赛项目，这对促进中国华北地区早期体育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保证了华北运动会能够持续开展多年而不衰，成为旧中国历史上区域性运动会历史久长的一项竞赛活动。与此同时，参加华北运动会的选手大多数是在校学生，而学生在团队活动中的效能远远超过社会团体，他们朝气蓬勃，积极向上，投入体育比赛的热情很高。以天津南开学校和北京清华大学为例，参加华北运动会的大部分是学校的学生，他们平时到校学习，学习之余比其他同学增加体育训练的课程，这些运动员每天很早起床参加长跑锻炼，增强体力。在华北运动会上成绩卓越的运动员可以入选参加全国运动会，在全国运动会上成绩优秀者还可以被选拔出来参加远东运动会。华北运动会的田径竞赛项目，基本上与国际比赛接轨，有男子 100 码、220 码、440 码、880 码、1 英里、120 码高栏、220 码低栏、880 码接力、1 英里接力、跳高、撑竿跳高、跳远、12 磅铅球、铁饼 14 个单项。为了将运动会办得有声有色，吸引更多的观众和参赛者，从第 2 届起增设了男子篮球、排球、足球、棒球和网球 5 项。这些比赛项目一直保持到第 10 届而没有任意增减。在弘扬国粹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年份，第 15 届华北运动会又将武术和摔跤列为表演项目。第 17 届华北运动会把游泳列为竞赛项目。第 18 届华北运动会将体操列为表演项目。后来还决定举行冬季华北运动会，将冰上项目列入，可是由于时局骤变，仅仅举行过一次滑冰表演。

第1届至第12届华北运动会简表

届　次	时　间	地　点
第1届	1913年5月	北京天坛
第2届	1914年5月	北京天坛
第3届	1915年5月	天津南开学校运动场
第4届	1916年5月	北京汇文学校运动场
第5届	1917年4月	天津南开学校体育场
第6届	1918年5月	保定东关校场
第7届	1919年4月	太原小五台
第8届	1920年5月	北京汇文学校运动场
第9届	1921年5月	沈阳小河沿
第10届	1923年5月	天津南开学校体育场
第11届	1924年5月	开封河南省体育场
第12届	1925年5月	济南山东省体育场

二、华中区运动会

1913年2月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第1届远东运动会之前，为了在全国范围内遴选优秀运动员，组成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比赛，国内的分区竞赛活动逐渐开展起来。1914年华北体育联合会率先组成，接着华南定期举行了六大学运动会，1919年华东成立八大学联合运动会，这些都在无形中影响到华中数省市体育界人士的决断，可以说是促使他们创办华中运动会的诱因。到了1921年，当第5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时，我国体育执行委员提出建议，将全国划分为华东、华北、华中、华南等几个大的区域，在这几个区域中定期举行运动会，推动各个区域体育运动的开展，以利广泛选拔优秀运动员，代表我国参加远东运动会。可是，当时华中区在上海参加远东运动会预选赛时只有湖南和江西两个省，运动员不足百人，虽然有人提议建立华中区体育组织，却因时间仓促，人员不

齐，而且没有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准备，所以没有建成。1923 年，在第 6 届远东运动会举行之前，全国体育界知名人士于 1 月份在南京会聚，通过反复商议提出了一个决议，要求华北体育联合会仍然按照惯例开展活动和举办运动会，华东区域的代表们在南京开会，华南区域的代表在广州开会，商议如何组建区域性的体育组织，而华中区的代表最后商定，由湖北、安徽、湖南和江西 4 个省份作为华中区，开始实施各项计划。由此可见，在中国体育界知名人士的促动下，华中体育运动会的诞生已经为时不远。后来，湖北的陈时、宋如海等人又竭力宣传，引起华中诸省份体育界和社会各界的重视，终于在 1923 年 3 月将这 4 个省份的代表召集起来，在武昌开会并成立了华中体育联合会。会上推举湖北的陈时、湖南的方克刚、江西的王熙寿、安徽的李寅恭为执行委员，并决定同年 5 月在武昌举行第 1 届华中运动会，以后在各省轮流举行，运动会的经费由承办省份负责筹集。华中体育联合会的日常开支则由 4 个省共同分担。会址设在汉口中山公园，由汉口青年会总干事宋如海主持日常会务性工作。华中体育联合会自此宣告创立，华中运动会也随之诞生。

第 1 届华中运动会于 1923 年 5 月 4 日至 5 日在武昌新建的公共体育场举行。湖北省督军萧耀南被推举为大会会长，湖南省长赵恒惕、安徽省长陈调元、江西省督理蔡成勋被推举为名誉会长。举行本届运动会一共需要 2 万元经费，全部由湖北省承担。本届运动会的竞赛项目有男子田径、篮球、队球（排球），女子无比赛项目，只有小学女生参加团体操表演。团体总分的计算方法是取田径各个单项的前 4 名，依次按 5、3、2、1 分计算。每一个球类项目取冠军队，计为 5 分。比赛结果，湖南省获得团体总成绩第 1 名，球类项目获得队球冠军，共计 65 分。湖北省获得篮球冠军，加上田径得分共 21 分，位列第 2 名。江西得 6 分，位列第 3 名。安徽 1 分未得，排名最后。在举行此次运动会期间，4 个省的代表还召开会议，决定第 2 届华中运动会于 1924 年在湖南举行。会议还要求湖

南省拟就一份《华中体育联合会简章》，定下规矩，便于以后照章办事。

第2届华中运动会于1924年5月9—10日在长沙经武门外协操坪举行。湖南省长赵恒惕担任大会会长，湖北省长萧耀南、江西省长蔡成勋、安徽省长马少甫分别担任副会长。方扩军被推举为大会筹备处主任。由于当时湖南省的裁判工作难以独自承担，便聘请了东南大学体育科主任、美国人麦克洛担任总裁判。举办本届大会一共需要经费14000余元，全部由湖南省负责筹集。在举行了第1届运动会的基础上，各省参赛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湖北、江西、安徽3省的运动员、工作人员以及随行来参观的人员达到了500余人。其中，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共179人（湖北省50人，江西省43人，安徽省30人，湖南省56人）。运动员的总数虽然比第1届略微减少，可是江西、安徽两省的人数有所增加。本届比赛的项目除了原有的而外，增设了男子游泳、足球和网球。田径项目增加了400米、800米、1600米接力和三级跳远以及五项全能和十项全能。女子终于有资格参加比赛了，不过仅仅限于排球一项，其余的还是以团体操表演为主。本届比赛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将径赛项目一律改为米制计算成绩，只有田赛成绩仍然采用英制单位计算。在运动会期间，每天上下午比赛开始之前，都有湖南的男女中、小学生数千人表演团体操，这些孩子统一着装，精神饱满，动作整齐划一，博得了观众的赞赏。各个运动项目的名次和计分方法，沿用上届运动会的细则。比赛结果仍然是湖南省成绩突出，以218.6分夺得总锦标和田径、游泳、男女队球以及长距离赛跑5项锦标，湖北省获得篮球、网球两项冠军，以52.6分排在第2名。安徽省获得足球冠军，得7分，排列第3名。江西省没有获得一项冠军，仅得18分，位居第4名。虽然江西省的积分比安徽省高，可是本届运动会的团体名次按获得锦标的多少来排定，由于安徽省获得一项足球冠军，所以名次排列在江西省前面。

第3届华中运动会于1925年4月21—23日在南昌顺化门外

大会场举行。大会由江西省督办方本仁担任会长，江西省长胡幼腴、湖南省长赵恒惕、安徽省长王揖唐、湖北省长萧耀南担任副会长。江西省教育厅长朱念祖被推举为大会筹备处处长。执行总裁判及田径裁判长由东南大学体育教授卢颂恩担任，游泳总裁判兼发令员为陈奎生，球类总裁判为郝更生。竞赛项目除上届所设各项外，男子组增设了棒球，女子组增设了篮球、网球、垒球。各项比赛的录取名次和计分方法与上届相同。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湖南省以133分蝉联团体总分第1名，并取得田径、游泳、男女队球、男女篮球、棒垒球和女子网球的冠军。男子网球冠军被湖北省夺得，湖北省以55分的成绩排列第2名。安徽省以41分排列第3名，足球冠军被安徽省夺得。江西省仅得24分，排名最后。这次江西省为了成功举办运动会，将赛场面积扩大，跑道修整得很平坦，使比赛进行得很顺利。田径比赛有8个单项（100米、5000米、10000米、110米高栏、铅球、跳远、标枪和撑竿跳高）的成绩都比上届有所提高。可是游泳比赛却出了问题，游泳池是利用一个池塘，水质很差，加上辅助设施缺乏，让参赛选手感到不舒服，而且比赛期间气温不高，影响了选手们的发挥，所以总体上看成绩不佳。

第4届华中运动会原定于1926年春季由安徽省负责承办，由于当时安徽省的时局发生变化，未能如期举行。自从程天放担任安徽省教育厅长以后，便积极策划，推动全省体育的发展，并且竭力促成停办了数年的第4届华中运动会恢复。经过他的努力和安徽省政府的商议，决定1930年3月18日在安庆揭幕，23日结束。大会由安徽省主席马福祥担任会长，江西省主席鲁涤平、湖北省主席何成睿、湖南省主席何健和汉口市长刘文岛担任副会长。汉口市被更改为特别市，相当于现在的直辖市，与省区平行，所以华中运动会的比赛单位也变为4省1市了。执行总裁判兼径赛裁判长由留学美国归来的吴蕴瑞担任，田赛裁判长是参加过远东运动会并取得优异成绩的吴德懋担任，计时长是宋如海，总记录吴中俊，总报告李少陵，检查长何泾渭，他们对于如何制定竞赛规程和设置项目已经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竞赛项目除上届已有的而外，增设了女子田径赛。各项运动的竞赛过程，都按照第4届全国运动会的竞赛规程以及规则来执行，比赛期间还增设了国术和团体操表演。当时的社会评价认为，大会之所以能够取得圆满成功，筹备人员居功至伟。当时的报纸评论道："若此大规模之运动会，在皖实属创举，故职员人选，关系大会进行甚巨。必计职员二百余人，多系一时知名之士，热心从事，劳瘁费辞，克尽厥职。"

3月18日上午9点钟第4届华中运动会在皖安庆东门外运动场正式开幕。10点钟开始各项比赛，到现场观看的人数达到了数万人，气氛极为热烈。大会会场因为离城不过3里地，交通方便，当天早晨由建设门至运动场，沿途车水马龙，观众络绎不绝。安庆市各中小学学生集体整队前往参观。社会各界人士也身着盛装，去观看运动会的比赛。道路两旁有新种植的树木，随处张贴着提倡运动的标语，激发观众参与运动的兴趣，并鼓舞运动员奋勇争先。会场入口处竖立着一块石牌坊，上面书写着"第4届华中运动大会会场"。还有以青翠的松柏枝扎成的五彩牌楼，名为"勇进门"。而遥遥相对的是一座凯旋门，运动员行经此门，更觉得精神奋发，勇气倍增。会场中设有高台6座，左边是来宾台，右边是奖品台，中间是司令台。开幕时乐队奏乐，鸣礼炮11响，行礼如仪。首先由大会会长程天放致辞，接下来湖北省政府代表刘亚平、名誉会长王之觉及总裁判吴蕴瑞相继致辞。最后在音乐声中，全体运动员绕场一周，随后便开始比赛。在5天的赛程中，运动成绩虽然并不是很理想，没有打破全国纪录，但是与以前几届的成绩相比还是有显著进步。例如400米、800米、1500米、铅球、铁饼等项成绩都有所提高，而湖北武汉大学的曹承进以37分46.4秒跑完10000米，创造了华中运动会长距离赛跑的新纪录。女子成绩在本届运动会中也有长足的进步，显示了华中女子体育的大好前景。

大会为奖励运动员起见，设立了男、女田径，全能运动，游

泳，男、女篮球，男、女排球，男、女网球，足球及棒球12项锦标。另外，还设定总锦标一项，仿照安徽省振风古塔样式制作了一座价值500大洋的银塔，专门奖励给夺得锦标最多的单位。结果湖南省又取得好成绩，除保持前3届连获总锦标的荣誉外，还夺得男子队球、棒球和女子篮球、队球、网球的冠军，独揽9项锦标，再次获得团体总分第1名，捧走了这座银塔。汉口市获男子篮球冠军，而足球和男子网球冠军被江西省夺走，说明江西省的体育水平有所提高。

第三节　全国运动会

1912—1926年期间，全国先后于1914年在北京、1924年在武昌分别举办了第2届和第3届全国运动会。两届运动会之间间隔十年之久，这本身就给人以难尽的回味。

一、第2届全国运动会

第2届全国运动会于1914年5月21—22日在北京天坛举行。这实际上是民国成立以后举行的首届全国运动会，由北京体育竞进会负责操办。本届比赛仍然采用清末举行的第1届全国运动会的办法，将全国划分为东、西、南、北4部，各部仍然以着有颜色的标带来作为标志相互区分：华东为黄色，华西为红色，华南为绿色，华北为白色。运动会设置的比赛项目有6大类：田径赛、足球、棒球、队球、篮球和网球。计分大体上是采用国际上通行的方法，田径赛的十项全能和五项全能第1名5分，第2名3分，第3名1分，除此而外，其他项目每项第1名3分，第2名2分，第3名1分。球类运动的计分方法则另有一套：足球、棒球、队球（排球）和篮球这4个项目的第1名计5分，第2名和第3名不计分，这显

然是因为参赛单位过少的缘故。网球的计分也与其他不同：无论单打还是双打，第1名计3分，第2名计2分。有一种说法认为，第2届全运会的人数不及第1届的多，特别是华南，只有两名运动员参赛。可是另一种说法认为，第2届全运会时，来自东西南北4部的田径运动员就达到了96人，加上球类项目的运动员，总人数应该超过了第1届全运会，而且这些选手都是通过层层比赛精挑细选出来的各路好手，可以说代表着当时旧中国的最高竞赛水平。例如，北京为了迎接本届比赛，先期举行了两次比赛。民国成立以后，北京市政府就开始注意提高体育竞赛水平，师范学校也设有体育专科，能够被选拔出来参赛的体育人才开始增多。因此，在第2届全运会开幕前两天，北京市在5月18日和19日举行了一次运动会，名称是“第二次北部联合运动会”，目的是选拔参加全运会的选手，接着在20日又举行了一次北京教育运动会，顾名思义，是从学生当中挑选优秀体育人才。

第2届全运会的组织者是由美国人担任负责人的“北京体育竞进会”，也就是说，全运会的实际组办者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侯格兰德，他担任本届全运会的名誉秘书。由于负责人和裁判工作都是由基督教青年会的外籍干事担任，所以组委会安排汤化龙担任名誉评判长，凌善昭担任评判长，这大概是为了表明国人在组织运动会当中的作用是不能轻视的。本届比赛设置的项目有田径、足球、排球、篮球、棒球和网球6项。田径项目包括100码、220码、440码、880码、1英里、5英里、220码低栏、120码高栏、跳高、跳远、撑竿跳高、铅球、铁饼、半英里接力、1英里接力、五项运动和十项运动。

运动会开幕的第一天，中外人士和众多观众到场，根据粗略的统计，有15000余人。设在天坛的大会会场本来并不大，在看台上还分设有头等座、优待座、普通座，座无虚席，站着观看比赛的观众则更多，显得异常拥挤，几乎难以找到一块容足之地，观众密切关注着比赛进展，不时地报以热烈掌声，为选手们助威，也为运动

会增色不少。比赛第二天有一支由美国人组成的排球队到赛场进行表演，格外引人关注，使得赛场里面充满了活跃的气氛。两天的赛程虽然较短，可是选手们经过奋勇拼争，也取得了不少的好成绩。华北凭借着天时地利人和，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包揽了田径、篮球、棒球、排球和网球双打的冠军。仅仅是田径赛，华北队就获得17项中的13项冠军。从总体上看，各个单项比赛的成绩比第1届略有提高。

以下是各个项目的名次和获奖选手名单。

田径比赛成绩

项目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第1名成绩
100码	李如松(北部)	粱启崇(西部)	黄元道(北部)	10.4秒
220码	李如松(北部)	粱启崇(西部)	张惠迪（东部）	25秒
440码	李如松(北部)	林祖光(东部)	郭希棠(东部)	56.2秒
880码	吴辉明(西部)	李文昌(北部)	宁国贤(北部)	2分16.2秒
1英里	周展(北部)	李文昌(北部)	邱康宇(东部)	5分13秒
5英里	白葆琨(北部)	李宝兴(北部)	邱康宁(东部)	30分39.6秒
半英里接力	东部	北部	西部	1分41.6秒
1英里接力	东部	西部		4分2.2秒
120码高栏	黄元道(北部)	郭兆祺(东部)	张信孚(东部)	18.2秒
220码低栏	黄元道(北部)	冯建统(北部)	凌达扬(北部)	28.4秒
跳高	袁庆祥(北部)	郭兆祺(东部)	黄惠林(北部)	5呎5吋125
跳远	杨景铎(北部)	姚福仁(东部)	黄元道(北部)	18呎11吋75
推铅球	俞时宏(北部)	陈鉴(西部)	陈昌佑(北部)	28呎9吋
掷铁饼	吉子英(北部)	谈瑞铭(东部)	陈昌佑(北部)	85呎8吋75
撑竿跳高	杨锦魁(东部)	杜连科(北部)	姜汝震(北部)	9呎10吋
十项运动	黄元道(北部)	陈昌佑(北部)	李如松(北部)	639分
五项运动	吉子英(北部)	黄元道(北部)	黄灏(东部)	258分

球类比赛成绩

项 目		冠 军	亚 军
足 球		东 部	
棒 球		北 部	
篮 球		北 部	
队 球		北 部	
网 球	单 打	南部的韦荣洛	南 部
	双 打	北 部	南 部

团体总分成绩

名 次	部	总 分
第 1 名	北	91
第 2 名	东	29
第 3 名	西	12
第 4 名	南	5

本届全运会的大会职员、裁判员，仍多洋人。与第 1 届一样，无女子参加比赛。

二、第 3 届全国运动会

第 3 届全国运动会于 1924 年 5 月 22 — 24 日在湖北武昌举行。由熊秉三担任会长，张伯苓担任总裁判长，裁判员除游泳及棒球两项聘请了三四名外国人，其余都是由本国人担任。参赛单位有华东、华北、华南、华中 4 区，选手共计 340 余人。华东区包括安徽省、浙江省和江苏省，华南区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西省、贵州省、云南省、香港地区和菲律宾华侨，华北区包括直隶省、山东省、山西省和河北省，华中区包括湖南省、湖北省和江西省。当时东北地区和西北的几个省份地理位置遥远，经济不发达，竞技水平

较低，没有被列为参赛地区。菲律宾华侨青年会派遣了一支篮球队来参加比赛。本届全运会除了正式的比赛项目，还有女子球术、童子军表演、国操、器械操等运动。包括外国友人在内，每一天到场参观的人达到了四五万。颁奖和计分方法都与如今的方法比较接近，设有全国个人奖和团体奖，下面又分为省奖和区奖，分别根据获得优胜数目的多少来计算。计分方法则采用“五三二一”制。

比赛结果是华东区获得足球、棒球及网球双打的优胜；华北区获得田径赛、篮球及网球单打的优胜；华中区获得游泳的优胜；华南区获得排球的优胜。根据统计结果，华东区和华北区各获得两个半锦标，成绩是相同的。可是按照远东运动会章程的规定来衡量，成绩相同时以获得田径赛锦标者为优胜，于是第 3 届全国运动会的团体第 1 名是为华北区，而华东区屈居第 2 名，第 3 名是华中区，第 4 名是华南区。最后田径赛的个人总分第 1 名被东南大学的吴德懋夺得。

本届大会，华南队除了选派排球、篮球及少数游泳、田径的选手参赛而外，其他如足球、棒球、网球等都没有参加，这件事情让有识之士感到遗憾。而且大会各项比赛的成绩也不突出，与日本和菲律宾相比较，差距很大。尤其是游泳比赛的差距更为显著。除了这些遗憾而外，当然也有值得庆贺的方面。其一是比赛项目的设置比较完备，为了参加远东运动会，所有的项目都参照设定，包括已经有的田径、足球、篮球、排球、棒球和网球 6 项，又增设了游泳、拳术、童子军表演、体操 4 种。田径赛中增设了三级跳远、标枪，取消了 1 英里赛跑，新增设了 5000 米赛跑。其二，参加者较为踊跃。因武汉市的地理位置比较理想，九省通衢，来去方便，所以参加比赛的人成倍增加，各代表团总人数加起来达到了 700 余人。除了国内选手，海外归国华侨也参加了本届全运会：菲律宾华侨选派的选手有 7 人；吉隆坡则选派女青年会会员参加国术表演比赛，并获得团体第 2 名。其三，在旧中国历史上首次有女子选手参加比赛。从本届全运会开始，我国的女子选

手开始正式参加篮球、排球、棒球（实为垒球）的比赛。可是由于对这种大胆的尝试有所保留，所以给女选手只颁发奖品却不判定名次。后颁发锦标。其四，以前的比赛因为是由基督教青年会的外籍人士，特别是英美国家的人士在主办，所以量度单位全部采用英制，从本届比赛开始，改用全世界通用的公制单位。以下是各项比赛的成绩：

田径成绩统计

项　目	成　绩	姓　名	单　位
100 米	12.1 秒	朱宝章	直
200 米	24.2 秒	朱宝章	直
400 米	57.6 秒	朱宝章	直
800 米	2 分 16.6 秒	张恒	苏
1500 米	4 分 47.2 秒	张焕龙	直
5000 米	18 分 22.4 秒	张纪成	鲁
110 米高栏	17.6 秒	李骏耀	苏
200 米低栏	28.2 秒	陈启东	苏
跳高	1.72 米	马祥波	湘
跳远	6.255 米	黄炳坤	苏
撑竿跳高	3.255 米	夏翔	苏
三级跳远	12.43 米	逯明	直
12 磅铅球	12.62 米	张颖初	直
铁饼	31.52 米	张凤瀛	直
标枪	43.78 米	尹商屏	直
800 米接力	1 分 43.6 秒	华北队	
1600 米接力	4 分 1 秒	华北队	
五项全能	8 分	吴德懋	苏
十项全能	4053 分	吴德懋	苏

田径比赛的计分，分为区与省两种，其排序如下：获得区奖第1名的是华北区，113分；第2名是华东区，108分；第3名是华中区，28分。

获得省奖第1名的是江苏省，101分；第2名是直隶省，83.5分；第3名是湖南省，22分；第4名是山东省，21.5分。

田径个人总分第1名是吴德懋（东南大学），共计25分。

游泳各个单项获得前四名的选手姓名和冠军的成绩统计

项 目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第4名	最佳成绩
50米自由泳	付启述(中湘)	邓懿(中湘)	袁灿耀(南粤)	程万秋(中鄂)	41.4秒
100米自由泳	刘焕新(南粤)	龙翳(中湘)	付启述(中湘)		1分33.8秒
100米仰泳	赵士敏(东苏)	贺体仁(中湘)	何嘉猷(中鄂)	彭庆用(中湘)	2分2.4秒
200米仰泳	刘焕新(南粤)	杨光喧(中湘)	陈诗道(南闽)		4分13秒
400米自由泳	刘焕新(南粤)	龙翳(中湘)	林昭云(南粤)	龙翔(中湘)	8分45.8秒
1500米自由泳	龙翳(中湘)	黄志勤(东苏)			39分45秒
200米接力	华中（龙翳、杨光喧等）	华南(刘焕新、陈诗道等)			2分25

获得省奖和区奖的单位及得分：区奖第1名华中区，42分；第2名华南区，27分；第3名华东区，8分。

省奖第1名湖南省，39分；第2名广东省，21.5分；第3名江苏省，8分。获得个人总分第1名的选手是刘焕新（广东省），6.5分。

足球：参加比赛的单位一共有4个，即华东、华北、湖滨大学和文华大学。比赛结果是：华东对湖滨大学12∶0；华北对文华大学3∶0；华东对文华6∶1（决赛），最后华东夺得冠军。

棒球：参加比赛的单位只有两个，即华东与华北。两队之间一共比赛了两场，每一场打9局，第一场，华东以12∶8获胜；第二场，华东再度以6∶5获胜。华东夺得冠军。

篮球：参加单位有华北、华东、小吕宋华侨青年会、华南（广

东培正学校）、华中（文华）及贵州 6 支球队。比赛结果是：华北对华中 32∶22；小吕宋华侨青年会对贵州 97∶3；华东对小吕宋华侨青年会 31∶23；华北对华南 38∶22；华北对华东 21∶18（决赛）。最后华北夺得冠军。

排球：参加单位有华南（广东培正）、华北、华东、汉口青年会 4 支球队。比赛结果是：华南对汉口青年会 21∶2、21∶1；华东对华北 21∶2、21∶14；华南对华东 21∶17、21∶4（决赛）。最后华南夺得冠军。

网球：网球比赛分单打与双打两种形式，参加单位只有华北和华东。决赛结果是：单打，华北时昌黎对华东陈乃新 3∶0；双打，华北乔铁汉、时昌黎对华东黄保廉、陈乃新 1∶3。单打冠军被华北夺得，双打冠军被华东夺得。

此外，本届比赛增设了女子球术、童子军、国术操、器械等运动项目的表演，为大会增色不少。

第四节　远东运动会

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过去每年 2 月有一个盛大的节庆活动，称“嘉年华会（CARNIVAL）”，在节庆活动中也开展各种传统形式的体育活动。随着西方近代体育在菲律宾的传播，后来嘉年华会上的体育内容更加丰富多彩。1910 年，美国芝加哥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部的干事布朗被派到菲律宾工作，在他的组织策划之下，菲律宾成立了体育协会，开始组织各种类型的近现代体育项目的比赛，而布朗本人则担任了体育协会的会长，负责全国的体育事务。1911 年，清朝政府还统治着中国的时候，菲律宾体育协会就发出了邀请，希望派人去马尼拉参加嘉年华会的体育比赛。清朝政府接受了邀请，派遣了田径和足球选手出征海外，而日本也接到了邀请，派遣了朝吹常吉和山崎健之丞两位网球选手以及早稻田大学棒球队参赛。这

是亚洲地区第一次有3个国家在一起举行的邀请赛。由于当时亚洲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在东亚，而西亚和中亚还远远落在后面，上海、东京和马尼拉的发展水平又更高于东亚国家的其他城市，因此，在这次举行了3个国家邀请赛的基础上，再举行其他赛事不是不可能的。布朗萌生了一个念头，要组织3个国家之间的常设比赛。于是，他在1911年9月先后到中国和日本访问，联合日本青年会的美国干事科龙和中国广州青年会的美国干事图斯里，商议如何筹建联合比赛的事宜。可是仅仅过了一个月，武昌起义就爆发了，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12年，布朗再度代表菲律宾体育协会访问中国和日本，他提出了筹建一个联合性质的体育协会的建议。因为当时中、日、菲3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在欧美国家的人看来十分遥远，通常被称为远东地区，因此，该协会的名称就叫做远东体育协会。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以孙中山为首的政府要人深知加强国际联合的重要性，因而政府的态度不会是消极的，而更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组织并没有在辛亥革命的风暴中受到任何影响，相反，民国以后的基督教青年会在更加宽松的环境中加速扩大规模，他们对成立远东体育协会表示了非常积极的态度，支持成立这个组织。以刚刚结束不久的“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为主的中国体育骨干们立即表示，愿意加入该协会，并成为远东体协的正式成员。而日本刚开始只是派遣选手参加，直到第3届才正式加入该组织。实际上中国不仅先于日本加入，而且每一届都派遣了选手参加。就这样，远东体育协会组建起来了。该协会决定，参照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办法，每两年一届，轮流在各国的大城市举行。

一、参加第1届远东运动会

1913年2月1—8日，第1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

拉举行。当时的菲律宾还是美国的殖民地，由驻菲总督福伯斯将军担任大会总裁，布朗担任会长。中国派遣广州青年会德苏莱担任领队，由多名选手组成了田径、游泳、足球、篮球和排球（当时称为“队球”）队出征此次比赛。日本体育协会由于缺少准备，没有派遣更多的选手，只有明治大学的棒球队和大阪朝日新闻社的两名田径选手参赛。作为东道主，菲律宾参加了田径、游泳、足球、棒球、篮球、排球和网球全部7项比赛。由于中国和日本并没有派遣网球选手参赛，结果网球比赛实际上是菲律宾本国选手的表演。毕竟这是第一次组办国际比赛，组织者缺少经验，竞赛的规程没有详细制定，计分方法很简单，凡是夺得锦标最多的就成为团体冠军。

中国选手参赛的情况如下：

田径。韦辉章获得120码高栏比赛的冠军，潘文炳获得亚军；韦辉章获得220码低栏亚军；李文昌获得5英里赛跑的第3名；潘文彬获得跳远第3名；韦辉章获得跳高冠军；杨锦标获得撑竿跳高亚军；潘文炳获得五项全能亚军和十项全能冠军；中国队获得半英里接力赛跑和1英里接力赛跑的亚军。最后中国团体积分为40分，排名第二；菲律宾为65分，排名第一，日本为11分，排名第三。

球类。因为日本队没有派选手参加篮球比赛，所以这项比赛只在中国和菲律宾之间进行，一共打了两场，首场中国以18∶57失利，第二场也以24∶36败北。排球比赛中国本来并没有派选手出征，日本也没有选手，为了应付赛事的需要，中国队从田径和足球选手当中临时抽来16人组成了排球队，结果打了两场比赛，分别以10∶21和20∶22负于菲律宾。根据后人的回忆，广东选手许民辉和邱纪祥参加了此次比赛，虽然输了球，可是他们却并不沮丧，一来是比分很接近，让人树立了信心；二来是学会了如何打排球。回国以后他们就组建了“广州排球联会”，借用长堤广州青年会会址的运动场开展练习和比赛，逐渐培养出了一批热爱排球的选手，以后代表中国出征远东运动会的，大多是这个排球联会的会员。足球比赛也是在中国和菲律宾之间进行的，一共踢了两场，中国队以

3:4 和 0:3 告负。棒球和网球比赛，中国无人参加。

游泳。中国选手在这项比赛中全军覆没，菲律宾大获全胜。

综观上述情况，20 世纪前 10 年，亚洲地区尽管经济水平总体上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却能够克服重重困难举办国际体育赛事，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虽然刚开始比赛项目很少，参赛国家只有 3 个，水平也不高，但它的意义却很重要，这意味着亚洲正在向体育发展速度较快的西方国家学习，也说明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影响已经波及到了亚洲。有人认为，远东运动会就是后来的亚运会的前身，这种说法是有其合理性的。而中国在第一次参加远东运动会时，虽然成绩不理想，但给了国人一个鼓舞信心和勇气的机会，这也意味着在以后的赛事中，中国不会甘于寂寞。

二、承办第 2 届远东运动会

1915 年 5 月 15 — 22 日，第 2 届远东运动会在中国上海举行。为了此次比赛，上海体育界人士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认真筹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个原因是中国队在第 1 届取得的成绩不佳，铩羽而归，使国人的大国情结受到了刺激，朝野上下都憋了一口气，希望借第 2 届的机会显示中国真实的竞技水平。当比赛时间和地点确定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即将开战，担任大总统的袁世凯和副总统黎元洪以及军界的周自齐总长、蔡廷干上将、张季直总长都表示支持运动会的召开，也是想借此没有硝烟的战争来显耀自己的军事实力。在这个过程中，由于首届远东运动会上中国选手在十项全能的比赛中一枝独秀，表现不俗，所以他们特别关心田径十项全能比赛的冠军归属，认为能夺得这项比赛冠军的人才是最优秀的选手。为此，袁世凯特别为冠军准备了一个价值数千元的银制牌楼作为奖品，这个牌楼一共有 10 扇门，其寓意是 10 个单项无一不精。

第二个原因是 1915 年元月，日本提出 21 条，企图进一步瓜分

中国，遭到举国上下一致反对。袁世凯为保全帝位，卑躬屈膝地接受了这个丧权辱国的条款，更引起人们的愤怒，全国一片声讨。当反日反袁运动此起彼伏之时，处于经济文化中心的上海，成为了各种进步思想和进步人士的荟萃之地，也成了反对卖国主义的前沿阵地。运动会举行以前，上海就已经有市民举行声讨集会，发表反日反袁声明，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的运动。因此，举办这一届远东运动会也是向日本显示国人爱国情绪的机会。

第三个原因是体育界本身。自从首届远东运动会结束以后，看清了形势，感到信心百倍，认为在这一届的比赛中战胜日本和菲律宾并不是没有把握，因而也想借此机会将民国政府成立以后的中国体育界实力展示一番。

在这样一个群情激奋的情况下，上海体育界为成功举办运动会做了充分准备，实际上包括新闻界和政府在内，可以说整个上海都在为此次赛事做准备。5 月 15 日，《申报》刊登了两则广告，第一则是劝诱市民购买观看比赛的入场券，到现场为本国选手加油助威；第二则是政府的交通运输部门表示了关注和支持，愿意提供优质服务，将交通线路延伸到运动会会场，方便市民到场观看比赛。而海外华侨的热情更是异乎寻常，檀香山华侨社团组建了一支棒球队，专程赶赴上海参加比赛。当时社会各界在新闻界的舆论引导下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凡是能够在田径比赛上获得十项全能冠军的就是“第一大运动家”，而在第 1 届的比赛上获此殊荣的潘文炳尤为引人注目。可是潘文炳已经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到美国去留学了，1915 年的赛事不能参加，于是人们将这次夺冠的希望寄托在新手身上，这无形中更吊起了人们的胃口。另外，还有一件新鲜事也让人们充满了期待：早在 1915 年年初，菲律宾举行世界博览会时，中国政府派遣了伍秩庸博士代表政府前往参观，他在那里亲眼目睹了一群十四五岁的少女打棒球（应为垒球），感到万分惊讶，这一群少女个个神情自然，行为举止端庄大方，身体矫健，让伍秩庸博士感慨万分，他便向菲律宾体育协会会长布朗提出要求，希望

派遣这支少女棒球队来华参赛。适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初起，他的目的显然是想借助外来的影响，推动中国妇女体育活动的开展，并唤起妇女的觉悟，努力争取妇女的解放。

第2届远东运动会经过了认真准备，于1915年5年15日下午2时30分在上海靶子公园（今虹口公园）如期举行。开幕式上，首先是由各国运动员分别按照自己的国籍排列在场内东首，向本国国旗行鞠躬礼，然后，排队行进到中场，即主席台对面。此次运动会的会长由外交部长伍廷芳担任，他主持了开幕式的各项议程，沪海道尹兼外交部特派交涉员杨小川代表袁世凯致祝词，王正廷代表副总统致祝词。最后运动员列队绕场一周，向观众致礼。行进的顺序是日本居前，菲律宾居中，中国以东道主的身份殿后。开幕式结束以后，比赛马上开始。

有两点值得说明，第一点是，此前发生了一些波折，即围绕中日关系和日本是否参赛问题引起的纠葛。因为袁世凯正在考虑向日本妥协，签订丧权辱国的21条，中日关系变得很紧张。日本国内体育界的一些人竟然反过来指责中国，并且指责他们自己的体育协会，主张日本应该退出远东运动会。一时间日本体育界普通人士不知何去何从，虽然大部分选手渴望着来中国参赛，可是能否成行却成了一个问题。结果，袁世凯不顾国人的唾骂，签订了21条，日本也在仓促之间决定派运动员参加比赛。因此，日本选手出发时间稍晚，抵达上海的时候已经开幕两天，最后的比赛成绩也略受影响。第二点是，在开幕式上和在运动会进行期间，中国妇女界受到了巨大的震撼。其原因正是菲律宾女运动员来上海参赛，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石破天惊的奇闻，对我国妇女今后参加体育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菲律宾被邀请来的女选手共18人，个个身体健康，容貌秀丽，精力充沛，运动技术水平也不低。中国当时刚刚结束封建时代不过几年，妇女大多裹着小脚，精神面貌和身体健康水平都乏善可陈，两相对照形成强烈的反差。这不能不让一些勇于冲破传统习俗桎梏的妇女备受激励，自此以后，上海的女子体育运动发展势

头骤然加快，而这件事也为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经验。

此次比赛，我国有 200 余名选手参加，可谓阵容庞大，其中上海籍选手人数较多，有韦辉章、冯建维、姚醒黄、姚麟书、孙文奎、白宝琨、李图星、李文昌等，他们参加了田径的比赛，而篮球、排球、网球的选手有郭琳爽、凌道扬、蔡文炳、杨锦辉等人，游泳选手有蔡文炳、杨锦辉等人。其他选手当中，有突出表现的是通州协和书院的李如松、上海南洋公学的李文昌、北京清华大学的黄元道、天津南开学校的郭毓彬、北京汇文书院的吉子英和广东的李罗伯，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李罗伯，他在游泳比赛中一人参加 5 个单项，孤军奋战，以顽强的精神夺得本届远东运动会的游泳锦标，他当年创造的成绩，在中国游泳史上也弥足珍贵。

菲律宾选派了 90 多名运动员参赛，而日本仅有 8 名选手参赛，他们是田径选手明日和卫、黑白义夫（东京大学）、泽田一郎（第一高等师范学校）、金栗四三和多久仪四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津村清次（庆应义塾大学）、冈本荣次郎（神户高等商科学校）和高津金涪（香川县青年会）。

田径十项全能比赛有如下项目：100 码赛跑、跳远、铅球、跳高、440 码赛跑、220 码低栏赛跑、铁饼、撑竿跳高、独足跑跳（三级跳远）、17600 码赛跑，结果中国选手李如松获得第 2 名。与十项全能比较相同的项目是五项全能比赛，中国选手吉子英、卢颂恩和黄元道包揽了前 3 名。

中国选手在田径的其他单项比赛中取得的成绩如下：

440 码赛跑：冠军李如松、亚军李文昌。880 码赛跑，冠军郭毓彬、季军李文昌。1 英里赛跑，冠军郭毓彬、亚军李文昌、季军周展。8 英里赛跑，亚军白宝琨。120 码高栏，冠军黄元道、亚军张信孚。220 码低栏，亚军黄元道。铁饼，亚军吉子英。铅球（16 磅），亚军高恩养。跳远，亚军姚醒黄。跳高，亚军崔云、季军凌道扬。撑竿跳高，亚军黄元道、季军郭绍仪。五项全能，冠军吉子英、亚军卢颂恩、季军黄元道。半英里接力赛跑，中国队获得第 2

名。1英里接力赛跑，中国队获得第3名。

中国选手在游泳比赛中取得的成绩如下：

220码自由泳，冠军李罗伯、季军何伟卿。440码自由泳，亚军李罗伯。50码自由泳，季军蔡文炳。1英里自由泳，亚军李罗伯、季军黄彬。100码仰泳，冠军李罗伯，季军林福。220码俯泳，冠军李罗伯、季军何伟卿。220码接力，冠军中国队（蔡文炳、杨锦辉、林福、李罗伯）。

中国选手在球类比赛中取得的成绩和名次如下：

足球，冠军中国队（第1场1∶0胜菲律宾、第2场1∶1平菲律宾、第3场2∶1胜菲律宾，日本未参加足球比赛）。篮球，亚军中国队（第1场28∶34负于菲律宾、第2场20∶40负于菲律宾，日本未参加篮球比赛）。排球，冠军中国队（第1场21∶4、21∶2胜日本，第2场21∶18、21∶18胜菲律宾，而菲律宾胜日本）。网球和棒球比赛均告失利。

15英里自行车比赛，亚军马国骥、季军李祖芝。

中国选手在第2届远东运动会上取得的较好成绩，使上海乃至全国的同胞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上海民众的反映尤为强烈，决定5月26日举行提灯庆祝活动（人手一个灯笼上街游行），组织者甚至考虑把这场游行活动的范围拓宽，届时全国各地同时举行提灯会庆祝。但是面对人民群众的激愤情绪，当局非常害怕，他们不管老百姓是否为了庆祝比赛的胜利，而担心聚会游行会发生示威活动。于是，政府便明令禁止，5月26日在《申报》头版登载了一个《远东运动会紧要广告》，声称“因时局艰难，恐有误会，拟暂不举行”，将这个提灯会活动扼杀。

虽然第2届远东运动会结束了，提灯会的庆祝活动也没有举行，但是成功组织比赛的影响却是不可估量的，近代体育从内容到形式都引起了国人的极大关注，而这种影响也迅速地由上海向内地辐射，推动了各地体育活动的开展。远东运动会在中国举行，这种在国际间组织体育比赛的新鲜事在当地更是不胫而走，使国人的观

念行为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两个月后，江苏省政府便委托上海的江苏教育会开办体育传习所，江苏省公署则颁布了各县筹办公共运动场的有关文件，上海县知县沈宝昌也立即委托县教育会会长吴馨筹建体育场，这意味着开展体育活动所必需的场地条件将有所改善。此后不久，上海市立第一公共体育场落成，而宝山县教育会也在 1916 年 10 月报经上级部门批准，从吴淞镇北边的吴淞外海水师六营演武操场划出 18 亩左右的土地，修建了一座简易公共体育场。另外，运动会上菲律宾女子棒球队的出现所产生的轰动效应也没有结束，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乘着这个东风，更积极地推广体育活动，创设了“女子体育师范学校”，为那些渴求解放的新女性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各地一些院校也相继增设了体育专科，使旧中国的体育人才培养上了一个新台阶。从那以后，体育书报杂志的出版也逐渐繁荣起来。总而言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大潮中，在第 2 届远东运动会成功举办的影响下，旧中国体育的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前景。

三、参加第 3 届远东运动会

由于日本在参加第 2 届远东运动会时表现出消极的态度，所以第 2 届远东运动会刚刚结束，菲律宾体育协会会长布朗便于 1915 年 6 月东渡日本进行游说，并希望日本承担第 3 届比赛的筹备和组织工作。日本体育界接受了布朗的要求，正式加盟远东体育协会，于 1917 年 5 月 8 — 12 日在东京举办了第 3 届运动会。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大限重信侯爵担任总裁，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担任会长。

中国当然想继续保持比赛获胜的荣誉，早在 1915 年 6 月 12 日，《申报》便发表文章指出：“后年之远运会已定于东京矣，且日本已拟定会长等矣。夫后年转瞬事耳，我国运动界而苟留意此事亦当及时修炼，勿以为其时尚远而须臾待之也。”给中国体育界

敲响了警钟，必须及早做好准备。在 1917 年 4 月以前，远运会中国部总干事柯乐克便开始在国内物色运动员，力求选拔最优秀的选手参赛。当时新闻界对此事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在把握舆论动向的时候认为，前两次比赛均由东道主夺得冠军，这次日本获胜的可能性也很大。可是，如果中国选手对此做好了心理准备，同时刻苦训练，不一定会输。为了选拔优秀人才，力争取得好成绩，国内事前在天津、武昌和上海三座城市声势浩大地组织了选拔赛，并开展宣传，唤起国人的注意。

第 3 届远东运动会于 1917 年 5 月 8 日如期开幕，参加开幕式的观众有大约 1 万人，其中旅居日本的华侨就多达 1000 人，他们是专程来为祖国的选手助威的。下午 2 时，运动会开幕，首先入场的是菲律宾选手，其次是中国选手，日本选手走在最后。全体运动健儿先绕场一周，观众热烈鼓掌，因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已经多次举行，所以日本就完全仿效国际惯例，每个国家的队伍前面有一人执掌各自国家的国旗，在举行入场式时有军乐队伴奏，要求队伍步伐整齐。然后 3 个国家的队伍排成 3 列横队，面向主席台，裁判员和工作人员则站立在右端。接着，名誉会长大隈侯爵致开幕词，大会会长嘉纳治五郎、菲律宾代表安雄和中国代表张寿椿分别发表简短的讲演。开幕式结束以后，正式的比赛从 3 点开始进行。

为了参加这一届的比赛，中国共派出运动员和代表团成员 332 名，代表团总领队是清华大学副校长赵国祥和青年会干事葛雷。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担任总代表，敬元崇担任总教练。出发时运动员分为南北两组，一组从北京动身，另一组从上海起程。他们于 4 月 29 日乘船先抵达神户，再从神户换乘火车于 5 月 7 日早晨 6 点抵达东京，受到日本体育界的代表和当地华侨组织的热情接待，代表团下榻在青年会会馆。

大会的比赛场地设在东京的芝津一带，这个地方不大，宽广不过数里，但为了迎接比赛，一切都已经布置妥当，看台可以容纳观

众 5000 人，门票价格也不高，根据看台座位分为几等，折合旧日元 3 角至 5 元不等。根据后人的回忆，上海选手张信孚、袁庆祥、冯建维、潘文焕、蔡文炳等参加了本届比赛。从总体情况看，中国代表团在比赛中表现不佳，负多胜少，这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国内舆论也一片哗然。

为了总结经验教训，《申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代表团团长赵国祥，他向记者分析了失败的原因，认为主要有三点：其一，中国选手乘船去日本耗时过多，长途跋涉造成身体疲劳，而到达以后又没有及时地休息和调整，马上参加比赛备感吃力，特别是从北方来的选手辗转换船换车，尤为疲惫，结果又有五六名赛跑的优秀选手都患了疾病；其二，中国选手很多是在校的学生，他们不愿意旷课影响学习而外出参赛，所以在选拔运动员时没有将最优秀的人才集中起来，造成实力不够，此次上海方面来参加比赛的就很少，这就能够说明问题；其三，日本气候瞬息万变，早晚温差很大，气温低于北京、上海，与广州相比更冷，我国选手大多感到不能适应，例如游泳，上海是淡水，而日本是海水，上海水温较高，而日本水温很低，这也影响参赛者发挥正常的技术水平。赵国祥认为有这三个原因，比赛难免失利。记者又问道，菲律宾选手与我国选手处在同一种情况下，他们的比赛成绩如何呢？赵国祥认为，我国选手失利的主要原因还是舟车劳顿、体力不支和患病者较多。菲律宾代表团虽然也是远道而来，但幸运的是他们没有人生病，而且全国有 3000 余名美国的体育教练在专门辅导运动员，虽然选拔出来参赛的未必是最优秀的体育人才，但这些人水平势必不低。以教育界知名人士身份担任代表团团长的赵国祥最后鼓励国人，尽管比赛失利，但不必认为是奇耻大辱，只有一败再败才是耻辱，希望中国选手在下一届的比赛中能够有所作为。

日本代表团在比赛上大获全胜，引起了国人的关注，针对日本获胜的原因，报社的记者深入了解分析以后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日本体育运动不限于学校，在社会上也十分流行。为了夺得第 3

届远东运动会的总锦标，日本的政界、商界、体育界以及社会各界无不表示重视，社会成员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日本的新闻媒体则推波助澜，例如某报馆倡议举行自京都至东京的超长距离接力赛跑，国会有一位议员年龄已经超过50岁，可是运动能力不亚于青壮年，也入选代表日本参赛，其他选手当中并非学生的人也很多。

随行远赴日本并担任代表团干事的郝伯阳也作了认真细致的分析，他指出，比赛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是经费不足，乘船及饮食条件欠佳，运动员在途中就不能适应，加上有人晕船，身体亏损很大；第二是不适应气候，他调查以后认为，不光是中国运动员有患疾病的，菲律宾也有不少人患病，所以到日本以后，运动员感到特别疲劳，而注意力也难以集中，因而比赛失利是在情理之中。他也鼓励国人不可泄气，认为失败不足为奇，不能因为遭受挫折而丧失了斗志。郝伯阳毕竟是专学体育出身，他以专家的眼光看出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他指出：日本和菲律宾运动员姿势极佳，究其原委，是因为他们在幼年时代学习运动技能时就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基本功。同时，各个学校在训练运动员的时候既有规定课程的安排，也限定了时间，保证了训练质量。此外，各地的公共场所任由民众出入利用，不收取费用。他还指出：中国不但没有这种严格的训练，也没有这样的教练员，而家长则认为体育运动很危险，对喜欢运动的学生百般阻扰甚至禁止。接着他又进一步责问，日本商界人士乐意出巨资赞助比赛和资助运动员，大力提倡体育，而中国的富商巨贾有几人舍得掏腰包？最后他指出，提倡体育运动必须从学校抓起，要让国人形成一种正确的认识：喜欢体育运动的学生才是好学生，好运动者即爱国。只有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才能洗雪耻辱。可是郝伯阳徒有一番凌云壮志，在旧中国经济落后、政局不稳定的情况下，实现这些美好的理想谈何容易？

中国队参加田径比赛的成绩如下：跳高，冠军袁庆祥、亚军郭绍仪、季军陈文瑗。撑竿跳高，冠军丁熙春、亚军郭绍仪。120码高栏，亚军张信孚。铁饼，季军刘萌思。铅球（16磅），亚军孟继

懋。标枪，季军程树仁。五项全能，亚军杜荣棠、季军朱恩德。

中国队参加游泳比赛的成绩如下：

220 码仰泳，亚军李罗伯。100 码仰泳，季军李罗伯。200 码接力，季军中国队。

中国队参加球类比赛的成绩如下：

网球，先后负于菲律宾和日本，而日本战胜菲律宾获得冠军。足球，先后战胜日本和菲律宾，获得冠军。篮球，战胜日本而负于菲律宾，获得亚军。排球，先后战胜日本和菲律宾，获得冠军。

中国队参加其他比赛的成绩如下：

20 英里自行车，未进入前三名。

综观本次比赛，中国队出师不利，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当时的体育界高层人士所进行的分析是比较正确的，尤为发人深省的是，他们已经认识到参加体育比赛之前的人才选拔和基础训练的重要性，而这些问题能否得到很好的解决，不仅仅在于体育界，而且在于学校和整个社会。由于旧中国尚处在积贫积弱的状态，体育并不被人们重视，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局部的领域经过一番努力，参加以后的远东运动会获得好成绩，这不是不能做到的。

四、参加第 4 届远东运动会

第 4 届远东运动会于 1919 年 5 月 12 — 17 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这是自轮流举办远东运动会以来菲律宾所承办的第 2 次比赛。美国总督伍德将军亲自担任总裁，布朗担任会长。中国青年会干事葛雷担任总领队，率领我国选手于 5 月 4 日从上海出发。由于航运缓慢，中国运动员所乘坐的“哥伦比亚号”轮船直到 5 月 8 日才抵达马尼拉，凌晨 5 时左右登陆。中国驻菲律宾的桂领事亲自到码头迎接，他高举着五色旗，登上甲板慰问全体代表团成员。然后乘坐汽车一同到领事馆休息，以茶点招待。半小时以后桂领事又

亲自陪同代表团到马尼拉青年会下榻，当天晚上有许多华侨汇聚到一家广东华侨开的中华酒楼召开欢迎宴会。10日下午五时半菲律宾体育会会长又召开欢迎大会，美国总督伍德将军携夫人到会，向中国代表团表示慰问。7时，中国、日本、菲律宾3国运动员举行交谊会，由大会组织者颁发第4届远东运动会纪念章。随后，全体参赛成员又欣赏了菲律宾的音乐会。当晚，桂领事亲自将中国代表团接回领事馆，组织娱乐活动。

主办方和领事馆之所以表现出了非常热情的态度，是因为大家都越来越重视比赛，也要体现出对选手们的关怀。特别是日本在又一次几乎退出比赛的紧急关头，日本体育界大多数人坚持要求参赛，扭转了局势，使得主办方备感欣慰，对来宾也就特别关照。日本参赛发生波折，其原因在于体育界领导人措施不当。日本体育协会认为会期确定在5月，正值学校考试期间，选派运动员出国比赛极为不便，他们致函告知菲律宾主办方，要求推迟至8月。菲律宾方面则认为8月份东南亚一带是多雨季节，不适合举办大规模的国际运动会，便拒绝了日本的要求。日本体协一些负责人自恃大权在握，便独断专行，宣布日本不选派选手参加第4届远东运动会，甚至声明永久退出远东体育协会。不料，此事引起了日本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舆论谴责铺天盖地而来，纷纷指责这种轻率的举动。国民和学生一致谴责日本体协举措失当，要求体协改组。日本体育协会没有想到民众的反应会如此强烈，便不敢再干涉这件事情。眼看群龙无首，日本参加本届比赛的事情就要泡汤，体育界和社会各界也感到束手无策。正在紧要关头，大阪天狗体育俱乐部站出来力挽狂澜，奔走呼吁，得到大家的响应，临时成立了一个日本青年运动俱乐部，他们贴出标语，宣称要“打倒日本体育协会”，并且在匆忙之中选拔了14名选手参加比赛。其中田径10人，游泳1人，网球3人，领队和教练员由三神八四郎和久仪四郎两位选手兼任。由于仓促出战，日本选手在本届比赛中不可能有所斩获已经可以预见。

5月12日比赛正式开始，菲律宾依仗着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加上做了认真准备，最后如愿以偿地获得团体总分第1名，日本除了夺得网球锦标，其他无所收获，而我国虽然组建了一个阵容较为整齐的代表团，参加了全部项目的比赛，却劳而无功，只有足球继续保持不败，夺得冠军锦标，其余各项比赛的冠军几乎都被菲律宾获得。本以为自行车比赛有可能获取好名次，可是本届比赛却将这项赛事取消了。与上届相比，田径和游泳的成绩是有进步的，特别是被人们最为看重的田径十项全能和五项全能的冠军都被中国选手夺得，而且都创了新纪录。以下是中国选手获得的各项比赛的名次。

中国选手参加田径比赛的名次：

五项全能，清华大学朱恩德获得冠军、杜荣棠获得亚军。十项全能，清华大学朱恩德获得冠军、时昭涵获得季军。1英里赛跑，张德平获得季军。掷铁饼，杜荣棠获得亚军、孟继懋获得季军。推铅球（16磅），孟继懋获得亚军。跳高，时昭涵获得亚军、刘中汉获得季军。半英里接力赛跑，中国队获得亚军。8英里接力赛跑，中国队获得亚军。

中国选手参加游泳比赛的名次：

50码自由泳，颜作臣获得季军。100码自由泳，颜作臣获得亚军。440码自由泳，梁国珍获得亚军。1英里自由泳，翁心坚获得亚军、梁国珍获得季军。100码仰泳，梁国珍获得季军。220码俯泳，衣新文获得季军。

综观上述，中国选手在第3届的比赛中失利，尚可找到客观原因，而在第4届远东运动会上仍然没有取得好成绩，则找不到解释的理由，因此国内一片悲叹之声，舆论界普遍认为参加这种比赛是劳民伤财，丢人现眼，给当时中国体育界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特别是负责组建体育代表团参赛的基督教青年会难辞其咎。实际上，当时中国政坛风云变幻，帝国主义列强横行霸道，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体育水平不高，这是明摆着的事实。要改变比赛失利的

情况，仅仅依靠少数体育界人士的努力和呼吁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五、承办第5届远东运动会

第5届远东运动会于1921年5月30日至6月4日在上海举行。虽然中国参加前几届远东运动会连遭挫折，给国民心理上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不甘于被讥讽为“东亚病夫”的渴望使得国人仍然为本届比赛积极准备。尽管有人对承办并参加比赛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是劳民伤财的事情，但是，是否举办并且能否举办成功关系到国际声誉，当局当然不会不清楚，因而停办是不可能的。面临着上海再度成为东道主的机遇与挑战，当局很想凭借有利条件，夺取胜利，鼓舞人心。

1921年2月18日，远东运动会的组织委员会召开会议，认真讨论了各个准备事项，并作出如下决定：其一，大会地点江湾跑马场或虹口公园当中选择一个，最后定在虹口；其二，运动会的会期自5月30日至6月4日；其三，推举王正廷为会长，穆藕初、张伯苓为副会长，顾亨利为会计兼书记。另外，为了吸引观众，比赛期间每天举行团体操表演或比赛。任何一个社会团体、学校、工厂和会馆都可以参加演出。条件是，参加单位挑选30名儿童，由教练带队，根据安排入场表演体育技艺，或者与其他单位进行比赛。组委会还决定，待本届远东运动会结束以后，仿效奥运会的形式，接着举办万国运动会。很显然，这些决议并不能解决竞赛水平如何提高的问题，甚至给人一种印象，即只是追求排场。3月13日，著名美国体育教育家麦克乐针对相关的情况发表了一篇题为《对于此届远运会之希望》的文章，指出国人对于体育的概念并不理解，对体育精神也不明了，过于追求比赛的输赢，而且获胜便骄傲，失败便忧愁，贪图虚荣，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他还指出：学校训练选手也有单纯为了争锦标的现象，派选手出国则只是为了装点门面；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却把他国选手视为敌人，一味地鼓

励选手打败敌人为国争光，而全国观众的心愿，大体上也是如此。麦克乐认为，这种只希望用一次比赛获胜来显示荣耀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没有雄厚的基础，即使偶尔获胜也不能保证以后不衰败，参与体育锻炼的群众太少，当然难以选拔出优秀选手，那些参赛选手失败了怎么能责怪他们呢？凡是参加远东运动会的各国选手都是选拔出来的精英，代表着自己国家的运动水平，能够在竞争中保持不败，全凭过硬的本领，依靠幻想或投机取巧是没有用的。他特别指出：举办远东运动会，无非是比试一下东方各国的运动成绩，鼓励各国努力发展体育，跟军事目的并不沾边，谈不上将对手视为敌人，全国民众不必同仇敌忾。他语重心长地指出：中国应该借举办本次远东运动会的机会，分析成败的原因，体育界的人士和教育家们要放宽眼量，关注未来，同时要积极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取长补短；还要利用竞赛活动来激发学生的兴趣，利用竞赛活动来推动体育的发展，这才是体育的根本；参赛选手获胜也好，失败也好，不足以成为一国的荣辱，如果一个国家的青年人没有强健的体魄和奋斗的精神，那才是真正的奇耻大辱。麦克乐的这篇文章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对于帮助国人理解体育精神是颇有益处的。可是当时因为中日关系紧张，要让老百姓抛弃敌对情绪也是很困难的。而他主张抓好基础的愿望固然很好，在旧中国的时代背景下和在一个急功近利的政府的领导下，也是难以见到成效的。麦克乐在 5 月 22 日又发表了一篇题为《远东运动会与中国兴盛有何关系》的文章，再度宣示他的体育主张，认为中国必须首先抓好基础，才能希望在远东运动会上取得好成绩。

为了响应远东运动会组委会的倡议，8 月 20 日，上海县劝学所所长李宗业召集各校体育委员开会，商议在远东运动会上如何表演的事宜，有 14 所学校的体育委员出席了会议。妇女界也积极响应，女青年会体育师范学校决定率领女生参加表演。过了不久，江苏省教育会和上海劝学所又联合致函本市中小学，准备动员 3000 名学生到场表演游戏。游戏的内容包括会操、徒手体操、各种接力

赛跑、拔河、叠罗汉等等。由于政府和组委会的宣传动员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各省市大学开始积极响应。作为营造声势和选拔人才的一种需要，武汉、南京举行了联合运动会，东方八大学也举办了春季运动会，远东运动会的前期准备搞得如火如荼。

日本为了参加本届比赛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积极性。在第4届前宣称要退出远东体育协会的日本体育会，由于遭到国内舆论谴责失去了公信度，后来崛起的全日本学生陆上竞技联盟会和其他体育团体发出呼吁，要求对它进行改组，公举岸清一博士担任会长。经过改组以后的日本体育协会重新焕发了领导活力，决定网罗全国优秀体育选手，认真挑选，并派出一大批人员参加比赛。据统计，最后参赛人数多达111名，这是以往从来不曾有过的。5月24日，日本代表团由岸清一会长率领渡海而来。当时的日本政府和体育界已经有一种不可一世的狂妄态度，为了显示实力雄厚，日本为参加远东运动会还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委员团，将办事机构设在虹口区蓬路（今塘沽路）日本总会里面。会长由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川崎担任，副会长是日华纺纱厂经理田边辉雄。日本选手抵达上海以后，领事馆和委员团方面连日宴请，鼓舞士气，甚至连日本驻上海记者站也设宴款待本国选手。根据当年目睹过这般情景的人回忆，这样热烈欢迎的场面的确很引人注目，相比之下，中国选手在上海的待遇就差多了，可是中国选手们并不在乎，只希望在比赛中一展身手。

5月20日，从我国各地选拔出来的选手会聚到上海。这一次为了鼓励各地积极支持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对于被选拔出来的选手还特别说明是来自何处。其中，朱恩德代表华西，来自长沙，下榻在复旦大学；南洋毕业生杜荣棠代表华中，来自汉口；从其他地方来的运动员都住在西藏路一品香旅社。有关这些运动员的籍贯都作了宣传报道。复旦大学自创建以来很重视体育，当我国优秀选手下榻此地时，便专门召开欢迎会，鼓舞士气。5月26日晚7时，第5届远东运动会总干事葛雷在一品香旅社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运

动员和领队，葛雷表示，为了筹备此次远东运动会，已经费时6个月，现在开赛在即，希望大家竭尽全力参与竞争，为国争光。香港领队刘福基、广州领队许民辉、保定青年会总干事柯兰克、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马约翰等人相继发表演说，表示一定不负众望，要力争锦标。欢迎会结束后的第二天，葛雷召集各地来的教练员，在青年会协会举行会议，商定了各个项目教练的名单，决定由郝伯阳担任总代表（总教练），富博思（mr. forbos）担任篮球指导员，刘福基为足球指导员，姚某（k. y. yor）担任排球指导员，包德飞（Forler field）担任棒球指导员，卜威廉（Witli ampoff）担任网球指导员，高某（s. w. go）担任游泳指导员，司马德（smard）danren担任田径指导员，并由柯兰克统管。从教练员队伍的组成可以看出，大部分还是外籍人士，可是已经有中国人入围，这说明不久的将来，教练员是可以全部由中国人来担任的。6月1日，江苏教育厅、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上海青年会等团体，又在青年会殉道堂开会欢迎来上海参加比赛的选手，这样一来，上海嘉宾云集，呈现出一派赛前繁忙的热闹景象，接待各地选手的规格似乎也提高了。

5月27日，开幕式的会场修建完工，也基本上布置完毕。田径场呈圆形，设有主席台一座，坐西向东，有十余级看台，可供贵宾在此观看比赛。除了游泳竞赛是在工部局游泳池而外，其他如棒球、网球的比赛均在虹口。此次的会场布置与第2届远东运动会大致相同，唯有打电话很不方便。此外，为了便于管理，不允许闲杂人等出出进进，运动员必须持有深黄色的特别通行证才能入场。我国北方选手在饮食方面不太适应，运动会执行组和一品香旅社商洽以后提供了面食，尽可能满足比赛选手的需要。同时，商务印书馆等社会团体也为运动会提供了赞助。为了保证比赛正常进行，大会执行组还限制了进入赛场的摄影人员的数量，并且拒绝了日本在场内安装无线电台的要求。

5月29日，参加运动会表演的各地童子军抵达上海，他们主

要来自附近的市县，其中苏州 113 人，松江 50 人，盐城 90 人，南汇 18 人，无锡 60 人，嘉定 12 人，崇明 18 人，如皋 21 人，溧阳 15 人，宝山 30 人，上海本市大约有 1000 人，上海和苏州还有女童子军 7 人参加表演。由于沿海城市与内陆城市的差异很大，西部地区的省市甚至没有派代表参加，其余地区都有代表，如广东黄君、天津南开大学章辑五、北京清华学校曹坤林、厦门魏子铭等，都是当地颇有声望的人物。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在妇女解放的大潮冲击下，中国女选手首次参加了国际大赛。根据当时的初步统计，女青年会体育师范学校有 84 人，爱国女校有 150 人，务本女校有 400 人，民主女中有 40 余人，裨文学校有 80 余人，圣玛莉亚教会学校有 80 余人，中西女塾有 740 人，神州女校有 80 人，勤业女子师范有 120 余人，爱群学校有 100 人，中国女子体操学校有 62 人，清心学校有 120 余人，万竹女校有 120 人，爱迪生电灯公司女工有 14 人，城东学校有 25 人，启秀学校有 40 人，民立女中有 60 人，成德学校有 24 人，女子体育师范学校有 28 人。虽然这些女选手主要是按照组委会的要求只参加表演，可是，在妇女参加体育运动受到社会严重歧视的时代，这仍然不啻为一壮举，对于今后中国妇女是否能够自主地参加体育活动无疑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5 月 30 日下午 2 时举行开幕式，全体参赛运动员绕场一周。开幕式当天下雨，但仍然有 1 万余人前来观看。组委会的负责人许秋司、徐国梁、谢传安、卜芳济、黄任云、余日章、唐露园、陈立廷、韩玉雾暨夫人、岸清一、嘉纳治五郎、阿西亚斯等人都参加了开幕式。1500 名童子军的演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尤其是女童子军，在中国体育史上是初次登台，她们一个个身姿矫健，动作灵活，格外引人瞩目。在开幕式上，首先由王正廷致开幕辞，接着，许秋风、齐燮元相继致辞。开幕式结束以后，各项比赛于下午 3 时正式开始。

经过了几天的激烈角逐，比赛当中没有发生令人不快的事情，使组委会松了一口气，可是比赛的最后结果却令人喜忧参半。

中国选手参加各项比赛的成绩如下：

田径

掷铁饼，杜荣棠获得冠军。跳高，袁庆祥获得冠军。五项全能，杜荣棠获得冠军。十项全能，朱恩德获得季军。半英里接力赛跑，中国队获得季军。1英里接力赛跑，中国队获得季军。

球类

足球，中国队获得冠军。篮球，中国队获得冠军。排球，中国队获得冠军。

这次比赛，菲律宾获得4项团体冠军，位列第一；中国获得3项团体冠军，位列第二。日本一无所获，名列最后。成绩公布以后，中国体育界颇感意外。6月3日晚上，江苏体育视察王小峰、体育师范校长邵汝干在青年会食堂宴请中外体育家麦克乐、郝伯阳，教育家郭秉文、沈信卿、朱单皋等10余人，讨论让中国喜忧参半的原因。讨论结果大家达成了一个共识，认为田径的长距离跑是日本的强项，中国人练习长跑的不多，以致临场比赛耐力不足，获胜机会很小，虽然也夺得了名次，那是因为菲律宾和日本没有悉数参加长距离赛跑的单项比赛的缘故。游泳是岛国的强项，所以菲律宾和日本获胜也在情理之中。此外，菲律宾运动员食宿都在停泊于黄浦江中的客船上，生活很有规律，日本下榻的地点也非常符合卫生条件，而中国运动员全都挤在一品香旅社，饮食起居无人管理，这是造成某些项目的比赛失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是，让大家感到无比欣慰的是，足球、篮球和排球都获得了冠军。尤其是篮球，能够战胜菲律宾实属不易。自从1913年以来，菲律宾队连续包揽了前4届远东运动会的篮球冠军，成了远东篮坛霸主，而日本队后来居上，也成了一支实力不可低估的强队。当时代表中国参加第5届远东运动会篮球比赛的是华北地区代表队，这支队伍以北京高师篮球队为班底，补充了清华大学等校的几位优秀选手，他们经过与天津队比赛而获得代表地区队资格，而后又战胜了华东、华南、华中几支大区代表队，取得了代表国家的资格。中国篮球队的

经费当时很微薄，大部分依靠募捐得来。队员们只领到一件背心、一条短裤、一双布鞋。中国对菲律宾的比赛原定于 1921 年 5 月 30 日举行，不巧这天下雨，中国队担心布鞋漏水，只好买了些绳子绑住鞋子，准备冒雨比赛。后来菲律宾队提出改期，比赛就改在第二天举行。31 日这一天，雨过天晴，气候适宜。因篮球比赛为运动会的重头戏，观赏性很强，这天到场的观众特别多，看台上人山人海，为本国同胞加油。这场比赛，双方争夺得非常激烈，中国队凭借“神投手”王耀东终场前两次投篮命中，反败为胜，以 30∶27 拿下菲律宾。

6 月 1 日，中国队迎战日本队，又是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在终场前的关键时刻，由当时素负盛名的王耀东依靠准确投篮和罚球命中，才力挽狂澜，反败为胜，使中国队以 32∶28 再胜日本队，从而夺得了本届远东运动会的冠军。这一胜利轰动海内外，王耀东也因此成为国人心目中的英雄。

运动会结束以后，舆论界也对此次比赛作出了比较公允的评价，认为大会增设了冲水前进、水底拾碟、奇态游泳（花样游泳）和潜泳 4 个项目，为比赛增色不少，也有利于今后推动中国游泳运动的开展。而女子参加运动会的表演既增添了风采，更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意味着妇女自主参加体育活动已经为时不远。此次比赛我国有 200 余人参加，各运动项目的组队体现了广泛性，如棒球、足球、排球和游泳选手，由香港的南华体育会遴选，圣约翰大学何家鎏也入选参加了排球比赛。篮球队以华北队为班底组成，网球队由北京和香港两处选手组成，田径则集中了全国的精英，上海有徐腾辉、唐恩霖、林世光、曾学鲁、周家骥、吴炎章、杨锦魁、陈启东等，南京有蒋湘青、金兆钧，华西有朱恩德，华中有杜荣棠，华北和清华大学有陈崇武、时昭涵等。这体现了中国体育界的团结合作正在逐步加强。

6 月 4 日晚上 8 时运动会组委会决定在礼查饭店举行颁奖仪式，也就算是闭幕式。由于到会人数过多，便一而再再而三地更改

地点，最后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会馆举行。8时半左右，远东运动会颁奖仪式正式举行，王正廷、陈立廷、李迪云、郝伯阳、骆维廉、柯兰克、刘福基、嘉纳治五郎、岸清一、近藤、阿西亚斯等中外贵宾出席大会，其他中外来宾达到700余人。王正廷主持大会，张謇代表上海市政府致辞，阿西亚斯代表外国宾客致词。然后由葛雷就运动会筹备和召开的情况作了一个总结，最后请石美玉女士一一颁发奖章和奖品。本届远东运动会的奖品很有特色，为运动会增添了一个花絮。奖章是一个圆形，上面刻有天坛的造型，四周用英文写着远东运动会的字样，下面是中文的上海和1921年等字样。

综观上述，第5届远东运动会的参赛国没有发生纷争，比较顺利地结束了所有的比赛，这说明经过若干届的组织筹备以后，组办单位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能够应付各种情况并及时解决问题。菲律宾在此次比赛上获得优胜出乎人们的意料，这说明菲律宾是经过认真准备的，而且教练水平很高，纪律严明，运动员服从管理等因素也帮助他们能够取得好成绩。在此次比赛结束时，日本提出，在中国举行的历届远东运动会都是由外国人在操办，今后是否可以由中国人自己操办呢？这个问题当然引起了国人的思索，要努力改变现状，争取在以后承办比赛的时候获得自主权。

六、参加第6届远东运动会

1922年9月，东京远东运动会筹备会作出了一个决定，将于1923年5月21—26日在大阪举行第6届远东运动会。消息很快传到上海，在上海体育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为了唤起青年学生参加运动会的热情，10月18日，上海中华武术会、江苏教育会附设体育研究会、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上海公共体育场等，致函南市六中校联合会，信函指出，转瞬之间运动会就要举行，参加比赛不是夺得锦标显扬国威就是比赛失利蒙受耻辱。到底选择哪一个，我国的青年学生，都应当思考一下，也都应当为争取荣誉尽到自己的职

责。为了帮助青年学生实实在在地掌握体育技能，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郝伯阳他们甚至愿意主办免费讲座，以期发掘人才。当年11月9日，麦克乐辞去了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书记的职务，由上海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部干事葛雷继任。葛雷一向热心体育，在此前的几届运动会上他都为中国参赛做了不少的工作。他上任后，立即被任命为远东运动会中国部主任，负责中国运动员选拔和组团等事宜。

11月17日，中国为了顺利参赛，由筹备会制定了一系列重要计划，用信函的方式分送给全国知名的体育家和各个体育团体的负责人，主旨是号召各地在当年秋季多召开运动会，要求各个学校、各省，甚至有条件的各县都可以举办比赛。同时还规定，每个月的5日要组织跳高、跳远、单足跳、撑竿跳的比赛；每个月的10日组织掷铁饼、打靶、掷银枪（标枪）等；每个月的15日组织20、25、50、75及100码赛跑等；每个月的月末举行一次田径比赛，检阅前几个阶段的训练比赛成效，也可以举行3英里至5英里的长距离赛跑。在1923年3月10日以前，各省会城市要举行预赛，在各地初选人才，5月10日以前，在上海举行全国选拔赛。运动员赴日本参赛的时间至迟不超过5月14日，这样有利于抵达之后的休息调整，避免中国运动员像以往那样不适应环境。

根据计划和安排，1922年11月19日，圣约翰大学、沪江中学、南洋中学和第二师范学校等单位首先举行了越野赛跑，帮助运动员克服耐力不足的老毛病，随后又接连多次举行越野赛跑。到了1923年3月中旬以后，各地陆续举行了选拔赛。长江沿岸的一些省市较早举行，于3月份在武昌汇集，进行比赛。湖南、河南、安徽和江西等省运动员都参加了此次选拔赛。南方的广州、香港接着也举行了预选赛。北方地区由于冬季漫长，举行选拔赛的时间稍晚，5月上旬在天津开赛。上海方面的预选赛和全国总预赛，都是在圣约翰大学操场举行的。

在上一届女子参加表演赛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妇女体育在沿海

一带的发展速度逐渐加快，她们也积极要求参加第6届的比赛。女青年会体育师范学校校长巴琪对记者说，如果中国女子能够得到政府当局和家长的允许，去国外参加比赛，可以说是妇女解放的一大创举。因此她准备亲自率女运动员赴日本参赛。可是当时日本政府刚刚胁迫中国接受了“二十一条”，引起了国人的极大愤慨，有不少人提出要抵制大阪远东运动会，女选手当中也有不少人表示赞成，特别是北方的体育界态度更坚决。这就出现了矛盾，究竟参加还是不参加，围绕这个话题展开了论争。葛雷在4月12日撰写了一篇文章，他认为中国不应该抵制，并列举了6条理由。日本方面得知中国有抵制运动会的意图，也表示担忧，日本体育委员都谷午郎希望中国不要采取这样的行动，而江苏省教育会也发表意见，赞同葛雷的理由。但深受日本帝国主义戕害的东北选手义愤填膺，在天津发出抵制的倡议，并打电报到上海来责问，这样一来，中国能否派出选手如期参赛就成了一个疑问。

为了应对危机，稳定民心，远东运动会中国执行部在出发前的5月13日发表了一个宣言，提出了几点主张，否定了天津倡议，决定如期起程，东渡日本。女子参加此次比赛虽然出现了一点波折，但最后还是选派了运动员参加比赛。

5月14日中国选手乘日本轮船加茂丸号前往日本。代表团由103人组成，葛雷、刘福基担任总领队，田径选手有李庭三、戴桂昌、邱全忠、黄文建、周家骐、沈昆南等人。篮球选手有何家鎏、欧秉光、黎宝膑、马德泰、张福星、刁庆欢、余志忠、陈启东、曾学鲁、杨锦铨、沈嗣良等人。足球、棒球、女子棒球由南华队代表中国参赛。本届比赛由日本天皇的弟弟秩父宫亲王担任大会总裁，副总裁有大阪市市长池上、日本体育协会会长岸清一、大会代表嘉纳治五郎等人，他们都参加了开幕式，中国选手董守义执掌国旗入场并代表中国选手讲话。

在本届运动会上，日本选手获得了田径、游泳和网球三项锦标，菲律宾也获得了排球、篮球和棒球三项冠军，双方不分上下，

谁应该夺得总锦标就产生了分歧，日本依仗着田径比赛中的名次列前，最后将总锦标夺去。中国选手在本届比赛中一败涂地，仅仅凭着以球王李惠堂为首的一群年轻选手努力奋战，夺得了足球赛冠军。日本报纸发布号外盛赞中国足球队，称他们“球员有铜头铁脚，战法似铜墙铁壁，战无不克，攻无不胜，中华铁军堂堂十年连胜”。在田径比赛中仅有余怀安获得跳高第1名，其余项目一无所获。游泳则全军覆没。女子因为是初次参赛，自然谈不上争夺名次。与上届比赛相比，中国代表团成绩不佳，引起了国人的责问：究竟原因何在？根据当时报纸所披露的情况，矛头直指中国筹备会的要人。据说一上船就有选手质问葛雷，为何数十人挤在一个统舱里面，开船后又将顶板盖上，致使空气不能流通，令人感到快要窒息。舱内还堆满了货物，环境非常恶劣，加上饮食很差，分量不足，甚至连洗浴也成问题。后来经过交涉略有改善。晕船的情况也很严重，很多选手一路上呕吐不止，除了棒球选手杨锦铨、跳高选手李大裕、篮球选手张福星3人比较正常，其余的人几乎两天吃不下饭，体力大损。在分析了这些原因之后，又总结出几点教训，例如田径选手赛前缺少练习；游泳选手没有选拔出优秀人才，入选者却自恃甚高，不听教练指挥；女选手临时组合，相互不熟悉，缺少默契，等等。另外，此次安排了两名领队，与队员之间有矛盾，也影响了赛场发挥。最能引起人们思考的是，由葛雷等外籍人士掌管中国体育，他们真的能为中国人着想吗？实际上当中国代表团抵达日本以后，旅居日本的华侨得知葛雷担任中国总领队便大为不满。中国体育界的有识之士也不赞成让外籍人士独揽大权。通过这次比赛失利后的总结，中国体育界开始认真考虑如何收复体育权的问题。回到祖国不久，圣约翰大学体育教授沈嗣良于6月8日在《申报》上发表题为《补救远运会失败之办法》的文章。他指出：“历届失败原因均在少练习及缺乏领袖办事人才”，“须组织完全由国人办理的委员会”，“我国应设立体育机构，学校范围有限，青年会范围有限，场馆难以普及，为国家行政机构，约

束甚多。不如联合以上各方及其他团体，组织一体育会，各地设分会，这样才有益于长远发展。”沈嗣良的文章如石破天惊，震撼着中国体坛，他的话代表了中国体育界的呼声，也预示着收复体育权已经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不久以后，中华体育协进会便正式成立，该组织的成立预示着中国体育界的重大变革即将开始。

七、参加第7届远东运动会

在追述第7届远东运动会之前，不能不将此前中国体育界发生的重大变革作一回顾，而且在准备参赛的过程中遇到的经费不足问题也特别值得一提。

1923年7月7日下午2时至5时，在上海召开了一次旧中国体育史上的重要会议，会议集中了当时体育界的几乎全体精英，有三十几人到会。此次会议的议题很明确，就是讨论如何使“体育管理国有化”。精武体育会的代表卢炜昌认为，第6届远东运动会遭受失败，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从计划到组织都是仰仗外国人，而这些外国人又不要中国人帮忙，导致组织管理失调，那么，我们岂能就此放弃责任呢？他表示愿意为中国人自行管理体育尽一点力，甘愿做一个助手来帮忙。另一位代表马子贞则坚定地认为，上届远东运动会失败了，成立体育协进会，一定能够昭雪前耻。体育干事郝伯阳也很客观地指出，远东运动会遭到失败，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其实是有好处的，发起组织体育会就是借此机会进行改革的一项举措。通过热烈的讨论，会议作出了一项重要决定，先用中华体育会的名义，与华南、华北、华东、华中等区域性的体育会取得联系，商定一个日期举行成立大会，并议定暂借上海北四川路中央大会堂为大会临时筹备处。众人推选了唐少川、马子贞、郝伯阳、卢炜昌等20人担任筹备委员。卢炜昌、戈公振、陈公哲、郝伯阳、侯可九、裴国雄、马西民7人担任筹备会执行委员。

先期准备就绪，1924年5月22日，利用在武昌举行第3届全

运会各路人马会聚在一起的机会，筹备会邀集全国5个区域性的体育联合会发出共同倡议，推选8名委员筹备组建一个完全由中国人组成的全国性体育组织，这是向外国人执掌中国体育大权发起的一场挑战。当时体育界的知名人士大多数也是教育界的领军人物，所以同年8月便依托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举行年会的时机通过了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章程，并在上海宣告了该组织机构的正式成立。张伯苓先生德高望重，深孚众望，被一致推选为名誉会长，其他有王正廷、沈嗣良、蒋湘青等人当选。董事会的15名成员全部是中国人。中华体育协进会的成立，标志着外国人控制中国体育竞赛活动的终结和中国自己管理运动竞赛的开始。该会在推动全国和各地区体育竞赛活动的开展、加强国际联系、组织参加国际体育活动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华体育协进会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为迎接第7届远东运动会做准备。考虑到葛雷在以往的工作中毕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要求他办理移交手续的同时，仍然聘请他担任中华体育协进会的名誉顾问。第7届远东运动会的筹备会也很快成立，当时中国的新闻媒体对于体育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申报》报馆主动将自己的办事机构借出来作为筹备会的临时事务所。

本届远东运动会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经费问题。从选拔运动员到组团参赛最棘手的也是如何筹措经费。1924年2月28日，距离第7届远东运动会开幕已经不远，经费仍然远远不够。执行委员沈嗣良不得不致函广州筹备处执行部委员长金曾澄和香港南华体育会干事部主席李玉堂，嗟叹经费筹划之艰难，希望他们二人鼎力相助。过了几天，3月2日沈嗣良去沧州饭店谒见副会长王正廷，又提出经费难筹的事情，王正廷深表理解，答应回去想想办法。后来王正廷写信给沈嗣良，表示愿意主动承担筹集经费的责任，并且要求将预算制定得精细一些。到了3月22日，中华体育协进会用通告的形式宣布有150余人赴马尼拉参赛，往返费用至少3万余元。同时提出了几种筹集经费的方案：一是请求中央政府拨款；二是请

求各省长官予以资助；三是在上海举办各区域性体育组织参加的足球、篮球比赛，发售门票，大约可以收入一两千元；四是向商界和社会各界发起募捐。3 月 28 日，东亚体育学校、爱国女校、华东体育学校、中国女子体操学校、两江女子体校、东南女子体校等参加远东运动会入选选手较多的单位联合致电江苏省政府，请求补助 1 万元经费。可是江苏省教育厅体育委员张元秧闻知此要求便大倒苦水，声称实在是爱莫能助，他呼吁江苏省 3000 万同胞共同出资，帮助选手们出征。眼看着比赛一天一天地临近，而经费的问题依然困扰着筹备会。到了 4 月 7 日，曾经担任过北洋政府外交部长的唐绍仪不得不向全国民众发了一封公开信，希望社会各界量力输捐。4 月中旬，经过多方努力，终于筹得经费 17525 大洋。另外，冯玉祥和江西督办也表示愿意划拨一笔经费，最后总计应当不少于 2 万大洋，勉强可以利用。于是筹备会立即发电报告诉菲律宾方面，表示中国一定会参加比赛。

经费的问题得到解决，总算让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接下来的选拔赛便可以顺利进行了。可是到了 4 月 9 日，中华体育协进会忽然发布一道通告，取消原定在南京举行的全国预选赛，改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举行，日期为 5 月 1 日至 2 日，原因是东南大学校长患病亡故，该校为了祭奠，不适宜继续承办比赛。所幸的是，这个小小的变故没有产生什么影响，5 月 1 日全国选预赛如期举行，入选第 7 届远东运动会的选手脱颖而出。华东地区的体育竞赛水平明显地高于其他地区，入选的运动员也比较多，田径选手有黄炳坤、张茂林、李威年、玄飞柱、朱耀燮、陈启东、苏炳泰、沈昆南、夏翔、徐维贤、曾福盛、吴德懋、陈作新、董承康、黄文建等。篮球有李祖祺、李大宸、张则仿、倪光祖、谈达佯、余志忠、黎宝骏等。棒球有张国勋、卢观祥、温联东、邱君等。网球有何家鎏。游泳有郑丁才、童文正、赵士明、陈童年、童郁勤。女排有苏祖琦、陈新凤、高霭鸿、孙安英等。除此而外，广东运动员的人数也比较多，参加田径比赛的选手虽然只有梁无恙一人，可是球类项目如足

球和排球大多数是广东籍选手，特别是篮球队，半数是广东培正中学的学生。

5月8日上午10时，上海体育界和教育界举办茶话会，欢送参赛选手出征马尼拉，江苏省教育会黄任之、圣约翰大学沈嗣良教授发表演说，肯定了国人自筹经费参加比赛的意义，并鼓励运动员要为国争光。5月9日上午9时，我国体育代表团乘坐格兰总统号轮船从虹口招商局北栈码头起锚，奔赴菲律宾。经过了6天的航行，终于在15日上午抵达马尼拉。代表团受到各国官员和地方士绅的热烈欢迎，然后驱车去中国华侨在马尼拉创设的基督教青年会。下午嘉年华协会代表东道主欢迎中国选手。在以后的几天当中，我国选手都住宿在菲律宾华侨创办的中华女校的宿舍。

1925年5月16—23日，第7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如期举行。大会开幕式是在诺萨列陀公园举行的，菲律宾总督乌特担任大会的总裁，他与大会组委会会长威顿博先后致辞，然后各国选手宣誓，随后比赛开始。

开始阶段比赛还比较顺利，不曾想田径比赛中发生的一件事情使本届运动会差一点半途而废：在400米决赛中，日本最有希望获得冠军的野藤因为违例被罚下，取消了比赛资格，致使在场的日本人大为不满。在场的日本官员与总教练急忙商议对策，而日本选手却不顾在场官员们的调解，集体退出比赛。当天下午，组委会不得不召开3个国家的代表协商，并宣布比赛延期。这件事情尚未平息，又一件事情发生，如火上浇油，使事态越发不可收拾。原来100米赛中，日本谷君跑了第1名，裁判却宣布菲律宾选手夺冠，第二天冲洗出来的照片显示，跑在前面的分明是日本选手，这就使日本选手更是不依不饶，坚决抵制比赛。日本体育协会为了阻止事态恶化，不得不作出一个决定，将13人除名。日本教练也发表意见，指责选手不顾大局，并宣布罢赛和被除名的人回国以后将失去参加国内比赛的机会。日本的新闻媒体也不赞成日本选手的过激举动，《朝日新闻》发表文章，斥责他们缺少大将风度，有失国体。

5月21日下午，日本体育协会会长岸清一和总教练高漱在马尼拉旅社向记者团公布：日本选手不听政府规劝，给予除名，并要求他们退出寓所，发给旧日币50元立即回国。日本代表团如此严厉的处罚，总算将事态平息下来。后来连菲律宾方面也自觉地反省，本方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而中国代表团则对事态洞若观火，也对菲律宾方面的做法甚为不满，更因为承办者未经协商便将比赛延期感到恼火，便提出强烈抗议。结果，大会组委会不得不派代表向中国远东运动会的代表道歉。

纵观比赛成绩，中国的田径几乎全军覆没，除了吴德懋夺得五项全能的冠军，其他一无所获，而游泳输得更惨，仅仅获得200米接力一项第3名，可是第3名并不计分，因为一共只有3个队参加这项比赛。除此而外，棒球、网球都是第3名，所幸篮球和排球没有殿后，得到了第2名。唯一值得自豪的是中国获得足球比赛的冠军。

24日，中国选手乘船离菲回国，31日下午7时15分抵达上海，受到上海总商会、各路商界联合会、中华商业协会、上海童子军联合会、江苏省教育会、岭南体育会、圣约翰大学、圣约翰童子军、沪江大学、复旦大学、青年会日校、青年会全黑队的热烈欢迎。可是新闻媒体对本届比赛的反应很冷漠，很少看到探讨失败原因的文章。也许是首次由中国人操办组队，国人不忍苛求；也许是由于“五卅”惨案爆发，国人关注着国家的存亡。总而言之，人们平静地接受了失败，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下一届在上海举行的第8届远运会上重振雄风。

第十一章　建立体育组织

建立体育组织，是发展体育运动的重要保证。为此，早在1904年，华东地区就曾建立了最早的校际体育组织——华东四大学体育联合会。1910年第1届全运会期间，又曾试图成立一个全国性体育组织——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而作为以政府名义成立的体育管理组织，最早大概是在1914年。

第一节　政府的体育行政管理组织

在中国近代体育史上，作为政府成立的体育行政管理组织，最早大概是在1914年。1914年7月，教育部在颁布设定的官制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对体育进行管理的要求。当时是在教育部设置了社会教育司这一部门，以主管“关于公众体育及游戏事项”。教育部置总务厅及下列各司：“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社会教育司等。其中在第六条中规定了社会教育司长官事务有：一、关于通俗教育及演讲会事项；二，关于感化事项；……九、关于公众体育及游戏事项。”[1]

作为政府的体育行政管理组织的出现，实际上是建立在学校体育发展基础上的。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教育思想、政策、制度与设施大为改变。原有学部改称教育部，但体育方面并没有常设的主管机构。在政策上，当时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只不过是聘请外国教

[1] 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 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96.

授、从培养师资人才着手、建立学校体育基础而已。直到1914年，才看到了这样的体育行政管理组织的出现。而且就功能而言，它还包括对社会公共体育事业的管理。

1919年，第5届全国教师联会在山西省城举行年会，议决组织体育委员会及改进学校体育两案。提案人认为，政府提倡体育，但至今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组织，难以发挥其功效，应设一体育委员会，以主其事。但会后似乎并没有看到成立新的体育行政管理机构。

第二节　非政府的体育行政管理组织

由社会上有识之士倡导并建立的全国性体育行政管理组织，在近代中国体育史上，特别是在民国初年到北京政府这一时期内，曾起到了领导中国体育向前发展的重大历史作用。其中最重要的非政府体育行政管理组织，就是1924年成立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这一组织一直延续到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它也是中国近代的“国家奥委会”组织。

一、中华业余体育联合会

组织建设是发展体育事业的基本保证。在张伯苓先生于1907年第一次提出中国也要加入到奥林匹克运动中去的想法以后，中国体育界就已经开始考虑到与之相称的组织建设问题。例如在1910年召开的第1届全运会期间，就已经成立了一个与运动会相同名称的体育组织——“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这一组织的发起人是1908年来华的第一位青年会专任体育干事爱克斯纳。

虽然早在1910年的第1届全运会期间，就成立有“全国学校

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的组织，但这个组织毕竟是临时性的。所以它在第1届全运会结束后，便实际上已不存在了。1915年，当第2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召开时，体育界的一些人士考虑到为主持全国各地区的运动竞赛活动，是否分别在华东、华西、华南、华北、华中五个地区首先成立各自的体育联合会，以为将来成立全国性体育组织做准备。所以，1919年，在中国为参加马尼拉第4届远东运动会做准备时，由华东、华南、华北、华中四个地区的青年会代表首先提出，应仿照美国“业余运动联盟”的组织形式，组建一个全国性的体育运动组织，以选拔优秀运动员参加远东运动会。

在《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宣言》中曾有这样一段回顾：“民国八年，在小吕宋举行第4次远东运动会的时候，中国赴会的执行委员和其他有关系的人员，以为需要组织一个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于是在当时回国的时候，中国代表就组织了一个委员会编订草案，同年8月，就把草案分寄国内外热心运动的各团体机关。11月，他们又在上海召集会议，修改章程。以后又继续开会两次，到会的代表把章程修改了以后就通过。又选举出来5个委员，把章程通知全国属于运动的各机关。”这个组织的名称开始定名为“全国运动联盟”（National Athletic Uion）[1]。1921年，“全国运动联盟”利用第5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召开的机会，于6月4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体育代表会议，共有49人出席。在这个会议上，代表们一致同意成立一个筹建全国性体育组织的筹备会，并拟订了组织章程，选出了筹备组成员，共9人。他们是：会长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副会长郭秉文（东南大学校长），会计袁敦礼（北京），书记麦克乐（南京）。另有顾问5人：刘福基（香港）、郝伯阳（上海）、马约翰（北京）、司马德（苏州）、柯兰克（保定）。其中麦克乐、司马德、柯兰克为青年会系统的外国人。

在筹备组全体人员的努力下，1922年4月3日下午2时30

[1] 麦克乐. 体育季刊，1922，1（1）.

分，“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在北京青年会会所正式成立，其英文名字为“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筹备组成员同时正式当选为首届执行委员。“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是继“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后成立的又一个全国性的体育组织。它曾参照奥林匹克宪章，提出了自己的宗旨是：“在中国提倡有程序之运动及体育；为全国业余运动比赛制定统一之标准规则；推广并改善业余运动员之运动游戏；设立并维持业余运动之划一标准，因以增进高洁之运动精神；在中华全国提倡并组织分区运动联合会，并使其隶属于本联合会；设立记录部，专司记录全国各分会业余运动游戏事宜；遇有国际竞赛举行时，由本联合会负责，选定代表中国之运动员。”它在宣言中特别强调了业余运动的意义，就是运动员进行体育活动应以娱乐为目的，使身体、心理、人际交往都能因运动而受到良好积极的影响，而不应以运动为生活之依靠。业余运动员的精神，应该是运动场上的君子精神，即爱惜自己的名誉、尊重裁判员和不取得不公平的利益[1]。“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成立后，不仅参与了1923年中国参加第6届远东运动会的队员选拔工作，而且还筹办了1924年的第3届全国运动会。所以，直到1924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之前，“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实际是履行了当时领导全国社会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的职责。

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1924年5月，第3届全国运动会在武昌举行。期间，经由5个地区（华东、华西、华南、华北、华中）的体育联合会代表倡议，决定成立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组成的全国性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并推选出8名委员进行筹备。同年7月5日，

[1] 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宣言．体育季刊，1922，1（1）．

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筹备组，共同在南京东南大学召开会议，组织临时董事会。并推举王正廷为名誉主席，张伯苓为名誉会长，聘请沈嗣良为名誉主任干事，宋如海等为名誉干事。董事会协商后决定，将原有的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筹备组合并，重新组成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对外的英文名称则仍沿用1922年报送给国际奥委会的“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而其所以在中文里增加“协进”二字，则是为了取其“大家同心协力，以求进步”之含义。同年8月，趁“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举行年会之机，体育界人士专门进行了聚会，讨论和通过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新章程，并在上海召开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大会。会议推选张伯苓为名誉会长，王正廷为名誉主席董事，沈嗣良为名誉主任干事，蒋湘青为干事。

蒋湘青（1898—1981年），字襄卿，江苏宜兴人，我国近代体育家。1918年考入南京高师体育专修科学习，曾代表中国参加了第5届远东运动会。1921年在圣约翰大学任体育教师。1923年任《教育与人生》周刊《体育》专栏主编。他对体育宣传工作的理解是：“增进社会上对体育的关注，唤起民众对于体育的觉悟。介绍并提倡新体育，促进学校体育的改革。”由于他的努力，《教育与人生》体育栏目的内容，曾对当时的中国体育界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蒋湘青曾先后担任过复旦大学体育主任、武汉大学体育主任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过上海体育学校副校长、上海沪南体育场场长，1981年去世。主要著作有《田径赛ABC》（世界书局，1928年），《人体测量学》（上海勤奋书局，1931年）。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董事会有15名成员，全部为中国人。但它的对外英文名称沿用原“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的名称，即“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它是否表明中国体育界之所以要抛弃刚成立了两年时间的“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而决意重新成立一个新的国家奥委

会组织，当与下列因素有关。

第一，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由于反帝斗争的影响和体育竞赛活动的增多，中国体育界逐步发出了从外国人手里“收回体育主权”的呼声。如 1923 年 7 月 7 日在上海召开的一次体育史会议上，30 多名体育界知名人士已经明确提出了“体育管理国有化”问题；在 1924 年 7 月召开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上，甚至全体一致通过了《收回教育权案》。这些应该是当时中国体育界考虑重新成立国家奥委会组织的直接动因。

第二，20 年代以后，随着我国体育人才的日渐增多，特别是留美、留日学生的大量回国，一种为了民族自尊，理应肩负起发展国家体育和奥林匹克事业的责任感的确立，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以中国参加 1923 年大阪第 6 届远东运动会为例，当时代表中国登台讲话的竟然是美国人葛雷，这一举动引起了运动员、旅日华侨，以及国内人士的极大不满，人们纷纷要求，成立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管理的体育组织。

第三，20 年代后在华外籍人员体育作用力的下降，也是导致考虑重新成立一个国家奥委会组织的因素。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推进速度得到加快，不仅召开有全国运动会，而且各个地区也都召开了各自的体育运动会，特别是各地区体育联合会组织的纷纷成立，使中国人已经完全具备了可以自己独立自主地发展和推进中国体育运动事业的能力。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所以 1924 年决定重新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将自己的宗旨确立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联合全国体育团体，以促进国民体育；二是提倡全国之业余运动，并增进运动员之运动道德；三是主持全国及国际间之比赛事项；四是制订业余运动员之资格；五是审定各项运动规则。”可以看出，当时它和《奥林匹克宪章》中的相关条款已相当接近。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该《章程》第八条中所设置的“各项委员会”专门条款，其中提出：“本会暂设运动员资

格审查委员会，田径运动纪录审查委员会，运动规则委员会及运动裁判会。”具体条款是：“运动员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运动员有无业余资格，并解决因该项问题而发生之一切争议，其细则另订之。”“田径运动纪录审查委员会，审查全国田径运动纪录，并确定各项最高纪录，其细则另订之。”“运动规则委员会，编订或修改或解释各项运动规则，其细则另订之。”“运动裁判会，主管各项运动比赛裁判事宜及解决一切因裁判而发生之争议，其细则另订之。”❶ 正是这些条款的设置，引导着一些单个运动项目的健康发展，并纷纷在全国范围内成立起各单个运动项目协会组织，从而有序地、一步步地加入了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主要有田径、游泳、体操、网球、举重、拳击、足球、篮球等项目），进而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顺利进入国际奥委会大家庭提供了条件。1931 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终于被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为“中国奥委会”。从此，近代中国的体育运动更有了在社会发展的雄厚的组织基础。

当然，“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以后，虽然曾在政府的内政部立案，但并没有得到当时政府的应有支持，这是一种历史的遗憾。例如在成立之初，既无固定的经费，也无固定的会址，只好暂用上海《申报》馆的房子办公。1925 年筹备参加第 7 届远东运动会时，也是借圣约翰大学的地方办公。然而，这个作为中国近代体育史上唯一的一个正式国家奥委会组织，它在推动中国近代的奥林匹克事业方面，确实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它筹办过第 4 届到第 7 届全国运动会；选拔过参加远东运动会和奥运会的中国选手；审定过各项运动的规则和全国的田径、游泳最高纪录；解答过各地有关运动比赛和裁判方面的疑难问题；出版过体育科学研究刊物；参与过一系列的国际体育事务活动。它将近代中国的竞技体育推向了顶尖的世界体坛。

❶ 体育季刊，1935，1（1）.

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章程

第一条：定名。本会定名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第二条：宗旨。本会宗旨分下列五项：一、联合全国体育团体，以促进国民体育。二、提倡全国之业余运动，并增进运动员之运动道德。三、主持全国及国际间之比赛事项。四、订定业余运动员之资格。五、审定各项运动规则。

第三条：会员。本会会员以省市（指行政院所辖各市）特别区及华侨团体为单位。

第四条：董事会常驻委员会及职员。一、董事会设董事九人，由代表大会上推举之，并互推一人任主席。董事任期二年，连举得连任。二、常驻委员会设委员五人，由董事会聘请之，并指定主席委员一人。为求管理会务便利计，人选以会址所在地为限。三、本会职员，设会长一人，副会长二人，主干及会计各一人，干事若干人。会长及主干由董事会推举，会计董事由董事会互推一人兼任，干事由会长商同董事会聘任之。

第五条：董事会之职权。一、计划本会会务。二、筹划本会经费并审查本会账目。三、推举会长聘请常驻委员。四、团体或个人之有违本会会章或细则之行动者董事会有处罚之权。五、主席董事有召集董事会、常驻委员会或临时董事会议之权，会议细则另订之。

第六条：常驻委员会之权。一、秉承董事会之意旨，管理本会一切重要事项。二、于必要时得代行董事会职权，但须于下届董事会常会时提出追认之。三、主席委员有召集常会及临时会议之权，会议细则另订之。

第七条：职员之职权。一、会长之职权：1. 举行大会时为当然之主席。2. 对外代表本会。3. 商同董事会聘任本会干事。4. 会长得召集职员会议。5. 委派委员会分理各项运动比赛及其他事宜。6. 会同会计及主干编制会务报告。7. 副会长协同会长处理本会一

切事务，遇会长缺席时，代理其职务。二、会计董事之职权：1. 掌理本会经济出纳。2. 商同会长编制本会预算书。3. 每年将收支细账、编制决算书交董事会审核。三、主干之职权：1. 秉会长、常驻委员会及董事会之意旨，办理全国及国际间体育事宜。2. 对各省市及特别区之体育事业负辅导之责。3. 保管一切运动纪录(各省市于省市运动会完毕后，应将结果及成绩寄交主干保存)。4. 编辑本会一切刊物。

第八条：各项委员会。本会暂设运动员资格审查委员会，田径运动纪录审查委员会，运动规则委员会及运动裁判会。一、运动员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运动员有无业余资格，并解决因该项问题而发生之一切争议，其细则另订之。二、田径运动纪录审查委员会，审查全国田径运动纪录，并确定各项最高纪录，其细则另订之。三、运动规则委员会，编订或修改或解释各项运动规则，其细则另订之。四、运动裁判会，主管各项运动比赛裁判事宜及解决一切因裁判而发生之争议，其细则另订之。

第九条：集会。一、大会每二年举行一次，在全国运动会开会时由会长召集之，每单位各派代表一人出席。二、董事会常会每年举行一次，日期地点由主席董事酌定之，临时会须由董事二人以上请求召集之。三、常驻委员会每半年开会一次。遇必要时得由主席委员召集临时会议。四、各种集会均以过半数之出席为法定人数，议案之通过，须经出席人数过半数之同意。

第十条：本章程之修改。一、本章程经董事会常会出席董事三分之二之同意得修改之。二、修改章程手续须经董事二人以上之联署，在常会一月前书面提交主席董事，由主席董事分寄各董事审查后，得交常会讨论之[1]。

---

[1] 体育季刊，1935，1 (1).

第三节 体育学术研究组织

北京政府时期的体育学术研究组织，主要是集中在对武术文化的研究上，在民间，曾一度达到了高潮。这主要是因为辛亥革命后，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民主潮流高涨，社会生活沸腾，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科学与民主的呼声唤醒了迷惘中的人们，要求进步、要求改革的浪潮风起云涌，席卷全国。所以它表现在体育方面就是当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涌来时，体育界，特别是武术界的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在当时的背景下更应该注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整理。所以，当时创办的体育学术研究组织，一般都以研究武术文化为多，包括武术的健身作用研究，以及武术的社会推广问题，如上海1919年创办的“上海中华武术会”，1920年创办的“中华国技研究会”，1923年创办的“武术研究会”等等；1912年北京创办的“北京体育研究社”、“中华剑术研究会”，1922年创办的“中华国技武术研究社”，1923年创办的“国强武术研究社”，1924年创办的“四民武术研究社”等等；1923年天津创办的“天津武术学会”、“天津道德武术研究会”；1924年在合肥成立的“安徽拳术研究会”等等。对于刚刚传入中土的西方近代体育而言，当时所建立的相关体育组织，考虑更多的还不是研究体育，而是如何更快更广泛地向社会推广西方近代体育的问题。这就是在这一时期内，几乎没有看到建立有关于西方近代体育学术研究组织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北京体育研究社

北京体育研究社是民国初期建立的一个民间武术研究和推广组织。1912年11月，北京武术界著名人士许禹生与郭志云、葛馨

吾、延曼生、伊见思、杨季子等人萌发了一个愿望，要将国粹武术发扬光大，而且希望得到各家各派的支持和帮助，于是，他们专程拜访了北京城内有名的一些武术名家，如耿诚信、吴鉴泉、赵鑫州、恒寿山、纪子修、高克兴、佟瑞甫等人，大家对于组建一个共同切磋交流技艺和理论的武术组织有着共同的心愿，便筹备创建了武术研究团体——北京体育研究社。

当时强国保种的社会风潮极盛，大家都希望该组织从成立之初就能够为国家和民族作出贡献，因此，在确定该社宗旨时便提出，要开展与普及武术运动，研究武术理论与武术历史，培养武术人才，以达到强民救国的目的。

该社由许禹生任副社长，地址选定在北京西四北边某处。经过数年的积累，到 1916 年，该组织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影响也逐渐扩大，大家感到还应当吸引更多的武术界名流加入进来，共同学习提高，而且必须招收学生，培养年轻人。经许禹生倡议，北京体育研究社聘请了当时武术界名望很高的一些人，例如杨少侯、孙禄堂、杨澄甫、吴鉴泉、刘彩臣、刘恩绶、纪子修、佟瑞甫、张忠元、兴石如等，这些名家都怀有弘扬国粹的心愿，相聚在一起为了同一个目的而共同努力，便开办北京体育讲习所，开业授徒。该组织作为体育研究社的增设机构，主要是培训武术教师，然后再鼓励这些武术教师进一步培养学生。这个举措应当说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体育师资严重不足的矛盾，故而得到当时的教育部长蔡元培的赞许，并由教育部拨出专款，在北京西单西斜街重建新的社址，教育部还特别发出通知，责令各地学校或教育机构选派学员来京学习，这无形中为研究社大大增色，使其影响得到扩大，规模也逐渐扩大。又经历了十数年的经营，当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中央国术馆系统也建立起来，北京体育研究社便于 1929 年 12 月，仿照中央国术馆的宗旨和建制组建起了北平市国术馆，仍然是以培养武术师资为主，同时，也审定武术教材，传习各种拳种和器械并研究武术理论。扩展以后的北京体育研究社应该说主体已经变成了北平

市国术馆，下设了高等研究部、普通研究班、各门专修班和民众练习班，使得推广和普及以及研究武术的分类更加细化。该社当时还编辑出版过《体育》月刊和一些教材，这意味着以武术为主的同时，也重视其他体育活动的开展与推广。该社于何时关闭的问题尚待求解，目前找不到明证，但根据推测，七七事变以后北平沦陷，武术界的人不可能坐以待毙，这也就可能使该组织不得不关闭，大家各奔东西。

二、上海中华武术会

1919年8月31日在上海，由吴志青发起并正式成立了“上海中华武术会”。它活动的主要对象是学界和商界。该会是继“精武体育会”之后的上海第二大民间武术团体。其宗旨是：发抒道德，锻炼体魄，起衰振弱，互相辅助，服务社会。

上海中华武术会的前身是1919年2月成立的“中华武侠会”。会址在上海英租界望平街，以传习少林拳为主，包括查拳、滑拳、洪拳、弹腿、炮拳等，1936年以后，又传授太极、八卦掌和摔跤等。该会会员一般保持在500人左右，最多时达到千余人。上海中华武术会办有自己的会刊——《武术》。

上海中华武术会成立后，曾与各方面建立了联系，如厚德小学、圣保罗学校、启明小学、沪北小学、女青年会体育师范、孤儿园、中城商业会、女界联合会、英华学生会、麦伦书院等，而且这些单位都邀请该会教授武术或表演，因而它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上海中华武术会还在法国、南洋的爪哇等地设立了分会，有数万名会员[1]。

---

[1] 陌雅. 上海中华武术会. 体育文史，1987（6）.

三、华东八大学体育联合会

华东八大学体育联合会是这一时期内影响较大的、以推广西方近代体育为主要内容的地区性体育组织。它的前身是“四大学体育联合会”，也称“中华大学生体育联合会”，或曰“华东体育联合会”，1904 年 4 月 23 日由苏州东吴大学发起成立，发起人为苏州东吴大学的司马德。四大学体育联合会包括上海的圣约翰书院、南洋公学、中西书院和苏州的东吴大学。这是一个跨地区的大学生体育联合组织，每年春秋两季在四校轮流举办运动会。比赛项目主要为田径。首届田径运动会是在东吴大学举行的。除田径以外，各大学之间也有一些球类比赛活动。1909 年，四大学体育联合会解散。

1914 年 5 月，又在苏州东吴大学司马德的倡议下，发起成立了“东华六大学校联合运动会”，亦称“华东各大学体育联合会”。当时参加联合会的六所学校是上海的南洋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由于东吴大学的司马德在华东地区体育界有较大影响，所以六校代表一致推举东吴大学为联合会盟主，并于 5 月 16 日在东吴大学召开了联合会成立后的首届田径运动会。除田径以外，六大学体育联合会还先后设置了足球、棒球、网球、篮球等项目的比赛。

1920 年冬，六大学体育联合会开始改组，先后又有南京的东南大学和上海的复旦大学加盟，由此出现了“华东八大学体育联合会”，亦称“东方八大学体育联合会”。主要负责人有南洋大学的莱司礼、东南大学的麦克乐和东吴大学的司马德，并推举司马德为华东八大学体育联合会书记。1921 年司马德在苏州病故后，由东吴大学的聂显继任书记。

聂显（W. Lnash），美国人，东吴大学体育专教，擅长棒球和篮球，1921 年司马德死于霍乱后，他继任华东八大学体育联合会书记。期间，他曾发起成立过“江南中学篮球联合会”。

华东八大学体育联合会是中国近代体育史上影响较大的体育组织，它对于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发展，特别是在华东地区的早期传播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历史性贡献。1925 年，华东八大学体育联合会解散。1926 年后只剩下沪江、金陵、东吴、之江四所大学，仍以“华东四大学体育联合会”的名义活动。1932 年，这一组织彻底消亡。

第十二章 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与改造

20 世纪前 30 年，中国的思想文化处于一个十分活跃的时期，在外来体育逐渐居于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人们开始关心民族传统体育的命运，希望对它进行研究、改造和重新利用，围绕“静坐”和“中华新武术”的讨论一度十分热烈。

第一节 对“静坐”问题的讨论

“静坐”本是古代养生的一种方法，在近代外国体育传入中国以后，人们开始怀疑它的作用和价值，围绕“静坐”的讨论开展起来以后，各种观点纷纷提出。以蒋维乔（因是子）为代表的一种观点在当时最为引人关注。

一、“静坐”问题讨论的缘起

民国初年，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开始传入我国，动摇了以军国民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德、日体育体制。我国开始向以实用主义为思想基础的英、美体育体制的过渡。新思想的传入，造成了体育界思想的混乱。恰如徐一冰所说：“窃唯我体育界总值之乱、学说之杂，无过于今日矣。或则习岛国之风，或则守新大陆之制，入主出奴此排彼斥，或者又欲保存国粹，恢复旧章……。”[1] 各种体育主张纷

[1] 体育周报，1919（13）.

纷出台。“新、旧体育”之争，“兵操废存”之争，风靡体育界。自然主义体育的流行，使人们对体育的认识突破了“体育即体操”的藩篱，在探求“体育之真义”中，扩展了人们对体育手段或方法的视野。在对学校兵操与“选手制”体育的批判中，不少人开始转向我国传统的健身、保健方法及民族体育形式，企图从民族传统形式中寻求“尽善尽美”的体育手段，以实现所谓的“人的体育”的理想。

1915 年，王怀琪将传统健身术“八段锦”，按图中所绘姿势编成简明的方法，将不甚通俗的动作名称，按体操术语的表达方式，加以概略的说明。如原名为“两手擎天理三焦”，分解注明为：“1. 两臂由左右向上高举，掌心向上，十指交错，两肘勿屈，同时两踵高起；2. 休止；3. 两臂由左右下垂，踵亦放下；4. 休止。如法连行三次，至 4 之时，足尖闭合。”王怀琪将该套动作提名为“八段锦体操”在《教育杂志》上发表。用图文并载的形式推荐给高等小学及中学作为体育教材。此后不久，有人在《教育杂志》上撰文称道：“自兴学以来，体育之科，步趋随人，礼失而求诸野，道失而学在夷。有心世道者同声一慨，亦宁知吾高妙之柔术，尚有未尽灭绝者耶。阅报见有以印八段锦编著学校体操者，盖是有心人也。”[1]在江苏省立各学校第二次联合运动会上，八段锦的表演备受欢迎。参观者认为此种操法与米勒氏 35 分钟基本体操实异曲而同工，似可推行。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涉猎了各种运动方式，感到“皆系外铄而无当于一己之心得”，于是取各种运动之长，自成一种运动，称之为“六段运动”，并于 1917 年刊载于《新青年》第 3 卷第 2 号上。毛泽东的“六段运动”，基本上是在继承传统导引术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徒手操的某些特点而加以创新的。

[1] 教育杂志，1915，8（8）.

二、因是子静坐法

“静坐”是中国古代导引术的一种，行之得当，有一定健身治病作用。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静坐”往往同道家的“修身养性”和佛家的“参禅打坐”相联系，其理论与方法掺杂了一些封建文化思想。

提倡“静坐”的代表人物是因是子，名蒋维乔，字竹庄。江苏省常州人，生于1873年，出身于书香门弟，与吕思勉并称常州二先生。他幼年体弱多病，用他的话说是“自幼多病、消瘦骨立，父母虑其不育。年十二即犯手淫，久之梦遗、头昏、腰酸、目眩、耳鸣、夜间盗汗……百病环生。”他也曾“百般求治疗之法”，皆无效验，于是在20岁以前就开始研究静坐练功法，一连坚持了18年，“不特病疾竟疗，而且精神日益健康。”后来他读到日本人冈田虎二郎、藤田灵斋等著的《冈田氏静坐法》《藤田式息心调和法》等书，又听说这些书“风行一时，重版皆数十次”，那两位日本气功师的门徒万万千千，影响甚广，遂慨然浩叹道：“是我国固有之术也!”他认为冈田和藤田所倡导的静坐法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也是根据中国古代医学、养生、武术等理论而写成。但是日本人能运用近代科学的道理来解说静坐法的道理方法，不含神秘色彩，却是值得中国人学习的，因是子又慨叹道：“察吾国民间习尚，凡一切学术以及百工技艺，苟有超绝恒理者，往往自观为秘法，不肯示人”，以致中国许多绝技都失传了。而我们东边的邻居则不是这样，“凡得一术，必共同研究之，其结果远胜于我，我国且转而取法之矣”。比如明朝末年中国武师陈元赟流亡日本，向一些日本人传授了中国武艺，结果日本人据此加以研究而丰富，造成了当今日本国技“柔道”，而中国的摔角技艺仍然如故，停滞不前。因是子接着唏嘘长叹道：“我国之拳术如故也！内功粗者可以祛病，精者乃可成道。然亦以自秘之故，不肯共同研究。彼

国人自大学讲师、学生等人，老幼男女起而学静坐法，且学校列为课程，大学生有联合组织静坐会者。嘻！何其盛欤！而我国人则何如也夫？因自秘之故，濒于失传，亦可叹矣。”[1] 民国初年，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因是子受日本人冈田虎二郎与藤田灵斋倡导的静坐法的影响，同时根据自身锻炼的经验，创编了“静坐法”，首先在北京大学提倡。

1914 年 10 月，以《因是子静坐法》题名刊行于世。这本书一扫神秘怪异之谈，“而以心理、生理之学解说之，凡书中之言，皆实验所得”。此书问世后，受到各界人士极大欢迎。据因是子自己说：“书出版后，购者络绎不绝，近则各省，远至南洋，无处不有学习之人”，“此书行销数十万册”。因是子也由此被聘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及江南各地学校演讲“静坐法”，影响很大。

《因是子静坐法》全书分原理、方法、经验 3 篇及附录，全书约 1.2 万字。该书力图用近代科学成果阐述“静坐”的原理和方法，比较注意剔除传统养生术中掺杂的神秘怪异的附会。书中叙文说：“余之为是书，一扫向者怪异之谈而以心理的生理的说明之，凡书中之言，皆实验所得。”这位因是子，民国初年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秘书长，后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也是鲁迅以不屑口气斥为“那班教育家”之一；加上他又竭力提倡“国粹”之一的静坐养生 —— 这自然成了鲁迅《随感》中的一个目标。

该书发行后，影响极大，4 年内 14 次再版。据 1920 年《体育周报》记载，提倡“静坐”的湖南“同善社”，遍布 18 个省，就连偏僻的小县，也几乎都有它的分社。当时一些学校也把“静坐”编入课程，大学学生还专门组织成立了“静坐会”。耒阳县以教育会长为首，联合多名教育界人士组织了“中外卫生会”，该会主要研究中国人“静坐”养生方法及外国人操练的方法。当时有

[1] 蒋维乔. 因是子静坐法.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

人著文惊叹道："民国以来，于今也有八年，甚么教育、失业、政治，丝毫没有长进……独有两样事情，我国国民的程度可长进了：第一样是扑克，第二样是静坐，我国男女老少，除了正正当当的劳工不计外，差不多没有一个不是内行。静坐几乎成了国民的趋向。"❶

三、关于"因是子静坐法"的论争

从1917年起，就先后有人在《新青年》等杂志上撰文，对"静坐"提出异议，并结合社会上掀起的复古潮流，对"静坐"进行了辛辣的抨击。1919年《体育周报》专门就"静坐"问题展开了讨论。

鲁迅不相信中医，更不相信静坐养生。蒋维乔在《因是子静坐法》的《原理篇》中运用了一些中医术语，如"丹田者亦名气海"等；在他译述的日本铃木美山所著《长寿哲学》的《病之原因》一节中，引用了德国科荷博士吞食细菌而不生病的事，来证实精神能影响人的生理功能、静坐调神能强身祛病的道理。这引起鲁迅的强烈反对，他在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上发表对蒋维乔《因是子静坐法》的批判。以今天眼光看来，鲁迅所指责的那位"大官"（指蒋维乔）的话并无大错，说不上是什么"鬼话"和"带了妖气"。由胚胎出生为人前不是靠脐带维系生命的发育吗？蒋维乔试图用现代科学阐述人体某些部位很重要的原理虽不一定十分精当，但未必就是"最恨科学"和在"捣乱"。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反对静坐养生的并不仅是鲁迅一人。《新青年》1917年4月1日在第三卷第二号发表的一篇《体育之研究》中就有一段话："近有因是子者，言静坐法，自诩其法之神，而鄙运动者之自损其体。是或一道，然予未敢效也。

❶ 龙毓莹. 辟"静坐". 长沙：体育周报：特刊. 1920-01-05.

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作者署名“二十八画生”（毛泽东）。1920年1月长沙《体育周报》特刊第二号的《辟静坐》，更激烈地写道：“静坐的最大害处，就是使人趋于消极，我们一天天的习静，清心寡欲，就一天一天把进取心消磨了。”虽然鲁迅、毛泽东等人都曾反对静坐气功，但中国许多人仍坚持静坐锻炼，当时的一些高等学府还成立师生组成的“静坐会”，静坐法流行不衰，许多提倡新文化的斗士也靠它祛病强身，比如郭沫若，他因年轻时治学过勤患严重神经衰弱，形销骨立、夜不能眠，痛苦得几乎自杀，百药无效之时他坚持静坐练功，结果顽疾痊愈。静坐法的奇效使他多次浩叹道：“从前眼前的世界只是死的平面图，到这时候才活起来，成了立体。”“静坐于修养上是真有功效，我很赞成朋友们静坐。我们以静坐为手段，不以静坐为目的，是与进取主义不相违背的。”[1] 这种见解，比之鲁迅等人偏激批判无疑公允得多。

在发掘民族传统体育形式的浪潮下，“静坐术”风行一时，在社会上引发了一场关于“静的体育”的争论。

提倡者除了引据“身心并完”的体育思想来证明“静坐”是重要的体育手段外，还依据心理、生理学说，阐述“静坐”的锻炼原理。蒋维乔说：“我们这个人，是物的方面心的方面两者合成的。物的方面，就是肉体；心的方面，就是精神。所以讲到体育，这两方面都不可偏废的。体操和运动，虽然可以强健筋肉，活动血脉，实在它的效验，不过偏于肉体罢了。至于精神，就不能顾到，所以于育字未必完全。以我的见解，必须兼用修养的功夫，方得完成此育字的意义。”[2] 这一段话基本上可以代表当时“静坐”提倡者的看法。除了从身心并完论证之外，提倡者还依据心理、生理学说，阐述“静坐”的锻炼原理。黄醒在《我的静坐观》一文中提出，“静坐是一种体格修炼运动”，讲了四点理由：第一，“静坐术最重

[1] 郭沫若. 沫若自传.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 蒋维乔. 我的体育观. 长沙：体育周报：特刊，1920-01-05.

姿势”，人体姿势是靠各部分肌肉的紧张来维持的，“静坐术利用肌肉的紧张，增进肌肉细胞的新陈代谢作用”，因此“静坐对于内是动不是静”。第二，“静坐术最重呼吸——深长的呼吸。人体呼吸深长时，血液循环量必然会增加，血行也随着旺盛”。这与“催促血液循环的旺盛”为锻炼效果的运动，其功效是一致的。第三，“静坐术忌闭眼，忌睡着”，其目的在于使“筋肉紧张，血液盛行”以提高新陈代谢的作用。第四，依据治病的生理与心理因素，“静坐”具有防病治病的功效。他们认为，一切病不是心理上来的，就是生理上来的，而“静坐”不仅能保持筋肉的紧张，促进血液循环，同时可以调和“心力体力的劳动”，而达到“血肉多动身体必健，杂念排除精神必多”的效果，从而防治疾病的发生或有利于病体的恢复。

而反对者则依据“天地概唯有动而已”的进化论思想，批判“静的体育”。认为体育的功效在于强筋骨，因此而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以求“身心兼适”。而“运动为体育之最重要者”，“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并指出：“肢体纤小者举止轻浮，肤理缓弛者心意柔钝”，没有强健的身体就不会有健全的精神[1]。在《体育周报》上，有人以《辟静坐》为题，对“静坐”进行了批评。作者根据当时的神经生理学说，就“静坐”的原理与效果进行了逐一的反驳。作者认为，神经分自主神经与非自主神经两类，人的运动也分为“自觉的”与“不自觉的”两类。循环与呼吸两系统都属于“不自觉的”运动，一般不受大脑的支配，那种“在以人心之能力，感动骨骸，促进血液之循环，使不阻滞”是缺乏生理依据的。因此，“静坐”“不合于生理的原理”。从人生社会实践的角度，作者指出：“静坐最大的害处，就是使人趋于消极。”并指出“佛教最讲静坐；印度为佛教的发生地，免不了为英国所灭；梁武帝为中国最信佛教

[1] 二十八画生．体育之研究．新青年，1917，3（2）．

的一人，免不了台城一死。各位先生想做梁武帝，何必定要把中国弄成印度呢”，作者认为，在当时军阀混战、封建势力猖獗的社会条件下提倡静坐，会带来巨大的消极影响。

“静坐”的提倡者，尽管在“静坐”原理的阐释上，使用了近代科技成果，并力图从健身防病的角度发掘它的体育意义，但他们对“静坐”的基本理解，依旧是立足于封建士大夫“修身养性”的思想基础之上的，认为“静坐”的主要作用是“惩忿窒欲”，清醒头脑，认为“静的体育最适宜个人修炼，最适宜社会领袖的修炼”[1]。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迎合了社会上一些养尊处优不好运动的“社会领袖”，是为他们设计的“修炼方法”。

尽管“静坐”这种带有传统文化特征的修炼术有一定程度的健身益体功效，但时逢政治上的顽固保守派大呼“尊孔复古”“保存国粹”之际，提倡“静的体育”，而未对其浓厚的封建意识进行批判，在当时就迎合了固守旧文化的封建势力的政治需要，客观上阻碍了近代体育的开展，因而遭到了激烈的抨击和反对。

第二节　关于《中华新武术》

《中华新武术》是借鉴西方的体操、兵操形式，把散传在民间的武术编成了一种武术操。它最早是1914年由马良（1878—1947）开始推行的。当时，在军队任职的马良出面请来一些武术名家创编了新的武术套路教材——《中华新武术》，主要适用于团体的教学和操练，因此首先在军队中广泛传播。后来马良又成立了“武术传习所”，进一步扩大了《中华新武术》的传播范围，促进了武术的普及发展。“武术传习所”改变了武术原来师徒口授单传的教学方式，为后来武术进入学校提供了借鉴的教学模式。

[1] 体育周报，1919（11）.

一、《中华新武术》的创新与不足

《中华新武术》在教学上的创新，方便了学校与军队中的武术教学与训练，不少学校相继以此作为武术教材。1916 年，教育部曾派许禹生、孔廉白等人赴济南考察了《中华新武术》的实用效果，并由教育部审查了《摔角》《拳脚》两科教材，建议把《中华新武术》作为教授武术参考用书。1918 年 10 月全国中学校长会议决议，“以《中华新武术》列为全国各中学校正式体操”，教育部即通令各校实行。同年，在上海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教育联合会，也一致通过山东代表提出的“以《中华新武术》列为全国高等以上各学校并各专门学校之正式体操”的建议。1919 年秋，经国会辩论，最后通过《中华新武术》为全国学校正式体操，并通令全国实行。

这种创新改变了传统武术单人教授所造成的不易推广的缺陷，开创了武术发展的一个新途径，有利于武术的普及。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人批评这种创新是“以个人之一知半解，窃取拳术中数无系统的姿势，编为国技体操，徒求皮毛，全失本意”。这些批评指出了这场武术教学改革存在的问题，表明武术的革新与发展还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

二、围绕《中华新武术》问题的讨论

民国初年与北洋政府时期，提倡武术的人大多视武术为一种实用技术，重在自卫应敌。这是当时颇为流行的看法。孙中山曾在《精武本纪》序言中写道：“惟火器输入中国之后，国人多弃体育之技击而不讲，则至社会个人积弱愈甚，不知最后五分钟之决胜常在面前五尺地短兵相接之时。为今次欧战所屡见者，则谓技击术与枪炮飞机有同等作用，亦奚不可，而我国人曩昔，仅习得他人物

质文明之粗末，遂自弃其本体固有之技能，以为无用，岂非大失计耶。……我同胞然处竞争剧烈之时代，不知求自卫之道，则不适于生存。”这个序言反映了当时提倡军国民主义教育的许多人对武术的认识。孙中山对当时提倡纯粹西方体育、国人弃传统体育的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强种保国”的历史潮流中，在土洋军事的、体育的思想碰撞交锋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既反对对本民族传统文化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又引进西方的兵式体操，兴办军事学校，将民族的尚武精神和技击内容与兵式体操训练相结合。《中华新武术》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逐渐形成的。

《中华新武术》的出发点是以中国拳技和摔跤术的传统武术动作为内容，参照和借鉴兵式体操的教练方式，采取中西融合的做法，编成的新式武术教练法。1914 年，马良再次广邀各派武术专家，修订《中华新武术》。1919 年秋，《中华新武术》被国会批准为全国学校正式体操教材。《中华新武术》并非单纯对武术的复古，也不是盲目地模仿西方的体育手段，它具有创造性，在武术发展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积极意义。《中华新武术》成功地将西方体操的方式、体育教学的方法以及竞技运动的思想注入传统武术之中。然而，《中华新武术》在当时正值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加之马良将其称为“我国之国粹，我国之科学”，并不断被一些封建官僚和“国粹派”教育家所利用，受到了新文化运动改革派的激烈反对。

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过程中，中华新武术从形式到内容，从理论到实践，以及它的功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近代中国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武术的研究和推进，成为近代体育演变过程中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思想家和“国粹派”教育家之间的论战，主要集中在武术的去留问题上，其中较为出名的是鲁迅和陈铁生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关于武术问题的论战。

对当时“国粹派”教育家提倡的传统文化，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

思想家进行了激烈的回击，如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著文《随感录》。此文发表后未多久，即遭到陈铁生《驳〈新青年〉五卷五号〈随感录〉第三十七条》一文的强烈反驳。后鲁迅在答复陈铁生函中指出，他前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批评一种“社会现象”，而陈铁生的反驳则是他个人态度的反映。鲁迅解释道：产生这种区别是因为他参考了陈独秀在其关于《克林德碑》一文中所征引的有关新拳术的书。对此，鲁迅认为如果这仅仅是个人独立的看法，也就无关宏旨了。但是事实是，该书（《中华新武术》）已经政府审定，受到教育界的热忱对待，并且在全国作为教科书之用。这便成了一种确实存在的社会现象了，而且是一种倡导“鬼道主义”风气的社会现象。鲁迅接着写道，他承认中国武林中有不借鬼神的高手，然而由于这些武术家并不站出来公开说明他们的主张，他们的看法就必然被社会上盛行的倾向所掩盖。“所以写了这一条随感录，倘能提醒几个中国人，则纵令被骂为‘刚毅之不如’，也是毫不介意的事”[1]。

对于马良的“新武术”以及鲁迅先生的批评，思想界和教育界的认识并不一致，即便时至今日，对此也是见仁见智。但在当时的背景下认识这段历史，不难看出，马良的“新武术”等在当时受到批评，主因是其适应了“国粹主义”文化的潮流——袁世凯称帝前后掀起的复古逆流，封建买办势力在“保存国粹”的鼓噪声中，大肆提倡尊孔谈经，力图保持和加强旧文化、旧思想对人们的控制。这股反动逆流也反映在体育领域里，一些守旧分子借口提倡“新武术”和“静坐”，极力推销“国粹”，以抵制新文化运动，抵制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发展。这与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科学、民主背道而驰，因此必然受到进步人士的强烈反对和激烈批判。

[1] 拳术与拳匪. 新青年，1919，6（2）.

大 事 记

1840 年（清道光二十年）

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从此进入近代社会。

1848 年（清道光二十八年）

在华外商侨民在上海南京路修建第一个跑马场。

1851 年（清咸丰元年）

太平军中已经有使用西方武器的记载。
上海“老公园”举行第一次赛马大会。

1856 年（清咸丰六年）

曾国藩的《陆军得胜歌》诗中有关于湘军兵操活动的描述。

1862 年（清同治元年）

李鸿章在上海创建“淞江洋炮局”。
京师同文馆创办，以西学为主要内容的新式学堂诞生。

1872 年（清同治十一年）

上海《申报》创刊号报道了第一篇体育新闻。
首批留美学童从上海出发。

1881 年（清光绪七年）

天津水师学堂创办，这是中国最早的海军学校。

1890 年（清光绪十六年）

《申报》中首次出现“体操”一词。

圣约翰书院召开田径运动会，是中国近代最早的运动会。

1895 年（清光绪二十一年）

袁世凯奉命在天津小站组建新建陆军，出现了著名的小站练兵。

张之洞所聘的德国教官来华。

来会理在天津青年会介绍篮球运动，从此篮球传入中国。

1896 年（清光绪二十二年）

张之洞的两湖书院开始设置体育课程。

1897 年（清光绪二十三年）

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出现“体育”一词。

1898 年（清光绪二十四年）

张之洞的自强新军在上海组织了一次会操表演。

1900 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京、沪等地教会学校开始举办校际运动会。

中国人首次从《中西教会报》上知道了奥林匹克运动会。

1902 年（清光绪二十八年）

天津各学堂举行“联合运动会”。

1903 年（清光绪二十九年）

江苏优级师范学堂体操科创办，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体育专业教育。

山东举行“烟台阖滩运动会”。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

清廷颁行《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规定“各学堂一体练习兵式体操”。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施行的新学制。兵式体操以法定形式在官办学堂推广。

华东四大学体育联合会成立。

上海出现乒乓球运动。

广州成立“广东体育协会”。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

光复会会员徐锡麟、陶成章于浙江绍兴创设“大通体育会”和“大通师范学堂”（仅设体操专修科）。

广州等地出现排球比赛，近代排球运动开始传入中国。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清廷学部通令全国各省，于省城师范学堂附设5个月毕业的体操专修科。

四川体育专门学堂、云南体操专修科成立。

香港“域多利游泳会”开始举办全港渡海比赛。

通州协和书院足球队以2:0胜驻北京的英国军人足球队，夺得白磁九龙杯。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在南京召开“江南第一次联合运动会”，有80多所学校参加，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校际运动会。

中国体育留学生成批从日本回国担任体操教师，日本式体操从此广泛传播。

河南体操专科学堂、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体操专修科、奉天师范

学堂体操专修科成立。

1908 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徐一冰、徐傅霖、王季鲁等于上海创设中国体操学校及女子部（后改为中国女子体操学校）。

香港“南洋足球会”成立，为我国最早的足球组织。

黄兴到日本重组“大森体育会”，招国内革命党人去学习军事体育。

一批美国体育专业人员来华，分赴上海、北京、天津、长沙基督教青年会任体育干事，有的进入高等学校任职、任教。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开办“青年会体育干事训练班”（后改为“中华全国基督教青年会体育专门学校）。

1909 年（清宣统元年）

上海武术爱好者邀请河北武术家霍元甲赴沪与西人较技；后建立“精武体操学校”，由霍氏师徒任教师。

“上海万国足球赛”（年赛）开始举行。

1910 年（清宣统二年）

陈公哲等在上海“精武体操学校”的基础上组成“精武体育会”。

“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在南京举行（后被追认为旧中国第 1 届全国运动会）。

1911 年（清宣统三年）

马良编定《中华新武术》，分摔角、拳脚、棍术和剑术 4 科。

1912 年（民国元年）

北京“体育竞进会”成立。

民国政府颁布《新学制》（《壬子学制》）及《普通教育暂行课

程标准》，规定“兵式体操尤宜注重”。

1913 年（民国二年）

第 1 届远东运动会于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日、菲 3 国参加了比赛。

第 1 届华北运动会在北京天坛举行，会后成立了“华北联合运动会”（后改为“华北体育联合会”）。

1914 年（民国三年）

第 2 届华北运动会在北京举行。

旧中国第 2 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举行。

1915 年（民国四年）

第 3 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举行。

上海承办第 2 届远东运动会，中国获总锦标，组委会与国际奥委会发生联系。

“全国教育联合会”提出《军国民教育实施方案》。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创办“女子体育师范学校”。

1916 年（民国五年）

第 4 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举行。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专修科”创办，麦克乐为第一任主任（自 1923 年后，又先后改称为“东南大学体育系”“中央大学体育系”）。

1917 年（民国六年）

毛泽东重要论文《体育之研究》在《新青年》第 3 卷第 2 号发表。

第 5 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举行。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专修科”创办（后改称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

第3届远东运动会在日本东京举行。

恽代英的《学校体育之研究》一文，在《青年进步》第四期发表。

1918年（民国七年）

第6届华北运动会在保定举行。

鲁迅先生在《新青年》发表《随感录》等文章，对“新武术”等“国粹主义体育”进行抨击。

1919年（民国八年）

第7届华北运动会在太原举行。

第4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

吴志青等发起组织“上海中华武术会”。

第五次“全国教育联合会”提出《改革学校体育案》，要求减少兵操，增加课外运动，学校兵操开始衰落。

1920年（民国九年）

第8届华北运动会在北京举行。

上海两江女子体育学校开始创建。

1921年（民国十年）

第9届华北运动会在沈阳举行。

第5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

“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建立，主持了1923年以前的主要全国和国际体育竞赛。

1922年（民国十一年）

恽代英发起组织的“川南联合运动大会”在四川泸县举行。

北洋政府教育部颁行《新学制》（《壬戌学制》），次年公布《新学制课程标准》。正式宣布废止学校“兵操”课，“体操科”改称“体育科”，我国学校体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国际奥委会选出王正廷为中国委员，中国与国际奥委会从此建立了紧密关系。

1923年（民国十二年）

第10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举行。

第1届华中运动会在武昌举行。

“华中体育联合会”成立（后改称“华中体育协进会”）。

第6届远东运动会在日本大阪举行。

1924年（民国十三年）

第11届华北运动会在开封举行。

第2届华中运动会在长沙举行。

旧中国第3届全国运动会在武昌举行。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南京成立，这是旧中国的国家奥委会组织。

在全国、华北等运动会上，田径赛丈量由码制、英尺制改为米制。

1925年（民国十四年）

第3届华中运动会在南昌举行。

第12届华北运动会在济南举行。

第7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

中国学生联合会第7届全国代表大会号召“反对畸形体育”“反对锦标主义”。

1926年（民国十五年）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上海举办“全国分区足球赛”。

主要参考文献

[1] 饮冰室文集. 上海广智书局印行，1903.
[2] 金兆钧. 体育行政. 勤奋书局，1931.
[3] 袁敦礼. 体育原理. 勤奋书局，1933.
[4] 国民政府教育部.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 开明书店，1933.
[5] 王崇武，黎世清，编译. 太平天国史料译丛. 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
[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7] 中国史学会. 辛亥革命.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8] 牟安世. 太平天国.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9] 牟安世. 洋务运动.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10] 龚自珍全集.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1] 魏源集. 北京：中华书局，1976.
[12] 陈景磐. 中国近代教育史.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13] 辛亥革命回忆录.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14]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料.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15] 朱有瓛，等.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16] 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17] 董守义. 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18] 中国体育史学会. 体育史论文集（一）. 1985.

[19] 中国体育史学会. 体育史论文集（二）. 1986.
[20] 谷世权. 中国体育史. 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7.
[21] 顾长声. 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22] 拉斯洛·孔. 体育运动全史. 颜绍泸，译. 中国体育史学会，1985.
[2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日伪统治下的北平.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
[24] 中国体育史学会. 体育史论文集（三）. 1987.
[25] 中国体育史学会. 体育史论文集（四）. 1988.
[26] 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 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
[27] 徐泰来，等. 中国近代史记.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28] 严中平，等. 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29] 周西宽，等. 体育史.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9.
[30] 何启君，胡晓风. 中国近代体育史. 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9.
[31]《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 中国兵书集成.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1995.
[32] 国家体委文史工作委员会. 中国近代体育议决案选编.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
[33] 康有为全集.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34] 苑书义. 李鸿章传.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5] 王金铻，等.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
[36] 王承礼，等. 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
[37] 夏东元. 洋务运动史.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38] 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等. 中国近代体育文选.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
[39] 浙江体育学会体育史专业委员会. 中国近代体育史文集.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
[40] 乔克勤，关文明. 中国体育思想史. 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3.
[41] 苏竞存. 中国近代学校体育史.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42] 戚谢美，等. 陈独秀教育论著选.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43] 罗时铭，等. 中国体育简史.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6.
[44] 关文明，等. 体育史.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45] 张耀庭. 中国武术史.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
[46] 崔乐泉. 中国近代体育史话. 北京：中华书局，1998.
[47] 苏肖晴. 新民主主义体育史.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48] 王章维，等. 五四与中国现代化.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49] 汤铭新. 我国参加奥运沧桑史. 台北：中华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1999.
[50] 郭廷以. 近代中国史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51] 任海. 奥林匹克运动百科全书.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52] 王先明. 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论.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53] 国际奥委会. 奥林匹克宪章. 4版. 北京：奥林匹克出版社，2001.
[54] 陈争平，等. 中国近代经济史教程.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55] 龚书铎，等. 中国近代文化概论. 北京：中华书局，2002.
[56] 刘承华，文化与人格. 北京：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
[57] 郭汉民. 晚清社会思潮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8] 林德利. 太平天国.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3.
[59] 李喜所. 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60] 罗时铭. 奥运来到中国.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61] 任海. 奥林匹克运动.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

后记

《中国体育通史》第三卷的写作，凝聚着集体的智慧。早在2003年的第一次杭州会议上，近代卷的作者就讨论产生了第一个编写提纲。在2004年春天，再次在杭州师范学院召开了近代卷全体编写人员会议，对编写提纲继续进行逐章、逐节的讨论。最后完成了近代卷编写提纲第三稿，并进行了编写人员的具体分工。

《中国体育通史》第三卷的原有编写人员还有上海体育学院的肖焕禹教授和北京体育大学的易剑东教授，二人因工作太忙而未能参加具体的撰写工作。最后承担本卷编写任务的有：苏州大学体育学院教授罗时铭博士（绪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苏州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李翔博士（第五章）；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副所长聂啸虎教授（第十章）；成都体育学院崔莉老师（第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成都体育学院副教授潘华博士（第十一章第三节，第十二章第二节）；成都体育学院李国玲老师（第十二章第一节）。全卷最后由罗时铭进行了统稿。